

# 目 录

一、第四国际重新統一代表大会文件 (1963年6月).....	3
1. 公报.....	3
2. 重新統一的理論和政治基础.....	5
3. 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	16
4. 国际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67
5. 中苏冲突和苏联与其他工人国家形势.....	99
二、第四国际国际書記处关于中苏分歧問題的声明 (1963年7月25日).....	127
*           *           *	
三、第四国际(拉丁美洲托派)特別代表會議文件 (1962年4月).....	137
1. 公报.....	137
2. 宣言.....	142
3. 致欧、亚、非洲国际布尔什維克黨員和干部的信.....	164
四、波薩达斯: 中苏分歧的現阶段及其历史意义 (1963年6月9日在阿根廷工人党[托派]全国扩 大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171
五、波薩达斯: 中国革命的成熟, 政治革命的新阶段 (1963年9月).....	191
六、法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代表 會議呼吁书(1962年7月).....	237
*           *           *	

## 七、社会主义的世界前景

-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在 1961 年年会上通过并在  
以后经过修正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 ..... 246

\* \* \*

## 附录：

### 战争与第四国际

- 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国际书记处 1934 年 6 月通过的  
提纲草案 ..... 323

# 一、第四国际重新統一代表 大会文件 (1963年6月)

## 1. 公报

延續將近十年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已在列昂·托洛茨基創建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即第四国际的一次重新統一代表大会过程中宣告終結。大会在意大利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和观察員。

1953年的分裂是派別斗争的結果。派別斗争的原因是：对苏联发生的自由化过程的意义持有不同的見解，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內部組織問題有分歧。重新統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們一致认为这些爭执現在已过时，双方今日已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綱領。

重新統一代表大会是两个不同的大会的繼續。第一个會議是加入“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大多数支部的代表所举行的大会。第二个會議是加入“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各支部的代表所举行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这两个會議举行于6月21日至26日。

重新統一代表大会通过几个共同文件。“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們立即批准了代表大会的決議，“国际委员会”代表們宣称将提交各自的組織尽速批准。

“国际委员会”代表以观察員身分参加了第七次世界代表大

会。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整整一天时间讨论了密歇尔·巴布洛提出的关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报告。大会一致同意阿尔及利亚现在有可能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开始起着同古巴在拉丁美洲所起的同样的作用。代表大会决定尽最大力量发动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援助。

代表大会对大多数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举行的充满窒息性的官僚气氛的会议作出鲜明的对照，出色地严格遵守民主法则。存在于两个主要倾向之间的分歧得到了广泛和清楚的讨论。经过投票，少数派在各代表团的支持下，在新的领导中获得代表权。

在皮埃尔·弗朗克，厄内斯特·杰尔曼，列维奥·麦丹领导的多数派，和密歇尔·巴布洛领导的少数派之间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关于制止核战争方法的各种不同估计，不同地区的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中苏冲突的意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此应持的态度，以及上届领导机构的工作报告。

大会就多数派提出的下列文件进行了讨论：《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的文件研究了今日革命过程中各主要倾向的辩证法；《中苏冲突和苏联及其他工人国家的形势》的文件分析了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危机，确定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应采取的立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件阐述了当前的世界各种倾向，提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任务。密歇尔·巴布洛提出一个补充文件：《关于国际形势和第四国际任务的提纲》，文件简明地归纳自1961年10月以来曾提交国际讨论的许多文件中已广泛地发挥过的观点。

除了前述三个多数派的文件外，重新统一代表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委员会的一件声明：《争取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迅速重新统一》，文件建议争取重新统一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的

所有力量应采取的立場和根本政治条件。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由于它本国的反动立法关系而没有参加第四国际，但对第四国际生活表达了兄弟般亲密的关切。

在大会开会期間，代表們靜默一分钟以哀悼列昂·托洛茨基的伴侶娜塔莉婭·塞杜娃。大会对自上届世界代表大会以来逝世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色利·曼剛和弗尔南多·布拉伏也致以同样的哀念。

大会发出一項号召，发动一次强大的运动来保卫最近遭受逮捕的秘魯农民領袖胡哥·勃朗科，和身系監獄的另一个秘魯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伊斯馬埃爾·弗里亞斯。<sup>①</sup>

大会向印度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屬於左派的印度共产党人表示关怀。他們由于反对中印边境冲突中被鼓动起来的沙文主义而被尼赫魯政府投入監獄。

重新統一运动重新集合了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現在还处在重新統一行列之外的有，拉丁美洲的前曾参加过“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极左派，以及“国际委员会”的英国和法国的支部。虽然曾邀請他們派遣观察員，然而他們拒絕了。尽管如此，代表大会仍重申它的关于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力量重新統一的号召。

1963年6月27日

## 2. 重新統一的理論和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工人党”<sup>②</sup>政治委员会在几个月以前通

① 后来我們得悉：弗里亞斯同志已获釋放。

②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美国托派組織。

过一項決議：“爭取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迅速重新統一”。這項決議把它认为有可能重新統一的理論基础和政治基础歸納为十六点。重新統一代表大会接受了這項決議，作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重新統一的基础。全文現在发表如下：]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自 1954 年以来分裂了。过去各种努力对弥縫裂痕都证明无能为力。但是近来，由于第四国际，即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在数量和影响的新的发展方面存在着鼓舞人心的因素，双方感觉有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謀求重新統一的必要。

“社会主义工人党”前已指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各派統一有着一个原則性的基础。

去年国际書記处曾采取主动，坚持指出結束分裂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国际委员会”<sup>①</sup>方面建議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尽管“国际委员会”有些同志对此认为仅仅是便利共同討論和进行有关各个方面的共同利益的統一工作的一个有效办法，但是多数同志明白表示欢迎成立仲裁委员会，认为是走向迅速重新統一的一項重要步驟。

尽管还存在着若干实质性爭論，特别是关于 1954 年分裂的原因，但是在基本共同綱領和对目前世界发展中主要事态的共同分析面前，分歧各点已成为次要，这两方面已将两派团結起来。只要有良好的願望，有可能把所有还存在着爭論放在一个統一的組織內，繼續通过討論来澄清；这样来做，现在还屬於这一或那一組織的各成員的力量和才能統一起来的重大益处就有了利用的可能。

主要的事实是，双方的多数派对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基本

---

<sup>①</sup> “国际委员会”是英国托派于 1953 年同“第四国际”分裂后成立的一个对立組織。

立場已統一起來。我們尽可能簡略地指出共同點如下：

(一) 垂死的社會的當前危機歸根到底反映了革命領導存在着長期的危機。全世界範圍的生產力發展已使全世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達到更為成熟的階段。只有實行全世界性社會主義經濟計劃才能迅速地克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經濟不發達狀況，解除人類遭受核毀滅的威脅，保證世界社會取得持久的和平、無限的富裕、無限的文化發展和實現人類完全的自由。社會主義不取得國際性的勝利，腐朽的資本主義將繼續大批地浪費資源，把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保持在可怕的貧苦中，延長社會不平等和種族不平等，支持獨裁制度。為了充實這幅飢餓、不安全和壓迫的悲慘圖畫，資本主義還不斷地進行着核毀滅威脅。

(二) 出乎所有我們前輩的著名馬克思主義者預料之外，社會主義世界革命延遲了，這主要是由於工人運動傳統領導的無能，由於他們作為資產階級和克里姆林宮的幫手的可恥行為。他們應對戰後 1918—1923 年和 1943—1947 年主要革命危機以及 1932—1937 年次要的危機的失敗負責，應對這些危機本應以無產階級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取得政權為結束而終於失敗負責。

(三) 只有建立一批能夠領導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取得政權的新的群眾性的革命馬克思主義黨，才能勝利地解決世界危機，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建立這樣的黨是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方針和目的。制定一個包括各種口號和過渡步驟的綱領在建黨工作中有着決定性作用，這是因為克服領導危機主要的問題是消除存在於群眾目前的覺悟水平和客觀需要的覺悟水平之間的鴻溝。群眾覺悟目前停留在只關心當前的事務和當前的問題的水平上，而客觀需要的是要推翻資本主義並建立以民主方式選舉並以民主方式進行工作的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的工人國家的覺悟水平。在革命

的社会主义建党工作中应该实行列宁方式，这些方式包括在现有的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核心中，同时也要在有需要或有机会可以灵活地接近而又有可能被吸引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中来的各种不同倾向的群众团体的领导内部，耐心地坚持地吸收工人分子。个别吸收和大规模策略性运动的方式应该作为建党工作的补充办法，这两种办法都各有各的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危险。一方面由于党处于被迫孤立的情况下，在改造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另一方面，由于要适应改良主义环境，也容易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行所谓“打进去主义”的策略时，凡是已打进那些特别复杂和困难的地方去的人，应该经常地保持一部分公开的独立工作，包括他们本身的托洛茨基主义报刊；应该充分意识到，离开这个标准将会带来严重的危险。

(四) 作为国际组织的第四国际和作为民族党的它的支部都应该接受民主集中原则。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证明这些原则的正确性。民主集中制符合为实现革命任务而采取迅速和有纪律的行动的需要，同时它保证讨论的自由和组织各种派别的权利，没有这些自由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真正的政治生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由于关怀内部民主，这和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党或改良主义工会运动培养出来的官僚分子强加于他们所控制的工人组织的窒息性制度是恰恰相反的。

(五) 改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器不利用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去推翻所有已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地方的资本主义。他们不去关心无产阶级历史利益而首先关心他们自己的特权和政权。由于他们的消极怠工，由于他们的反社会主义观点，或者由于他们了解到起义会把他们一起冲垮，他们只是在不得已的、被迫的情况下发动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谴责和反



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孳生禍害的同时，不能把这些組織的真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劳动者和他們的叛徒领导同等看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承认，主要任务不在于单单进行反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文字斗争，而是真正地把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劳动者爭取到綱領中来，爭取到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組織中来。

在先进资本主义各国长期“繁荣”的压力下，和反对斯大林主义罪行的反应中，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已經掀起一次广泛地反对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进攻。必須进行一場坚决的思想斗争来反对这股修正主义潮流。

(六) 苏联的政权尽管被享受特权的官僚主义所篡夺，但是它依然是个工人国家。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摧毁了资本主义，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依然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不論它有多大的缺点、錯誤甚至罪行，比起资本主义来它依然是进步的。通过巨大的工业和文化革命而实现的苏联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已經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改造成世界第二个工业强国，在許多技术领域內确实可向帝国主义挑战。世界历史上这个偉大事实证明计划經濟有它的巨大潜在力，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者采取无条件保卫蜕化的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場是正确的。

(七) 苏联官僚主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脚印，把它的权力和寄生主义伸展到东欧的所謂“人民民主”国家和北朝鮮。但是为了保持它的特权地位，它必須在这些国家用官僚—軍事办法摧毁资本主义。这些办法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不正常的环境：当地的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权暂时垮台，加上战时和敌人占領时期大屠杀之后工人阶级极端地被削弱。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变质的工人国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保卫这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要在这些国家里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

(八) 在无产階級民主遭到斯大林主义摧毀的工人国家里,以及由于斯大林主义影响从未有过无产階級民主的工人国家里,必須为无产階級民主的恢复或建立、为实行劳动群众民主地管理国家和經濟而进行斗争。斯大林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已經用政治反革命手段摧毀了无产階級民主。因此列宁主义力量面临着这样的任务:組織一批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以便工人階級有领导地实施推翻官僚貴族的独裁并代之以无产階級民主的权利。这意味着必須进行一次政治革命。把无产階級民主恢复到高水平后,各工人国家首先是苏联,将恢复斯大林之前的吸引力,从而将在资本主义各国中掀起一个爭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新高潮。

(九) 在古巴出現一个工人国家——它的形式还未肯定——具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古巴革命是在一个完全独立于斯大林派之外的领导下实现的。7月26日运动向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发展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典型,它現在已成为一系列国家的榜样。

(十) 由于世界革命出現了新高潮,尤其是由于在国际范围内改变了階級力量对比的中国的偉大胜利,已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帝国主义的胜利以及苏联經濟、技术和文化的巨大成就壮大起来的苏联无产階級,对官僚主义专政所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了,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当权的貴族为了減輕这种压力,作出了大規模的让步:取消了极端的警察专政(撤消了强迫劳动营,修改了斯大林的专橫的劳动法),摧毀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恢复了斯大林清党运动中許許多多的受害者的名譽,显著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在各領域内撤除了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限制。赫魯曉夫政权并不是要粉碎官僚专政,他的目的不是要来一个“自动改造”,而是要在日益高漲的人民压力面前保持貴族的政权。但是群众把这些让步只当作是偿还他們的欠債的一部分,他們力图把所

取得的東西變成新的據點以爭取他們最後的切身要求，即恢復無產階級對經濟和國家的民主監督。歐洲各工人國家的無產階級地位這種緩慢地然而穩定地加強，是斯大林主義的世界性危機的根本原因之一。

(十一) 南斯拉夫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領導之間發生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衝突，促成了怵目驚心的分歧的爆發，從而最後地打破了斯大林主義的完整體系。匈牙利工人的政治革命的嘗試加深了這種衝突。古巴革命使這個危機更加深刻化。隨着中蘇衝突的發生，這個危機已成為世界政治頭等重要問題之一。危機除了反映各民族官僚主義之間的利益矛盾、蘇聯官僚主義和它影響下的各國工人階級之間的利益矛盾外，還反映了斯大林主義和生氣勃勃的勝利的革命之間的根本不可調和性。在生氣勃勃的勝利的革命中，戰鬥的先鋒隊伍力圖遵循列寧的教導。因此這個危機具有非常進步的性質，它標誌着重建一個全世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群眾運動的一個重要階段。

(十二) 殖民地革命與斯大林主義世界性危機已結合在一起，在目前世界革命中起着關鍵性作用。在十年多一點的時間內，殖民地革命迫使帝國主義取消了幾乎全部的直接的殖民地統治，而代之以間接的統治，即同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實行新的“聯合”，即使在有些地方這個資產階級還在萌芽狀態中。但是這種制止被殖民地革命所喚醒的國家擺脫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企圖，遭到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不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控制，就不可能解決這些國家的解放和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历史任務。因此殖民地革命有着發展成為不斷革命的趨向，就是說，這些革命以徹底的土地改革開始，而後轉到剝奪帝國主義托拉斯和“民族”資本家財產，最後走向建立工人國家和實行計劃經濟。

(十三) 在一个以仅仅要求民主权利开始，而将以摧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告终的革命的道路上，无土地的农民和半无产阶级力量所进行的游击战，在有一个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领导的情况下，是能够在摧毁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政权、加速它的崩溃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从战后经验中应该得出的主要教训之一。这个教训应该有意識地結合到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的战略中。

(十四) 第二次大战后，西欧的资本主义成功地暂时稳定了。这个强加于工人阶级的后退，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主义领导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叛变所致。他们阻止群众在战后革命大危机中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是，资本主义这种暂时的稳定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的增长，包含着更尖锐、从而归根到底更具爆发性的矛盾。这些矛盾也关系到其他帝国主义大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这些矛盾包含着地理上日益缩小的世界市场越来越猛烈的竞争，想克服通货膨胀的必要性同想把潜在的大经济危机转化为有限的衰退的必要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性；维护“社会和平”的愿望同为了使自已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而必须进攻工人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就业机会之间矛盾的加深。这些矛盾越来越使阶级斗争尖锐化，使阶级斗争有可能从经济斗争上升到尖锐的政治斗争，并在有优越的领导条件下，可能掀起帝国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一次新进攻，在资本主义最后堡垒内部对资本主义进行挑战。

(十五) 社会主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是持久和平的唯一可靠的保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帝国主义有步骤地准备一次新的冲突，挑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起来反对各工人国家，其中以苏联作为主要靶子。扩充军备已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经常的支柱，已成为符合资本主义世界联盟的头子美国资

产阶级政治目标的一个经济需要。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和苏联周围建立广泛的反革命力量。它对新的解放斗争的第一个反应是设法把解放斗争淹没在血泊中。它的军事干涉越来越具危险性。随着古巴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而发生的危机中，统治美国的亿万富翁的各资本家家族表明他们准备对苏联发动核武器攻击，甚至要使人类和文明冒毁灭的危险。这个难以想像的毁灭力量只有美国工人阶级才能把它从华尔街的疯子手中夺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在把美国无产阶级提高到伟大的历史任务的水平上来将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历史任务即是争取世界社会主义决定性的最后的胜利。

(十六)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积极地参加一切争取单方面裁减核军备的人民群众运动，为立即停止一切核试验而斗争的同时，应该明白地指出人类到处面临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抉择，即不是世界社会主义就是核毁灭。清楚地理解这种处境不会降低群众士气，相反地有力地推动打倒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以为不必结束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而可以通过“和平共处”来保证和平，是一个致命的幻想。打退核武器战争的威胁最好的方法是通过阶级斗争来争取社会主义。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由于对这些基本观点见解一致，有义务加速实现重新统一。企图延长分裂是不合原则的。重新统一也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从各方面来看，革命运动已有了新的扩大机会。古巴革命已给拉丁美洲和其他殖民地国家所奉行的斯大林主义的阶级合作政策以沉重的打击。在古巴革命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的潮流正向革命的社会主义寻找它们的道路，努力把殖民地革命主要的教训应用到自己的形势中。阿尔及利亚革命已对非洲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起了同样的作用，联系这

些向左发展的各潮流，同它們一起进行工作，甚至在不放棄我們的原则下团結它們，这一切已經成为紧迫的需要。重新統一将大大地便利我們这一任务的完成，加强我們本身的力量并賦予托洛茨基主义以日益增长的組織上的吸引力。立即可取得的后果将是：我們在帝国主义内部所进行的保卫殖民地革命的工作将取得越来越大的效果，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綱領在爭取本国的經濟、社会和政治的根本改造的一切严肃的革命者中間的份量将越来越大。此外，毫無疑問延长已分成抱有各种暗淡的动机的派別的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局面，只能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吸引新的力量的能力大幅度地削弱。

与此并行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导致了出現在中苏分歧中的明显的大分化，解放了全世界共产党內的巨大力量。許許多多战士被我們的列宁主义綱領和傳統、我們几十年来反对斯大林主义斗争的正确性、我們坚持保卫内部民主的行动所吸引。我們缺乏团結，我們表面上不能在一个单一的巩固的組織內調动我們的力量，使他們惊異，使他們不敢接近。重新統一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将有效地推动用真正的列宁主义精神、用自己的真正的国际团結和无产階級民主的傳統去教育共产主义战士的工作。很明显，一个統一的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所有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将更具吸引力。这些世界共产主义力量对斯大林主义和它的分支來說是越来越具危險性，它們已准备对一个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組織能力上是严肃的运动的立場进行考察。

最后，我們應該以最大的注意力来考虑我們对青年工人和学生的吸引力問題。青年工人和学生在示威、进攻和領導革命起义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巴革命主要是青年的功績。同样，正是青年把土耳其的曼德列斯和南朝鮮的李承晚的腐朽的独裁政

府推翻了。在美国的争取黑人平等的斗争中，法国的同情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斗争中，反对日本和西德的重新武装的斗争中，英国的反对失业的斗争中，也是青年人充当了突击队。在苏联和欧洲各工人国家加深和扩大非斯大林化的运动中，青年也是站在战斗的前列。在全世界，青年高举起争取单方面核裁军的斗争旗子。我們可以用我們大胆的綱領，我們的战斗精神和我們的战斗行动来争取这新一代中最优秀的分子。我們之間过去的爭論对革命的青年积极分子已很少意义了，他們关心的首先是关于迫于眉睫的問題和当前的重大政治問題，因此为了过去爭論的分歧而拒絕加强我們之間的團結只能把青年往外推出去。

簡言之，迅速地重新統一已成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必不可缺的。当然，在派系斗争曾經是长期的和剧烈的各国，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問題。但是这些問題也是可以在整个国际重新統一的条件下得到很好的解决。重新統一将使双方的主要领导人开始在目前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形势下創造新的友好气氛并扫除客观上毫无根据的害怕心理。經過了一段时期在越来越多的方面的共同的友好活动，我們确信在目前看来无法克服的地方性的問題将由同志們自己通过民主方式来解决。

我們也相信，一个統一的組織有可能提出可供考虑然后接受的各种建議，以便在不涉及割断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精神的情况下，消除还可能存在的关于章程所载明的保证民主权利的一切怀疑。

我們的运动已面临同 1938 年第四国际成立时同样巨大和严重的責任，我們要求两个潮流在今后几个月內即将举行的各自的国际會議作出决定：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統一的时刻已經来到了，而这件事應該在重新統一代表大会上予以实现，而重新統一

代表大会应在上述国际会议后尽可能快地举行。

1963年8月1日

### 3. 当前世界革命的动力

1963年6月第四国际重新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 一、时代背景

按照经典的世界革命的纲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这样给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作出榜样。“先进的国家将让落后的国家看到自己的前途，”马克思曾这样写道。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来，高度的工业化基础、强大的无产阶级以及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劳工运动乃是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所必须具备的主观和客观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只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才具备的。

诚然，在1848年的革命之后，马克思对于这个纲领的政治条件之一曾经表示过某种怀疑；就是说，在一个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成熟而现代无产阶级已经存在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是否一定有能力实现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来恩格斯更进一步推翻了这一个纲领；他曾经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所以比较薄弱，恰恰是因为英国是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由于它的高度的生产能力在全世界居于垄断地位。

二十世纪初，托洛茨基于1905年所提出的，工人阶级将发现自己被迫去实现按照历史的观点应当由资产阶级去实现的任务的不断革命论，以及列宁于1914年提出的，帝国主义的锁链将首先从



它的最薄弱的环节破裂的帝国主义論，都表明他們已經了解到，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和彼此关联的規律所必然产生的主要結果；就是說，由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資本主义制度存在着本身的矛盾，无产階級完全可以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政权。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都坚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取得的革命胜利，最后将证明不过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的資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的一个序幕，同时也是便于最后取得这种胜利的一个方法。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布尔什維主义者在 1917 年 10 月取得了政权，并在 1919 年成立了第三国际。

革命实际經歷着一个更为曲折的道路，这是这些最偉大的革命理論家都沒有料想到的。我們知道，由于这种革命所走的弯路，整个人类，特别是第一批工人国家中的工人和农民不得不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改良主义的官僚集团的叛变导致了 1918—21 年德国和中欧的革命的失敗，因而使得第一个胜利的革命运动出現在落后的俄国，其結果就等于是給为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严格控制的苏維埃国家和共产国际的官僚主义蜕化鋪平了道路。由于共产国际已从一个世界革命的工具变成了掌握在克里姆林宮手里的外交活动的工具，这就使得它，最初是无意識的，后来是有計劃的，阻撓了許多有希望的国家的无产階級革命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結束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階級合作政策，配合着西欧帝国主义的努力，使得某些社会主义的胜利在客观上已經成为可能，甚至已經即将来到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資本主义經濟和資產階級政府完全稳定下来了。

由于 1919—23 年和 1943—48 年两次較大的革命浪潮——以及 1934—37 年較小的一次革命浪潮——的連續失敗，世界革命的

主要中心有一个时期轉移到殖民地国家中去。1949年，随着战后欧洲革命浪潮的出現，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給一系列的連續不断的殖民地革命开了先声。所有在1917年之后取得胜利的革命，包括在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和古巴等通过武装革命运动建立起来的工人国家，都是在比較落后的国家实现的，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早日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却反而推迟了。

有一种观点是我們必須强烈地加以反对的，就是說这种經典的馬克思主义沒有預見到的发展情况或多或少是由于客观条件，或者說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缺乏革命热情或革命意志所造成的。誰也不能认真地否认，在1917年之后，在許多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所发动的群众运动或甚至說起义运动已經使得推翻資本主义制度在客观上成为可能了。（这种情况出现在德国和整个中欧是1935—37年，意大利是1919—21年，德国1923年，英国1926年，奥地利1933—34年，西班牙1931—37年，比利时1932—36年，法国1935—37年，意大利1943—48年，法国1944—48年，英国1945—50年，等等。）同时我們也不能完全否认，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除外）中的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无数次的总罢工、对工厂的占領、动摇本国政府的群众示威运动以及甚至威胁着资产阶级政权基础的起义运动，已經一再地表明他們已經了解到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重新改建社会的必要性，并表明他們要实现这一任务的願望。这些努力的失敗并非由于这些无产阶级天生无能，由于政治上“落后”或者“腐敗”，而是由于领导集团違反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再拒絕利用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夺取政权，或甚至有意打消这种可能性。欧洲的无产阶级由于领导叛变所受到的打击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都更为严重，这种情况从德国和西班牙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然，革命领导的危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中，也和先进的国家中一样存在。许多失败的或流产的革命运动——从1925—27年的中国革命一直到不久前危地马拉和伊拉克的失败——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在斗争可能产生的结果方面，很显然领导力量的不足在落后国家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敌人要强大得不知多少倍。

面对着帝国主义国家中强有力的富于经验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具备一个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力量，它必须能够：（1）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建立统一行动的纲领；（2）尽最大的可能动员工人阶级中潜伏的、常常是隐蔽着的革命力量；（3）战胜已经知道如何利用各种改革来强有力地阻止革命运动的非常狡猾和机智的资产阶级的领导力量；（4）在不牺牲本阶级具体目标的前提下，尽量争取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资本主义的群众基础），并使其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于中立地位。不存在暴发性的土地问题，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是资本主义所以能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落后的国家中情况就不同了。面对着一个从根腐烂而且完全得不到群众支持的统治阶级，革命力量能够使全体劳动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最穷的农民和完全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参加斗争，彻底破坏传统的秩序和状态，对中间派的工人阶级政党和类似的党派施加巨大的压力，最后让他们取得政治领导权。

在任何接近于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之下，我们必须记住，正像列宁曾经说过的，“决不可能存在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无法找到出路的情况。”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一次革命浪潮的失败，最后总给那个国家带来某种形式的暂时的相对的经济上的稳定，甚至

促成它的新的發展。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在一定期限內推延了新的革命運動，因為工人階級的政治上的失敗（甚至意志的消沉）更加上生活水平的提高顯然是不利於立即再採取新的革命行動的。

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由於資本主義本身的缺點，由於帝國主義創造出來的特殊的經濟結構，由於絕大多數的人民群众在沒有完成激進的土地革命之前永遠處於悲慘狀態，由於一方面工業化以相當大的速度向前發展而另一方面生活水平始終停滯不動或甚至日愈下降等等情況，一次革命浪潮的失敗不會自然地帶來相對的或甚至暫時的社會或經濟的穩定。因而，一個似乎永遠不會完結的群眾鬥爭運動會繼續下去，正像玻利維亞在整整十年中的經歷一樣。敵人的力量的薄弱使得暫時遭受失敗的革命，和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情況相較起來更容易儘快得到恢復。

總起來說，1917年以後的革命的勝利和失敗表明了在全世界範圍內，舊的統治階級和勞動群眾之間的關係。革命首先在落後國家而不是在先進的國家取得勝利的事實，並不能證明先進國家中的工人沒有表現出足夠的革命戰鬥性。這只是表明在這些國家中他們必須戰勝的反對力量，要比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不知強大多少倍。落後國家中敵人的力量的薄弱，使得他們甚至只有一些非常遲鈍的武器的時候也有可能取得政權。而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由於敵人的強大，就要求他們必須使用更為完善的工具。

同時，另外一個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三種世界革命的主要力量——殖民地革命、蛻化變質的工人國家中的政治革命和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實際組成一個辯證的統一體。每一種力量都影響着其他的兩種力量，同時從其他力量受到促使自己發展或妨礙自己發展的強有力的影響。帝國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的推遲一般說來，毫無疑問地阻止

殖民地革命使它不能更快地和更有意識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而如果它能够受到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强有力的革命运动或革命胜利的影响，情况就会完全两样。这种推迟同样也使得苏联的政治革命不能尽快达到成熟的阶段，特别是由于这种情况使得苏联工人看不出采取另一种办法来建設社会主义的令人信服的榜样。最后我們还必须說明，由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迟而受到某种阻撓的殖民地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浪潮，却又反过来帮助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使他們极力想不让革命再推迟下去。

## 二、殖民地革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而且更明显的是自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始終不停的群众运动已經使得一个接一个的落后国家走上了不断革命的道路。这一浪潮的一般的原因應該說是由于旧的殖民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后遭到了削弱；苏联的进步，特别是新中国的进步对它們产生了吸引的力量；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已經开始認識到他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所处的悲惨境地；民族独立运动所表现的威力以及在人民群众看来获得民族独立就可能改变他們的悲惨处境、提高他們的低下的生活水平和低下的文化水平，并消除各种各样的剝削和压迫；特别是在“朝鮮战争时期的繁荣”結束以后，輸出原料的国家在国际貿易上的地位日愈恶化；在过去十年中，一切工业化国家的巨大的經濟发展和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群众生活水平的变化的近于停滞（或每况愈下）——所有这些都可以說是殖民地世界普遍发生动荡情况的主要原因。

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过程，殖民地革命首先表明了二十

亿的人民——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們按照几百年的傳統一直处于被人統治的状态之下，遭受着最大的压迫和最殘酷的剝削，遭受着无比的屈辱，而在如果他們不被作为大量屠杀和灭絕的对象的时候，就必须完全拋棄他們的民族傳統和甚至他們的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現在却忽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說出了他們自己的語言并表現了他們自己的人格。归根結底一句話，殖民地革命就是这二十亿人民至少要变成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和建造者的不可抑止的趋向。从社会的观点看，这情况是只有通过建立工人国家才有可能达到的，这就給殖民地革命的总的傾向提供了使它走上不断革命的道路的客观基础。

在世界革命的过程中，殖民地革命——首先是中国的革命，接着是一系列其它地区的革命运动——已使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体系不再可能有1921年以后的暂时稳定的局面。它使得各种力量的国际关系不利于資本主义，并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进行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防御战——而且往往遭到失敗——这些战争原是帝国主义为了遏止殖民世界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而发动起来的。这样，殖民地革命就对世界一切地区的反帝的力量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它使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获得了必要的喘息机会，以便它們能够克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高潮时期帝国主义在軍事方面所掌握的优势。

殖民地革命决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摧毁帝国主义。說一句看来有許多人不会同意的話，殖民地革命甚至并没有能够破坏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的经济稳定。完全違反1919年以后一般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論断，殖民体系的垮台并没有立即給帝国主义国家带来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潰；而和它同时出現的却只是一如半个世紀以来的情况，資本主义的生产和对外貿易得到了最大的

相对的发展。

这个看来似乎不可信的情况所以会产生是有很多原因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只要这些通过殖民地革命获得独立的新兴的国家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仍然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参加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那么在那些国家中帝国主义的真正势力就依然可以说是安然无恙。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统治由一种直接的形式变成了间接的形式罢了。正像很早以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见到的，在面向着殖民地革命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基本策略将是改变它的统治的形式，而竭力保存它的统治的实质。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转变会使帝国主义遭受到一些实际的损失，因而它不得不尽量避免这种具有危险性的统治形式的改变，有时甚至不惜发动不顾一切的残酷的殖民地战争。

由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改变为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就必须对殖民地人民群众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重新进行分配，其结果是有利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同时由于这种转变必然会加速殖民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所以这甚至等于是改变国际劳动分工的状况，使得生产某些工业消费品（特别是纺织品）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可以从世界市场上分得更多的利润，而限制了帝国主义国家，使它们不能进一步扩大向外输出的投资商品的数量。

新殖民主义的这一方面的情况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本身的固有的需要相适应的，工业结构的改变迫使它急于想寻找新的出售生产资料的市場，而不是出售消费品的市場。所谓的“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拆穿了说，不过是从财政上来支持求得满足这些需要的努力，其所能预期到的政治上和社会关系上的结果都只不过只

是成功地滿足主要的經濟需要之后的副產物。可是這種在資產階級把持下的極其有限的工業化的過程以及帝國主義所提供的少得可憐的“援助”，絲毫也沒有能夠滿足殖民地國家經濟發展的真正的需要。從根本上來看，它們的社會經濟結構現在和過去處於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之下的時候是並沒有什麼改變的。它們實質上仍然是生產和出口原料和食糧的國家，仍然完全受着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它們的農村地區仍然有嚴重的失業或半失業的現象存在。甚至這種有限的工業化過程也是在引起通貨膨脹和降低實際工資的情況下完成的；那也就是說，在進一步加深工人階級的苦難的情況下完成的。

既然直到現在為止，殖民地革命還仍然被限制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範圍之內，所以它對於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經濟並不是一個嚴重的經濟上的打擊，同時也並沒有在那些失去舊日的帝國統治的帝國主義國家中觸發起較大的經濟危機。只有一個帝國主義的經濟，由於它的特殊的經濟結構，仿佛是在一旦失去自己的殖民地的時候就無法維持下去了——葡萄牙。

可是這並不是說，殖民地革命對帝國主義的經濟活動完全沒有影響。它的最顯著的結果是，減緩了私人資本對落后國家的輸出，並迫使國家或國際的公共（政府）機構負擔起在帝國主義極盛時期始終由私人資本負擔的任務。從這裡就產生了嚴重的金融、財政和經濟上的矛盾。在過去十年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在相對的迅速發展的時期就已不願把剩餘部分向落后國家輸出的私人資本，由於殖民地革命的发生，這種輸出更完全停止下來，這情況顯然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政府對投資的保證和保險只能減輕，但並不能完全克服這種困難。

只要極大多數新興的獨立國家仍然處於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



範圍之內，從世界資本主義的觀點來看，這些困難還只不過是一個“較小的災禍”，這些困難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之內多少還有可能加以克服——至少在目前的情況下是如此。只有那些主要的半殖民地國家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變成工人國家的時候，殖民地革命才會給它帶來嚴重的經濟打擊，並迅速在那些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完全從發展的情況來看，可以認為在政治革命在蘇聯取得勝利以前，以及在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或幾個重要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以前，這些國家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變成工人國家的。可是不管怎樣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如果以這個不十分肯定的假定來作為他們行動的基礎，那恐怕是不十分合適的。要實現這種前景不但需要殖民世界的永遠革命的過程一直延續下去（實際情況肯定會是这样），同時需要這種過程在一定的時間限制之內（在各個地區都已取得勝利之前）得到一個勝利的結局。世界革命的三種主要力量的發展在時間的先後上可以有種種不同，如果任意以其中的任何一種可能性來作為我們政策的基礎，都可能產生極其嚴重的政治上的錯誤。

殖民地國家進行不斷革命的客觀條件，最主要的是，殖民地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領導集團沒有能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範圍之內，解決由經濟和文化的動蕩所產生的一些根本的問題。這方面的最突出的表現是資本主義沒有力量進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其客觀條件則是由殖民地群眾一般都不能理解爭得民族獨立和爭得較高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之間的差別這一事實所決定的。如果生活條件得不到改善，他們就會認為，他們所取得的獨立似乎不夠完全、不夠徹底，或者是不真實的。這就說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不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殖民地國家中要

想求得社会、經濟或政治上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在短暂的时期內，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义的領導力量也可能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因为它可以让人民群众仍然认为它是在进行爭取民族独立的真正的反帝的斗争，并可以成功地让人民相信社会变革和經濟发展已經实际在进行之中。在这方面取得相对的成功的一些比較突出的例子是阿根廷的庇隆、埃及的納賽尔和印度的尼赫魯。甚至在這些例子中，它們的政治上的稳定实际上也是极不稳固的，并且表明，如果出現了另一种能够环繞着根本的、具体的革命目标来动员人民群众的一般反帝情緒的（这是傳統的領導集团所无能做到的）工人階級領導机构，将会发生如何不同的情况；比方，在印度实行的激进的土地改革。

由于以上所有这些原因，对大多数落后的国家來說，最可能出現的前景是，在那里將出現一連串持久的社会革命的危机，这些危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义的領導力量將不顾一切地加以限制或使其轉化，但它仍然將不顾一切不可避免的挫折不时跳出那些領導力量的限制之外。这种持久的不稳定的时期和社会危机并不表明无產階級或革命农民階級的力量在馬克思主义的領導之下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或者說，工人国家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正如把（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势力的領導之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開始和在无產階級領導之下胜利的結束完全等同起来的情况一样，任何人如果认为这一过程会自然地或者不可避免地在一一定的時間內发生，那就势必会錯誤地估計各种力量的真正对比关系，并以幻想和一廂情願的打算来代替科学的分析。它事先就认为，这种必須通过先鋒队的主观努力（亦即对群众运动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領導）在斗争中来加以解决的任务，会在客观过程中自己解决。在革命的过程中，并且在一個比較短的

时期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古巴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然而这个过程也决不是必然发生的，同时如果没有这一过程，革命就肯定会遭受严重的失败或者至少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其它拉丁美洲国家最近的历史所表明的：例如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危地马拉的情况就是如此。

要比较精确地推断每一个按种族和地理划分的大区域的殖民地革命（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黑非洲、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可能的前景，我们就必须对这些地区的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以及他们的更确切的经济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不管怎样，某些一般的社会趋势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是大体相同的：

(a) **民族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和經濟上都是不够强大的。**尽管从历史上讲，民族资产阶级出现得更早一些，可是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能力好好地利用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的名誉下向他们提供的资本，以求获得预期的工业化的结果。这也許是对经济不发达问题采取“资产阶级式的解决办法”的最大的障碍。在所有的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一种相同的现象：可以利用的剩余资本一大部分都从工业用途上转向对土地的投资，或者用于放高利贷、囤积物资、进口奢侈的消费品，甚至直接流出国外去。这种民族资产阶级的无能并不是它的道德败坏的结果或反应，而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分子追求利润的冲动所必然引起的正常情况。对不断革命的恐惧在这里也起着决不是最小的作用。

(b) **以财产国有化的形式，通过国家机器建立重工业的下层结构。**推动并具体代表这一过程的社会基础是由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军队和政府机关中的职员所构成的。因此这个过程，甚至是必然地，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政体的发展。然而，

在私有經濟方面，它可能同旧的資產階級在許多方面的利益发生冲突——不仅是同傳統的买办資產階級，而且甚至同工业資產階級也有所冲突。这就說明了为什么在像埃及、加納等等国家中会出现反对資產階級的宣傳和把資產階級企业收归国有的情况。不管尼赫魯和納賽尔这两个政权之間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別，国家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乃是尼赫魯和納賽尔的“社会主义”的客观基础。資本主义的一般經濟特点在下面这样一些国家中是必然会明显地存在的，只要：（1）国家机器本身和已經国有化的部分經濟仍然是私人資本积累和私人工业的培养所（通过贪污、盜窃、公开受賄和拿津貼等等办法）；（2）国家的經濟仍然从屬於資本主义的世界市場；（3）可以助长資本积累的小商品生产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

（c）**殖民地无产階級的战略任务。**从这些国家的特殊社会和經濟結構来看，我們可以說，无产階級的主要力量并不是产业工人，因为他們在这些国家靠工資过活的人群中实际只占少数，这里，只有阿根廷是一个例外。殖民地的无产階級因而就必须包括一切完全或主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力为生的人群；那就是：产业工人、服务行业工人、家庭雇工、矿工、种植工人、农业工人以及打零工和临时工的城乡劳动人口。在他們中間，最重要的是后面的四种人——矿工、种植工人、农业工人和大部分時間失业的劳工——这正是殖民地經濟的典型的情况。他們为数之多往往是一般人所料想不到的。甚至在黑非洲的一些国家中（罗得西亚、南非、安哥拉、剛果），他們也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三之多。在古巴革命运动中，由于首先参加游击队的都是貧雇农，革命因而得以农业工人以及农村失业人口为基础，最后才跟制糖工业和城市无产階級联合起来。古巴革命所以能够很快地达到那样高的觉悟水平，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群众基础。

(d) **农民阶级的积极作用。**在扩展游击队的活动中，农民阶级在殖民地革命中所起的积极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它表现出了一种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农民阶级多少有些不同的社会特性。然而，为了防止误解或混淆（这在某种情况下是可能会引起极其悲惨的结局的，中国实行人民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sup>1</sup>），他们之间的两个根本的差别这里必须说明一下。

首先，农民阶级为争取以私有制形式占有土地（虽然土地以合作社的形式集中起来）而进行战斗的革命作用和农民阶级在对农村所有制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保守作用之间的差别。东欧和中国的经验已再次证实了俄国的教训，那就是，无论什么地方地方的农民，为了使自己变成土地的主人，在反对地主、高利贷者和买办的联合势力的斗争中总是站在最前列，它作为一个阶级，只是在工人国家还没有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前，能够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这种关系的基础只能是农民阶级中最穷苦的部分，因而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如果希望避免严重的社会危机，就只能逐渐地改变。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并不是一切农民普遍都是革命的。在农民阶级中占绝大多数的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的存在，无疑对某些东南亚国家（马来亚、泰国，甚至锡兰）的革命运动，起着巨大的遏制作用。

其次，具有数百年小商品生产历史的古老的农民阶级的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他们或者已经占有土地，或者始终渴望着占有土地——和部分或全部生活在部族所有制（公社式的）经济条件下的农村人口的集体主义倾向之间的差别。后面的这一阶级，和传统的农民不同，他们本质上并不反对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因而，他们在不断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可以是无产阶级

的同盟軍。在某些國家，這一階級的存在可以使農民起義从一开始就具有強有力的半無產階級性質。可是，甚至在这种極有利的情况下，我們也不能對這些群眾的思想覺悟程度給以過高的估計。由於處於悲慘的被壓迫的境地，由於他們真是“除了鎖鏈之外再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東西”，這些群眾的確可以給人類提供最光輝的革命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的榜樣。然而，要使他們具有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特別是紀律性、自治能力和現代工業的觀點等等，那就必須使他們處於有力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和工人國家的教育下，才有可能。

為了在殖民地國家的群眾中爭得領導權，馬克思主義的先鋒隊必須學會如何使這些勞動群眾的基本的進步要求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綱領嚴密地結合起來。不斷地教育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使他們認識到無條件地支援殖民地革命的必要性的工作，必須和為殖民地革命爭取物質支援的實際活動連結起來。對於殖民地國家中爭取自由的戰士們，主要的任務是要把他們基本的革命意識提到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高度，要使他們理解今天世界革命的三種力量之間的辯證的、互相影響的關係。所有這一切是不能希望它們自動完成的。在一切情況許可的殖民地國家中，教育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幹部、建立各種流派和獨立的政黨乃是絕對必要的工作。建立能夠對本國的特殊情況進行具體分析、並能對存在的問題制定出具體解決辦法的第四國際的支部，現在仍然是一切國家的最主要的戰略任務。

為了確定當前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總的進程中的地位，如果光是從政治和軍事角度（如在什麼地方曾經給帝國主義以嚴重的打擊）或者從經濟的領域（如在什麼地方還沒有造成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嚴重威脅）來考慮，那是不夠的。我們同時還必須

注意到这一殖民地革命对帝国主义国家中阶级力量对比的关系所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工人阶级运动，对在官僚主义制度下蜕化变质的一些工人国家中的彼此冲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殖民地革命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能够使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发生不利于资产阶级、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重大的变化。不过，以法国的情况而论，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对法国帝国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的确阻止了戴高乐的拿破仑式的独裁政治，使它不可能得到最后的稳定。在戴高乐于1958年5月上台时受到严重打击的法国工人阶级，终于得到了一个喘气的机会，这对于使他们能够恢复士气并重新积蓄力量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就葡萄牙来说，安哥拉和其它殖民地的革命的爆发，对于破坏萨拉查的独裁政治的稳定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制造出一种革命前夕的气候，把推翻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萨拉查的倒台势必将加速西班牙的革命，削弱法国的拿破仑式的政权，并加强西欧劳工运动的新的斗争热潮。

到目前为止，殖民地革命还没有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群众运动的激进化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最多它只不过是提高了早已在某些重要基层中普遍存在的思想觉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慢慢相对地变弱了。可是它却以间接的方式发生了某些影响，它推动了新的反抗运动，反对旧的领导集团对殖民地革命采取观望、消极或甚至背叛的态度，或者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一般比较低下的政治水平发生了新的促进作用。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那些新的基层一向呼声极高的法国，而且还发生在某些别的欧洲国家，特别像西班牙，还有美国，在这里，由于有机会和古巴革命互相呼应，这就为新一代先锋队打开了进行激进政治活动的大门。

同样的，由于殖民地革命，特别是非洲革命对黑人运动的影响，这就帮助了一个新的激进的左翼的形成。在上述所有这些情况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在这些新出现的先锋队中争取最出色的分子，使他們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并使他們同左派的群众运动发生联系。

殖民地革命对于工人国家中逐渐觉醒的群众的影响是极其复杂而且是多方面的。一般說来，殖民地革命帮助克服了丧失斗志和感到政治上无能为力的情绪。这些群众对于殖民地革命（主要是对中国的革命，还有1959年以后对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一直是极为关怀的，而且这种关怀伴随着休戚相关的感情一直有增无已。同时，由于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采取反革命的策略，并由于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主义统治集团对殖民地革命怀着矛盾的感情而引起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促成了工人国家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分化，这首先表现在青年群众同官僚主义集团之间，后来则更表现在毛泽东派和赫鲁晓夫派之间。可是，毛泽东同苏联官僚机构中最保守的一派结成机会主义的和无原则的集团，再加上他对于破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抗拒，正如我们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情况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的，使这种分化在许多工人国家的共产党中受到了限制，没有发生实际的结果。殖民地革命的另一作用则是它对殖民地学生力量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这些学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磐石一块的气氛中感到呼吸困难，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在莫斯科和索菲亚发生的学生示威运动一样，超出语言的范围，而用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情绪。由某些已越出斯大林主义的控制之外的党派所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出现（如古巴、阿尔及利亚），对国际斯大林主义产生了极有力的分化作用，这是很有利于革命的左派势力的发展的。



如果說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我們还不能很清楚地看出殖民地革命所产生的經濟和政治上的直接影响，中国、北朝鮮、北越和古巴等工人国家的建立对于各国共产党以及对于整个革命领导力量的形成，却产生了强有力的分化作用。

由于許多特殊的原因，南斯拉夫和中国共产党都沒有能够使它們的“傾向”在国际范围得到充分的发展。南斯拉夫极力想同民族資产階級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亲密的机会主义的联合。这就使得它很难同殖民地革命中的最富有战斗性的力量进行合作。在西欧，他們对改良主义的官僚主义集团也采取了一种机会主义的道路，这同样也使他們难于同那里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发生有效的联系。可是，南斯拉夫内部进步力量的发展对于工人国家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的。比如說，工人委员会的“重建”就在特別像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国家中引起了反响，虽然由于工人委员会并不掌握政治权力，它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一定限制。

中国共产党，由于北京对某些（并非全部）民族資产階級政权怀着仇恨，在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中成功地获得某些影响。可是由于中国和沒有改建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权进行无原則的联合，并由于中国国内仍維持着官僚主义的統治，它在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中的影响不免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正是在这两个主要的問題上，各大都城的具有战斗性的工人以及工人国家中的工人、青年和农民感到他們不能同中国人站在一起。不过，中国人对陶里亚蒂之流的人物进行的批判却在許多共产党的群众中得到了贊揚。

古巴的胜利标志了世界革命历史的一个新紀元的开始；因为，除开苏联之外，它是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之外建立的第一个工人国家。这一发展，不管它所涉及的国家大小如何，在世界革命中却是

一个重要的轉折点，而且它必然会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国际卡斯特罗主义的浪潮已經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而且，正如可以料想到的，这种浪潮以殖民地，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为最高。在其它工人国家中，也是显然存在的。卡斯特罗主义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更证明了古巴这一发展的重要性。

除开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卡斯特罗主义在欧洲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它对其它殖民主义中心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也是极有限的。其原因之一乃是古巴的领导集团现在还不十分理解，它如何才能较好地扶助这些地区的革命力量的复兴。

通过殖民地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以使更多的、特别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工人国家出现，将会帮助加强和充实国际卡斯特罗主义的浪潮，使人们能看到一个更长远的远景，并从而理解到新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党派的国际组织的必要。这一历史可能性的任务的完成，既部分地有赖于第四国际在殖民地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有赖于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能协助它取得新的胜利。

使托洛茨基的思想和这个新的卡斯特罗主义的浪潮密切结合也将有利于（特别是在工人国家中）自觉的革命领导力量的发展，将帮助防止“铁托主义”的倾向，并更好地保证群众的压力和直接行动进化为政治革命的清洗力量。从历史的观点看，短期内即将成为可能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革命的发展，也将表现出接受卡斯特罗主义的新的趋势，因而将帮助古巴人和在这一浪潮影响下的人民更充分地了解到整个世界革命的发展道路。

### 三、政治革命

1923年以后，苏联群众在政治上越来越消极，对政治越来越漠不关心，这种情况是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一）国际革命失败，第一个工人国家从而陷于孤立；（二）由于国家落后，群众生活标准低。这样，苏联广大群众被迫日日为生計操心，无暇旁顾。苏联群众还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国家始终有受到世界帝国主义进攻的严重危险，这种感觉对他们政治上的消极也不无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从那时起，有利于苏联群众不关心政治的一切因素已日渐消失；有利于群众对政治发生兴趣和鼓舞他们的士气的条件在日渐成熟。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孤立已被打破，不仅是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和整个世界。斯大林死后，群众的生活标准很快地上升——这是在技术和经济日益进步的条件下群众对官僚机构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的结果——人民因之有可能把他们的一部分精力用于文化和政治的目的。苏联一方面成了世界的第二工业强国，甚至还在某几个技术领域内领先，一方面生活标准却相对地低下，二者相形之下显得极不相称，这就促使人们提出更多的经济要求。帝国主义进攻的威胁依旧存在，官僚主义集团还自觉地利用这种威胁来按时压制反对的声音。然而，群众毕竟感觉到在这个火箭武器时代，苏联已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新的力量和地位，而官僚机构的领导人自己也在不住地吹嘘他们有能力给予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以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自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1953年斯大林

逝世以后，那些工人国家所取得的总的进展已逐步消除了促使群众和他們的先鋒队对政治抱消极态度的各种原因。在东欧的工人国家内，由于群众有一种受到民族压迫的强烈感觉，这种进展的速度加快了，虽然情况也变得越加复杂了。所有这些新的因素都有助于促使下列事件的发生：1953年6月16至17日，东德发生总罢工和暴动，1956年春天波兰发生波茲南事件；1956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开始发生政治革命；1957年初，在中国的“百花齐放”时期，工人先鋒队和共产党反对派中間的某些阶层又重新发挥政治战斗性；苏联群众向官僚机构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結果赢得了1953年的让步（粉碎了国家政治保安部的权力，解散了奴隶劳动营，根本改革了暴虐的工厂劳动条例），随后是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譴責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由于官僚机构对經濟政策的总路綫作了根本的改革，从1953年起，群众的生活标准就一直在不断上升；最后是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新的政治让步（新的政治权利写入了新党綱，受到斯大林鎮压的无辜牺牲者有一部分公开恢复了名誉，等等）。

在苏联，群众的压力开始于反抗斯大林拿破侖式独裁中最野蛮、最暴虐的制度，参加这一普遍反抗运动的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随后，这种压力开始向經濟領域内分化，所有的社会阶层也都参加了，但各有各的一套要求。此后运动又向提出特殊的政治要求的方向发展，这种要求最先由官僚机构内部的人員提出，他們要求了并获得了一种使官僚主义者作为个人可以得到保障的穩定局面。这就是在施政方面扩大参与者的范围。这些改革受到了工人們的欢迎。从农民中听到的第一陣雷鳴，是要求集体农庄中的民主，这种呼声在苏联国内到处都可以听到。知識分子和学生也在跃跃欲試，提出艺术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这类的問題，預示对政治上的民

主将要提出要求。官僚机构中的某些部門也显示已經認識到了客观的需要,那就是必須放松斯大林主义对生产力上的束縛,以便更好地对付美帝国主义在軍事上和技术上的进步所带来的威胁。

到目前为止,像工人管理工厂、通过民主选举的委员会来建立管理制度等这类基本要求还没有提出。然而这不过是時間問題,这类要求迟早要提出的。苏联的官僚机构之所以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那么敏感,其理由之一就是害怕南斯拉夫在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方面所取得的經驗会吸引进步的苏联工人、青年、知識分子,甚至官僚机构中的下层人員,尤其是工会系統的下层官員,因为他們和无产階級有直接的接触。

必須明确划分普遍的群众压力、开始采取群众行动(必然是改良主义性质的)以及开展真正的政治革命这三者之間的差別。在事件的高潮里,这种差別有时不容易明确划分,因为在事件的同一进程中,各个阶段都彼此銜接,相互之間并无清楚的界綫。例如1956年的波兰事件,以及导致匈牙利革命第一阶段的那些行动,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个論点。尽管如此,关于苏联发生的事情,却可以略作一些概括。

首先,从1953年开始的主要趋势是群众压力而不是群众行动。其中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伏庫塔和其他奴隶劳动营的暴动可能在加速清算这一完全反动的制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某些地方性的罢工在住房和合理分配消费品方面替工人們爭取到不少让步。学生、青年团体和先进的知識分子的某些行动也許有助于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群众所作的政治让步。但是总的說来,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却始終停留在群众行动的水平之下。在政治生活方面慢慢觉醒起来的广大群众的压力,当然足以使官僚机构梦寐不安而不得不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这些让步远不能满足群众并哄骗他们沉默下来，相反地，他们的胃口却更大了。群众对他们的低生活标准比斯大林死前更加不满，如果说在程度上并不真正比过去大，至少呼声确实比过去响亮了。这种看上去仿佛是矛盾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却是为人所熟知的。对官僚机构来说，让步的代价是获得一种普遍的改良主义气氛，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以后，这种改良主义气氛使群众觉得，继续施加压力可以赢得新的重大让步。他们还没看出有必要或者有可能采取更广泛的群众行动，这种行动的规模势必会扩展到革命的程度。

这种气氛也许能持续一个时候，但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群众的压力和官僚主义的改良之间固有的辩证关系中潜在的两股力量，使这种气氛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第一股力量是群众倾向于将在纸上答应给与他们的政治权利变为现实。这在某一点上可能导致跟官僚机构的某些权力部门发生公开的冲突。第二股力量是群众的要求有进展到要求工人参与监督和管理的趋势。这方面的压力在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第一次有明显的反映。事实上，在到达公开冲突阶段之前的让步越大，苏联的经济越发达，那么冲突的性质将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发生政治革命的时候，力量的对比对群众将越有利。

## 二

在分析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殖民地革命、政治革命（主要在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相互作用时，时间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即使苏联没有恢复无产阶级民主，它对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许仅仅是因为苏联证明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能够做到

在經濟发展上和提高生活标准上使一个落后国家赶上一个先进国家的水平。万一在不远的将来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领导能在苏联执政，从而在国内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在国外建立革命的团结，那么把殖民地革命溶入工人国家的过程就一定会大大地加速。

这在实践中要采取双重形式。苏联的新领导要结束莫斯科目前所采取的依靠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结盟的总战略。自然，新的领导也要继续推行列宁主义的政策，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与帝国主义发生公开冲突时，要给与前者以有批判的支持和物质援助。它要制止的是那种把革命先锋队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只要去掉了这一政治和物质力量的源泉，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就会很快地失去对舆论中那些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的控制。这同一政策的另一面是要排斥今天控制着殖民地的大多数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它的主要力量就在于对苏联亦步亦趋。苏联的新领导要援助这些共产党内愿意坚决向左转的反对力量，或者支持那些在传统的共产党外面涌现出来的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尤其是在某些殖民地国家里，这些共产党或者是十分薄弱，或者是因为过去犯过错误或出卖过革命，在殖民地人民群众眼里已威信扫地。依靠上述两种办法，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就会很容易地取得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随之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殖民地革命以建成工人国家结束的趋势就会大大加速。

政治革命在苏联早日取得胜利，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的加速甚至会起更有决定性的作用。苏联如果在更高的水平上重建了苏维埃民主——象征着自二十年代初期以后第一次建立的有真正民主和精神自由的政权，质量上要比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高出一筹——那么就会一举消除帝国主义国家内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共产主义所持的主要反对意见。这还会迅速

导致旧的共产党内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领导的解体，它将会向四面八方分化，主要分化为一个左翼的改良主义派和一个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派。在法国和意大利这类国家内，共产党尽管奉行着机会主义路线，却继续控制着群众运动，如果苏联的政治革命早日取得胜利，在这些国家里就会迅速发展起一个群众性革命政党，只要客观的有利条件一成熟，就会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那些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的国家里，也会通过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被再生的苏维埃民主所吸引——和旧的共产党党员中的优秀分子的溶合，出现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群众运动。这样的话，革命领导的危机就能最后得到克服，而客观存在的新的革命形势就会给无产阶级的胜利开辟道路。

但是不管苏联的政治革命早日取得胜利后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何诱人的后果，这一过程却可能要比我们所盼望的拖延得更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如果把一切都压在一张牌上，同时却忽略了在苏联的政治革命成功之前可能在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内取得突破的真正机会，那当然是一个错误。总之，在早日的胜利尚未来到之前，把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技术上和经济上的不断进步对世界革命的进程可能发生的影响估计在内是明智的。

### 三

如前面所述，工人国家内经济和文化的不间断上升会对殖民地人民群众发生重要的影响，使他們对于用“资本主义方式”解决不发达的问题失去信心，而对于社会主义的解决问题办法增加信心。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增加了工人国家在世界经济内的比重，使它們有可能粉碎帝国主义从许多落后国家买进农产品的垄断，同时也使它們有力量提出一个富于吸引力的



建議，以代替帝国主义附带苛刻条件的装备贈与和发展計劃。工人国家在技术和經濟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殖民地革命，也有利于在这一革命的痛苦过程中跟資本主义世界市場割断联系的趋势。古巴的例子最清楚地說明了这問題。显然，在华盛顿拒絕购买古巴糖的时候，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挺身而出当古巴的新顾客，帝国主义的突然封鎖和迫使古巴屈膝的企图很可能更加見效。

工人国家在世界市場的比重虽然日益增加，但在与落后国家的国际贸易中总的說来还远不能比帝国主义起更大的作用。在未来的几年中，工人国家的联合經濟力量似乎还很少可能超过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經濟力量，除非是某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了革命胜利，那情况当然就不同了。不应忘記，苏联和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經濟上所起的补充作用，也远不能和西欧資本主义强国相比。同时还应注意，只要政治革命尚未在苏联取得决定性胜利，苏联的官僚主义集团就不会热中于充分利用因工人国家經濟力量的增强而带来的革命可能性，因为这是与殖民地资产阶級結盟的方針相抵触的。

有人认为工人国家的經濟与技术方面的进步本身就能根本改变帝国主义国家内阶級力量的对比，或者能对在这些国家内推翻資本主义制度作出重要貢獻，这种看法是錯誤的，必須予以排斥。这类的进步对于西方資本主义社会的积极影响可以在两个方面看到：在客观方面，为某些工业产品爭夺国际市場的竞争更趋激烈；在主观方面，因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而产生或引起的許多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动偏見，会慢慢地消失。苏联人民群众的生活标准与西欧越接近，这些偏見的消失也会越显著。但是，这两方面的影响都不足以使規模較小和丧失威信的共产党复兴，也不足以使法国、意大

利、希腊等国家的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官僚主义领导发生奇迹，一下子转变过来，采取革命的方针。

因此，对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说，主要的贡献只是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收获对工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这在下列这些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国共产党之间内部越来越分化；真正群众性的反对势力有可能在某几个共产党内部发展；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和斗志昂扬的向左转的群众在某些共产党内溶而为一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由于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产生的结果，许多共产党内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偏见已迅速消失。

#### 四、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

—

自从战后在西欧掀起过革命高潮并在美国出现过罢工浪潮以后，工人运动以及它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所面临的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意料之外，那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经济竟得到空前的扩展，这种扩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也就是说，差不多在半个世纪里——从未有过的。这种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加上西欧传统的工人阶级领导所采取的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政策和美国工会中的官僚主义领导，在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的情况下，使得欧洲的资本主义有可能获得暂时的相对稳定。因此，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也就暂时转移到殖民地国家了。

这一暂时的发展孕育了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所

抱的修正主义看法和失败主义看法。这两种观点中的无论哪一种都排斥了西方的无产阶级在未来的长时期内现实地争取权力的可能性。既然谁也不可能不看到世界总的潮流是在冲击资本主义，鼓吹这些概念的人们就把希望主要寄托在依靠外力来最后推翻帝国主义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共产党的领导圈子里流行着一种理论，认为苏联的经济发展会最后解决在西方赢得社会主义的问题。只要苏联人民的生活标准高出于西欧和北美工人的生活标准，那么这些工人就会自动地转向共产主义。另一种理论，由斯威齐和萨特这类理论家多少有点自觉地提出，说是殖民地革命会最后打倒帝国主义，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先锋队除了积极援助殖民地的革命者外，再也不能起更大的作用了。

这两种理论都基于同一个错误的假设；那就是认为在今后数十年内西方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随后为了冲淡这一悲观主义假设的刺激性，就提出其他的替代办法作为行动的目标。但是只要仔细一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替代办法都是不现实的。

即使在今后十年内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量已经赶上了美国，那么要赶上美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活标准至少还需十年，因为这是当前的生产和过去累积的消费物资以及公益粮食的总和。因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美国和西欧工人的生活标准的急速下降，当然会改变这一前景。可是那样的话，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革命后果，显然要比苏联的经济成长所发挥的诱人力量重要得多。

即使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活标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那么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这件事本身就会推翻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不会自动地导致萧条、经济衰退和工人生活标准的降低。维护这一理论的人们是从这样一个错误的假设出发的，就

是假定西方的无产階級基本上“滿足”于目前的經濟“繁榮”，認識不到那些滲透資本主義社會的比較深刻的离心現象。

至于說光靠殖民地革命本身就能夠使西方帝國主義崩潰的理論——我們前面已經作過分析，說明這個前景是不現實的。

事實上，這兩種關於西方无产階級革命潛力的失敗主義理論最後必定會引向這一荒謬的結論，肯定帝國主義的壽命還很長。

這些理論萬變不離其宗，其基本的荒謬之處在於它們淺薄的機械經濟定命論。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一個工人階級如果有相對高的生活標準，就不願意或者不可能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鬥爭。這一假設無論在理論上、在實際經驗上，都是沒有根據的。從理論的角度看，應該明白工人們的態度是由許多力量決定的，生活標準的絕對水平只是許多其他先決條件中的一個。工人所享受的高生活標準究竟是工人階級鬥爭的結果，因而像一系列鬥爭的勝利果實必須予以保護呢，還是對工人們來說只不過是一伙“慈善”的主人所施舍的“禮物”呢，這二者是有天大的差別的。在第一种情況下，高生活標準不但會不起阻礙作用，反而能起有力的推動作用，激發工人們的鬥志；在第二種情況下，高生活標準却能起瓦解士氣的作用，給資產階級代言人和工人運動的右翼理論家所散播的階級調和論幻想提供營養。從經驗的角度看，馬克思曾收集相當多的資料，說明英國工人在上一世紀贏得十小時工作制以後對他們自己所起的革命影響。羅莎·盧森堡曾要求人們注意工會取得的一切基本成就所產生的革命影響。最近在比利時、西班牙和意大利所掀起的罷工浪潮——都是由薪金極高的工人們發動的——再一次證明，認為工資最高的工人都自然而然地被“資本主義繁榮”所“腐蝕”的看法是十分錯誤的。

不論是理論或經驗，都證明了最革命的後果並不產生於實際

工資和生活标准的绝对水平，而是产生于它们短时期的相对波动。如果资本家企图甚至稍微降低一些经过艰苦斗争赢得的高工资，或者如果工人们普遍地担心这样一种企图正在酝酿中，那么在某种情况下，这就可能引起大规模的阶级行动，这些行动还会迅速地从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而且围绕着过渡的口号会把客观上具有革命先驱意义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这类斗争甚至可能导致革命形势的形成。

西方的两代革命家都受得同样教育，相信工业化国家内的革命形势是以大的经济危机或者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因战争或军事失利的全面崩溃为转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中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希腊、法国和意大利）。但是，理论和历史又再一次证明，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这只是导向可能的革命危机的一条道路。1936—1937年的罢工大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西班牙革命，都不是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或是在某个经济大崩溃的顶峰。它们发生于1929年和1938年两次大的经济危机之间相对的经济恢复时期。整整一系列的有利因素——最重要的是法西斯的威胁和工人们想要补回大经济危机时所受的损失——使得这次罢工浪潮在美国和比利时具有革命先驱的性质，在法国则具有革命的性质。今后五年至十年内，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产生这类革命的危机和机会，其可能性要比产生1918—1919年或者1944—1948年的崩溃类型的危机为大。

当然，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否认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会给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带来变化。在长时期贫困中所形成的各种习惯——对消费动产的漠不关心，对共享金钱立即表示团结一致的趋向，对日常牺牲的习以为常，对许多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整个上层建筑的漠不关心和敌意——逐渐消失了。新的习惯和思

想方式开始出現，这些在肤淺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小資产階級的”。但是，从抽象的“唯心”观点来看待这些变化是錯誤的——貧困、墮落以及把需要降低到純粹的生理水平等現象的理想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是十分危險的！新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只是在它們于特定的条件下用来阻碍或者促进階級斗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美国工人的汽車——不久之前还被許多人看作是“美国无产階級的小資产階級情緒”的象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已成了一个完全新的、急进的罢工战术的工具。欧洲工人的机动踏板車和摩托車在比利时总罢工时也被用来組成罢工別动队，这是未来比利时无产階級革命自卫队的胚胎。

如果說昨天的面黃肌瘦的无产階級所具有的某些明显的优良品质似乎已在今天的西方工人身上喪失，那么另外一些新的好品质却也在他們身上出現了，这完全是西方无产階級所贏得的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文化标准带来的結果。技术工人和資产階級技术員之間的知識差別事实上已經消失，或者已經大大减少。今天，西方工人在工业技术上已比他的父輩或祖父輩更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自治了，他自己也更强烈地感觉到有必要在生产过程中起一种自觉的領導作用。

今天的工人也更容易理解一切因素之間的全面經濟的相互作用、一切經濟問題的錯綜复杂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計劃的必要性和实际的目的。許多国家內休息時間的增加說明了群众参加政治管理工作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这一条件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否认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真理，就是資本主义制度是給工人們以社会主义教育的大教师，至少在經濟領域內是如此。

## 二

在資本主义經濟相对稳定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里，革命前或者甚至革命的形势如何产生，其要点可以簡略地归納如下：

帝国主义国家的經濟先經過第一阶段的迅速擴張，这阶段的主要刺激是軍备、欧洲和日本的新建設需要（包括绝对和相对两方面；也就是說，重建破坏了的的城市和工厂，使过时的装备現代化）以及在新建設和准备一次新世界战争的双重刺激下所掀起的技术革命的大浪潮。此后它就进入了另一阶段，在这阶段里擴張的力量正在慢慢地自行削弱，經過新的技术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竞争日益尖銳，而这个世界市場由于殖民地革命的胜利和工人国家的經濟擴張，已經变得相对地小了。这一日趋激烈的竞争更因西欧共同市場的形成而变本加厉，最后平均利潤率降低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也会因之变得更加严重。（归根到底，这一趋势也就是新技术革命的后果；換句話說，即是更高的資本有机构成带来的后果。）

作为对这些趋势的反应，資产階級将会按时想方設法来改善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或是放慢增加实际工資的速度，或是冻结工資，甚至企图减低实际工資，特别是在工人的相对工資最高的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階級对这些进攻的回答会导致大規模的斗争，逐渐造成革命前或者甚至革命的形势，只要工人階級，或者至少是它的广大的先鋒队，有足够的自信心推行社会主义方式来管理經濟和国家，以代替資本主义方式。这反过来主要依靠工人运动中广大左翼力量的活动和影响，要它来教育工人階級先鋒队为什么必須为社会主义方式管理經濟和国家而进行斗争，要它来树立自信心并建立一个能够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局部斗争而进行革命斗争

的机器。

这当然只是个大概的雛型，里面應該包括各种特殊的灵活变动；工人阶级为反抗一个想限制或者取締其政治基本权利和工会基本权利的企图而采取激烈行动的可能性（反抗一个擅自采取“强硬”措施的企图或者反抗突然出現的法西斯危险）；对一个突然出現的財政或政治危机采取迅速行动的可能性；群众反对发动一次新的殖民地战争或者反对一般的备战政策等等的可能性。对革命馬克思主义者来说，主要的一点是通过符合各国特殊情况提出一系列过渡的要求、通过与群众运动的密切联系，把革命社会主义的綱領与群众联结起来。目的是尽量鼓舞和扩大群众斗争，尽可能争取在这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开始时提出最基本的要求，随后在过渡的口号指导下把这些要求发展到争取权力和建立双重权力的政体的水平。（工人执政；争取一个工人政府；一个工农政府；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政府；以及其他的变种。）

在美国，能在国内形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工人阶级战斗浪潮极其可能会按照一个类似的雛型出現。支付差額上长期存在的赤字，伴随着集体合同中伸縮条款的取締而产生的越来越厉害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为改善国际市場上的竞争地位而想冻结或降低实际工資的企图，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增加間接稅，所有这一切都会迫使美国工人阶级起来采取措施进行反击，从而破坏资产阶级与工会的官僚主义领导之間的联盟，掀起工人阶级斗争的浪潮。日益增加的永久性失业人数和工会力量的相对削弱更会給这一酝酿中的斗争火上添油。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一开始采取的几个重大的敌对行动就会引起工人阶级大规模的反抗，迫使某些工会領袖中断与民主党的联盟，最后为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工党的出現开辟道路。



因此，在今后数年中最可能的变动如下：殖民地革命会继续下去，席卷一些新国家，随着更多的工人国家的出现而日益加深其社会意义。它不会直接导致帝国主义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翻，但是它会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革命领导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如目前卡斯特罗主义潮流的出现已经清楚地证明了的。工人国家内群众的压力也会继续下去，在某些工人国家内还有发展为日趋激烈的群众行动和可能开始政治革命的趋势，这两种发展都有利于鼓舞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群众的斗志，从而加剧了由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经济扩张速度的放慢所直接产生的那一趋势。

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只是葡萄牙或西班牙，而是包括其他的西欧国家和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内的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在今后十年中因此是存在的。这些国家内任何一国的胜利都会反过来加速苏联这个关键性国家内的政治革命，如果政治革命还未在那里发生的话，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美国革命胜利的加速。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会对发展落后国家的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使其经济发展达到可能的最高速度。

### 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起，帝国主义列强一直在疯狂地准备第三次冲突。事实上帝国主义始终在发动战争，规模时大时小，目的是要遏止世界革命的前进：如在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肯尼亚、朝鲜、苏伊士运河、阿尔及利亚、老挝、安哥拉等地的战争，外加一些帝国主义的干涉，如艾森豪威尔在危地马拉和黎巴嫩采取的行动，肯尼迪对古巴吉隆滩的进攻。向苏联和中

国发动核战争的主导计划在过去十五年内有几次到达了危险的程度：在冷战的开始几个阶段，在美国侵略朝鲜时期，在奠边府战役上，在苏伊士危机、1960年的柏林危机中，以及最后也是最危险的1962年秋天的古巴危机中。

有几个相关连的因素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尚未发动一次全面的原子战争：在周期性的重整军备的浪潮推动下，经济扩展仍有可能；还没有重大的经济危机出现，带来迫在眉睫的威胁；通过与表面上“中立”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事实上的联盟来转移殖民地革命的希望依旧存在。（例如老挝问题的所谓“中立”解决，在这问题上苏联官僚主义集团帮助了美帝国主义，迫使老挝的革命陷于停顿。）

还有其他的考虑阻止了美帝国主义者，迫使他们把日程表上的时间推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军队证明是不可靠的，不能依赖他们进行其他的战争。面对着大规模的罢工抗议和“送我们回家”的示威，美国当局不得不送他们回国，重新建立一支完全新的军事力量。此外，还得把国内可能反对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力量估计进去，并设法加以压制。实行麦卡锡主义的那些年使美国国内的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受到很严重的侵犯，但是公众是否已真正适应于接受另一次战争却依旧是个疑问。朝鲜战争的经验在这方面是很说明问题的。它很快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一次战争，这次冒险终于被迫停止。殖民地革命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促进了美国的黑人运动的发展，使它成为一股富于潜力的独立力量进入了政治舞台，将来能轻而易举地与工会中组成工党的任何行动以及反对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力量联结在一起。美国军队跟与他们为敌的那些力量接触以后，也有可能受到革命思想的“传染”，美帝国主义把这一考虑估计在内以后，就更蹩

躊不前，不敢貿然發動另一次世界大戰了。

此外，核戰爭給戰爭作為政治的繼續帶來了新的因素——自杀的真正可能。一場可能自己毀滅自己的戰爭失去了戰爭的主要目的——勝利、掠奪戰利品。美帝國主義者揮舞氫彈已有許多年，可是總覺得無法與希特勒媲美，無法在自己收集起來的火葬柴堆上点火。這樣，儘管有某些戰爭販子在竭力攬掇握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們發動戰爭，他們却總有所顧忌，被迫推遲最後的攤牌。

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家們明白這一制度面臨着徹底崩潰的危險，因此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他們就在一直設法在內部鞏固這制度。在世界資本主義重大政策的後面的是這樣的看法，就是認為要保證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下去，或者延遲它的死亡，只有通過世界規模的防禦戰略來對付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那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正同那些被連鎖的軍事同盟（北大西洋條約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等等）緊緊拴着的衛星國家一起在擔任世界資本主義警察力量的角色。

但是，美帝國主義雖然必須動員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力量——特別是西歐和日本——來合力進攻工人國家，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却遠不是一塊磐石。像英、法這類舊的帝國主義強國已被降為從屬於美國巨人的僕從了。在它們看來，擴軍備戰、接受所需要的美國布施來支撐它們的結構，對於它們是極其有利的。然而，經驗已經教導它們，戰爭本身並不一定像備戰一樣有利。而這一基本真理尤其適用於核戰爭，因為戰爭的結果會毀滅這個星球上的一切高級生物，包括資本家在內。因此，離世界末日越近，它們就越表現出裹足不前的強烈傾向。像戴高樂之流所採取的一個突然行動，就會出人意外地暴露出資本主義聯盟中間很深的裂痕，從而給西方的統治者們帶來新的疑慮。

殖民地革命、資本主义国家內的階級斗争、資本主义的經濟形勢或工人国家的經濟发展会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但是只要这种变化并不威胁到資本主义制度的立即消灭，两个主要的敌对陣营里的首脑們之間进行一次新的妥协总是可能的。只要它們并不面临一个迫及眉睫的重大威胁，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集团双方总是会双峰对峙，誰都企图取得更好的地位，或者避免陷入更坏的处境，誰都想加强自己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贏得新的盟友或者避免失去旧的盟友；只要一方真有意思发动战争，另一方总会設法妥协。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賭博。双方试图保留的“安全区域”究竟有多少安全可言呢？由于“錯誤”、“誤会”或者一个愚蠢的瘋狂行为，任何时候都能把这一“安全区域”冲破。

科学家們差不多已取得一致的意見，认为一次全面的核战争如果不会把全人类消灭，至少也会把人类文明全部摧毁，因此显而易见，世界工人运动的主要战略目标不可能是在一場世界規模的原子战争中爭取投机性的胜利。要建設共产主义，人类必須存在。某些最低限度的物质下层建筑也是必需的。认为光靠“共产主义觉悟”就足以在放射性的廢墟上建設共产主义的任何假定，其水平都已在馬克思主义前的原始空想家之下了。目标必須是防止一場世界性的原子战争。

有一个时候，苏联核武器的发展对于防止一場核世界大战是一个必要的步驟。如果没有苏联的原子彈，朝鮮或越南的地方性战争的結果，一定已經引起了一場世界大战。但是到了某个阶段，防止一次核世界大战的唯一方法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內的工人来解除帝国主义的武装。这是办得到的，因为原子武器不能在內战中使用，否則就等于是整个資產階級集体自杀——尽管出現过“宁死不变紅”这样的瘋狂口号，这种可能性可以說是很微乎其微的。

一場核世界大戰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最現實的辦法是在帝國主義的主要堡壘里推翻帝國主義，解除它的武裝。這必須是殖民地革命、工人國家內的政治革命和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互起作用的过程所產生的最後結果之一。这一过程的发展会在帝國主義者的思想上起二重作用。随着革命力量日益壯大，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最後遠景也就越來越失去信心，從而也越來越不敢貿然發動核戰爭作孤注一擲。另一方面，同一过程的发展也可能使他們更傾向於閉起眼來不看將來。當他們覺得自己除了向革命乖乖地投降之外別無出路的時候，他們也可能作重大的冒險。可是在某個時候，階級鬥爭的动力會促使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人及時干涉，阻止帝國主義發動核戰爭。

歸根結蒂，只有最發達的帝國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的勝利，尤其是美國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把人類從核毀滅的夢魘中徹底解放出來。這是革命社會主義的解決辦法，第四國際就是以這種辦法來反對“和平共處”和在一場核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的這些烏托邦幻想的。是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這兩者之間的抉擇在今天也可以歸結為：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美國呢，還是整个人類被核武器所毀滅？

這樣，革命馬克思主義今天給世界無產階級的所有部門帶來了一個單一的、完整的世界革命的概念，說明全力支持殖民地人民進行的解放戰爭就是對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在不久的將來解除帝國主義武裝作出重要的貢獻。同樣，在帝國主義國家內單方面的和平主義性質的過渡口號非但不像舊時代的和平主義那樣是“反動的”或者“烏托邦”的，相反地，只要它們與其他的過渡口號聯結起來，最後提出工人階級為奪取政權而鬥爭，那麼這類口號還是能起極其進步的作用的。

## 五、第四国际

1963年是第四国际成立二十五周年紀念，离革命社会主义被貼上“托洛茨基主义”的标签差不多有四十年了。在思想上，我們的运动是結了丰富的果实的，光是这一收获就远远超过它存在的价值了。在它綱領性的宣言中，在它参加世界規模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它已证明自己是革命馬克思主义的偉大傳統的合法继承人和傳播者。事件已經证明它的許許多多論点都是正确的，因此連反对它的敌人也不得不从它的軍火庫中借用武器，虽然在方式上是部分的、片面的或者是經過歪曲的。

列昂·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領導了使苏联有計劃地迅速工业化的斗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富农破坏工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对外貿易的壟断，这一斗争早在1927—1928年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今天，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斯大林臭名远揚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論与实践所展开的斗争是正确的，正是这种开始于三十年代初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給希特勒鋪平了道路。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人民陣綫主义”的理論与实践的批評，也通过最最令人痛心的方式被一再证明是正确的，工人阶级遭受到一連串不必要的失敗，尽管客观条件已經最有利于他們取得胜利，例如1935—1937年在法国和西班牙，1943—1948年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等。

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三十年代对斯大林的罪行的揭露和譴責，目前終於在苏联官方的教条中得到为时已晚的反响，这一反响开始于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招认。托洛茨基主义

者把官僚主义的性质解释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正确性，已经被一切认真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所接受。它甚至在南斯拉夫政府通过工人会议和工人自治的实验所提出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做法中得到了反映。1956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革命一开始，一些多少带点自发性的工人会议就出现了，这充分地证实托洛茨基主义者为了在苏联恢复无产阶级民主的列宁主义准则而展开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从下面的情况中还生动地说明，甚至某些最老的托洛茨基论点也是适合时宜的：在1923年，托洛茨基曾说过，如果在一个不发达国家里建成的工人国家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化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有任务把这种官僚主义化程度加以限制，方法是发展一切主观与客观的有利条件，使工人阶级得以从事政治活动并参与国家和经济的管理。总之，不应该否认这一危险的规模和严重性，党也不应该向官僚主义集团的压力屈服，更不应该使自己成为帮助官僚主义集团篡夺权力的工具。在1962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于古巴工人国家中刚冒头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强烈的谴责，跟着又指责官僚主义的基础在于国家和经济机构中脱离工人群众、物质上享有特权的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的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分子的攻击，听去很像约莫四十年以前在苏联听到的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演说的重复！

同样，不断革命的理論由第四国际作为珍贵的遗产从托洛茨基那里承继下来并赋予生命力，很久以来已在正反两方面完全得到证实。（反面的例子如革命的无数次失败，如印度、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领导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土改；正面的例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某些历史任务——特别是土改——得以

完成，总是通过工人国家的建立，如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和古巴。）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估计，今天已被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所接受。托洛茨基对苏联的阶级性的分析使我们早在1946—47年就能预见到，甚至在那些受到苏联官僚主义集团的占领和残酷剥削的东欧国家里，只要它们的结构一旦适应于苏联的结构，那么那里显然一蹶不振的生产力不久之后一定会高涨。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使我们在斯大林逝世之前就能预见到苏联工人阶级力量的高涨和斯大林主义的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以及它们最后一定会导向政治革命和列宁主义型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恢复。在国际工人运动内，唯独第四国际能在西欧“繁荣”的高峰和戴高乐上台执政的时期，始终对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保持信心，从而正确地预见到1960年开始在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爆发的新的工人阶级斗争。

## 二

如果我们从思想领域转到组织领域，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显然不那么成功了。除锡兰外，第四国际还未在任何国家产生持久性的群众性影响。它的支部还只是未来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的核心，而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说，不是那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相当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力量的组织。

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是正确的而有力量的，但是作为有组织的运动，它的力量却是薄弱的，两者之间的罅隙早已一再受到注意，特别受到来自一些大共产党和殖民地革命组织的新阶层的注意。他们表示同意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性的观念，但是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在组织上是否能有所成就，开展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是否有



可能性，却始終抱着懷疑。這個矛盾是實際存在的，因此有必要加以慎重的考慮。

首先，這個問題必須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除世界無產階級的長遠利益之外別無其他的利益。它對於建立一個只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或者僅僅是施加壓力的集團那樣的“組織”並不感到興趣。它想要建立的組織是為了達到明確的目標——在世界範圍內取得無產階級的勝利——而採取明確的手段。這就需要有尽可能高的覺悟，因而也就需要徹底的誠實和廉潔，不管其直接後果有什麼痛苦。這些品質的具備往往是同迅速建立組織相矛盾的。第四國際除了循着這條困難的道路前進之外，別無其他選擇，因為這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所要求的。只要它代表着那一偉大進程的理論覺悟和政治覺悟，它自己的最終命運同這個進程是不可分開的。

為了更合理地對第四國際的力量與弱點作出估價，最好的辦法是拿它與它的先驅者作一比較。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領導下建立的第一國際，從來不曾有過巨大的組織力量，儘管它在理論上的成就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第二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增加了貢獻，同時也建立了一些巨大的組織。但這一切都在1914年的大崩潰中瓦解了。為了在俄國取得勝利，左翼力量發現有必要從這個母組織中分裂出來。第三國際在布爾塞維克的好心領導下發展得很快，但是得仰斯大林主義的鼻息，後來終於被可耻地解散，作為克里姆林宮送給羅斯福——帝國主義聯盟的政治首腦——的戰爭禮物。顯然，建立一個革命社會主義的國際並使它成功地達到目標，並不是容易的事。

只要記住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為之戰鬥的綱領，就會發現責備運動在組織上停滯不前是沒有根據的。這個運動比起它剛開

始的时候（苏联左翼反对派成立的时期和运动的创始人被暗杀的时期），已壮大了不知多少倍。1938年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支部不到十个；出席1948年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支部不到二十个。今天，托洛茨基主义的組織已在四十个国家内成立，这些組織极大部分都要比十年或者二十年前更为强大——要是那个时候还有它們的話。

有两个重要的发展必須予以強調。第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最近几年内有显著的壮大，而且与世界規模的革命浪潮的普遍高漲多少有联帶关系。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符合世界无产阶级的客观需要的，它并不是在短暫時間内发生于某些特定国家里的曇花一現的特殊現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反对势力相形之下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后者在开始的时候实力要雄厚得多。在这些势力之中我們可以列入意大利的波尔迪格主义者、德国的布兰德莱主义者、美国的洛夫斯东主义者、西班牙的卡塔兰联盟、日本的共产主义同盟以及其他許多类似的派別。所有这些“民族共产主义”反对势力都完全不能发展为世界性的組織，其中的大多数不是已經消失，就是甚至在國內基地上力量也比不上托洛茨基主义势力。應該注意的是，有一股竞争的反对势力——南斯拉夫的铁托主义者——已經执政近二十年，然而已經证明它无法在国际上作一次认真的挑战。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已一再证明对于那些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具有吸引力，不管这些青年是在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或者是在像美国和比利时、法国和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意大利、希腊和英国这样截然不同的国家里。这就清楚地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符合数以千計的进步分子所感觉到的具有国际規模的强烈需要的，这些进步分子都在日漸脱离傳統的工人阶级領導的机会主义

路綫，正在寻找方法和手段来建立一个能领导群众斗争取得胜利的新的革命领导。

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正确性同为实现这个纲领而斗争的运动在组织上的软弱性之间的矛盾不是新的。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它一般总是以提出这个疑问的形式出现：“要是托洛茨基是那么正确，他怎么会被斯大林夺走权力，后来怎么会无法把它夺回来呢？”

在这个以个人为象征的问题上，有一点是没有看清楚，那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所代表的敌对社会力量的浮沉。托洛茨基不能在1924年以后保持权力这件事，是和他能在1917年这样的形势中取得权力这件事直接联系着的。在斯大林所代表和体现的反动社会力量猖獗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因为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不得不与无产阶级共命运，暂时在苏联失势。随着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破除，托洛茨基的明星又开始在苏联上升了——换句话说，也就是那里的无产阶级再度开始进入政治舞台了。

### 三

归根到底，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命运是同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要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组织上的盛衰有任何真正的理解，包括解决运动中最困难的组织问题，就非从这个基础出发不可。

光是证明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理论上正确，并不曾自动地导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壮大。托洛茨基的理论解释了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怎么会失败，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怎么会失败，希特勒怎么会在实际上无人反对的情况下上台执政，西班牙革命怎么会失败，以及三十年代中期法国工人运动的大高涨怎么会

毫无成就。可是这些失败毕竟是无产阶级的失败，因此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失败，而它所遭受的损失也最为惨重。它的干部四分五裂，有的丧失了信心，有的投降，有的入狱，有的竟然被暗杀。世界的反动势力集中了最可怕的力量来打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从斯大林通过罗斯福到希特勒。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进步的政治运动遭受过这样的迫害，也没有一个进步的政治运动像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那样除了自己的队伍之外，简直从外界得不到任何支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先锋队终于能坚持下来，这是人类意志力坚韧的不朽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高涨，本来似乎可以指望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能在这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中首先得到好处。但是它与世界革命具体进程的相互关系却证明情形要比这复杂得多。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只能在最后和在长远的时期内得到好处。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唯一事件——苏联的胜利。这一胜利开始了一个连锁反应，其最后结果在目前还难以预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仍像过去一样，转向第一个工人国家寻求鼓舞和指导。但是苏联的政权却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手中。结果，这一官僚机构——而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这一矛盾现象在当时就得到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解释。我们还预料到正是那些加强这个官僚机构的力量本身，不久将会开始败坏这个机构的基础，其最后的结果就是斯大林主义的灭亡。然而，直到1956年，这一进程还仅仅部分地在苏联政府的官方声明中记录下来；只是在今天，这块世界磐石才无可挽回地被粉碎了，给一些趋向于涌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新的政治潮流开辟了道路。这

一趋向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些工人国家涌现的形式中清楚地看出来——从东欧国家到南斯拉夫和中国，最后到古巴，它们的领导都已表现了脱离苏联官僚机构的越来越大的独立性。

这一趋向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来。随着斯大林主义磐石的粉碎，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共产党之间讨论问题，并用合理的方式来处理一些真正的问题，而不是像过去斯大林那样，用制造假问题来代替真问题，用贴标签、诽谤和陷害来代替说理。例如，富于教育意义的一点是看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讨论的大问题之一，是有必要把扩展无产阶级革命作为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唯一实际办法。显然，那些讨论者的看法，已越来越接近于截至目前为止还一直被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言论的那个禁区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革命以及最近的古巴革命的胜利，加上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破除，这一切都只会加强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正如目光锐利的美国新闻记者 I. F. 斯东在古巴作了一次旅行后所说，那儿的革命者都是“不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随着这些潮流和有关潮流中间的觉悟的提高，托洛茨基主义将会变成一股强大的潮流。

这反过来也会影响世界革命三个组成部分的发展。群众性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出现将会给政治舞台带来一支新的生力军。甚至在这些政党尚未在各个国家内占优势之前，光是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开始取得的部分成就，就能深刻地影响世界形势，在三个主要部分加速革命过程的自然节奏。

#### 四

第四国际的干部们执行了他们的革命任务，赋予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以生命力，同时按照世界形势的要求不断丰富它的内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綱領的組織不会受到长时间的孤立和迫害的影响。有两个主要問題必須經常加以关心。有一种傾向不时在各地出現，想要寻找捷徑来建立一个群众性組織。这方面的經驗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样做只会带来不幸的結果，使許多从事这类冒險的人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中消失。另一个更大的問題是宗派主义的傾向偶尔冒头。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背离原則以逃避来自敌对环境中的压力，宗派主义者的特点則是躲进书堆，把书本变成教条。一个革命者受到他无法控制的情势的孤立之后，很可能不自觉地掉进宗派主义的泥坑。因此对一个小組織來說，宗派主义要比机会主义更富于潜伏的危險性，因为机会主义一般說来是比較容易辨認的。

建立另一个工人階級領導——即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始終是我們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問題不在于一再重复这一基本真理，而是具体地說明这一任务怎样完成。事实上，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包括三个具体进程：保卫和不断丰富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綱領；培养、教育和鍛煉一支革命馬克思主义的干部队伍；替这支干部队伍贏得群众影响。这三个进程是辯证地交織在一起的。脱离了群众运动，一支革命的干部就会变成一个宗派主义者。脱离了革命馬克思主义的綱領，沉浸在群众运动里的干部最后就会屈从于机会主义。脱离了作为群众的骨干而进行斗争的干部的实际考驗，革命的綱領本身就会僵化，日漸退化为背誦教条公式的毫无內容的咒文。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經很好地考虑了这样的問題：怎样从小股的力量开始去爭取工人階級，把它組織成一个能够向资产階級的統治挑战的政党。它在組織路綫上遵循的总原則是那句列宁主义的名言：一个革命者必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让自己脱离自

己的階級。因此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準則就是要加入自己的工會組織，在工會工作中起積極作用，不管這個工會的官僚機構是如何地反動。同樣地，他們也應該參加一切群眾性的大組織，不管這些組織的性質是民族主義的、文化的或者政治的。他們應該尽可能地從這些組織的成員中傳播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和綱領，並設法從他們中間發展新黨員。

在某些國家，如西歐和澳大利亞，群眾在階級覺悟和強有力的政治組織方面都有舊的傳統，這就給革命核心提出了特別困難的問題。由於這一傳統以及會員群眾的力量，這些組織深受工人們的擁護。同時，由於過去的失敗和官僚主義領導對工人運動的長期控制的結果，群眾雖然極願意走革命行動的道路，開始的時候卻並沒有高度的馬克思主義覺悟，而是只有一種比較接近於偏左的中立主義觀點。

此外，官僚主義的領導對於向群眾散發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材料還不肯提供便利。它們起的作用就跟殘酷的永久性黨派一樣，完全敵視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準備使用政治迫害和各種最不民主的手段來對付那些宣傳新觀點或者挑釁性的觀點的人們。

這就是革命核心必須面對的總形勢。他們除了“打進去主義”之外，別無其他選擇；所謂“打進去主義”，就是以正式成員的身分參加群眾運動的內部生活。在這種形勢下，革命核心的特定作用是宣傳一些過渡口號，作為群眾覺悟水平不夠和有客觀的必要採取行動踏上革命的道路這兩者之間的橋樑。革命核心應該積極參加建立左派勢力的工作，俾使這些勢力有可能領導越來越廣大的群眾採取行動。通過這些行動中積累起來的經驗，他們起了應起的推動作用，使這些中立主義勢力或者偏左的中立主義勢力中的優秀力量日漸轉變為純粹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

“打进去主义”的目的并不如某些批評家所攻击的那样是创建一个“施加压力的集团”，而是在許多国家必須面对的实际形势下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战术是充滿危險和困难的，如果不把这些危險和困难經常牢記在心，就无法成功地施展这个战术。但是在工作的某一阶段，除此之外，簡直別无出路。由于国内的特殊条件，这个战术應該有許多灵活性。在运用的时候，也必須十分灵活，不應該有任何种类的教条主义。对采用这个战术的人們来說，工作的准則是保持一部分公开的群众工作，包括出版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刊物在內。

不管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組織所处的是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只要它基本上还是个很小的宣傳团体，就无法起領導群众的作用。尽管如此，它还是可以做不少有效的工作，通过积极的、始終不渝的努力来弥补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客观形势之間的罅隙，以帮助群众从經驗中学习。用最普通的話来說，要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是必由的途徑。这一道理还总结在托洛茨基写于1938年的“过渡綱領”中。这个綱領必須經常注入新的血液，办法是通过研究群众觉悟程度的变化和經常联系群众。

在許多国家內，跟建立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有关的一个尖銳問題是缺少時間在革命爆发之前組織群众和积累足够的經驗。在过去几十年中，这可能意味着革命的失敗。然而，鉴于一系列新的因素，情况已不一定是这样了。苏联的榜样，其他工人国家的存在（从它們那里还可以得到物质援助），世界資本主义相对的削弱，这一切都有可能使革命在某些情况下取得部分的成功，达到某种高度（他們可以在这高度上暫時保持不稳定的平衡，如玻利維亞那样），甚至徑直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在这类国家內的革命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一些极端困难的問題，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不



够到缺乏执行无数迫切任务的久經鍛炼的或者有經驗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他們别无其他的选择，只有整个儿地、全心全意地投入革命，在革命的进程中建党。

## 五

建立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始終是主要的战略任务。为了协力完成这一工作，应该把已有的这些党的核心集合在一个国际組織里。

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知道，真理的最后考驗是人类的行动。不經過行动的考驗，一切理論都是空洞的，沒有內容的。对世界形势作正确的分析，在今天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复杂得多。有一个事实本身生动地說明了这个問題：一百多个国家內的人民，在人类历史中第一次被經常卷入世界事件中，有时候情况甚至还极有爆炸性的。只有通过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并經常用实际行动来重新檢查和考驗这个分析，才有可能使一个世界性运动的每一部門感到前进中的历史的脉搏。只有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国际，一方面把許多不同的势力团結在行动中，一方面却允許它們民主地互相交鋒，唯有这样才能使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經驗得到正确的估量，然后再納入世界規模的革命任务中。如果对世界形势的发展缺乏总的了解，想要根据本国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或者采取正确的行动，那簡直是不可能的。各个国家和各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沒有像今天这样必須互相依賴。认为革命运动可以在“一国”或者孤立的“区域”內建立的看法，在洲际彈道火箭和外层空間旅行的时代，未免太落后了。

現在的問題在于建立某种机构，在质量上要不同于光是几个国家組織的总和。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把每个国家的經驗和意

見集中在一起，建立一个比在单一的区域內能建立的任何机构要优越得多的领导机构是可能的。基本的概念并不是把一群知識分子召集在一起（不管这种做法本身是多么必要和有价值），而是把各个领导机构在国际規模上联結起来，这些领导机构都是在自己的国土里扎根的，跟本国的群众有血肉联系。一个这种类型的国际领导就能够完成困难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使理論适合时宜，一方面制訂有生命力的政策，领导世界当前的重大問題上的革命行动。

鉴于目前存在于世界革命三个主要部分之間的辯证关系，建立一个坚强的、民主集中的国际的必要性就更明显了。在先进的国家里，这个国际能为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作出卓越的貢獻，創造一些方式方法来激发工人階級团結一致的感情，这种感情甚至在政治上最落后的工人中間也都存在的。这个国际能够帮助殖民地革命里的斗士始終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使他們对世界无产階級保持信心，学会区别帝国主义国家內的工人群众与那里的政府以及傳統的群众組織里出卖无产階級利益的领导人。在工人国家的进步工人、知識分子和青年中間，这个国际能够起一个特別的作用，那就是帮助他們在堆积了四十年的伪造、歪曲和誣蔑的垃圾中覓路前进，去寻找革命馬克思主义。

古巴革命的胜利使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某些势力对于建立革命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提出疑問，特别是对于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革命馬克思主义国际的必要性提出疑問。这样的結論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鉴于他自己在一个活的革命中的經驗，今天都在強調在所有国家內建立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极端重要性。

事实上，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产生于无产階級爭取权力、贏得权力和在胜利后施行权力时所面对的客观任务。工人

階級的旧領導机构的無能与背叛使得这个必要性更为迫切。核毁灭的威胁更使这必要变为一个与全人类生死攸关的問題。要贏得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除了把群众性革命政党友爱地联合在一个国际組織內以外，別无其它办法。这一任务看来仿佛很艰巨，但总是会完成的，而且是及时地完成的。

## 4. 国际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第四国际重新統一代表大会通过的決議)

### 序 言

1960年以來，世界力量的对比繼續向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古巴革命的胜利加速了許多拉丁美洲国家革命前夕的形势。继古巴革命胜利之后，阿尔及利亚人民群众經過了七年流血斗争取得了独立，开辟了阿尔及利亚革命新的社会阶段，建立了整个非洲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輝煌的中心。在东南亚，特别是在老撾和南越，殖民地的革命在停頓了七年之后重新向前发展。尽管中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和波兰工业生产增长緩慢，全体工人国家的工业生产繼續以高于全体資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

另一方面，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最近三年来，在维护生活水平的斗争中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战斗力量。尽管在这些国家内出现了相对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在比利时、西德、西班牙和英国，但是无产阶级的重大的经济斗争却屡次动摇了这些国家的制度的政治上的稳定性。即使在法国，1958年5月之后受到严重挫折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也开始恢复，而当他们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胁时，

他們表現出來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出色的(例如礦工的罷工)。

儘管世界力量的對比逐漸對他們不利(統治階級對這點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世界帝國主義依然保持着經濟、軍事和政治力量到這種程度,即在日益高漲的世界革命的各种力量前,還沒有失去反扑能力。在經濟方面,帝國主義在歐洲大陸和日本繼續迅速地增長它們的資源,雖然這種擴張已開始嚴重地緩慢下來。美帝國主義克服了1960—1961年的衰退,現在美國的統治階級正竭力用大量增加國家開支辦法來加速擴張,因而造成通貨膨脹和美元的國際地位的削弱。在軍事方面,帝國主義繼續擴充核武器的儲存,迫使蘇聯也不得不加速這方面的軍備。在殖民地革命新的進展前,帝國主義的反應是一方面進行局部的干涉戰爭(老撾、南越、古巴,拉丁美洲的軍事代表團);另一方面,力圖用加強財政和政治援助來勾結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印度、巴西、委內瑞拉、伊朗、剛果等)。這些辦法從長遠來看,是不能發生效果的,但是能把社會主義的到來推遲若干年。日益尖銳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特別是歐洲帝國主義大國之間、歐洲某些帝國主義大國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還沒有把世界帝國主義削弱到在革命的進展前毫无反扑力量的程度。

在這種情況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是現實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危險只有在最主要的帝國主義堡壘內部的無產階級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才能最後地排除。現階段的殖民地革命的進展和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運動的進展正削弱着帝國主義,從而準備着這個勝利。這個戰爭所以被推遲的爆發,首先是因為帝國主義統治階級和蘇聯官僚主義領導人意識到一場世界核戰爭將造成全人類自行毀滅和自殺的巨大危險。所以有可能帝國主義非到最後關頭,即它感到一切繼續生存下去的一般可能性完全被切斷,它的

关键性利益受到迫切的威胁而它还保持着进攻主力时，不敢发动这场战争。这意味着革命力量还有一段时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削弱帝国主义，尽最大可能准备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胜利的可能性，以便能够及时地从堡垒内部瘫痪和推翻帝国主义。

最近的革命进展已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产生了最重要的政治后果。古巴革命的胜利是1917年以来第一个由不属于国际斯大林世界的政治力量所领导的革命胜利，也是从1917年以来第一个革命领导由于它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它本身的认识水平不得不公开地求助于革命的国际性发展的胜利。在阿尔及利亚，有利于重复古巴经验的条件日益在明朗起来。各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团结已经破碎了，从而加速了以中苏冲突为代表的剧烈的政治斗争，这个斗争越来越迫切地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战士提出了和将提出一系列根本性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这就是说，不论是殖民地革命的进展，或是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的进展，都开始越来越摆脱过去十多年来力图控制这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中派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势力。殖民地人民群众争取他们的革命取得社会主义出路的动向；知识分子、青年和工人先锋队伍力求使非斯大林化运动超越赫鲁晓夫阶段而真正地回到列宁道路上的斗争；中国企图建立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左派，从而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争取同资产阶级联盟”等根本方针重新提出来讨论的努力；各帝国主义内部新的先进队伍的出现——这一切现象表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性革命领导的道路已取得进展，而建立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是保证世界革命迅速成功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项关键性的任务。如果说建立和壮大第四国际各支部是这个过程的

基本因素，那末，这个因素还包括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各国革命力量必須合并的任务。

### (一) 世界經濟形势

美国經濟曾发生 1960—1961 年的衰退，而后又有了恢复。这次恢复虽然比預料的要緩慢，却在沒有遭受很大破坏的情况下克服了 1929 年以来最严重的华尔街的金融崩潰。目前美国經濟发展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还不是这个金融崩潰，而是每次經濟衰退后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和未利用的工业生产能力趋向于扩大。另一方面，把經濟危机轉化为規模和时间上有限度的經濟衰退，是用不断增加財政开支，首先是軍事支出作代价的，这是美元逐漸貶值的基本原因。肯尼迪政府想以巨額預算赤字来加速美国經濟增长，只能加剧今后几年美帝国主义經濟政策的矛盾，再次扩大国际支付的赤字，引起新的物价高漲，从而削弱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市場上的竞争能力。

从长远来看，美帝国主义被迫面临着这样的任务：既要保证經濟增长以便它有可能稍微推迟苏联經濟“赶上”的日期；又要不断增加它的軍事費用和在財政和軍事上援助殖民地資產階級，首先是拉丁美洲的各“同盟国”政府。这样，它如果不是向美国工人階級已取得的生活水平进攻，就是对美国工人階級实行严格的工資凍結，此外別无办法。大批失业的压力，美国資金向“劳动力价格”較低的国家外流，工会力量的削弱和政府对某些工会特权的侵犯，加上自动化的客观效果，逐漸地給上述进攻創造有利条件。从而引起这种进攻的政治和社会不堪設想的后果。

西欧和日本(除了英国和比利时)資本主义經濟在美国和加拿

大經濟衰退时期，再一次成功地逃避了經濟衰退（在 1957—58 年經濟衰退时期已是这样。它們长期增长的因素，首先是工业現代化和合理化投資水平高，以及耐用消費品工业的发展。这些因素是这些資本主义經濟十年来特大“景气”的原因，也是得以逃避这次衰退的原因。

但是，这些长期增长的因素已开始一点一点地疲軟下来。鋼鐵业受生产性投資逐渐緩慢的影响，三年来已处于真正的停滞状态。汽車工业在 1960—61 年已出現明显的衰退象征，現在虽然出現一个短时期的复元；但是一般估計到了 1965 年汽車市場将趋于平衡。同时，在資本主义欧洲，經濟越来越出現生产能力过剩，因而表明即使不发生严重的經濟危机，資本主义經濟固有的生产过剩現象依然存在，只不过以新的形式表現出来罢了。

因此，可以肯定所有欧洲資本主义国家以及日本的增长率都将逐渐下降，耐用消費品和“新产品”的市場将达到饱和点，大多数的工业資本主义大国的生产率水平将趋接近，由此帝国主义之間必然会发生的竞争将趋剧烈，欧洲資本主义經濟也将逐渐重新出現經濟衰退和工人失业。突然兴旺的景象让路給更加“正常”的循环期的速度在各国之間是会有所不同的。毫無疑問，像意大利特别是日本这样的国家还拥有大批工业后备軍，資產階級可以利用比美国、英国或西德低廉得多的工資，它們延續这例外的“景气”阶段可能要更久一些。

目前資本主义世界的經濟形势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帝国主义工业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市場越来越縮小，这些国家的在世界貿易的比重也越来越縮小，从而帝国主义之間的貿易成正比例地增长，特别是由于欧洲共同市場的建立。这种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封建資本主义結構阻碍了本国

經濟的發展，阻礙了本國的工業化以及人民群眾貧困的生活水平真正的提高。1960—63年這一階段同上一階段一樣，儘管“援助”這些不發達國家之說甚囂塵上，儘管有一切“爭取進步聯盟”的辦法，這些國家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依然在下降，下降的原因或者是交換條件的惡化從而削弱它們在世界市場的購買力，或者是特殊現象例如通貨膨脹。軍事費用的增長和外國資金的外流。這樣，這些國家中有些國家，本來已很緩慢的資產階級工業化的過程受到了阻礙，特別是在阿根廷、印度，甚至在委內瑞拉也是這樣。最近一個時期的原料市價的上漲，也不能根本地改變這種局面。

隨着大部分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投資景氣接近尾聲，製造工業設備的工業因而越來越焦急地尋求新的市場。無疑的，這些帝國主義國家要作出新的努力，用貸款方式去資助不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在經濟上去配合為穩定大部分這些國家中的新殖民主義制度所作的努力。即使不低估這種政策取得短時期的成功的可能性，這種政策也不能消除引起群眾不滿情緒的任何一個因素，而殖民地革命的动力將在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繼續起根本性作用。

在這同一時期，除中國外，各工人國家的經濟繼續不斷地在發展，儘管發展速度各不相同。特別是較為發達的工人國家的工業發展（例如蘇聯、波蘭、特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捷克）這一二年來出現或多或少的顯著的緩慢；相反例如羅馬尼亞這個國家的發展卻十分驚人。某些計劃甚至完全失敗了，特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七年計劃（這計劃原定：“到1965年按人口計算生產要趕上西德”），捷克計劃和蘇聯的化學工業計劃。但是，蘇聯七年計劃大体上似乎可以在1965年完成。

農業由於氣候影響、儲存缺乏、投資不足以及農民群眾對合作



化生产不关心，继续出现一年比一年更猛烈的波动。各工人国家经济缺乏国际间的协调和一体化的后果越来越显著。苏联官僚机构因此不得不来一个大转弯，企图把经济互助委员会变成国际间经济一体化的机构，包括计划一体化（至少在某些方面）和国际贸易及多边国际支付在内。在各工人国家范围内改进国际间的劳动分工，毫无疑问，会使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等国家工业重新增长。这些国家受到自给自足倾向的害处最深，而这种自给自足倾向是每个民族官僚主义的计划工作的特点。

南斯拉夫克服了1961—62年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在歉收和过度的分散主义恶果双重影响下，曾突然地中断了经济特大增长时期，甚至破坏了对对外贸易垄断，造成了严重的国际支付的逆差。今年，在调整了中央对外贸易的控制之后，同等的甚至高于百分之十的增长率可能再度出现。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特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也由于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过分的作法所造成的恶果，连续三年来情况黯淡。目前似乎正在复元，这个复元是依靠彻底改变经济政策——给予农业和轻工业以优先权，大幅度放慢重工业发展而得到的；重工业的发展还受到苏联停止援助和缺乏国际援助或贷款的阻碍。

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包含第四国际以前的文件所指出的几个大特点，即：

——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迟缓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这样不断地加深了这两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之间的鸿沟，从而提供了殖民地革命不断扩大的客观基础。

——工人国家高速增长同帝国主义国家波动很大的增长速度（一般趋向下降）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

——由于利潤率普遍下降和市場日漸縮小，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和竞争日益劇烈化。

## (二) 国际政治关系的演变

肯尼迪政府正是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上遭受許多显著的失敗和挫折的时期结束后上台的。这些挫折和失敗是：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在美国大門口建立一个工人国家；美国傀儡李承晚和曼德列斯在人民示威的压力下垮台；拉丁美洲（尼克松巡迴旅行）和日本发生了猛烈的反美示威；苏联在宇宙火箭方面取得了显著的領先地位。此外，苏联官僚机构重新提出西柏林問題，企图迫使美国軍隊撤出西柏林，給人一个印象：苏联不但力图巩固烏布利希摇摇欲墜的政权，而且还想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总趋势轉移到十年来朝相反方向发展的世界一个地区，即资本主义欧洲。

代表紐約財政資本和帝国主义最頑强的资产阶级的智囊团所包圍的肯尼迪政府，用尽一切办法企图制止这种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国际局势不断地恶化；加紧扩大核火箭和常規武器的軍备；用政治軍事压力和加紧財政“援助”相結合的办法在古巴周圍建立一条安全帶，进而用軍事干預、經濟封鎖、或者两者并举地来推翻这个工人国家；加强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即使因而損害它的欧洲帝国主义同盟国也在所不惜；对这些盟友和竞争对手保卫自己的經濟利益，特别是强制它們承担更大一部分的軍事政治的共同負担（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援助”）。同时，这个政府很明确地表示，它随时准备好发动一場世界核战争，以阻止世界力量对比的任何巨大的恶化，尤其是如果这种恶化是由苏联官僚机构直接引起的話（如柏林、古巴）。

毫無疑問，在許多方面，美帝國主義是依靠這種政策獲得了比杜勒斯的“戰爭邊緣”政策若干更大的策略性的成功。美帝國主義始終保持着它在西柏林的地位，而赫魯曉夫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上后退了一步，而滿足於建立一座“牆”，以阻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公民的大規模外流，並可能在更換旗幟的情況下讓占領軍繼續在西柏林呆下去。美帝國主義迫使蘇聯官僚機構撤離了剛果，從古巴撤出火箭。它暫時阻止着委內瑞拉和聖多明哥革命進一步的發展。它在宇宙飛行方面部分地改變了落后情況，而在核武器方面保持着數量上的優勢。

但是從戰略性方面來考察，兩年來國際局勢卻不斷地朝着不利於美帝國主義方向發展。三番四復推翻古巴工人國家的企圖，包括入侵，都以失敗告終。不論在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由於廣大群眾對古巴革命的同情，帝國主義強迫這些國家當權的資產階級同古巴完全決裂的企圖未能成功。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發生了政治和社會嚴重的危機，那裡的群眾運動加強了，在若干國家中發生了游擊戰。帝國主義聯盟內部的矛盾在加劇，帝國主義之間的关系目前比1956年11月蘇伊士運河危機以來任何時候更加緊張。蘇聯的技術和經濟進展繼續把增長速度緩慢得多、不平衡得多的美國經濟拋在后面。殖民地革命出現了新的爆發中心，特別是在東南亞（老撾、南越），這比任何時期更迫使帝國主義把它的軍事、財政和經濟資源分散到許多地區去，而這些資源並不是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阿爾及利亞革命從法帝國主義手中奪得了獨立，革命的第一批成果之一是阿拉伯世界的群眾運動重新高漲，從而直接威脅到在沙特阿拉伯、波斯灣各酋長國、伊拉克甚至伊朗的英美石油公司的巨大財富。

面對着1960年以來發生的事件所包含的巨大革命可能性，蘇

联官僚机构的根本政策基本上是保守的，它害怕世界革命的劲头和世界革命在苏联国内的反应。这个官僚机构的总路线依然是“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它不去动员革命群众，不坚决支持争取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殖民地革命中最先进的斗争运动，而以坚持同殖民地资产阶级联盟和“利用帝国主义矛盾”作为长远的战略的基本因素。但是随着这条总路线在官僚机构内部越来越受到批判，特别在中国共产党的压力下，这条总路线毫无例外地不能严格地执行了。因此，如果苏联官僚机构没有给予阿尔及利亚革命以重要的援助，而一直等到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夕才正式承认；如果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采取罪恶的消极态度；如果拉丁美洲各共产党阻止了和继续阻止对古巴来说是最好的帮助的群众革命斗争，那末，克里姆林宫却不得不给予古巴的工人国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以便它抵抗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第一批的侵入尝试。同样的，如果苏联官僚机构赞助老撾的“中立化”，如果它企图制止东南亚的革命斗争，那末它却不得不保护寮国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老撾的直接军事干涉。

克里姆林宫的保守路线在最近一个时期表现得最恶劣的是，它对中印边境的态度（供应米格飞机给尼赫鲁，赞扬“尼赫鲁的和平政策”），以及它对印度共产党内的丹吉的赫鲁晓夫派的态度（在本国资产阶级面前实行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投降）。

同过去一样，三年来殖民地革命的胜利伴随着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帝国主义反革命军事干涉或者反革命战争（刚果、安哥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南越和老撾、南朝鲜、新西几内亚、也门、北婆罗洲等）。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工人国家有义务给这些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以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些革命在现阶段是最能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

同时，同过去一样，尽管举行了一系列“裁軍”會議，核武器軍备竞赛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苏联官僚机构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核試驗。这件事实促成了一个新“原子休战”的締結。从核試驗威胁到人类生理状况，成为核詭詐外交的因素的方面來說，原子休战有其积极性。但是即使这种休战真的締結了——特别是在符合克里姆林宮和华尔街停止在世界上扩散核武器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它絲毫不能成为真正实行核裁軍的保证或甚至是許諾这种休战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加紧进行核扩軍的两个阶段之間的休战。在国际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还拥有原封未动的經濟和軍事的力量整个时期，任何认真的裁軍依然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这說明美帝国主义力量存在多久，全面核战争的危机将存在多久。反对核危險的最后斗争是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由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得好。削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殖民地革命在现阶段对这个未来的裁軍可以作出重大的贡献。正是基于这种精神，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去大力地参加争取帝国主义国家任何单方面核裁軍的运动。

近年来越来越尖銳化的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間的經濟力量对比起了变化。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翌日所取得的在帝国主义陣营中的绝对优势已經丧失。英帝国主义的世界地位几乎一直在下降。相反，西欧国家的帝国主义(特别是西德帝国主义，其次是法、意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地改善了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相对的經濟地位。这种变化表现在相对的生产数字上，也表现在各列强在世界貿易中的相对比重上。

但是政治軍事力量的对比并没有同經濟力量的对比并行地起

变化。美帝国主义在英国放棄了“閃电”導彈計劃后甚至加强了它的核武器壟斷。它繼續控制着帝国主义的联盟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东南亚条約組織。它毫不考虑它的盟国的特殊利益(剛果、加丹加、新西几內亞等),在决定性时刻甚至不同它的盟国协商就采取行动(1962年10月加勒比海危机)。帝国主义联盟内部的日益剧烈的紧张局势,尤其是戴高乐拒絕接納英国进入共同市場之后所爆发的法美之間的紧张局势,归根到底表明美国的至高无上的軍事威力同經濟优势相对地下降之間的矛盾。

虽然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个斗争中各有各的打算,但是帝国主义之間的基本团结精神在革命和工人国家的进展面前还是占着上风。真正的“反同盟”(就是說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同苏联結成联盟以反对美帝国主义)是不能想像的。一些暫时的阴谋活动,特別在貿易方面,不会改变这个根本动向(如英国拒絕承认美国对某些所謂“战略”物資向工人国家出口的禁令;加拿大突破对古巴的封鎖等)。

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戴高乐追求在欧洲建立第二个帝国主义集团。这集团将与美国的集团相等与它并起并坐。戴高乐的所謂“法兰西打击力量”(欧洲独立的核攻击力量的核心)和他的拒絕扩大共同市場的政策——华盛顿希望把共同市場溶化在“大西洋自由貿易区”內)——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他这种野心既不符合帝国主义真实的具体份量,也不符合西德帝国主义战略和經濟利益,西德由于它已延伸到非洲(参加共同市場的非洲国家)早已感觉它在“小欧洲”中的地盘太窄狭了。因此最可能的演变是,与其說“欧洲帝国主义集团”同美帝国主义之間冲突将长期化和深刻化;不如說,其他帝国主义大国日益参加到大西洋联盟实际的领导中去。

### (三) 殖民地革命的进展

自 1960 年以来，殖民地革命继续在各个爆发中心发展：古巴和拉丁美洲革命；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革命；南非和非洲革命；老挝、南越和东南亚革命；中印纠纷和印度革命。

古巴工人国家的建立是，没有受到苏联官僚机构控制和影响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胜利。这也意味着，1917 年 10 月以后第一次由于客观需要也由于阶级觉悟，有计划地企图在国际上至少在整個拉丁美洲扩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革命领导取得了政权。由于这两个原因，就是说，由于古巴对拉丁美洲贫困群众所具有的客观吸引力，和“卡斯特罗主义”在拉丁美洲工人运动先锋队内部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引起的逐渐的分化，古巴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拉丁美洲革命的高潮。

相反地，这个革命也导致美帝国主义政策的改变，在 1932—1957 年这一段时期内，美国政策主要特点是，间接干涉和经济财政的压力，即实行所谓“睦邻”政策。现在，美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越来越采用直接的经济、政治干涉，甚至军事干涉。

至于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它正处于越来越剧烈的分化过程中，一股力量企图用表面上适应群众反帝要求和实行绝不触犯半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若干改革的办法来抵消群众运动；另一股力量则企图对实质上威胁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群众运动实行直接的镇压。

古巴胜利影响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面对这种高涨的反应，这两种趋势结合在一起，正是最近三年来拉丁美洲政治社会的动向。

群众运动的高漲在委內瑞拉、秘魯、智利和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特别突出；至于阿根廷，工人运动已屡次表明，工人运动在現政权的經濟政治崩潰的气氛下（劳动人民和国家公務員的工資未发，接二連三的軍事政变等）依然保持着完整的发动大規模罢工的能力。甚至最稳定的国家例如墨西哥也受到农民反抗周期性爆发的震动。

另一方面，“爭取进步联盟”应该是美帝国主义干預拉丁美洲的一張王牌。但是直到現在不論在經濟上（通貨膨脹严重地阻碍工业化发展），在政治上都显得无能为力。美帝国主义和“民族”資產階級无法消灭革命高潮的客观原因，加上缺乏成熟的革命領導，这种情况促成了长期的危机，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玻利維亞危机已延續十年之久。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很快在过时，它正处在鍛炼和不断分裂为社会主义革命或亲美反革命的过程中。但是在拉丁美洲三个国家中，即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資產階級比这个大陆的其他国家强大些，因此帝国主义还有比較寬闊的迴旋余地。在阿根廷，民族資產階級在帝国主义扶植下还能够設法重新运用庇隆主义，庇隆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强大，足以用来对抗社会主义的出路。

最尖銳的革命危机正在委內瑞拉酝酿中，那里的局势依然很緊張。但是在那里美帝国主义有着巨大利益，它势必要用一切方法来保卫。在智利由于群众处在等待大选的精神状态，随着 1964 年的大选的发展，正在酝酿一場巨大的較量；在秘魯，群众运动不論在城市或农村都已达到一个非常先进的阶段。

阿尔及利亚革命在它轉向社会主义过程中，对阿拉伯人民貧困群众，不論是馬格里布或者已經巴尔干化为七个国家（姑且不談波斯灣各酋长国和教长国和亚丁殖民地）的劳苦群众來說，都是一



股巨大的吸引力。这些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只是在彻底玩弄阿拉伯统一的花样，即建立面积广大和石油资源丰富(这将最后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大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对抗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下，才有一丝希望抵住这股吸引力。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于团结在纳赛尔主义周围，他们利用纳赛尔主义作为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作为严密地官僚地控制或限制群众运动的手段。纳赛尔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出现在埃及本身，在群众的支持下纳赛尔主义无可怀疑地是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經濟地位。但是纳赛尔主义却把工人运动任何自发性和工人运动应有的斗争维持在窒息性的控制下，从而产生了恩格斯所用过的名詞“国家资本主义”；旧时资产阶级通过管理和經營国有化的經濟日益发财致富。

因此，伊拉克、叙利亚的“统一主义”的政治力量的胜利，约旦的群众斗争和也门的革命都可以认为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初步反应，同时也可以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对这个革命的初步反应。正是主要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共产党所犯的巨大政治錯誤使阿拉伯统一高潮暂时地造成了工人运动的削弱而不是工人运动的加强。但是今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以及纳赛尔式的“社会主义”强加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生产力发展中的狭窄的界綫，将为阿拉伯世界的工人运动新的前进創造出合适的条件；同样地，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进展将促进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工人运动。

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本·貝拉领导机构明确地表示，决心支持黑非洲各地的革命运动，特别是葡萄牙殖民地，主要是安哥拉、南非的革命运动。由此，阿尔及尔正在成为整个非洲革命运动的推动中心。

1960年政治独立斗争取得辉煌的胜利之后，黑非洲革命曾一度出现停顿，特别是由于新殖民地主义势力在几乎整个前法属黑非洲和刚果取得胜利，卢蒙巴和穆尼埃被杀害，新殖民主义在肯尼亚的某些进展以及加纳和几内亚群众运动的低落。总的说来，帝国主义直接的、间接的干涉是这个新殖民主义胜利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也得归功于部落势力的强大（特别是在刚果、加纳、肯尼亚）推迟了真正民族主义政党的建立和真正的民族意识的树立，归功于新资产阶级势力在独立后立即超速度地出现，特别是在行政部门、政治干部方面、商业部门和“公用事业”部门。

在这些条件下，黑非洲革命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东山再起，首先是在安哥拉，南、北罗得西亚，特别是南非。在南非，情况可以与1954年11月以前的阿尔及利亚相比，一触即发的原料已经堆积成，而种族隔离立法和经济剥削程度的加强更是火上加油。因此一开始就采取武装斗争形式是无可避免的。土著居民的特殊性：大部分是半无产者，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高过于黑非洲其他国家，使即将到来的南非革命成为整个黑非洲社会主义革命未来的中心。

在日内瓦协定签订和越南分割之后一度陷于停顿的东南亚革命，这几年来由于南越的游击战运动和老撾的内战的高涨重新在前进。想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压力下停止这场内战的企图遭到了北京和河内的抵制，和寮国对那些所谓“中立主义”力量所产生的吸引力的抵制。此外，南越和老撾革命的进展在泰国广大的边境地区创造了革命前夕的形势。

优越的经济地位和一批相当富裕的农村小地主，以及华人和马来亚人之间所爆发的民族冲突，使马来亚的新殖民主义者得以暂时地控制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然而新加坡革命运动的规模却

并未縮小，这迫使馬來亞买办資产階級起草一个馬來西亞計劃，以便一方面抑止新加坡革命高潮另一方面更好地抵禦越南、老撾和泰国革命进展的影响。但是这个馬來西亞計劃遭到北婆羅洲群众的猛烈的反对，引起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的新发展。

印度尼西亚仍然是东南亚革命的关键性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革命已停滞了一个很长时期，虽然还不能說資产階級政权已稳定或群众运动已遭到重大的挫折。苏加諾政权只是一方面依靠印尼共产党（該党实行毫不反对反而完全支持苏加諾并且絕對不考虑采用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极端机会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依靠巧妙地利用群众反对各种分裂运动和关于新西几內亞及北婆羅洲的民族感情来維持。

最后，印度各左翼政党（印度共产党、革命社会党、社会党等）可悲的态度，它們在沙文主义压力下投降和接受同資产階級結成“神圣同盟”可耻的行为，使得尼赫魯政府在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給印度工人运动造成严重的失敗。尽管中国軍隊在边境战役中严重地打敗了印度資产階級軍隊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撤退了，印度資产階級政府还是把大規模的国家軍事化費用强加在群众身上。这种軍事化并使第三个五年計劃遭到失敗。然而扩充軍备的客观后果（通貨膨脹、生活費高漲、稅捐剧增）将为工人运动的再起造成有利的条件，如果先进的政治力量懂得把无产階級和貧穷的知識分子保卫生活条件的斗争同真正土地革命的行動結合起来。

总之，殖民地革命的一切新的进展，将越来越把这个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轉化（这种轉化已开始 in 阿尔及利亚出現）提到日程上。当这种轉化达到各地理区域中的关键性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印度或巴西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将发生新的质的变化。

#### (四) 帝国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演变

总的来说，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帝国主义之间的猛烈竞争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导致对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定期性的进攻。资本主义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长期存在着相对的充分就业的气氛。在这种有利气氛中，劳动人民对付这些进攻所进行的不可避免的反击可以采取经济形式：或者只限于要求增加工资，或者争取减少劳动时间和延长工资照付的假期（这是面对着耗尽无产阶级体力和精力的无休止地提高劳动强度所必需采取的自卫步骤）。但是当—一个足够强大的先锋队成功地教育了劳动群众中最富战斗性的阶层必须为过渡性要求进行斗争的时候，这种反击也可以采取具有更进攻性和政治性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反击能够成为对资产阶级的一場力量的较量，创造出—一个革命前夕的局势和促使政权问题迅速成熟，而相对的“繁荣”景象的消失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先提条件。

尽管各国具体条件很不相同，但是比利时无产阶级进行的伟大斗争（1960年12月—1961年1月的总罢工），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斗争（1962年4月阿斯土里亚斯矿工的罢工，接着全国各地发生的声援罢工），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斗争（1962年夏季冶金工人的大罢工），英国和芬兰无产阶级的斗争（1962—1963年冬季的罢工运动），都是在—一个气氛中发生的。无论哪—一处这些罢工都具有时间长的特点，罢工时间长到超乎惯常情况；并且在斗争中出现—了一批新的青年战士，这些青年战士以特别旺盛的战斗精神参加了战斗。这些特征也同样出现在德国西南部的—十万冶金工人的罢工中。这些德国冶金工人的罢工运动表明，这是在接近上述

总的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第一次觉醒了。无论哪一处，归根到底，先锋队的相对力量、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它提出的切身要求的水平才是，想把斗争保持在狭窄的工团主义范围内或想把斗争提高到将动摇整个资本主义经济 and 资产阶级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甚至在法国，那是西欧唯一的无产阶级在1958年5月没有认真地起来反对而让拿破仑式的戴高乐政府建立起来，从而使无产阶级遭受严重失败的国家，1963年3月的矿工罢工运动也表明，工人阶级已准备艰苦地保卫他们在“繁荣”时期取得的生活水平，表明这样的斗争甚至已创造了有利于工人运动的政治复兴的客观条件。此外，戴高乐政府实行的政策把社会党推到反对党地位，威胁到社会党在议会制度中的原有的地位，这便利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接近，从而扩大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因此，首先，由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抵抗，其次，由于工人运动的若干复兴，戴高乐政权没有能够得到深刻的和长久的巩固；当它遇到经济和社会情况发生任何突然的恶化，在任何一个未解决的结构问题突然被提上日程上来时，仍然会束手无策；而这些情况反过来将会突然触发阶级斗争的火焰，为工人运动的真正复兴创造可能性。

总的来说，资产阶级想利用阶级斗争暂时的平息和工人阶级的若干非政治倾向来加强它的镇压武库，对罢工权重新规定，加速向“强有力国家”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却到处遭到工人阶级先锋队伍的猛烈的抵抗，而工人阶级先锋队伍已有足够的影响来推迟（德国）或在很大程度上挫败（意大利、比利时）资产阶级的计划。假如这种反抗能与好几年来更加艰苦的经济斗争的潮流结合起来，那末它也将成为工人阶级斗争再度政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资产阶级，特别在某些国家，酝酿了一种新方针：在不同

的或甚至表面对立的方針下，加强經濟相对的健全和合理化（这对資本主义利益本身來說也是不可缺的）；其次，把工人階級，首先是工人階級的工会，逐漸地“溶化”在“新資本主义”液体中。这种政策开始于法国孟戴斯—弗朗斯执政时期，然后更有組織地发展于戴高乐时期，最后在意大利依靠中間偏左的势力在更大胆的形式下明确起来。但是尽管有若干傳統的工人政党对此采取机会主义的或混乱的态度，这种政策显然沒有达到目的。不論 1962—1963 年的經濟斗争（意大利几次罢工带动了停滯好几年的某些工业部門，法国矿工的罢工等），或如 1963 年 4 月意大利大选那样的出色地有意义的事件，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階級战斗派对这类性质的新試驗應該在下列两个方面繼續予以反击：一方面，拒絕在“計劃化”、“收入政策”等借口下的任何公开的或隱蔽的工資冻结，保持工会运动的一切行动自由权，利用充分就业以改进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宣傳如工人监督、工农政府（各个国家要有各个国家的具体的特殊的内容）等过渡性的要求，这样可以順利地揭露所謂“中間偏左”解決办法的資產階級本质。

下列两个事例特別值得提出：西德的事例和英国的事例。

十多年来，西德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政治觉悟出現了退化現象。共产党被迫轉入地下活动并且承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烏布利希政权的不得人心的全部重担，因而完全陷于孤立，降到一个毫无力量的积极分子的核心。中派主义的小集团逐漸瓦解，被社会民主党排挤出来的新的中派集团孤立于群众运动之外而大部分瘫痪下来了。社会民主党自哥德斯堡代表大会以来快速度地向右轉。那次代表大会拋棄了該党綱領中仅有的社会主义的殘余，迎合了該党社会成分的变化，即小資產階級、公務員甚至中等資產階級。他

們这些人代替了工人，而成为該党日常工作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使該党变质为一架选举机器。然而社会民主党远不能成为西德工人階級政治团結的一个主要中心。

但是，各工会，特别是各大全国性的工会（冶金、化学、公用事业），保持了甚至相对地发展了它們的力量。所以发生这种演变，背景是，十五年来，沒有通过面对面的大規模的斗争而只是通过談判就取得年年提高工資。1949年起点很低的工資水平和工业特大发展促成了这样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目前已遇到越来越大的客观的阻力：国际間竞争的剧烈化，德国的工資今日已在共同市場內达到最高峰，国家非生产性的开支（特别是軍事开支）不断增长（这自必沉重地轉嫁到劳动群众身上）。西德的資方必将拒絕“一年一度”的加薪，甚至于通过生活費用的上漲强使实际工資降低。最近德国西南部冶金工人的斗争导致工人罢工和資方停业，說明了这种时刻已經接近。这个时刻一旦来到，即使在那时社会民主党已参加政府，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工会和資本家之間发生剧烈的冲突，工会先鋒队激进化，至少这支先鋒队可能迅速政治化。

这几年来英国大体上是朝相反方向发展。对某些政治问题的反应越来越敏感了，首先是对核軍备裁减問題；其次，盖茨克尔提出修改工党綱領的“第四点計劃”遭到猛烈的反对；保守党經濟計劃破产，使英国蒙受一連好几年的經濟停滞；劳埃德宣布冻结增加工資；大批失业重新出現，企图損害工人階級以实行工业合理化——这一切造成了社会緊張和逐漸重新政治化的气氛，使今日的英国工人运动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强大。工党可能在群众和积极分子不能再忍受（即使不起来反抗的話）保守党仅仅繼續它現在的軍事和經濟作法的情况下再度登台，那时毫無疑問地可能促成工党在一个短時間的間歇后重新向左轉。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独裁制度继续衰弱下去，一个是由于群众运动的真正复兴，另一个主要是因为殖民地革命扩展到所有的葡萄牙殖民地。这两个政权的复灭已经指日可待。

在日本，资产阶级利用经济空前的发展，利用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特别是扩展中的私营大工业部门的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在1960年严重危机之后成功地稳定了政治局面。但是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根本结构脆弱的特点，如现代工业和古老工业同时并存，相当高的工资和不足温饱的工资同时并存，此外它承受着某些工业部门结构性没落的后果（煤炭工业、造船工业），以及来自中国革命的吸引力，群众反核战争情绪的强烈等。这些条件汇合起来依旧是有利于群众运动的复兴。在美国，尽管失业数字不断在扩大，若干“萧条地区”的困难继续在扩大，工人运动总的说来是停滞不前。不时也发生一些罢工运动，其中也有时间较长、斗争较顽强的；但是这些罢工一般地是防御性的（特别是反对自动化后果），而且都是在上述的总的经济气氛中由资本家越来越倾向于加强他们的反劳工阵地所引起的（冲天的通货膨胀，比起欧洲竞争对手来更加恶化的竞争条件等）。这种形势直至美国资产阶级认为经济普遍恶化到需要对美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工资大举进攻之前基本上是不会变的。这种进攻可能引起坚决的反击，导致民主党和工会之间联盟的破裂，导致其中一部分的工会官僚分子出头来组织一个工党。加拿大新民主党的进展的速度，包括在大选方面，也将有利于美国的这个过程。

同时，如果说美国的工人运动停滞不前，甚至连原来的阵地也没有保住，那末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却大大高涨。黑种居民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采取了主动；南方的工业化，向北方移民的问题，战争的后果，工业中的地位，殖民地革命的反应。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青



年一代討論現狀的傾向越來越大，他們組織示威，建立越來越富有戰鬥性的團體。這種傾向又與另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傾向結合在一起，即民族主義願望的抬頭，特別在穆斯林黑人運動發展過程中更為明顯。

在美國長時期以來的相對的“繁榮”壓力下，加上這個國家空前的對民主權利的破壞和最凶惡的搜捕，美國整個極左派的力量已大大下降。只有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如此不利的環境中成功地維持下來。由於古巴革命的勝利，美國先進隊伍重新覺醒了。這種覺醒在大學里特別顯著。在殖民地革命、非斯大林化運動、反核武器的鬥爭和爭取種族平等鬥爭的影響下，以及了解到美國資本主義不可能給青年提供可靠的前途下，美國新的一代的先進力量正在形成中。

### （五） 國際革命工人運動內部的演變

1960年以來，國際革命工人運動內部最主要的變化是：卡斯特羅主義潮流的出現，中蘇爭論不斷擴大的後果。

古巴革命的勝利不但不是在古巴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而且甚至是在反對了古巴共產黨的阻力及該黨在菲德爾·卡斯特羅進入哈瓦那之前一貫執行的政治路線的情況下取得的。這個勝利對所有殖民地共產黨所執行的赫魯曉夫路線是個十分沉重的打擊；特別是在古巴建立工人國家和蘇聯官僚主義領導默認這既成事實之後，是如此。如果說這股卡斯特羅主義潮流對各工人國家（特別是蘇聯、捷克和波蘭）的青年和學生是一種吸引力，那末它對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國家尤其發生了深刻和持久的影響。在某些國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在古巴革命和“中國路線”的雙重影響

下发生了分裂(特别是在巴西、哥伦比亚)。在另外一些国家,共产党不得不大踏步地向左轉,采取了武装起义的路綫(危地馬拉、委內瑞拉)或是采取了非常先进的綱領和武装起义路綫(南非)。此外,一些非共产党的独立力量也采取了同样的路綫(委內瑞拉的“左派革命运动”,巴西的儒利奧等等)。

傳統的斯大林主义領導乞求“同民族資产階級建立統一戰綫”,甚至在民族資产階級把他們投入牢獄还是如此。在这种令人噁心的消极态度和机会主义的面前,卡斯特罗路綫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拉丁美洲各国大部分先进青年都深受感动(在非洲,阿尔及利亚革命和“中国路綫”的影响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这种普遍具有爆发性的局勢,如果缺乏有經驗的和在政治上成熟的干部,在有些地方(例如委內瑞拉),就可能发生考虑不周的軍事行动。

一般說来,中苏爭論的第一个阶段也在逐漸地发生影响,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各工人国家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群众性的共产党,如意大利党、法国党),这是二十二大以后非斯大林化运动的一个新的推动力,使討論扩大化并使討論接触到当代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策略中几个关键性問題。两个完全对立的潮流,很快地在有利于非斯大林化潮流內部分手了;一个是赫魯曉夫潮流或叫做陶里亚蒂潮流,它根本上是共产主义右派的潮流,修正主义的和新改良主义的潮流;一个是共产主义左派的潮流,“非斯大林化”对它來說,只是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的列宁主义方針的一个起点。

关于中苏冲突的重要意义和原因另有专门決議来加以討論。

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运动(主要局限于資本主义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机构除了在上述国家外,在北美保持着十分强大的陣地;它特別受到資本主义的“繁荣”同在这种“繁

策”之下发生的或多或少剧烈的阶级斗争这两者之间矛盾的影响。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不但在国际政策，而且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继续向右转。在国际政策方面，它们越来越迎合美国路线；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它们抛弃了马克思辞汇的最后残余，而完全站到凯恩斯式的新资本主义路线方面。

但是在这些党的内部，普遍地出现左派，有的反对迎合大西洋公约集团的扩军政策（包括核扩军），有的反对整个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在阶级斗争越有力、越剧烈的地方，这些左派的力量就越强大，也就是说，比利时的左派比荷兰的左派强大，英国的比西德的强大，丹麦的比瑞典的强大，芬兰的比奥地利的强大，许多情况是，由于反对改良主义官僚机构同意扩军而引起分裂，从而产生了一批左翼或中间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派（丹麦、挪威、荷兰）。这些党派在群众运动中的影响还是微不足道的（丹麦除外）。但是它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已起了一个警告和施加选举压力的作用。

这股社会主义左翼力量逐渐组织起来，同工会建立联系，吸收工会中最先进的力量参加，取得一个真正的群众基础，制定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整个投降主义政策的统一纲领，它就能为更换领导准备好基础——尤其是在缺乏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和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老传统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能够增强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和对自已的斗争前途的信心，从而深刻地影响事态的发展方向。正是这个因素决定了1960年12月—1961年1月比利时总罢工规模的空前巨大，这个因素也能在明天在英国甚至在西德起作用，一旦那里的阶级斗争有了新的重大的发展的话。

相反的，在工人运动受着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里，社会党没有能够照这条抛物线发展。例如在意大利，南尼的社会党这几年来更加向右转，它的右翼直截了当地与国外的传统的改良主义潮流同

流合污，它的左翼受着陶里亚蒂新改良主义的有害影响。在法国，统一社会党是作为各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力量的汇合中心而产生的，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不能再忍受摩勒—拉戈斯特—勒莱纳的领导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戴高乐上台期间所起的变节角色。但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之后，摩勒重新转到反对戴高乐行列中，以及缓慢的建立法国社会党—共产党统一阵线的趋向，可能使统一社会党在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眼中失去存在的意义。

## （六） 我们的任务

根据前面的分析和关于各工人国家形势的特别决议中的分析，第四国际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确立如下：

（一）第四国际继续向全世界群众提出警告：从事核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把核军备竞赛作为它目前经济支柱之一，随时准备对全世界革命的进展进行军事干涉，而在它感到生存受到迫切的威胁时，这种干涉可能采取核战争的形式。第四国际向群众提出警告：一场核战争对全人类将造成一场巨大灾祸，制止核战争的发生是当前头等重要的任务。

今天，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削弱主要地是由殖民地革命所造成的。帝国主义的削弱为未来的裁军创造了最有效的条件。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大国的无产阶级的行动推翻了帝国主义之后，裁军才能彻底实现。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如果不是主动地，站在最前列，来开展争取本国资产阶级单方面裁军，首先是核裁军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目标应包括反对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安置核武器或建立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基地（美国基地、西德基地或“一体化”基地）。

这些运动应该成为最广泛的群众运动，联合一切积极分子（主要是青年），联合各种倾向的工人运动（包括基督教工人运动），甚至应该把运动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些运动不会因为这样扩大而是因为选择错误的政治目标或者领导逐渐消极而蜕变。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同参加这些运动中的最富于战斗性的阶层一起，向比简单的示威更彻底更有效的战斗形式前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设法把这些运动引向以工人运动夺取政权为基础的政治解决的方向；应该努力说服群众；归根到底只有彻底裁军，就是说推翻资本主义，才是裁军的有效答案。

（二）在现阶段，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因此，“第四国际”和它的支部参加领导、保卫和援助殖民地革命，是我们运动的主要任务。鉴于若干国家的客观形势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现有的力量，第四国际应该对下列地区给予优先的注意：

#### （甲）阿尔及利亚

无可争辩地，目前正在进行殖民地革命的所有国家中，阿尔及利亚是把这个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并且正向着建立工人国家前进的一个国家。第四国际的力量，首先是欧洲的第四国际力量应该为推动工人运动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而作出贡献。同时，第四国际力量继续警告阿尔及利亚和全世界的群众：在这方面如果不同帝国主义切断货币和财政联系，不用革命手段动员群众，不在城乡群众中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政治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机器，要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 （乙）秘鲁—玻利维亚地区

正是在这个地区资产阶级和拉丁美洲贵族的力量是最薄弱，群众运动已获得非常丰富的经历，形势继续是革命前夕的形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最有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不论在农民运动

或工会和工人运动中取得优势地位。用武装民团夺回被侵占的土地（按照烏哥·勃朗科傳統方式），和建立一个新的工会中心是現阶段秘魯的中心任务，我們拉丁美洲的力量对此應該通力协作。在玻利維亞，我們的力量主要應該为建立用来替代玻利維亞总工会現領導的真正的左派領導、和为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統一而斗争。

一般地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應該成为古巴革命最好的保卫者，設法打进卡斯特罗主义潮流中去，反对傳統党的方針，坚持革命斗争是保卫古巴最好的方法。他們應該参加貧农的組織，貧农将是保证这些絕大部分的国家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警惕冒險主义和暴动主义的同时，他們必須支持游击战运动，首先是支持已經在秘魯和委內瑞拉发生的游击战。

### （丙）南非和安哥拉

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南非的局势，目前在整個黑非洲中最具有爆发性；由于客观力量（无产和半无产阶层的重要性）和主观力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領導的理論发展水平、南非有大量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干部）同时存在，大大地有利于即将到来的革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迅速发展。我們在南非的运动在武装自卫的道路上采取了正确的政治方針，同时对其他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各种群众运动的潮流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即稳步地着手建立反帝反资本主义統一战綫的方針——能使我們的运动在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初期就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南非革命初期必然会采取反对国家、反对军队和反对种族隔离的群众性总起义的形式。对这个斗争最初阶段的民族民主性质我們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宗派主义态度；而應該了解到斗争一开始，它必然在农村中表现为夺取土地的斗争，在城市中表现为反对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军队的斗争；應該在

这个群众的民主斗争内部和领导这个斗争中使这个斗争赋有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予以实现。

**(丁)第四国际也应该特别关心它的亚洲各党的活动，这些党已掌握了能深刻地改变客观形势和保证我们的运动向前跃进的杠杆。**

我们的锡兰支部已逐渐纠正了1960年支持锡兰自由党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方针。当群众一开始行动起来，锡兰支部就毫不犹豫地领导群众起来反对它昨天的大选同盟军。但是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一次更深刻的自我批评将是有益的，特别是因为这些错误归根到底是由于过高估计单纯的大选对在锡兰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作用。不然的话，在锡兰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阶段中，可能产生新的另外一些错误。

锡兰平等社会党今天应该毫不迟疑地采取建立工人阶级组织——政治团体、工会组织(锡兰平等社会党——锡兰共产党——人民联合阵线和工会组织，包括拥有绝大多数种植工人的锡兰工人大会和民主工人大会)——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提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政府的方案，作为改变锡兰独立以来历届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应该进攻性地实行这个方针，把这个方针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它的中心不是仅仅依靠上层的谈判，而是依靠建立各级(全国、省、市、区)统一战线委员会，并赋予这个方针以明确的阶级性。在政权问题上，同英联邦的关系问题上、同各工人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以及关于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语言等问题方面，统一战线的纲领都应该反映我们阶级立场。抱着这种精神，锡兰平等社会党的争取统一战线和统一战线政府的运动必然只会扩大党的影响和群众基础，提高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挫败可能混进统一战线内部来的投机分子的一

切阴谋活动。錫兰平等社会党应该关心的其他任务是：制定农村贫苦人民当前的和过渡性的具体要求的纲领，总结军事政变失败的教训，征求党员以及对工人党员和干部进行经常的政治和理论教育。

**(戊)第四国际坚决支持南越和老挝游击队推翻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第四国际号召抛弃使革命半途而废的一切主张，号召拥护贫农和工人大胆地夺取政权的方针。**

在印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着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大党和它的大人物尼赫鲁的毫不调和的斗争。他们揭露共产党的丹吉集团和人民社会党的美国代理人的叛变行为；这些人同印度资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不但反对中国工人国家，并且反对深受尼赫鲁政府迫害的本国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将继续进行澄清和革命力量重新集合的工作，越来越走向同共产党左派联系的方向，制定一个符合于城乡贫苦群众的愿望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

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苏加诺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并批判共产党屈从于苏加诺及其政策。他们将努力开辟社会主义的前景，制定一个导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

**(三)在世界范围内，今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参加到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大争论中去，以便逐渐澄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思想和战略方针，努力建立一股多少成整的强大的共产主义左派潮流，从而为殖民地革命、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的革命领导准备宝贵的干部。**

这种参与应该在我們自己的旗帜下，以全部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和第四国际的纲领为基础，不向任何倾向让步；因为我們深信，只有我們的纲领，即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才能够对



在共产主义战士們面前已提出和越来越将提出的各項問題給以完滿的答复。我們的参与有双重目的：經常地滲入真正的工人运动中去，以便取得領導地位；不断地为建立一个国际无产阶级新的革命領導而斗争。正是为了这两个目的，我們参与中苏爭論，在对双方观点提出分析批判的同时，实行策略性的选择以便締結能使我們接近于建立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同盟。

因此問題决不是在官僚机构内部寻找同盟軍，而是在群众运动内部。而这些同盟軍只能是共产主义左派，即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内的卡斯特罗派和“中国”派，以及各工人国家中同赫魯曉夫派对立的左派（他們願意比官僚机构更进一步推进非斯大林化运动）。

除了它的原則性和始終保卫我們的立場外，这种参与的效果将取决于正确地理解参加爭論的共产主义活动分子越来越关心的一系列問題，取决于我們正确地答复他們的能力。这需要：

（甲）努力阻止帝国主义从这个爭論中得到好处。为此目的，必須坚持：把共产党之間的关系同工人国家之間的关系区别开来的必要性；尽管爭論剧烈，中苏联盟应予維持的必要性；制止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經濟报复手段的必要性等等。为此目的，还必须坚持，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會議，会前应公布所有文件并通过广泛地民主地討論，举行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和各种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流派参加的討論和會議。

（乙）應該排除討論中的学究式和空泛的强詞夺理的爭論，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面临的战略和策略問題，提出这些問題的解决办法，而解决的办法不但必須參照革命馬克思主义經典傳統，而且應該广泛地总结这几十年来大大地丰富起来的革命經驗。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必須毫不犹豫地提

出过去没有得到充分解答的新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新问题如：武装斗争在殖民地革命中的作用，关于在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形势下提出什么样的新的过渡性要求；工人国家内的党、工人委员会和工会互相之间的关系；国际间的经济规划等等问题。我们运动朝着这个方面所进行的理论工作今天已有保证可以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广泛的响应。

(丙)二十大，特别是二十二大所造成的局势出色地有利于我们的运动在各工人国家内的发展。我们应该组织起来，使我们有可能加强我们对在列宁主义道路上走在最远的人的帮助，并为此目的通过一批成熟和热诚的干部、一套特殊教育方法和策略，把我们的观点顺利地深入到各工人国家的先进阶层中，特别是青年中去。

争取恢复列昂·托洛茨基和所有斯大林恐怖的受害者的名誉的运动应该给以重要的地位。

(丁)在资本主义欧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继续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

一般说来，他们应该在下两个方面提出更明确的口号和采取更明确的行动，即反对核武器斗争方面和欧洲经济一体化及共同市场方面。今天应该提出一系列过渡性要求来补充传统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这些过渡性要求应该着眼于：一方面要求同各工人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和无私地援助殖民地革命的国家并制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计划(这些计划能够保证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大规模地扩大国营经济(对在许多国家内设有分支机构和工厂的托拉斯，实行无赔偿的并置于工人监督下的国有化等)。同时还应该普遍地宣传制定一个全欧经济发展计划的观点，这计划应由各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来制定，用以抵制共同市场所冀求的新资

本主义的“规划”。

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还应该要求召开这个单单是共同市場範圍內的工人組織（工会組織和政治性組織）的代表大会，以适应工人运动制定共同战略的需要；来对付資本家和政府对群众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进攻。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1960—61年比利时的罢工、阿斯土里亚斯矿工的罢工和法国矿工罢工中得出一切結論。它表明这些真正令人难忘的罢工所取得的經濟效果，已由于国际貨物比不久以前更快更自由地周轉而被抵消了，从而表明，在欧洲範圍內建立統一的工会和有效的国际团结，越来越成为欧洲每个国家的罢工行动能否取得效果的必要条件了。

## 5. 中苏冲突和苏联与其他 工人国家形势

世界革命的高漲、經濟不发达国家和各工人国家强大革命力量的解放、以及它們对整个工人运动的影响，大大加剧了早在斯大林逝世前即已开始的进程，并給予斯大林主义、即給予莫斯科官僚机构統治群众共产主义运动、苏联社会和各工人国家的完全霸权以致命的打击。

基于这种霸权和一种不容置辯的指揮权，多年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国家一直承认苏联共产党是“领导党”，承认苏联是“领导国家”，并且一直与苏共和苏联站在一起。由于官僚机构在苏联社会和所有工人国家中都再也不能恣意統治、再也无法保持穷凶极恶的警察制度，于是对群众做出了一些让步。最近时期以来，官僚主义制度瓦解过程規模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从前各国共产

党的磐石般一致已不复存在，尽管苏联领导机构的威望仍居统治地位，但今后它已陷入无法整个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境地了；几年来都保持在内部的分歧，现已公开暴露；激烈的论战已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甚至出现了分裂的可能性。各工人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克里姆林宫的附庸的关系，并且在某种情况下还存在着公开的争端。近年来的两个主要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古巴和阿尔及利亚），是在独立于本国共产党和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之外的一些领导机构和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大大损害了斯大林的或斯大林死后的领导机构的威信与权威。在各工人国家中，尤其是在苏联，“非斯大林化”——即官僚领导机构用来维护自己对苏联社会的统治的自由化——，没有解决苏联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正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使各工人国家中有力地出现了真正生活民主化的趋势。

各工人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体系内的危机，目前阶段最显著地表现在中苏冲突上。特别是在1962年秋季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事件之后，中苏冲突采取的形式是在工人运动国际政策的重要问题上（如战争与和平、不断革命、是通过革命道路还是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公开冲突。这个冲突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各左派在世界革命问题上趋于一极的趋势。另一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机构的存在，特别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的青年中正使尚未组织起来的派别汇集于一极，并开始使拉丁美洲有组织的派别各趋一极。尽管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制的贯彻程度由于缺乏工人的政治民主而很有限，可是这一试验却吸引着苏联和东欧工人国家最先进的阶层。

这个危机是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国内生活中突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冲突并行发展的，而随着这个危机的发展，托洛茨基

綱領的有效性就愈发突出了，因为，托洛茨基綱領的某些部分，諸如殖民地国家中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中的世界革命問題，工人国家中反对官僚机构、爭取工人民主的斗争，都渐渐在这个危机中表現出来。

然而，尽管官僚主义制度的危机已达到很大的規模，可是至今在旧的斯大林主义范圍內表現出的各种派別，仍从属于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沒有任何一派摆脱了官僚机构的利益与前景而提高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与前景的水平。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現在这些派互相指責为“托洛茨基主义”，一致譴責“托洛茨基主义”，它們把討論拿到基层去是迫不得已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机构則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很有节制地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辯論。

对危机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最多可以通过短时期的休战使論战中斷下来。官僚机构的任何阴谋都无法阻止各国共产党和各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制度的危机。第四国际参与这个进程确保革命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革新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长中。

## （一） 共产主义运动磐石般一致的終結

### （甲） 中苏冲突

中苏冲突早在1957年就已公开，1959年“戴維营”会談后有所发展，1960年莫斯科會議达成暂时妥协后冲突再起，1962年秋加勒比海事件和中印边界事件之后更趋恶化。中苏冲突再次证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即使是受一个官僚主义领导机构所控制的，它的发展与胜利既同斯大林时代的那样斯大林主义不相容，也同赫魯曉夫领导下的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不相容。

不論是世界力量对比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前时期也好，还是在使世界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也好，苏联官僚机构国际政策的标志是不断設法保持现状，而这个现状却始終是不存在的。在战后时期中，保持现状应该理解为与帝国主义保持世界均势，这种均势不应被大革命运动所扰乱，帝国主义的主要地位也不得受到危害。

随着这种力量对比因工人国家的经济成就和苏联的武装力量而获得巩固，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官僚机构除在有利时机时进行一些冒险主义的行动外，最经常地还是加紧它在国际关系上的机会主义进程。苏联官僚主义机构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了苏联群众中正常存在的这样一种情感：他们对爆发一场新战争怀着恐惧心理，他们渴望他们在多年中为捍卫苏维埃制度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作出牺牲后，终于在物质上获得补偿。苏联官僚机构把一系列右的倾向和立场系统化了，而这些倾向和立场早在斯大林时代、特别是当斯大林与帝国主义民主国家寻求相互谅解的时代就已提出来了。

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在这一点上的重要区别，并不在于他们各自领导下的官僚机构的前景与意愿，而是在于他们从事活动的条件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斯大林曾公开地，厚颜无耻地把一些革命葬送给刽子手（别的不谈，诸如1925年至1927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西班牙革命，希腊游击队的斗争）。赫鲁晓夫也曾不得不支持革命运动，但是，他是根据同帝国主义或不发达国家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情况，或者在革命取得决定性成就之后，才这样作的，而且作得很不够的、畏畏缩缩的。

在这同一时期，中国领导人饱经二十余年的风霜，取得了胜利，开始时生产力水平很低，并且常常处于受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

国主义的进攻的处境。美帝国主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一个新的革命中心；把它看作实现自己在太平洋的野心的障碍。中国领导人没有对设法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提出原则性反对意见，但是，他们得到的经验是：这对他们来说是很不现实的，何况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在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利益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危险，一直存在着。因此，他们不得不使他们的行动方向远不是朝向设法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而是继续奉行旨在削弱帝国主义的政策。必须进一步指出，中共领导机构更贴切地感到十四年前取得胜利的那种朝气蓬勃的革命的压力的压力，而苏共领导人则代表着四十年来已巩固了自己政权的官僚机构。

中苏冲突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两个领导机构有不同的需要：一个需要表达居于经济发达国家领导地位的十足官僚机构的需求，另一个则需要领导一个还很贫穷的、不能指望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的社会。苏联官僚机构方面设法达成协议、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达成全球协议，是与中国领导人方面在帝国主义强大压力面前寻求越来越多的援助和更强大的国防相对立的。正是从这种不同的需要出发，才产生了中国人和苏联人在当前重大国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已导致中国人十分尖锐地谴责赫鲁晓夫的方针及各国追随赫鲁晓夫者（如陶里亚蒂、多列士、印共、美共）的方针。

这些分歧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 (一)

苏联人强调即使在资本主义仍旧存在的条件下也有可能确保和平，并且强调设法同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包括美帝国主义内部的某些派别合作的必要性，中国人则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在维护和平的斗争中不应对资产阶级的某某派别和某某帝

国主义领导人抱幻想。他们尤其正确地提醒说：避免一场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的唯一办法，是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努力的唯一方法是开展群众革命斗争。苏联人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动力主要是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范围内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则主要由苏联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来保证，世界各地革命群众的力量只起辅助作用，而且还要避免在某些特别敏锐的地方“挑起”同资本主义的重大冲突。中国人则申明：世界革命力量应起根本作用。因此，中国人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所捍卫的立场是接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方针的。

最后，中国人责备苏联领导机构没有充分利用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一般说来是有利的客观形势，责备它为了机会主义的目的，高估美帝国主义的力量。

赫鲁晓夫和铁托指责，中国人希望爆发一场世界大战，这种指责是明显的论战性的歪曲。尽管中国人有我们后面还将提到的严重弱点，但他们从来没有表示过这样的方针，也从来没有预先表示反对与帝国主义达成任何暂时妥协。事实上，1962年10月国际危机时，他们之所以批评赫鲁晓夫，不仅是由于他的机会主义，不仅是因为他践踏古巴革命的起碼权利，而且还因为驱使他在古巴领土上设置火箭的冒险主义。

## (二)

苏联政府主张同资本主义进行主要是“和平的”竞赛，因此力图与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某些协议，并使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如有可能）群众运动都从属于它们。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表现出某些类似的态度，——特别是在对印度尼西亚方面——，另一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持有批判性得多的态度，强调无



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强调革命的不断性。（这使他们与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的孟什维克观念相对立，并使他们接近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观念。）因此，总的说来，中国人倾向于支持不发达国家中最革命的运动，不受苏联犹豫不决态度的羁绊（请看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态度）。

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时所持的态度，以及他事实上支持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工人国家，正是在这样重大问题上的方针性差别的极端表现。

### （三）

中国人批评赫鲁晓夫及其在世界各地的追随者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民主、甚至议会过渡的新改良主义观念，这些批评是逐渐加强和明确了。尤其是对陶里亚蒂的论战，超出了一般化的范围，极为详尽地研究了意共书记——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中赫鲁晓夫主义的首领——的提法。这场论战实际上是要捍卫马列主义的国家观。尽管陶里亚蒂及追随他的人口头上也接受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这种观点的莫大的讽刺。

中国人的这个批评具有广泛的意义，这特别是因为，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某些共产党，也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道路观点，而这些国家，不是革命危机已经存在，就是正在迅速酝酿中，任何“民主”的、“和平”的前景都只会给这些国家加速带来灾难的后果。

\* \* \*

因此，在这个时期的三个重要问题——反战斗争问题、殖民地革命的性质与不发达国家革命运动的方针问题、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完全证明中国的观点比赫鲁晓夫

观点进步，与革命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相类似。因此，中国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地区和左派潮流中博得了有力的响应，中国的态度对它們来說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推动力。

我們对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演进的意义作出评价，絲毫不妨碍我們对他們在其他一系列問題上持錯誤和危險的立場进行批評。

首先，他們对一場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認識太簡略了，事实上他們低估这些后果。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有时低估帝国主义今天仍旧拥有的力量。特别是，他們不考虑一場核战争与以往的战争相比可能具有质上的新性質問題，因为，根据大部分科学界的說法，使人类全部毀灭的危險是存在的。

其次，我們的批評还針对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非斯大林化問題上的落后，而第一阶段时他們似乎是想对非斯大林化作出貢獻的。特别是他們对阿尔巴尼亚斯大林主义者和对苏联的老斯大林主义集团所持的态度，他們对苏联譴責斯大林、譴責迷信斯大林所持的保留态度，只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首先是妨碍苏联和东欧工人国家中“支持中国派”的发展。世界这个地区的左派，虽然贊同奉行革命的国际政策，但只能譴責一切老斯大林主义者，譴責对斯大林时代的任何留恋。类似的想法同样适用于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首先适用于那些有很大群众影响的党(如意共)。

再者，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必須譴責中国人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論战。这种論战常常使人想起斯大林主义的旧作風，它是对南斯拉夫现实和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表示的观点的明显歪曲为依据的。誠然，南斯拉夫人在一系列問題上(如国际政策方針，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第三世界”民族資產阶级的态度等)犯的右傾偏差，从它的某些經濟观点引起的、已无可否认地产生了

一些官僚主义蜕化现象的十分危险的倾向，都应加以谴责，但丝毫也不能证明指责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和把铁托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去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些做法正好不利于那些这样作的人。

最后还应指出，中国人不断地要求遵守 1960 年八十一国党声明，但这篇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折衷性的妥协文件，因此不能澄清争执中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它远低于近几个月来中国文件的立场。

### (乙) 各国共产党中的其他分歧

中苏冲突是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冲突，但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因此而没有其他分歧与矛盾。事实上不仅南斯拉夫潮流——虽然它靠攏赫鲁晓夫——保持着很大自主性和独具的特点，而且在两个“阵营”内部的分歧和特点也是五花八门的。

不仅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是如此，他们的观点并非一模一样，而且，赫鲁晓夫集团特别是如此，事实上，该集团聚集的各党和领导机构在一些非常重要问题上的方针很不相同。例如，哥穆尔卡的路线，特别是对农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和非斯大林化等问题的态度，譬如与保共的路线就距离很远。再如，意共领导机构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的态度不会接近于法共的态度，因为法共至今仍避免对官僚控制这种旧作风有丝毫的放松。再譬如关于国内政策的方针问题：多列士形式上宣称自己更忠于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讽刺，首先他无视任何过渡纲领的主张；陶里亚蒂则自夸为更“大胆的”革新者，公开对马列主义的国家论的某些方面适用与否提出疑问，强调用十足的改良主义方法构思出来的过渡纲领。

到目前为止，斯大林主义的磐石一致瓦解了，瓦解的特点是：

这是按照各国民族路綫发生的瓦解，也就是說各國領導機構之間的公开分歧，領導机构和党仍然保持着表面的政治团結。但是，分裂的規模，尤其是中苏冲突的規模——中苏冲突不可能以謀求始終可能的妥协的新嘗試来求得真正解决——正动摇着官僚領導机构的威信，从而动摇着各党中存在的制度。尽管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党恢复了真正民主制度、承认派系权，尽管蓄意歪曲对方的立場仍然是一种流行的方法，官僚主义領導机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也开始不得不承认本党党员采取了不同于官方路綫的立場，但不允許他們保持着領導地位。意共党内已經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歧和更大的批評的可能性，这表明有一派尽管总会遇到一些暫时的波折与退却，它是一定会巩固和扩大起来的。

### (丙) 卡斯特罗主义的潮流

卡斯特罗領導机构在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环境中，占据着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它日益起着真正的国际作用，当然首先是在拉丁美洲。这个領導机构不仅在它产生的起源上、而且在国际和国内問題的立場上，都有別于其他工人国家的領導机构。

尽管該領導机构的某些成員在参加“七·二六运动”之前，就个人來說已达到了馬克思主义立場，但古巴領導机构作为領導机构來說，其理論修养过去不够明确，甚至在夺取政权的問題上也表现出过模糊混淆的思想观点。但由于它深入联系群众，特别是深入联系古巴社会最貧苦的阶层，因而逐漸懂得了革命进程的真正邏輯，尽管有思想意識上的局限性，实际上它是遵循着不断革命的路綫来努力的，保证建立了美洲第一个工人国家。因此古巴是当代这样一种革命的第一个范例，即：領導机构本身是在斗争中并且通过这一斗争取得的經驗才和馬列主义观点結合起来的。

后来的經驗证明这种結合是深刻的。事实上，

(1) 古巴領導机构是继列宁和托洛茨基領導机构之后，第一个有着这样的領導机构的工人国家；它在美洲大陆上面向被压迫群众，号召他們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見第二个哈瓦那宣言）；

(2) 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战友的讲话和声明表明，他們主要是从革命的角度来考虑拉丁美洲的革命問題的，拒絕了大多数拉丁美洲共产党的赫魯曉夫观点。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美洲妇女大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方面再迈出决定性一步的标志。

(3) 国内方面，卡斯特罗領導机构强烈地感到了过去威胁过、現在仍可能威胁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危險，于是，正如左派反对派企图在苏联和布尔什維克党内采取的作法一样，也有意識地公开号召群众进行反官僚主义化的斗争，并在解除埃斯卡兰特的职务后，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組織措施。

因此，看来卡斯特罗領導机构是目前所有工人国家中最最先进的政治領導机构。尽管由于它需要苏联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它在投入当前这场国际辯論时非常审慎——无疑它的革命路綫更接近中国路綫——，但它一定会，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乃至资本主义国家和各工人国家的青年中，产生日益巨大的国际影响。

## (二) 各工人国家的演变情况

### (甲) 苏联的演变情况：

苏联社会中的紧张和冲突，有在托洛茨基运动长期以来所聞述的根本利益与傾向的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表現出来的趋势。

非斯大林化有极其深远的經濟、社会与政治根源。它基本上

是符合在斯大林的方法与观点可能引起爆炸的危險的情况下，来维护并保持官僚主义制度的需要的。它是试图哪怕是部分地解决涉及苏联切身需要、涉及苏联及帝国主义对崎的国际需要以及涉及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关系的、过去和现在客观地摆在苏联社会面前的问题的尝试。

在经济方面，苏联领导人曾面临着由于官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造成的后果所引起的一些问题。

由于十月革命建立起的集体所有制关系特有的活力，以及特别在战后也由于苏联也分享到的技术突飞猛进，因而生产增长率是相当高的。但这不等于说一切可能性都已真正利用起来了。恰恰相反，还有尚未发挥出来的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方面，这是由于群众的民主积极性的发挥还很有限，另一方面则由于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工具利用率很低、生产不平衡和巨额的浪费等现象。

斯大林时代末期，这些现象达到了极点。赫鲁晓夫主义本身的意义，在于为这种局面找到了一条出路而又不损害官僚主义统治本身。

权力下放是曾经被考虑过的解决办法之一，受到南斯拉夫经验启发的一股共产主义运动潮流都赞成这一解决办法。1957年的工业结构改组正是向这个方向进行的。尽管这种改革取得了某些成果，部分地消灭了触目惊心的流弊，但它既未能避免新的经济结构(州一级的结构等)中重新产生官僚主义，又未能避免地方上封建现象的出现，——这些封建现象与已往的封建现象是同样不幸的。所以，由于这个改革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在各级领导中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带来了在经济区域和经济领导机构上的重新改组。最近时期以来产生了重新集中的趋势。

苏联经济学家和领导人对此进行了讨论和论战。有一派深恐

权力下放，乃寻求比较集中的管理方式；另一派则认为新弊端之产生系权力下放不够所致，因而希望扩大权力下放。因此也对市场应有的日益增长的职能进行了讨论，有些人倾向于实行企业的更大自治（这也是跟踪南斯拉夫的经验）。

最后，还就经济客观规律、就制订新指数和经济核算标准以便为生产、定额提供更为精确、更可比较的指标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除在工业方面进行组织上的结构改革外，赫鲁晓夫官僚机构最近还考虑改变党的结构本身，考虑建立某些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机构。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宣布改革党，改革的真正目的在于逐渐使党成为整个官僚主义控制经济的机器的一个部件。这只能产生部分的结果（节制浪费，限制经济犯罪等），但绝不能解决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刺激办法和经济各部门的平衡等问题，甚至还能引起政治危险。根据类似的经验（生产委员会）而拟定的建立諮詢委员会计划，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官僚机构本身看到了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但同时却也表明，官僚机构在这方面不能走得太远，只能极度谨慎地行事。即使这些委员会真正成立起来，它们也不会握有实权，不过是发表諮詢意见而已。因此，它们不可能是苏联经济所需要的主要原动力。

因而很清楚，官僚机构无法解决过渡时期苏联经济的矛盾，因为一方面它无法深刻懂得经济规律并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又不善于动员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力量——即群众的创造力。它只是不断地找到一些治标的方法，提出“技术上”的解决办法，顶多采取新的官僚主义控制形式，只让工人阶级起一种完全从属的作用。

苏联经济当前的困难，在农业方面尤其显得尖锐和突出。尽管进行了许多改革，苏联农业仍很落后，农业增长率按人口计算

(虽不说没有增长)是很有限的。苏联农业仍然落后的程度，首先表现在农业方面的生产人口还要占全部生产人口的50%以上，这个百分比无法与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拟。其次，农业纳入计划经济遇到了巨大障碍，因为，农村中非集体的生产关系仍居主导地位。

增加集体农庄的自治权，建立更加有利于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民的交流，已使得避免了保持斯大林传统路线可能造成的灾害。不过，这些措施并未能实现计划多次规定的生产增长率，因而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消费的需要，也没能消除或逐步限制集体农庄庄员对自留地的兴趣。因此，集体农庄无法指望充分利用它们所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最后，垦荒试验证明是不稳定的，靠不住的，主要是因为收获量有很大波动，荒地上的国营农场本身中也已经提出了社会方面的问题。

赫鲁晓夫的试验没有为农业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没有触及问题的最深根源。农业的困难只能靠大量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来克服，要想做到这一点，则需根本改变经济方针，首先是缩减重工业方面的投资。再者，要想有一条更协调的经济发展方针，则意味着群众民主参加，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民主管理。只有当集体农庄庄员看到自己的农庄——因而自己农庄的收入——有巨大发展的具体可能性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感到集体农庄是他们自己真正领导的民主大家庭的时候，他们对自留地的兴趣才会渐渐淡薄，长此以往，才有可能考虑毫不紧张、毫无抵抗地从集体农庄形式过渡到集体管理的完善形式。

(苏联)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农业方面依然存在的落后状态，严重地妨碍着在充裕消费方面取得显著进步，1962年采取的大幅度提高食品(肉类、乳类等)价格的措施，就是最明显



的迹象。

已經指出过：赫魯曉夫曾力图使苏联社会朝着“福利国家”方向发展，对他來說，共产主义社会縮小到了“福利”社会的規模。赫魯曉夫在这方面的失敗尤其惨重。誠然，苏联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同样千真万确的是，1962年生活水平增长率就更加微弱，絕對讲来，它不足以滿足苏联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苏联群众是期望官僚机构常常大肆吹嘘的苏联經濟、技术的长足进步，能在消費和舒适設備方面得到反映的。

在文化方面，苏联官僚机构感到需要针对斯大林的作法来个轉变，首先因为教条主义和行政的方法是一个桎梏，使科学工作貧乏，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得不到提高；其次，因为这种态度有使知識分子与政府之間公开破裂的危險。因而产生了自由化运动，其发展形式是众所周知的。这个运动在某些时期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各科学学派相互竞赛的主張，出現了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的別的艺术流派。最近关于文学、繪画等問題的論战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这些論战表现出年青知識分子阶层的沸騰的激情，他們渴望苏联文化向着高于前一时期水平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突出暴露了赫魯曉夫主义的主要局限性，这特別表现在1963年初所肯定的文化領域的某种新日丹諾夫主义形式上。显然，赫魯曉夫与青年知識分子之間的冲突所牵涉到的問題，远远超过了抽象派繪画或十二音节音乐固有的意义。赫魯曉夫十分了解，在一个民主表現形式不存在或极为有限的社会中，最普通的政治冲突也会部分地或变相地在文艺冲突中得到表現。叶甫图申科和沃茲涅森斯基等詩人拥有那么多听众，这不仅表明苏联青年精神上的某种兴趣，而且也表明了这些活动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很明显，如果說官僚机构採納了科学文化多流

派、以及各流派自由辯論的主張，那么，它在客观上就会促进政治上的分化，这将使对一些政治問題有某种固定的看法，因而将是肯定苏联多党制权利的前奏。

之所以特別強調在文化方面进行辯論的政治意义，是因为在这场辯論中再次提出了斯大林問題和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問題，其中包括集中营問題。事实上，在討論文化問題和某些苏联的知識分子在斯大林时代所承担的责任問題时，往往都提出当前的許多苏联领导人在这一时期的责任問題。这对赫魯曉夫领导机构本身來說是个极其严重的危險，因而感到必須尽快地堵塞这个漏洞。

赫魯曉夫主义的矛盾再次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赫魯曉夫为了博得群众的支持，無論过去和現在都以“个人迷信”的消除者自居，都以斯大林滔天罪行的揭发者自居。实际上，每逢他在各方面处境困难、遭到对手的攻击的时候，他就再次求助于譴責“个人迷信”，想給人造成这种印象，即：恶劣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他本人就是这恶劣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保证。但是，另一方面，赫魯曉夫走向非斯大林化的每一个倡議，都会引起某些阶层提出新問題，提出新的需要，要求更彻底地进行非斯大林化。对这个官僚主义制度來說終归是一个危險，因而对赫魯曉夫派來說也是一个危險，赫魯曉夫派要么偃兵息鼓，要么不履行自己許下的諾言。

推进非斯大林化与后退时期的交替进行，可以由赫魯曉夫主义的性质來說明，这种交替进行甚至在最近的将来仍将继续下去。

最近几年來由于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向官僚机构提出了关于工人国家一体化經濟发展的新問題，而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正进行經濟一体化的嘗試的同时，各工人国家經濟配合的必要性也大大加强了。尤其在1962年下半年，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包括設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銀行”，从长远来看，这些

措施將影響組成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各工人國家的經濟結構。

此外，還曾考慮建立一個所有這些國家共同的計劃經濟結構。因此，官僚機構本身也不得不代表並表達（即使是以變相的形式這樣做）各工人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即使撇開某某國家的某些暫時的抵制不談，官僚機構的存在也將阻礙這種經濟一體化的實現，原因和在各國範圍內起作用的因素相似，即官僚民族利己主義和官僚機構的利益。如果在國內不實行民主的計劃經濟，如果各國間不實行協調發展，那就不可能實現國際上的民主計劃化和協調發展。各官僚主義管理下的各種經濟內部發生的緊張和衝突，在某種國際環境下將不會減少，而是會增多。此外還應着重指出：官僚機構是不惜採用經濟制裁的，它的政治需要與它使用的方法，妨礙着經濟任務的完成。因此，如果工人國家的真正的經濟配合排除其中某些國家參加，那麼，這種配合是不可能有效的；具體來說，如果中國不得不留在這個體系之外，那麼這種配合便只能是很有局限的。遠不該採取這樣一種方針，恰恰相反，應該要求各工人國家間的這種經濟配合的某些不發達國家的大量參加敞開大門，這些國家的革命正朝着社會主義的解決辦法前進（如現階段的阿爾及利亞）。

官僚主義領導機構正不斷遭到一連串各式各樣的社会與政治壓力。我們曾多次指出，現在甚至在官僚機構內部也存在着利益與方針上的衝突。最近幾年來，最明顯的壓力莫過於經濟方面的官僚機構的壓力。眾所周知，這是工農業的領導人施加的壓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採納赫魯曉夫的某些改革。但在目前階段，在關於市場法則、經濟核算、廠長的職權、市場的作用等問題的討論中，工業方面的某些領導人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這種趨勢的另一個反映是：蘇聯領導人中，受過技術教育和技術員出身的領導

人的数目在增长中。关于农民各阶层方面，他們与官僚机构的关系虽然与斯大林时代相比有了改善，但仍然是困难和复杂的。事实上，农民兴致勃勃地搞自己的自留地、集体农庄庄員力图高价繳納征购物資、他們偏愛集体农庄市場等問題，尤其表现了經濟方面的抵制与冲突。

而最引人注意的冲突还明显地表现在官僚机构同工人階級——他們的具体作用正不断增长——和知識分子的系关上。当然人們不能說現在已經有了群众大規模反对官僚机构的行动，也不能說工人已自觉地、确切地提出了自己的經濟与政治的权利要求。但是，最近几年来发生了一些区域性或地方性的示威游行和冲突，这表明有些趋势正在深化中。只要举出奧德薩和諾沃捷卡斯等地的罢工就够了，在罢工中，工人提出了經濟权利要求，提出了有关領導方法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某些正式文件中，甚至在赫魯曉夫的报告中，都提到了工人敌視工厂中官僚机构的监督方法。这一切实际上包含着工人管理問題。

至于知識分子，如上所述，最近发生了很有意义的冲突，冲突的内在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化問題。事实上，青年知識分子，甚至某些遺老，都愈来愈提出重新批判性地研究斯大林时代的問題。某些阶层还非常明显地关心諸如工人委员会等問題。继赫魯曉夫最近加紧控制以后，許多知識分子进行了抵抗，这表明，不管有什么样的暂时波折，官僚机构通过行政措施和强迫作有損体面的自我批評的方法来解决問題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

当代苏联社会的所有这些人心动荡現象，势必在国内問題与国际矛盾的刺激下，愈演愈烈和愈来愈多。（目前的中苏冲突至今尚无突出的影响，但随着冲突的繼續发展，一定会有些影响，另外还出現了年輕一代对古巴經驗很感兴趣的迹象。）官僚領導机构一

定会千方百计地力图应付这种局面，有时訴諸强制力和作一些后退，有时在非斯大林化方面作些新的让步。特别是赫魯曉夫领导机构一定会力图用极端波拿巴特式的伎俩来保持政权的。但是，总的說来，无论采用那种政策，都不会窒息革新趋势，因为这种趋势在苏联社会中是有十分深远的根源的。因此，每向非斯大林化推进一步，都会打开新的缺口，都将出現一些要求取得新让步的趋势，而任何后退的企图都会遭到愈来愈明显的反抗，都将促使工人阶级和知識分子的先进阶层对官僚主义制度的本质有批判性的認識。

### (乙) 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演变情况

中国最近五年来的发展是以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事件为标志的，这些事件揭示了在这辽阔的范围内进行革命实验的矛盾面及其目前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一方面来自中国工人国家本身实行的官僚主义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则因为国际经济援助太不够了，即使苏联政府不采取施加压力的措施——当然，这些措施使局势更趋恶化——，国际经济援助也是绝对不够的。

1958—1959年是以“大跃进”和建立公社为标志的。这两个措施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因随后几年的失败而被否认或缩小。充分利用农业劳动力对于一系列不发达国家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启示，这些国家面临着相类似的问题。但是，当中国领导机构一方面想把这一经验搬到城市中来、另一方面想把这一经验用于无限度的“大跃进”的时候，就必然会遭到失败。他们用官僚主义的方法来动员农业劳动力，甚至采取军事方法，过分延长劳动日，不合理地取消了必要的假期，这些都只有在非常时期、为了特殊目的才能这样作，长此以往则损害劳力，降低生产率，虽不說是消极抵抗或暗中破

坏。所有这些，必然会影响到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同样犯了极其严重的錯誤（大部分“小高炉”的产品沒有用处，因此付出了无謂的代价，造成了浪費）。除此之外，还有天災。据官方消息，实际上天災造成的后果異常严重。

这就是近几年后退和經濟困难的原因。我們再重复一遍，这种情况由于苏联官僚机构持如下的态度而更趋恶化，他們不仅不尽最大努力帮助陷入非常困难境地的中国工人国家，反而撤回技术人員，要求迅即償清債務，与中国的貿易关系銳减。

中国领导机构面对这些經濟失敗所持的态度，证明是一个經驗主义领导机构的态度，但它也不是按照强迫合作化时期的斯大林方法而行事的。毫無疑問，公社运动的发展速度太急了，沒有足够地考虑先决的必要技术条件；此外，把公社集体生活的条件描繪成几乎是行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前夜，实际上是犯了理論上的錯誤。这是宣傳上的嘩众取寵。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未訴諸暴力强制农民加入公社，也未求助强迫合作化过程中的斯大林方法，下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那里既沒有那种曾經血洗苏联农村的屠杀，也沒发生那种大量屠宰牲畜的农民的絕望反抗。

另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是：当所犯錯誤产生的后果暴露出来的时候，领导人在經過內部的激烈斗争后发生了轉折，使得公社方面和总的經濟路綫方面逐漸有了根本的改变。

他們懂得了調整几年的必要性，懂得了不再加速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因而把力量集中在工业消費品和食品上，直到肯定优先发展农业。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机构的特殊性还表現在与群众的关系的观点上。尽管他們一向采取官僚家长制，但重点还是放在必須說服上面，而不是放在必須施加强制力上面。中国领导机构投身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討論也证明了这个特殊性，如上所述，中国领导机构在討論中维护了一系列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对斯大林主义的磐石般一致給以致命的打击。

但是，中国客观存在的落后基础以及現任领导机构的政治素质，在中国工人国家中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畸形現象。前已指出，中国工人国家的管理依然是官僚主义的，“大跃进”和瘋狂建立公社时期所犯的錯誤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还应该強調指出中国领导机构对非斯大林化所持的官僚主义态度。1956年至1957年間，它似乎贊同进一步开展非斯大林化。毛澤东写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論文，文中承认了罢工权；在文化方面，他提出了“百花齐放”学說。但是当剛开始的放松造成許多派系的发展时（其中包括公开冲突），中国领导机构就打了退堂鼓，此后就一直在这块障地上居于后卫地位。

中国的經濟情况客观上是困难的，只有其他工人国家提供重大經濟援助，只有民主地动員群众生产才能迈出显著的一步。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在国际方面提出問題的，对他们說来，建立在“和平共处”与长期經濟竞赛的基础上的解决办法，是很难設想的，但是，通过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直接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这样就会造成更有利于他們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人們也不应无视这一点，即：他們希望把中国群众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国际問題上，这就是強調苏联领导机构对縮减援助应負的責任，提出扩大国际革命問題；另一方面則掩盖中国情况的另一面，即：必須对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实行真正的民主化。事实上，这种民主化可以带来以下的后果：充分利用群众的創造潜力，减少今天无可否认地存在着的緊張，减少官僚主义的管理由于其性质本身而給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各种困难。

目前阶段，真正的民主派别只存在于地方，而且很可能极为有限，根本政治问题和基本方针一向是由最上层、由寥寥的几个官僚主义阶层决定的。

各人民民主国家由于一系列因素而发展不平衡，这些因素是：1) 原有水平；2) 经济发展速度；3) 具体的政治因素；4) 国际因素的影响。

像捷克斯洛伐克之类的一些国家沿用旧有的经济结构，至少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是如此；像阿尔巴尼亚之类的另一些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只能依靠有限的生产力。在一些国家中，非斯大林化引起了历史性冲突，例如匈牙利革命和波兰十月事件，而在另一些国家中，非斯大林化有的被公开拒绝（阿尔巴尼亚），有的是被动地接受，有名无实地进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些国家的发展未受到国际上的牵制，而另一些国家（东德）则广泛地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

总之，人们可以指出下列倾向和问题：

——在经受某些困难和不平衡之后，工人国家的国际一体化和计划化的必要性越来越肯定了。然而这种倾向同民族的具体需要和具体情况相抵触，同官僚主义的民族利己主义相抵触。

——工业化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合理化的问题，经济核算问题，反对浪费问题等），在某些国家中（如捷克，南斯拉夫），这些问题同苏联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像东德，波兰的部分地区），则提出确保更高和更规律的增涨率的问题。

——官僚领导机构在农村的失败是明显的。不考虑必要的技术先决条件而快速发展的集体化，导致了真正的危机，例如在东德和捷克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哥穆尔卡的领导机构通过的相反的



路綫，即使避免了快速集体化的緊張局势和失敗，但它过去和現在仍不能保证农村生产力的必要的高漲，不能保证把农业部門实际納入經濟計划化；事实上，还異常缺乏一个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經濟部門。

——关于生活水平問題，好几个国家的生活改善仍然受到限制。而另一些国家，即使生活水平比較高，但由于农业发展不够和官僚主义的管理造成的混乱，在供应上仍不时发生危机。

——在文化方面，一些国家（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僚机构的控制力仍然很强大，某些小心謹慎的嘗試在萌芽状态就被粉碎了。相反，在其他国家（如波兰，甚至匈牙利），知識分子获得一定的自由化，自由化的程度在波兰比苏联更大。

在1956—1957年苏联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采取新的路綫之后，民族因素——战后一直到匈牙利事件为止都是很重要的因素——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随着旧的統治階級的影响逐渐消失，随着人民民主国家采用类似苏联的結構，因而苏联特有的冲突和問題在人民民主国家也就逐渐产生，尽管它們是以这些国家所特有的形式出現的。

最近时期，最可能有重大发展的局势是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在波兰，存在着左派批評力量新高漲的迹象。在匈牙利，上次选举反应出不同潮流的存在，它們可以利用非常有限的合法条件来表現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甚至可能在不太长的時間內引起尖銳冲突的日益緊張的局势。巴拉克事件、大学生示威游行、工人冲突等事件，提供了这种局势的迹象。

### （丙） 南斯拉夫的演变情况

南斯拉夫是各工人国家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情况。尽管生产在

某些情况下有的減緩，一般讲来，生产的增长是很可观的。甚至在农村中，（南）领导机构似乎也制定了一个比东欧其他工人国家领导机构所制定的方针还要正确有效得多的方针。显然，工人委员会的存在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虽然这种委员会的权力还有限，尽管官方也揭发某些蜕化的现象。

新宪法——它应该被通过——的制订表明：在关于过渡时期工人国家的结构问题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已经作出了、而且正在作出十分积极的贡献，超过了其他工人国家的领导机构，甚至超过了那些最赞成非斯大林化的工人国家的领导机构。人们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派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南斯拉夫人早就提出来了，如（权力）下放、经济刺激的必要性等。

不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权力）下放的倾向已经走上了极端，尤其是，允许市场的自由泛滥不能不带来极为严重的危险，事实上这些危险已经具体化了，连领导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此外，（权力）下放也未妨碍官僚主义在地方上的重新出现，并且有助于特殊化倾向的发展。

事实上，就连南斯拉夫的情况也证明，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化。但这种民主化现在没有因为建立权力有限的工人委员会而实现，因为现在没有能就政治方针的根本问题真正表示意见的无产阶级民主的组织。

### （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不断地对官僚机构及其制度开展革命的批评，不管这种制度目前的表现形式如何。第四

国际不隱瞞，它对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战略目标仍然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以求实现(1938年)过渡綱領中和我們国际运动后来的文件中所闡明的綱領。此外，这些国家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本国际的帮助下，根据每个国家群众运动現有水平和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为不同国家制訂綱領。

总的来說，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應該在官僚制度的当前危机中找到支持点，以便回答正在爭論的、反映(經常是以变相的形式反映)过渡时期的問題的問題。他們特別應該竭力用年青一代能够接受的語言表达自己的意見，因为这一代即使沒有被斯大林教育弄成最坏的畸形，也不会因而可能了解列宁主义批判性思想的优良傳統的。

在中苏冲突中，以及一般讲来，在目前各国共产党的論战中，第四国际最坚决地譴責使用国家手段来解决理論問題与政治問題。第四国际尤其譴責赫魯曉夫領導机构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采取的經濟措施。它再次強調必須把工人国家的政策同共产党的政策分別开来。它譴責下述的事实：即，党的領導机构之間的分歧与冲突，引起了国家方面的报复与决裂。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第四国际重申：第四国际批判地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赫魯曉夫領導机构和大部分其他共产党領導机构的新改良主义的斗争，因为，它认为，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資本主义斗争的根本問題上(如反战斗争的方法問題，对殖民地革命的看法，“不断”革命問題，先进資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問題)，中国路綫大体上比赫魯曉夫分子的路綫进步，更能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集中于一极。

但第四国际也就其他很重要的問題，如對一場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估計，对某些不发达国家民族資產階級所持的态度，对

南斯拉夫工人国家性质的判断,对非斯大林化问题的态度等,也对中国领导机构提出批评。

第四国际支持必须举行一次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会议的筹备工作应在广泛的民主讨论中进行,并且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都参加讨论,第四国际应该享有参加这样一次会议的权利。

在苏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现阶段为扩大和加深非斯大林化的进程而斗争,迫使官僚机构向群众和知识分子作出更大的让步。应该特别着重批评官僚主义的管理在经济中产生的不良后果,提出在企业中建立监督组织和工人管理的必要性。

对于工人享有以罢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求的权利,不是抽象地支持,而是从经验和实际进行的运动出发来支持。

在文化方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日丹诺夫的观点或新日丹诺夫的观点,为各种科学学派和各种艺术流派的充分自由而斗争。

同时,他们还要为新闻自由,特别是为苏联公民享有直接和完全了解党和国家机关中现存的或可能存在的不同立场的权利而斗争。同样,也为他们能享有直接、完全了解各国共产党之中存在的不同立场的权利而斗争。

在经济政策方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显著提高农业部门和消费品部门投资的必要性,甚至可占用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这种方针将确保经济更平衡、更协调的发展,同时还可能提高生产率,其结果将在一切领域中包括在重工业部门中得到表现。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赞同各工人国家日益扩大的经济一体化,它可以确保更加合理的分工。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还应该日益密切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和各工人国家间人们的流动自由,这将促进经验交流和日益增长的一致。

在中国，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須強調指出：虽然中国领导机构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冲突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它仍然是一个官僚主义的领导机构，它所领导的工人国家的特点是深刻的官僚主义畸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需要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制度、爭取无产阶级民主（即爭取拥有实权的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爭取真正的苏維埃结构、爭取使处于革命后的社会之中代表工农利益的派别和政党享有自由表达权、爭取使工会独立于国家之外、爭取一切科学学派和一切艺术流派的自由等的斗争。只有通过一場足以在政府的政治形式中发生质变的群众性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上述成果。

现阶段，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特别要在中国为以下各项而斗争：

- (1) 为公社的有效民主管理而斗争；
- (2) 为在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并继而建立工人管理而斗争；
- (3) 为在党内享有批评权而斗争，并爭取在中国实行（中国）领导机构在国际上所要求的那种少数派的权利；
- (4) 为恢复并发展 1956—1957 年間关于非斯大林化的方针而斗争，这一方针在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和在“百花齐放”的运动中得到了表现。

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中，革命馬克思主义者的当前斗争綱領应根据与适用于苏联的标准相类似的标准来制订，同时还必須从前面已指出的十分不同的情况出发。

在南斯拉夫，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应该为反对当前经济结构的离心倾向、为工人委员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拥有更多权力、为把工人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到政治方面、为真正贯彻最进步的宪法新规定、为在党内享有派别权和享有自由表现、批评和反对权、为享

有苏維埃性质的多党制而斗争。在国际政策方面，他們要为反对领导机构在战争、“和平共处”、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上的右倾的和机会主义的方针而斗争。

## 二、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关于 中苏分歧问题的声明

(1963年7月25日)

苏共和中共领导人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意识形态会议”的中断，在中苏分裂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方面打开了新的一章。在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二十五点”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个月以后发表“公开信”作为答复以后，人们对这新的一章看得更清楚了。

第四国际——由列昂·托洛茨基创立的世界性的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认为有必要公开地说明它对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由于苏共的“公开信”明确提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态度，并指责中共的行动“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行动”，就更有必要这样做了。这封信还指责中国在锡兰的代表同“埃·萨马拉科迪集团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个集团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的工具”，并说，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在给中共的一封公开信中“完全支持北京的活动”。

第四国际对中苏分裂的态度在第四国际6月21日到26日在意大利举行的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一个文件中已经阐明了，不久前这个文件发表在杂志《第四国际》（法文版第21年第19期）的专号上。我们想概括说明一下在那一文件中提出的主张，并

澄清我們对中共的“二十五点”和苏共的“公开信”中提出的根本問題的立場。

## I

第四国际认为，由于中苏分裂而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現的討論是一种健康的发展。就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基本問題和战略进行坦率和公开的辯論。远不会“削弱社会主义陣营”和“在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而只会有助于使工人階級运动和殖民地国家的反帝运动在意識形态和政治方面得到澄清，从而加强全世界一切反对資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斗争。

現在討論終于公开进行；几年来，尽管主要的辯論是中共和苏共之間的辯論，赫魯曉夫却集中攻击阿尔巴尼亚，而毛則集中攻击南斯拉夫，現在这一可笑的現象也終于結束了。这的确是向前跨进了一步。

在世界革命运动内部公开討論意識形态上的分歧，这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傳統远不是相違背的。無論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世时所有重大的意識形态問題的討論都是由列宁和布尔什維克公开进行的，以便让所有工人和馬克思主义者了解情况，这样做是符合1914年以前卢森堡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領導的斗争的傳統的，也是符合社会党国际左派从1960年起(就社会党参加資产階級政府問題)对伯恩斯坦和米勒兰主义进行的斗争的傳統的。

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共产国际头四次大会上的一切討論也是公开进行的。这几次大会的會議記錄都发表了。这些討論牵涉到有关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群众性的政党的策略問



題，也牽涉到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提出的許多策略問題。

### 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如果說，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較弱、第一个苏維埃国家受到敌人的包围、陷于內战、經濟差不多垮台的时候，它还能进行这种公开的討論，那么，現在当它比以前不知道强大多少、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并且周圍有着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工人国家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这种討論肯定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此外，世界力量对比已发生了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决定性的变化。

有人說这种討論会帮助帝国主义分子了解社会主义陣营正在进行的事情，这种論点是不能成立的。资产阶级报纸好多年以来一直“得悉”中苏分歧。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一直在随心所欲地在推測分歧的程度，并且试图利用这种分歧。唯一受迷惑的力量則是国际工人阶级，他們被阻止参加辯論。这再一次证明，在工人阶级运动內部采用“秘密外交”的办法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对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战略、策略問題的討論应当同各个工人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明确地区別开来。虽然我們贊成各党之間坦率地、公开地进行討論，但是我們強調指出，各个工人国家在軍事、外交和經濟領域絕對需要保持行动一致。为了确保行动一致，工人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就必须严格地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且断然拋棄“领导国”和“领导党”的理論。工人国家必須通过互相协商和談判来采取共同行动，任何国家都不得向其它国家发号施令。

斯大林为了保卫篡夺苏联政权的苏联官僚机构的狭隘利益而

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实行共产党之間进行秘密外交的作法。斯大林还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倡导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卑躬屈节地服从苏联官僚机构。我們呼吁所有共产党人、特别是声称为共产党之間的平等关系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自称正在“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后果”的苏联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断然根除这种官僚主义的作法。

不要向你們的有战斗性的党员和工人阶级隐瞒分歧！

不要用秘密外交代替意识形态問題的討論！

为举行一次所有矢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組織参加的国际會議而奋斗！参加这次會議的人必須包括所有共产党人、第四国际、古巴和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主义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从各个正式共产党开除出去的“亲华派”共产党人。唯有这样一次會議能够根据过去二十年的丰富的革命經驗而不是用官僚主义的方法，透彻地討論今天世界革命运动的一切战略和策略問題。

## II

赫魯曉夫领导集团企图把問題模糊起来，硬說中共“希望打核战争”，“对爆发核大战的危險漠不关心”。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誹謗，客观上帮助了美帝的反华和反共宣傳。

的确，中国共产党在从前一些文件中虽然支持苏联爭取銷毀和禁止对世界工人阶级造成极大威胁的核武器的斗争，但是对問題的提法有时候意味着低估了这种武器的破坏力量。苏共答复中共“二十五点”的公开信繼續根据下面这种假設进行爭辯：中共对核战争“漠不关心”，中国人甚至希望发动这种战争等等。很明显，苏联领导这样做是故意歪曲和曲解中共在自己的文件中的第15、

16 和 17 点中清楚地表明的立場。

实际上，世界革命运动内部并没有也不可能围绕发动核战争“是不是适宜”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因为除了一小撮疯子以外，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内部谁也不会为这种自杀性的建议辩解。讨论也不是围绕核战争究竟有多大破坏潜力这个问题进行的。这也不是什么“策略”问题，而是一个科学事实。真正的讨论关系到的不是工人国家（既不是苏联、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而是各国共产党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政策。

中国人在自己的“二十五点”中没有哪一点要求苏联在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中进行武装干涉。他们所要求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不能用国与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一口号来作为他们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托辞，或者以此作为幌子来掩盖他们抛弃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实行彻头彻尾的改良派和修正派的机会主义。

### 武 装 斗 争

中国人提醒共运注意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到目前为止——不仅在核时代以前，而且在发明了核武器之后——一切取得成功的革命，如越南、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所显示的那样，都不得不进行武装斗争来推翻它们的敌人。

因此，把说出这种不可否认的真理的革命者同想要煽动一场核战争的人等同起来是极大的诬蔑。相反地，中国人的这样的说法一般说来是有道理的：只有殖民地的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如果必要的话也包括武装斗争——并取得成功，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成功，最终才能解除世界帝国主义的武装，销毁核武器，并保证人类享有肯定的持久和平。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張的大致是上述的总路綫，在世界革命的問題上我們支持他們反对赫魯曉夫的右傾机会主义的傾向。中国人現在也同意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某些共产党极右派的蜕化变质的表現提出的批評，例如丹吉領導集团（在印度）支持本国的資產階級来不仅反对中国的工人国家而且甚至反对被尼赫魯投入監獄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背叛行徑；美国共产党要求黑人和工人支持壟断資本主义和最狂暴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所控制的民主党的可耻行徑；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表現的可耻的消极态度；意大利共产党的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理論：可以通过“結構造革”、通过議會手段、把資本主义社会轉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无需推翻資產階級国家、也无需由工人和貧苦农民夺取政权。在这个範圍內，我們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共产党領導集团提出的一般的批評。但是同时由于北京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苏加諾資產階級政权的机会主义的作法保持緘默，我們对中共立場的一貫性表示怀疑。

### III

另一方面，中共提出的二十五点（其中的第二十三点）认为南斯拉夫已經不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而已經变成一个資本主义国家；中国人（在第十九点中）（应为第二十一点——編者注）說，“有些人”过去夸大“某个人的作用”的問題，他們还要求对“批判斯大林”进行討論，对此我們肯定不能贊同他們的立場。

#### 非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中共拒絕过分夸大个人作用的重要性，不同意赫魯曉夫的这

种非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在斯大林統治下对苏联共产党人和工人以及对国际工人階級犯下的可怕罪行是由于所謂的“个人迷信”造成的。中共这样做是正确的。中国人批評赫魯曉夫想“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把一切功績归于自己”（第 19 点）（应为第 20 点——編者注），中国人这样说也是正确的。对赫魯曉夫領導集团进行的这种批評，只有用来比赫魯曉夫更进一步推行“非斯大林化”，那才是正当的。如果用这种批評来反对非斯大林化的作法，这种批評就会变成不負責任的、不正确的。

对苏联共产党的整个老近卫軍領導犯下的罪行，（这些人大多数被斯大林肉体消灭了），斯大林主义領導集团对国际工人階級犯下的罪行（他們力图在許多国家破坏和阻撓革命斗争）是非常真实、非常具体的。今天，这些罪行在許多国家首先是苏联和欧洲的工人国家里千千万万有良知的共产党人、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中仍然記憶犹新。

当我们批評赫魯曉夫在这些問題上的政策的时候，我們必須說：这些罪行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責任，而是那一阶段整个苏共領導集团集体的責任。对这些罪行，我們只有看作是官僚階級利益的表现，才能作出馬克思主义的解釋。这种官僚階級篡夺了工人和貧苦农民的政权，并压制作为无产階級政权的真正工具的苏維埃民主。为了防止这种罪行的重演，光譴責斯大林个人是不够的。必須取消官僚階級的政治、社会和經濟特权、在选举出来的工人委员会的基础上恢复真正的苏維埃民主，恢复共产党人在共产党內形成各种流派的权利（因为正如中共自己說的，一个共产党內的少数也可能是正确的），并恢复工人在苏联法律許可範圍內以及在社会主义宪法基础上成立新的工人階級政党的权利。有必要重新确立列宁在世时的那樣一个条例：“黨員最高收入”（政府中的黨員的

最高收入)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平均收入。尤其重要的是,有必要通过工人委员会建立工人自治制度,把工厂的实权交付给工人。

对赫鲁晓夫这样的批评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共产党员和工人中间将是非常受欢迎和得人心的。苏共公开信说得对,苏联人民群众当然是支持非斯大林化的。中国反对非斯大林化的任何企图只能使他们同所有的工人国家的基层工人和共产党员完全隔绝开来。

第四国际怎么也不支持中共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试图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我们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批评。我们坚决认为只有一次政治革命才会在苏联恢复真正的苏维埃政权。消除官僚机构滥用权力的现象和他们的特权,将大大加强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

我们也反对中国的反南共的宣传以及他们把南斯拉夫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提法。中国谴责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上极端右倾,这种谴责是正确的。但是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跟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目前南斯拉夫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个工人国家的所有制关系,其程度至少同1948年中共也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一样,如果不比那时更大的话。

中共谴责赫鲁晓夫提出的以“全民国家”代替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斯大林也是如此!——关于苏联已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论点是沒有根据的,他们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指出,苏联仍然存在两个阶级(工人和农民)因而推翻了所谓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说法。但是在中国人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摘出大量引语以证明只要阶级存在国家也将存在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列宁也在《国家与革命》中发展的

这个基本真理的辯证的另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是一种“开始消亡的国家”，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职能应当由劳动人民群众集体行使。中国人似乎并不像列宁那样强调必須不断发展和增进社会主义民主，必須使工人群众掌握真正的权力从而不断反对官僚机构濫用权力和蜕化。为什么？也許是因为在这方面取得最大进展的正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要不然就是因为在中国就有官僚机构濫用权力的严重現象，而工人群众并不像《国家与革命》所論述的那样行使直接的国家权力。

#### IV

簡單說，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进行的“大辯論”中所采取的立場。

托洛茨基主义者全心全意地、但批判地支持中国以及在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中跟其亲赫魯曉夫领导集团的右翼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各共产党左派。

我們批判地支持中国的这一主張：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采取革命方針是同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准备核战争的活动进行斗争的唯一有效办法。

但是同赫魯曉夫派和毛派相反，托洛茨基主义者维护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反对任何这样的图謀：把这些原則进行修正来适应任何官僚集团或官僚阶层的眼前利益、或对这些原則进行歪曲来反映任何工人国家的暂时利益。我們致力于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以期在現时代人类正在經歷的偉大的、革命的剧变中，它能反映国际工人阶级以及全体人类历来抱有的普遍願望。我們再重复一遍，人类摆脱目前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

胜利

目前的危机反映出世界共运必须刻不容缓地摆脱斯大林主义曾想在其中把它扼杀的困境，以应答现时期的要求。我们再次重复我们向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人所提的具体建议：

召开一次由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

通过工人的民主和国际辩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再生。



### 三、第四国际(拉丁美洲托派) 特別代表會議文件

#### 1. 公报

为了討論第四国际的成长危机所造成的形势，为了討論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并为第四国际的成长和发展打开一个新局面，第四国际于4月間，在拉丁美洲局领导下，举行了特別代表會議。

代表會議是在以列昂·托洛茨基同志和娜塔莉婭·塞杜娃同志为名誉主席的形式下举行的。

會議一开始，先靜默一分钟，对娜塔莉婭·塞杜娃同志表示敬意。

會議对拉丁美洲的群众表示了敬意，拉丁美洲群众的斗争，已經使他們成为殖民地革命的先锋。會議对苏联和工人国家的群众表示了敬意，政治革命正在这些国家里发展着；同时，科学、經濟和核武装的发展，也正在从客观上导致苏維埃工人国家采取反对苏維埃官僚主义統治的行动。

會議还对拉丁美洲各支部表示了敬意，这些支部正在用他們的发展推动着第四国际的成长和发展，特别是目前正在他們本国进行着重要斗争的阿根廷工人党(托派)和秘魯革命工人党。

會議还对各支部未能出席这次代表會議的同志表示了敬意，他們正在最遙远的地区执行着国际的任务。

艾米里奧同志代表拉丁美洲局在會議上致开幕詞，指出了这

次代表會議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路易斯同志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就布尔什維克派，在国际內部，針對前国际書記處的旧領導集團，針對這些歐洲知識分子的保守主義而進行鬥爭的意义，作了深刻分析。

已經墮入保守主義的上述領導集團，在運動的建設方面所持的觀點，是一種錯誤的知識分子觀點，而不是布尔什維克觀點。要建設同群眾打成一片的、具有以奪取政權為鬥爭目標和馬克思主義統一思想的真正的黨和幹部小組，他們表現了無能。

歐洲領導集團敵視並反對了拉丁美洲小組為建立真正的、具有布尔什維克思想的各國支部而開展的鬥爭。拉丁美洲小組是在拉丁美洲局領導下，按照拉丁美洲局的觀點，在拉丁美洲成立的。這種錯誤立場所導致的實際後果是：由於前歐洲国际書記處小組的政治瓦解，在勞工界壓力下，第四国际在歐洲的運動已被取消，第四国际的報紙已被停刊，機會主義傾向獲得了發展。

這個領導集團儘管過去經受過政治考驗，但他們終究沒有為應付當前的局勢作出過準備。當前的局勢是：群眾的革命運動無比高漲；世界原子大戰正在準備中。同時，幾乎是在全世界範圍內，這兩者是結合在一起的。第四国际前歐洲知識分子領導成員，在關於世界原子大戰的前景上，放棄了第四国际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立場；他們向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投了降，反對戰爭不可避免的主張；他們反對群眾就進行世界原子大戰而作準備；並在對待蘇聯恢復核試驗的問題上，滑到了反蘇的立場上去。

在這種政治瓦解的過程中，第四国际前歐洲知識分子領導成員，對待當代的一切重大問題，都發展了錯誤立場。在殖民地革命問題上——他們根本不懂殖民地革命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採取的是家長主義立場，最後，他們把殖民地革命從屬於宗主國革命。

在对待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上，他們放棄了托洛茨基的主張和分析。他們自甘适应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致敬，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官僚集团为了得以繼續生存而作的一种嘗試。这种态度不是別的，是否認政治革命的必要性。

杰尔曼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的一篇談論北美的文章里写道：“肯尼迪想同俄国人談判的願望想必是真誠的；他知道核軍备竞赛給人类带来的危害；他对某些自由主义人士的和平主义宣傳不是无动于衷，他誠心誠意地打出了联合国這張牌。……”杰尔曼在讲这番話的时候，表現了他的投降，他正在向和平共处的观念前进。

这些领导人已經墮落、腐化，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客观上，他們是联合在一起的。他們放棄了第四国际。

代表會議一致通过了路易斯同志的报告，这份报告表达了思想上的偉大統一和对于从而产生的任务的乐观主义和偉大信心。

代表會議接着討論和通过了路易斯同志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P. 貝雷茨同志关于工人国家內政治革命的报告；阿洛約同志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报告；洛素同志关于拉丁美洲革命的报告。

这些报告，加上拉丁美洲局过去的文件，将作为制定行将召开的世界特別代表大会各項預备文件的基础，并由即将按期出版的西班牙文《第四国际》杂志予以发表。

代表會議决定准备一項关于阿根廷危机的文件，一項关于玻利維亞和智利之間罗迦河边界問題的決議，一封致古巴同志、古巴工人国家以及工人階級、群众和政府的信，反对巴布洛的尾巴主义和自我保护主义，反对国际前領導机构里的投降派。代表會議把拉丁美洲局关于开除艾斯加兰特的決議和关于阿根廷革命当前情

况的決議作为自己的決議。代表會議宣讀了国际亚洲各支部的来信，其中有印度尼西亚同志表示批判并拒絕前欧洲領導机构投降主义立場的信。代表會議收到了欧洲同志們拍发来的致敬电信，还有在欧洲举行的重要會議以及这些會議的決議的通知。这些都是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斗争的支持。

L. 葛斯塔同志作了关于組織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她就发展黨員的工作和各党的建党經驗作了總結，就拉丁美洲局的工作作了簡短介紹，就国际执行委員會和临时書記处工作計劃以及行将召开的特別代表大會的工作計劃提出了建議。葛斯塔同志还報告了巴布洛和山登的獄中生活片断，他两人給国际留下来的經驗，以及拉丁美洲各支部——他两人获得釋放的重要基础——所作的巨大努力。代表會議譴責了巴布洛和列維奧写給拉丁美洲各支部和国际的下流信，这些信将立即予以公布。

代表會議选出了新的临时执行委員會和临时国际書記处，以代替业已陷于瘫痪和分化的旧执行委員會和旧国际書記处。代表會議就比利时支部杰尔曼領導集团，法国支部皮埃尔領導集团以及意大利支部列維奧領導集团的投降作出政治的和組織的結論之后，通过了一項关于在欧洲重新建立第四国际各支部的決議。关于前錫兰支部，代表會議得出結論，該支部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义。以上这些政党同第四国际和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代表會議通过了一項关于第四国际打入亚洲、非洲和工人国家的建議。在現時掌握了国际領導的国际布尔什維克派，已經用事实证明了他們建設这个运动的能力。他們在拉丁美洲局的领导下，在从事积极活动的生活中，发展了，成熟了。如果今天他們再不把运动的領導担当起来，他們就只有容忍运动的瘫痪。担当領導意味着克服危机，意味着在历史客观条件对革命、对社会主义最

有利的情况下,打开一个第四国际向前发展的新阶段。

关于組織問題的報告,像其它報告一樣,也獲得了一致通過。

為了恢復業已中斷達四年之久的第四國際傳統,代表會議決定發表一項“五一宣言”。對於各種各樣的所謂托洛茨基小組和支部,代表會議通過了一系列的決議。對於多年以前就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會議劃清了界綫;對於智利、玻利維亞以及秘魯的一些小組和個人也劃清了界綫。

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選舉了任期到下一屆世界代表大會為止的臨時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臨時國際監察委員會。在下一屆世界代表大會上將討論巴布洛和列維奧對拉丁美洲局、特別是對路易斯同志進行的下流誹謗。代表會議對路易斯同志表示了全力支持。

監察委員會還將負責調查第四國際的經費情況,並被責成向巴布洛追索這些經費。

代表會議決定呼喚全體國際幹部投入世界中央集權黨的新動力,以便完成使國際蓬勃成長的必要任務。

路易斯同志在代表會議上致閉幕詞,總結了會議的工作,他在閉幕詞里指出,代表會議上通過的各項決議都具有重大意義,由於這些決議,這次代表會議成了列昂·托洛茨基去世以來最重要的會議。

路易斯同志指出,在歷史上,能夠擔當這次會議所擔當的責任的集體是極少有的。這次會議所以能夠擔當這樣的責任,是因為它的高度成熟和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信心。同時,這次代表會議對於在群眾中帶頭並引導群眾取得政權,有着不可動搖的決心。

整個運動,特別是每一個幹部,都必須負責提高自己,使自己能夠勝任等待着他去完成的任務。

在繼續进行国际的工作方面，促成这次代表會議的召开并使會議作出各項決議的布尔什維克派，并不抹煞国际的过去。布尔什維克派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担当起国际的領導的：国际由于一班人馬的投降、保守主义和墮落腐化而面临着瘫痪和取消的威胁。国际的当前領導，为了应付目前存在的现实革命形势，曾經进行了多年的准备，而前一屆領導就沒有这样做。通过这次代表會議作出的各項决定，第四国际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

路易斯同志以代表會議的名义，向为使代表會議能够順利进行工作并进一步展开活动作出努力的支部致了謝意。

代表會議在国际歌声中閉幕。

代表會議结束后，执行委员会举行會議，选出了临时国际書記。書記决定，他的首先一項工作是把代表會議的全部文件用西班牙文、英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出版，并在短短三个月內用阿拉伯文、俄文和中文出版。

1962年4月

## 2. 宣言

致全世界被剝削群众、妇女、儿童、老人、工人阶级、工人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革命的偉大的农民群众、学生、以及当前阶段正在創造历史的工人和革命积极分子

同志們：

生活在历史現阶段的人类正面临着决定历史进程的两种根本現象：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里的政治革命。

观察历史不能根据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发展速度，也不能根据工人国家的社会发展，而是要根据世界广大群众的进攻性的、强有力的和革命的爆发。几乎人类的四分之三生活在工人国家里，或是资本主义结构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里。后者正在进行革命，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独立而斗争，并且正在阔步前进，接近这种独立。没有任何一个被称为“中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没有跨进这个殖民地革命的过程。

不断革命正在全世界向前发展。这不但可以根据手持武器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国家里的情况作出判断；不但可以根据已经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取得胜利。这些胜利正在促使建立一个未来的工人国家的那些国家里的情况作出判断；而且，即便是根据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里，那怕是最落后的国家，群众手里虽然还没有武器，但是在他们的意识里，在他们的心里，却已经有了武器。同时，在另外一些国家里，群众无时无刻不在挺起身来进行罢工、举行示威和提出抗议，这和武装斗争有着同样的意义。

在当前阶段，历史进步主要基础的特点和标志是：世界群众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的意志；他们进行罢工，组织示威游行，以争取生活的权利、争取生活过得更好的权利。在整个非洲，在落后得像加纳、几内亚、刚果和南非那样的国家里，群众都在寻求使自己的问题立刻获得解决。他们想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他们推动他们的领导和组织去夺取政权。

这种活动标志着历史向前发展的进程。这不仅是因为群众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某些发展措施。反过来，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企图抑制这种革命的推动力。当前阶段的历史就是这样。这就指出了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活动、纲领、政策和前景。

## 革命的加强和帝国主义的不斷衰敗

在工人国家里，經濟、社会、科学和軍事，都有了不断地增长。科学进步和軍事进步所取得的成就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它們是人类进步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和人类进步的前景有着绝对联系的一个部分。资本主义世界正在为解决它的历史持續性問題作准备，它企图用打一場原子战争的办法，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之間和平竞赛或社会共存的基础上，来解决它的繼續生存的問題。

对帝国主义准备这种原子战争的回击，就是在全世界要为夺取政权进行革命斗争，就是要为推翻帝国主义而斗争。但是，单单这样讲是不够的。因为，就可能作出估計的历史前景来看，同时进行又是政治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各种形式的殖民地革命，从而束縛住帝国主义的手脚，牵制住帝国主义，或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并且通过这种办法来阻止帝国主义发动原子战争是不可能的。

从帝国主义的存在本身的性质来看，从帝国主义的制度来看，从帝国主义的內部关系来看，从帝国主义龐大的軍事和經濟机器来看，帝国主义有力量随时发动原子战争。这并不是說今天或者明天，一个月以內或者明年它就要这样做，但是它已經为随时发动原子战争做好准备。总之，不管他到什么时候才发动原子战争，这是帝国主义企图繼續生存下去的唯一手段。因此，在軍事上作好准备是工人国家的一项无可非議的权利。对于工人国家來說，如果他們不做好准备，不試制各种最現代化武器，以便在科学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整个帝国主义，他們就等于自杀。作好科学的軍事准备，是这个时代的一项至为重大的必要措施，否則工人国家就会遭到摧毀和消灭。



这并不是說我們对工人国家的官僚领导集团具有信心。在必須作好准备以应付原子战争的同时，还必须号召进行殖民地革命，竭尽全力并通过各种方式支持这种革命。工人国家应当从經濟上、軍事上和科学上支持世界群众。那怕这会引起战争，甚至会引起帝国主义发动原子战争的危險。帝国主义已經到了它的生命的最后阶段，它衰弱、非常之衰弱，尽管它掌握着了了不起的經濟、軍事和科学的潜力。如果說美帝国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会是一股绝对超过工人国家联合起来的物质力量，可是它們沒有社会力量，这不仅从历史的前景看是如此，現下就是如此。

从欧洲一直到北美洲，任何一次重大事件，任何一次重要的罢工，都在动搖着资本主义国家。最近美国鋼价每吨上漲6元，肯尼迪立刻就有了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給予消費者群众什么利益或好处，甚至也不是使大鋼铁公司的进出口竞争直接得到什么利潤。这种反应的目的在于如何阻止通貨繼續膨脹，从而避免引起社会运动、罢工等等。北美洲的帝国主义害怕就連在美国都不能控制群众的动員。它怕动員起来的群众和古巴革命站在一起，和拉丁美洲的革命站在一起，和世界革命以及工人国家的文化、科学和軍事发展站在一起；因为这种团结会使美国的群众变得坚定，会使美国的群众产生信心，会使他們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恐惧，反映了它在維持治安方面的軟弱无能。

古巴的經濟力量只占世界經濟力量的百分之点零一。从經濟上說，丢掉一个古巴，对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造成任何損害。在經濟竞赛中，从任何角度来看，古巴的生产都影响不了任何人。然而古巴革命对于美国却成了比苏联还要可怕的头号敌人，因为它对拉丁美洲，对美国，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美帝国主义认为古巴可怕并不是指它的經濟力量，或是它将来的社会主义，而是

指它的社会主义革命，指它今天的工人国家和卡斯特罗对他们讲了下面这句话的古巴人民：“必须把口粮不足和食品缺乏分配一下”。帝国主义怕古巴怕到如此地步，是因为北美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的社会条件会使这些地区接受哪怕是小得像古巴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革命影响。因为古巴所产生的影响不是经济上的，也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社会上的影响。

全世界的群众都会把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个小小的国家就在美国人的鼻子尖和胡子梢底下，打倒了像巴蒂斯塔那样一个强大的军队。这个胜利激励着世界群众的士气，鼓舞着世界革命群众的意志，提高了他们的认识，促进了他们政治上的成熟。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当前所处的境地。衡量资本主义政治的和社会的具体历史力量，不能拿它的经济力量当尺度，而是应当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帝国主义的弱点不在于它所掌握的原子武器和弹道导弹是否比工人国家少些，而是在于，世界殖民地革命、古巴革命和工人国家的发展所产生的当前的和直接的效果，使得帝国主义——尽管它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感觉到些什么。北美洲的工人群众和被剥削群众接受了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美帝国主义早就已经把保卫北美洲、反对工人国家原子威胁的反古巴、反苏联运动组织起来了。任何反对苏联进行核试验的运动，美国都组织不起来，可是在它本国却有着一个强大的反对它自己进行核试验的运动。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那些胆小如鼠，犯了投降主义，因而反对工人国家进行核试验、核装备的人们的论点是如何的错误。

### 欧洲和美国的无产阶级斗争

世界群众，包括北美洲的群众（尽管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主要

的中心)，都感到了世界革命在前进的社会、历史和具体效果。美国人民十分坚强地成熟了。

北美洲帝国主义最操心的事是让全体美国人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都来参加准备反对工人国家和反对殖民地革命的原子战争。当初，美帝国主义和德国打仗的时候，它在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对手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方面，曾经博得一股强大的同情它和支持它的潮流，然而即使是在那个时候，美国群众也没有完全放弃罢工斗争。

当时，就是美帝国主义正在同德国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尽管某些人数众多的重要部门通过决议，举行示威并向帝国主义作了某些让步、公开支持它，美国的群众还是进行了罢工。

现在，正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原子战争并对古巴进行侵略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北美洲的群众发动了争取每个星期只工作四十小时和三十六小时的运动。九千个电气工人最近获得了每星期工作五天，每天工作五小时的胜利。在炼钢业和汽车制造业的若干重要部门里也出现了减少工作时间的趋势。这意味着尽管北美洲的无产阶级和被剥削群众的政治觉悟水平低，尽管他们还不如别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成熟，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他们没有上美帝国主义政治沙文主义的当，也没有服从美帝国主义政治沙文主义，支持它来反对古巴，反对工人国家的利益。这要是在往年，情形就会不是这样。换句话说，殖民地革命和世界革命对北美洲的群众产生了影响，从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从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

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意大利和英国，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处在经济繁荣、共同市场不断上升和发展、欧洲国家之间

的商业貿易大量增加和劳动得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的无产階級，相信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和平共处的和解政策的无产階級，开展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不断上升的罢工运动。这种事实意味着欧洲的无产階級并没有保守主义化，他们不消极。他们的争取增加工资和在社会福利方面争取新的胜利的大规模运动直接或间接地援助了殖民地革命。

例如在法国帝国主义决定对阿尔及利亚政府作出让步这件事上，法国无产階級2月13日的大示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几十万工人、小资产者、职员、科学家、学生、各行业的人举行了游行。他们游行不但是为了要求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也是为了反对法国帝国主义。这是他们表达斗争意志的間接方法，而在这以前，一连多少个月，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过什么行动。共产党和“群众統一战綫組織”的呼吁立即得到了响应。如果在群众意識里没有感到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他们就不会走出去参加游行，不会响应这个呼吁。

在德国，二十五万鋼铁工人最近争取到了重大的让步。在意大利，罢工运动在不断地发展，青年工人基本上都参加了这个运动。在英国，罢工仍在繼續进行，由于运输工人停止工作，整个倫敦瘫痪了24个小时。鋼铁工人、碼頭工人都在此起彼伏到处罢工。当然，这些罢工的规模还比不上过去有些时期的罢工规模那么大，那个时候，整个无产階級群众都罢工了。但是今天的罢工仍然表达了无产階級进行斗争的一貫願望和意志。这不是政治上充分成熟的、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罢工；但是他意味着在无产階級队伍里存在着走向更大规模斗争的坚强意志。这些斗争在准备着无产階級革命的胜利。

## 各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和苏联官僚 集团背叛了革命

苏联官僚集团和各国共产党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历史的虚伪之谈。它是一个历史骗局，是一项对世界群众的罪恶政策。在目前阶段，尽管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自感快慰，尽管它们的经济得以充分上升和突然繁荣，劳动得以充分就业，但它们无法抑制国内的群众运动，而这些运动的存在，标志着群众的斗争意志和对殖民地群众的同情。

不但在欧洲，而且在美国，都存在着摧毁世界资本主义堡垒的条件。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只消发出一项呼吁就可以粉碎北美帝国主义，北美洲的群众就会起来；而是说，有了这样的基础，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政策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苏联是有可能通过派遣技术人员，派遣民兵、志愿军，提供原子武器等，从军事上、科学上和经济学上，直接地、主动地、全面地支援殖民地革命的。这些办法，加上占世界人口半数的殖民地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会对北美群众产生直接影响。和平共处政策从历史来看不可能存在，这从古巴的例子已经得到证明。如果帝国主义同意在世界上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它就不会反对古巴。而如今帝国主义同古巴势不两立，这就说明它目前对待苏联的态度不会持久。苏联官僚集团和各国共产党所以要这样地强调和平共处政策，是因为他们在想办法继续生存——就像第四国际一贯分析的那样——是因为它们同帝国主义一样，害怕战争会把它们消灭。

战争意味着革命。和平共处政策是一种纲领，它想给群众指出一种虚伪的前景，导致群众放弃对殖民地革命的支持，同时阻止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高涨。

##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展开了反对 一切被剥削者的斗争

千千万万个男女老幼投入了斗争，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斗争的原因不仅是经济上的利益和需要，例如，要求同工同酬、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等；而且是要求解放的深切愿望。

阿尔及利亚的群众马上就要把他们的国家从法国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了。剩下来的是如何解决殖民庄园主问题。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斗争；在法国，没有广大的妇女和儿童投入斗争，阿尔及利亚人不会获得这项协议，法国帝国主义也不会被迫作出这样的让步。法国帝国主义为了使它同阿尔及利亚人签订的协议获得通过，必须同它自己的派系之一，秘密军队组织，进行内部斗争。法国帝国主义不得不攻打一部分它自己的机器，不得不采取加速它自己解体的措施，迫使它后退的措施，原因是社会矛盾的压力非常之大。在这些社会矛盾的內部，不仅是在阿尔及利亚，同样也在法国国内，前进、斗争和压力的历史重量是巨大的和不可摧毁的。

在上述解释以外，如果同意或认为法国帝国主义甘心自相残杀，从而削弱自己，沮丧自己的士气，在群众面前丧失威信和力量，而不是自行内部调解，那就荒谬了。是全世界的群众运动，包括阿尔及利亚的群众运动，在加强和增剧帝国主义的矛盾。当前阶段，决定历史的命运的是世界群众。

没有什么领导，但是有一个以世界群众的解放愿望为基础的世界运动过程。在整个非洲，从阿尔及利亚经过刚果到南非，千千万万个食不果腹，赤足裸体的人抱定决心投入了争取解放的斗争。非洲的一切问题都表明非洲大陆正在充分地向前发展，它不但有

把帝国主义赶走的能力,而且有建立工人国家的能力。

当前历史阶段的特点是:一个国家一旦独立,立刻就要求成立工人国家。它要求朝鏟除資本主义的組織形式,鏟除資本主义的社会机构的方向前进。“中立”国的数目一直在增加就是一个证明。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半殖民地国家。它們在不放棄資本主义陣营的同时,是处在殖民地革命的直接影响之下,說明資本主义对它們已經沒有威信。它們必須寻找一种特殊的自我保护的方法,把自己放在介乎資本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間的地位的方法。这些事实标志着資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沒有前途;反之,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对它們却有吸引力。这些国家的絕大多数人民已經有能力建立工人国家,如果它們还没有这样做,如果小資产阶级和資产阶级还在統治着他們,这主要是由于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罪恶和阴險政策,由于各工人国家官僚統治集团的罪恶和阴險政策。

茲值五一节之际,我們应申明我們决心把下述任务当做我們斗争的根本任务: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际领导机构,这个机构能够成为組織和推动殖民地革命、組織和推动在資本主义的欧洲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組織和推动在帝国主义堡垒的美国正在孕育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这个领导机构能够胜任把迄今仍听命于叛变了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党员群众争取到革命方面来,能够胜任在工人国家里推动政治革命,同时也能够胜任号召并組織群众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准备群众应付帝国主义将要发动的原子战争。

### **为同原子战争交锋作好准备,在战争爆发前 或战争进行中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为了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斗争,工人国家領

导应该用武器直接援助这些国家。它们没有这样做，这是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得以不倒的原因之一。用大量的人力、技术人员、物资和粮食来提供援助，对工人国家有困难，这一点我们知道。但是，工人国家的存在取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发展，工人国家应该同它们共甘苦，那怕这会影响到自己的生产机器。工人国家应该向这些国家提供技术人员、金钱和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并号召进行革命，促使建立以苏维埃形式组织起来的、由群众直接控制的新的工人国家。这是缩短新的原子战争，减少新的原子战争给人类造成损失的最好的和唯一的保证。

人类已经有了共产主义感情第一种总形式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水平，值此五一节之际，工人国家应该号召群众展开革命斗争。

这次的五一不是庆祝节日的五一，也不是呈现取得新的劳工立法胜利前景的五一。这是个记载人类实现社会主义道路和前景的五一，因为工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同资本主义国家最后清算的结果，必然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

工人国家和世界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不仅仅是号召争取改善生活条件，争取男女同工同酬，争取殖民地黑人群众与白种人同工同酬，而且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群众夺取政权的纲领范围内，为上述合理要求而斗争。为了立刻夺取政权，必须援助世界上正在发展的殖民地革命，以便推动革命的世界性发展，以便有助于阻止帝国主义准备原子战争带来可怕的破坏的斗争。如果帝国主义用原子战争来回答这一斗争，那就必须号召进行损失最小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不这样做而是相反，那就是把主动权让给帝国主义，让它在对它合适的条件下准备并发动战争，这就会给人类带来百倍的灾难。必须用先发制人的战争来对付帝国主义，但这要在对全体被剥削群众作出世界性革命动员的策略的基础上来进行。



即便是帝国主义在最坏的条件下发动了战争——它是一定会发动的——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破坏，人类的重新建设也绝不会开倒车，不会再返回资本主义去。重建世界将由人类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和初步形成的世界共产主义思想感情来实现。

官僚集团和帝国主义正在采取共同行动，企图用原子战争把人类吓倒。它们试图令人信服，原子战争一旦爆发，那将是人类的末日来临，它们的目的是想把解决问题的权力保留在它们手中，用官僚集团和帝国主义双方达成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它们所正在进行的。原子战争不可避免。这是世界革命工人运动应有的认识的第一点。我们反对原子战争，必须为反对原子武器、反对一切武器而斗争。但是工人运动无法束缚掌握强大原子武器的资本主义机器（帝国主义世界财政的45%都用于原子战争预算）。认为有可以阻止发生原子战争的前景，这纯粹是妄想。任何世界和平主义运动，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无法阻止帝国主义发动原子战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一班子人，尽管他们是个小小的集团，会由于自然的需要而发动原子战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世界革命斗争将会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削弱它们在原子战争中制造最大损失的手段和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一些由此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但是，为此目的，必须进行准备，必须对人类的共产主义未来抱有信心并作出保证。原子战争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也意味着将来活下来的那一部分人类的共产主义感情的增长。必须为反对帝国主义，为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把原子能用于军事上的目的。必须组织要求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世界运动。但是，如果认为这个运动能够瘫痪帝国主义，那是妄想。唯有同时采取革命的行动才能达到上述目的。然而这种可能性，至少在眼前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

內，是不存在的。可能性最大的前景是发动一場原子战争的前景。因此，世界工人运动，殖民地人民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須为这种前景作出准备。这种准备就是：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在工人国家里必須进行革命斗争以支持殖民地斗争；援助古巴和将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現的新的工人国家，向这些国家提供直接援助，号召他們夺取政权，那怕冒有帝国主义因此而轉过身来发动原子战争的危險。

一切工人国家，一切共产党，一切国家的工会和工人中央組織，都必須把殖民地革命的发展綱領作为自己的斗争的重要部分，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資送給像古巴这样的，正在建立和正在发展的新的工人国家，把自己的人、技术人员、工厂里的工人派到这些国家里去，援助这些国家。这是它們的一項不可推卸的責任，是它們为反对原子战争，以阻止发生可以預見的灾难的斗争的一部分。它們必須呼吁世界群众起来夺取政权，呼吁世界群众不同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资产阶级結成同盟，而是自己来夺取政权。

### **土地革命和工农联盟**

土地問題对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是生命攸关的問題。土地分配、土地改革和农民群众能过真正的文明生活的問題，只有成立工人政权才能解决。厄瓜多尔阿罗赛麦那的經驗，加納、几内亚和馬里的經驗，还有阿尔及利亚当前的直接經驗证明，不进行夺取政权的群众斗争，土地改革便会半途而廢，便会給资本主义的繼續生存提供新的机会。直接参加这种变革是工人国家、共产党、工会和工人中央組織的义务。革命正在搖撼着整个非洲。如果說它还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平，如果說爭取革命新胜利的斗争沒有获得更大的扩展，那是因为领导这个运动的是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

級民族主义集团。苏联官僚集团对这些领导集团提供了直接的或間接的援助，但它的目的是寻找同盟者来給自己的和平共处世界政策奠定基础，而不是強調和鼓励向这些国家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殖民地革命提供各种各样軍事的、經濟的和科学的援助。

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和持續的有生力量。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巴西和智利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农民群众运动的主要扩展地。但是，农民群众通过自己的經驗，了解了同无产阶级結成联盟的必要性，并且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在以农民为社会基础并且有着斗争傳統的秘魯，农民在新近的运动中感到自己的斗争和工人的斗争是一致的。他們已經同无产阶级結成了有力的联盟。賽罗·德·巴斯科的秘魯农民运动同矿工联合取得了輝煌的胜利。秘魯矿工有史以来第一次支持了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这是工农联盟取得的进展。

巴西农民感到在夺取土地的斗争中必須轉向南方，同大城市里的群众建立联盟。巴西群众用不了多久就会成立工农联盟。在广大群众經歷的斗争中，作为拉丁美洲革命和非洲革命的根本基础的工农联盟正在发展。以上是这次五一节的形势。它記錄了过去这段期間十分重要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工农联盟取得的进展。

### 殖民地革命的发展

在非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正面临着殖民地革命新发展的巨大压力。

如果說有一段时期革命运动曾在几内亚和南非受到抑制，剛果的爆炸却使它又整个活跃了起来。殖民地革命的地方性发展和苏共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后果，对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政

治革命的整个过程都产生了影响。

在經過了二十五年的法西斯独裁統治之后，殖民地革命使得連像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也发生了动摇。在铁的独裁統治之下和杀人犯薩拉查政府控制得人們連气都透不过来的葡萄牙，如今由于数千人举行起义发生了动摇。安哥拉群众在赤手空拳地进行着斗争。根据报导、公报和照片，展开斗争的安哥拉群众只有石块和木棍，他們設法从葡萄牙人手中把武器夺过来武装自己。这种动摇了整个葡萄牙統治的斗争說明了葡萄牙統治的衰敗和末日来临。它对西班牙产生的必然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西班牙的群众、学生和工人，伊巴尔的冶金工人，巴斯格地区的劳动人民，比尔包和貝阿散的鋼铁工人和矿工几年来一直在不断地斗争。这并不等于說打倒佛朗哥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不久就会发生，但这意味着就連法西斯西班牙也由于群众斗争的巨大压力发生了动摇。

我們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和群众，組織委员会，支援西班牙和葡萄牙英雄战士的斗争。我們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和群众开展一个支持他們的世界运动。

在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不受到殖民地革命的影响，东角會議（按：在烏拉圭召开的泛美經濟會議）证明了美帝国主义的巨大弱点。就像在亚洲和非洲一样，美帝国主义用“爭取进步同盟”的政策来抑制革命的企图已經失敗。它曾在东角企图把拉丁美洲联合起来以反对殖民地革命的威胁和古巴工人国家的威胁。

六个国家表示了反对意見，其中三个是大資本主义国家。这并不等于說从社会上和历史上看来，帝国主义已經被击败，因为持反对意見的国家同其它資本主义国家有着相同的利益。但是这說明已經积累了巨大的矛盾，这些国家更加直接地感到了世界群众革命斗争的巨大压力。帝国主义沒有能够及时地同拉丁美洲的資

产阶级以及一切国家組成一条統一战线，以对付古巴革命。它沒有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和美帝国主义不願意这样做，而是由于群众的斗争，矛盾太大。

争取进步同盟要在拉丁美洲实行沒有任何可能性，一方面，美国缺乏堪以使它的经济負担巨額投資而又不致影响国内稳定状态的积累，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群众的巨大革命力量正在加深危机，造成了日益增长的不稳定状态，使得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之間产生矛盾，同时每一个政府还有它自己所面临的矛盾。

资产阶级各个工业部門出現了这样一种倾向，即这些部門，由于利益所在，想发展自己的经济，以抑制群众的社会压力。这些部門和其它部門之間的矛盾，构成了組織反对古巴革命的統一战线的障碍。

殖民地革命进程对非洲的影响是另外一种情况。当前阶段这么多国家和独立共和国的出現，并不能肯定它們是些新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很短的时间內，它們会建立一些新的工人国家。

在当前历史阶段，标志进步的是古巴工人国家的誕生，是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和独立共和国的誕生。印度尼西亚的群众，通过他們的压力，正在寻求一个革命不断高涨的过程。共产党的阴險政策，即同政府訂立同盟和服从政府的政策，使资产阶级得以在目前阶段繼續維持，尽管群众的压力非常大。从網領角度来看，群众方面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土地改革問題。

老撾和越南标志着一个尚未完成的斗争过程，这个斗争仍在繼續展开，尽管各国共产党已經叛变，尽管苏联官僚集团采取了和解政策。在这个国家里，群众的巨大压力能够使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前进，而不被美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吓倒。而对着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威胁，群众沒有吓倒，也不会让人吓倒，他們不会

让人束縛自己的手脚。他們繼續在斗争中前进，就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一样，像在欧洲，在非洲，在一切世界殖民地群众革命得到发展的地方一样，尤其是像拉丁美洲一样，他們获得了新的、十分重大的胜利。在阿根廷，就像在最近的巴西一样，群众通过斗争认识到就连民主选举的权利都必须拿起武器夺取政权才能得到维护。

在阿尔及利亚、法国、巴西、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共和国、委内瑞拉等等，军队里的和国家的不同派系彼此之間展开的斗争和相互厮杀，至多是反映了他們的盲目火并，以便进一步——和过去一样——把自己出卖給帝国主义。正在前进的革命的巨大社会压力使它們的矛盾更加尖锐化，阻止它們获得任何协调一致。这种斗争乃是寻求不同的方法来对付正在发展的革命的一种反映。这些斗争说明当前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由于走向夺取政权的群众的前进和上升，有了根本的加深。

### 苏联的政治革命，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和 它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苏联国内斗争的一个向上发展的阶段。这种斗争对于世界革命的进程有根本性重要意义。苏共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指出了苏联苏维埃群众巨大压力的間接影响。苏联的苏维埃还没有找到表达压力的途径和方式。这种斗争标志着苏联政治革命的强大高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危机是这些政治革命和殖民地革命进程的直接表现。

赫鲁晓夫的政策間接地反映了他阻止、抑制和轉移苏维埃群众巨大压力的企图，反映了他作出让步、甚至同意把斯大林的遗体从陵墓中移走，以便他自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企图。

苏联国内对于过去和未来进行的讨论，表明了苏联政治革命的发展。力图在二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前景的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纲领，对于群众是一文不值的谎言。因为，除了取消国家以外，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不就是让人人都能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么？这只有在具备了充足的财富以后才能成为可能。为了根除国家的必要性，必须要有一个生产机器和一个社会组织来取消强制领导，只消有一个临时性的随时可以罢免的管理机关就够了。这就是说由整个“社会”来参加“社会”的管理工作。单单在一个国家里共产主义不能存在，单单在几个国家里共产主义也不能存在，而是要在整个几大洲上才能存在。官僚集团的这种一钱不值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观念还表现在他们宣称二十年内就可以单独在苏联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需要同其它工人国家共同作出计划。苏联官僚所以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纲领，是因为它觉得有向苏联群众提示前景的必要，是因为有一股巨大的对利益和政治关心的压力正在寻找表达的途径。

看得出来，苏联的政治革命正在上升，反过来，这种政治革命的上升又影响了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这些党内的群众。这些群众对他们的领导施加压力，迫使它采取革命的政策。在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立刻看到了这种影响，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在政治舞台上有着巨大的势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会领导抑制不住当前时代群众的重大斗争运动。巴黎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示威游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产生巨大效果，因为它显示了群众对自己的信心。

### **在全世界打倒资本主义**

我们在上面介绍完了当前的历史形势。重要的不是帝国主义

在做些什么，和平共处政策在做些什么，或者是联合国在采取些什么行动，而是群众的世界斗争。这是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形势。

在历史的当前革命阶段，各工人领导机构，从构成工人运动的最有力量、最根本、最重要的部分的工人国家开始，其根本义务是投身于推动革命。这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不是在这一个或者那一个地方，而是在全世界。如果资本主义为了反对这种斗争而发动原子战，那将是它的末日来临，将是它的毁灭。

推动革命应该是工人国家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正在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主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阶段，有史以来第一次，男工女工，儿童和老人，用一股无穷的力量投入了斗争，他们在要求获得生存权利的同时，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这就是五一纲领。这不是一个目的只在于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的纲领，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白种人和黑种人同工同酬的纲领；这是个眼前的和应该给以支持的斗争纲领，但它必须首先同为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总前景融化在一起，并且服从这个总的前景。

决定历史的地方不在联合国，而是在刚果，在南非，在古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巴西，在老撾。在前进的群众面前，世界资本赖以维持的唯一基础是苏联官僚集团、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罪恶政策。世界革命工人运动必须对这种形势有所认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当前的领导者身上。

我们号召世界群众，根据各国的特殊情况，在街道上，在工厂里，乡村里，成立具有双重权力的萌芽机构，成立委员会，以便为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前进而斗争。男男女女，儿童和老人将史无前



例地參加到這個革命鬥爭中來。

在世界工人組織、工會組織和革命組織里，必須實行無產階級的平等和民主權利。

必須號召軍隊里的士兵和下級軍官向人民投誠；號召他們把槍口掉轉過來，對准派遣他們去屠殺群眾的人。在巴西、在阿根廷、在智利、在全世界，不應該像共產黨、社會黨以及工人國家的官僚主義領導集團那樣去尋求和解，而是應該從現在起就號召士兵把槍口掉轉過來，對准他們的上司。這樣，人們就必然會為反對帝國主義用原子戰爭強加在他們頭上的災難和暴行而鬥爭。

對於這種反對原子戰爭的鬥爭，存在着種種的條件。首要條件是在全世界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反對備戰，為奪取政權而鬥爭。這個鬥爭必須在世界範圍內展開。必須把帝國主義的道路堵住，並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為民族解放、經濟解放和社會解放而鬥爭的國家里把它打垮。

必須建立世界無產階級統一戰線，號召世界群眾奪取政權。這是當前工人國家和共產黨、工會和工人中央組織的首要義務和歷史責任。群眾必須在全世界打倒資本主義，為此，我們全力支援他們這樣做。這個奪取政權的鬥爭是我們在这次五一節的一項首要呼喚。

同志們；

第四國際呼喚歐洲無產階級公開支持殖民地革命以及他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戰鬥弟兄的鬥爭，打倒資本主義，在歐洲建立新的工人國家，成立歐洲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聯邦。

第四國際呼喚北美洲的無產階級支持殖民地革命，從自己的階級組織開始；建立以工會為基礎的工人政黨，作為消滅美帝國主義，解決自己的問題，包括黑人的權利問題，以及一切被剝削者的

問題的工具。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同世界不断革命的不可轉換的进程融化在一起，把自己的命运同正在为建立拉丁美洲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从而在将来建立世界联邦的进程联系在一起。

第四国际呼吁正在进行革命的世界各大洲被剝削群众为建立工人国家而斗争，这些国家将在那儿是一个区域性范围内成立苏維埃社会主义国家，以便加速資本主义的崩潰和解体，为成立泛亚細亚苏維埃联邦，泛非洲苏維埃联邦和拉丁美洲苏維埃联邦开辟道路。不要等到在一切国家成立工人国家。在一旦出現的工人国家的基础上，要先成立区域性联合。例如：古巴工人国家可以向中美洲群众发出呼吁，以便成立中美洲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第四国际呼吁古巴工人国家参加到殖民地革命中来。作为工人国家，古巴的命运現在和将来不但同苏联联合在一起，它应该同意和接受苏联的援助，而且也同拉丁美洲革命的发展联合在一起。单单在一个国家里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苏联如此，古巴也如此。和平共处是行不通的，尽管可能有朝一日古巴革命领导集团会作这种尝试，以便在拉丁美洲各国政府面前表现自己不是革命的煽动者。

古巴工人国家的首要义务是輸出革命。輸出革命不等于說派遣民兵去侵入別的国家，而是号召一切国家举行革命，到处去直接号召夺取政权。古巴总工会应该是拉丁美洲革命的有力靠山。古巴总工会应该号召成立泛非和泛亚工人中心組織，应该指明無論是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无产阶级反帝統一战綫組織的必要性。

第四国际热烈呼吁工人国家的人民，主要是从資本主义剝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为爭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权利而斗争，强制建立苏維埃，使政治革命获得胜利。

工人国家的經濟、科学和技术发展以及它們的社会成熟要求必須在国际范圍內实行計劃經濟，必須建立一个世界性集中政治組織，群众的共产国际，以便有意識地領導建設社会主义，并在前景上把这种建設同第四国际的斗争和胜利結合在一起。

以上就是当前阶段为历史发展所必需的政策和綱領。

創造历史的工具不是联合国，也不是柏林条約，而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正在解决自己的問題的群众。工人国家和資本主义残余之間，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間的最后清算，其基本部分要在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里来进行。

展望前景，第四国际是这些过程的首要关键，是这些过程的鼓舞者、动力和組織者。

非洲的发展证明了意志坚强的、同投入夺取土地的斗争的貧农、中农联合起来以后的小組織能够干出些什么。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群众正在亲身經歷发展着的斗争。

这就是第四国际开辟的道路。

第四国际必須在这条道路上向前发展，同时立刻号召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第四国际本身的发展是和这种斗争联結在一起的。随着群众正在向着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方面前进，第四国际发展的可能性正在增长。

以上就是“国际”向世界群众和一切托洛茨基主义組織发出的、要求他們参加到革命进程中来的呼吁。

1962年5月1日

### 3. 致欧、亚、非洲国际布尔什维克 党员和干部的信

第四国际在拉丁美洲局领导下举行的特别会议，对国际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布尔什维克斗士和干部发出这个号召。它是在作出历史性决定要暂时担任国际的领导的时候发出这个呼吁的。在拉美局的领导下举行了这次特别会议并通过了若干决议，这对第四国际生命的延续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所以必要，是因为国际领导机构保守派的腐化堕落的行径已经达到十分危险的地步。当时这一部分怀疑的、垂头丧气的、犹豫不决的、萎靡不振的分子经受不住世界局势的压力，正在犯罪地使国际的生命及其活动陷于瘫痪。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与殖民地革命的新的持久的高潮相结合并扎根于其中的国际，扩大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和世界革命，从而设法为克服上述危机开辟道路，这无论根据历史或具体情况来说，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这就是第四国际在拉丁美洲局领导下举行特别会议的意义。

在以官僚主义态度阻挠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国际书记处应包含殖民地多数这一决议的执行以后，杰尔曼、弗朗克、列维奥·麦丹、巴布洛、沙尔·山登、乔治和勒纳的保守主义的、投降主义的和取消主义的方针已使国际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由拉美局领导的拉丁美洲代表团由于驳斥了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这种投降主义的倾向，保卫了关于把世界党的最重要的力量用于殖民地革命范围内的斗争这一战略。代表大会采纳了这个战略思想，指定成立一个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拥有殖民地多数的国际书记

处,以便有力地应用这个战略思想。在整整一年的期間,投降派并没有认真地采取什么措施来建立这个殖民地多数,最后还决定要保持领导机构不变,这就意味着把各殖民地国家的成员置于少数地位。于是,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便受到一种官僚主义的诡计的抵制。取消派巴布洛在他于1962年3月写的公开信里說,殖民地的成员将在下一届的国际领导机构中拥有适当的代表等等,这时,他是同意那个官僚主义的诡计的。

### 发展的危机

由于采取这种行径,并利用所谓国际领导机构中的多数,这个投降主义的和取消主义的集团已经把国际的政治生活保持在彻底的瘫痪状态中。它在我們运动的史无前例的最有利条件下阻碍了国际的发展。因此,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恶化以前,发展的危机就已经开始了。当这一部分的领导人对带有根本性的世界问题保持缄默时,拉美局不能不维护国际的方针,不能不作出决议来保持国际行动的继续。

拉美局就一些重要问题通过了决议,其中有:关于维也纳会议的问题,关于中苏分歧的问题,关于原子战争和苏联进行核试验的问题,关于美帝国主义侵犯古巴工人国家的问题,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问题,关于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法国签订最近协定的问题,关于开除埃斯卡兰特的問題,等等。在每一场合,拉美局都坚持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国际的观点。取消派阻挠国际参与这些重大的事件,当他们干预的时候,他们只是表现了他们的投降主义精神,像在分析苏共二十二大时那样;或者他们便是抛弃了在一个过程中击败帝国主义的毫不妥协的革命斗争路线,在那个过程中,核战争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最后的清算,

而緊跟着出現的將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世界規模的發展和勝利。這些投降主義分子已經沿着他們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暗示的立場繼續前進，例如在他們關於“核戰爭的空前大浩劫”的想法中，或者像杰爾曼在《法蘭西觀察家》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表示的那樣。在那篇文章里，作者硬說帝國主義頭子（肯尼迪）願意接受某些開明人士的和平主義宣傳，真誠地希望同“俄國人”談判。在這里，杰爾曼屈服了，甚至沿着接受和平共處的道路越走越遠；關於蘇聯進行核試驗的問題，情形也是如此。巴布洛公開否定工人國家有權實行自衛或準備實行自衛以反擊正在打算掀起核戰爭的帝國主義。

### 戰爭和清算

召開特別會議的一個口號是：“當代的布爾什維克鬥士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準備毅然地承擔社會主義革命和工人國家對資本主義的最後清算——這種清算將在核戰爭中獲得解決；他也準備勇敢地承擔它的後果。”

與此相反，杰爾曼、列維奧、巴布洛、沙爾、喬治和勒訥却屈服了。他們表示出小資產階級對戰爭看法的恐慌。他們否定蘇聯作為一個工人國家的進行核試驗的權利，也就是說，否定它的包括先動手進攻帝國主義的權利在內的防禦原子戰爭的權利。在這一關於國際均勢的演變的主要問題上，特別會議一致通過了國際政治決議和五一節宣言，明確地表達了第四國際對於原子戰爭的策略。這些投降分子卻被各處發展的形勢以及使他們感到驚恐並對共產主義前途喪失信心的最後決戰所吓倒，把他們的沮喪情緒帶到組織範圍中來，放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屈從人們對鬥士和黨的布爾什維克思想所抱有的模糊的、混雜的、折衷的態度。他們的喪失斗

志，导致他们对国际离心离德，轉而向过去和現在一直拥护班达拉奈克資產階級政府的墮落的前錫兰支部去寻求盟友；或者到那不仅与托洛茨基主义而且甚至与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社会工人党中去寻求盟友。

这些投降主义分子就是在今天硬說第四国际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区别一天天地越来越少的投降分子！也就是这同一伙人，他們在使国际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以后，决定要“解散”拉丁美洲局，即整个国际中最生气勃勃、最成熟和最有觉悟的部分，并决心把路易斯、奥尔蒂斯、卢塞罗和米兰达这几位同志排除于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外。在这里我們看到了取消主义的完整的表現。这些取消派也就是这样一些人，他們甚至在今天，在杰尔曼集团背棄了比利时无产階級的英勇罢工之后，仍旧认为那个支部是国际的一部分。我們拒絕那种认为这些人是国际在比利时的一个支部的想法！这一关于布尔什維克对比利时党的看法問題，是使我們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发生分歧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必須在比利时和欧洲建立布尔什維克的支部。必須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建立布尔什維克的国际，以便建設第四国际。这个历史任务是迫切的。因此，我們在全世界所面临的有如旭日初升的世界規模的革命进程，以及一日千里的形势发展，都需要托洛茨基主义和第四国际。

### **殖民地革命**

同志們：当三大洲的殖民地群众依靠新兴的工人国家取得胜利或准备取得胜利时；当无数被剝削的人民意气風发地投身于革命行动时；当以苏联肇其端的工人国家中的巨大力量助长政治革命的发展，而这种革命会同殖民地的革命在今天已經有力地影响了并且在将来会更有力量地影响从欧洲到美国的一系列主要国家

时；当这些影响在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經变得十分明显时；当托洛茨基主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出现在这些事件的任何一件中时；当这些群众、这些过程需要第四国际的领导机构及其有組織的活动給予越来越多的帮助和向它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时；这些投降主义派和取消主义分子把资产階級和小资产階級的种种畏懼搬到我們的运动里来；他們按照一种根本同国际相对立的思想 and 政治路綫办事。由于不能保持第四国际一貫的思想和行动，他們采取傲慢的态度，輕視不发达国家的革命群众运动。取消派巴布洛的公开信（特別會議曾单独对这封公开信通过了一項決議）的用意就在于此；他們决定要“解散”拉美局并把国际领导机构的骨干排除出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用意也在于此，而那些骨干由于是殖民地少数的一部分，至今曾努力使国际领导机构的活动繼續下去。

### 第四国际的會議

在世界規模的不断革命过程的生气勃勃的現阶段上，那些在政治上表现出对这一过程有所了解但不能組織群众的活动并在无产階級中生根的革命领导人員和革命干部，既沒有历史的基础，也沒有实在的基础；他們势必会面临空虛和崩潰。

这次在拉美局领导下举行的第四国际的特別會議，一方面通过历史性的決議要在这次會議召开特別世界代表大会以前暂时担任国际的领导工作，一方面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深信这个決議是符合我們对这世界革命过程的客观了解的，并且决心要維持第四国际的领导 and 它的革命活动，使其不致中断，同时也感到，固然我們的世界規模的运动今天是在拉丁美洲逐日爭取到新的力量和陣地，同革命群众溶合在一起，并取得新的胜利，我們的运动在全



世界各地的形势也将与此相同。在拉丁美洲，在最近两个月内，我们的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在秘鲁，由于费蒂萨的选举阶级阵线、亚莱·欧萨科联合工会(United Industries Yale Eusaco)和矿工联合会(有三万五千工人)的活动而取得了胜利；在阿根廷，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虽然在庇隆派群众投票支持工党以击败政府的地方产生了巨大的归向一方的变化，虽然人们用欺骗手段来反对我们的党，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却依然在三个地区获得了一万五千张选票；在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不断地在各工会中、特别是在矿工中赢得新的阵地；在智利，我们在瓦契帕托钢铁厂(有四千工人)以及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其中从事大胆渗透工作的社会党里巩固了我们的力量；在巴西、乌拉圭、墨西哥、古巴，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重要的进展；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我们正在为发展一个新的支部而打下基础。像在拉丁美洲有这样的可能一样，我们相信在亚洲、非洲和欧洲也有可能以一种积极的活动，即以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意识到现实和所需任务的那种活动，再结合争取政权的斗争经验，来组织工人阶级的活动；我们说，在未来的短时期内，我们有可能单独领导或与其他党派共同领导革命群众运动；或与决心前进的最进步最政治化的潮流联合起来。

同志们，我们抱着这种信念，已经决定要使国际的活动继续下去并使它活跃起来。我们不过是在继续进行我们从成立第四国际起一直为了国际的发展和布尔什维克的成熟而从事的斗争。今天我们作出这个决定来继续推进那种同国际的活动本身混合和溶合在一起的斗争。这是克服在发展国际时所遇到的危机的不二法门，而唯一可以采取的途径是：我们必须和群众运动中扎下根来，不管群众运动在各个国家中的现状如何；我们必须在世界规模的殖民地革命的生气勃勃的运动内部，以及在我們能够参加领导各

种群众潮流和革命的地方，放手地运用我们的主要力量。

在发出这个呼吁时，我们鼓励第四国际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切布尔什维克干部和斗士在这些大陆加强国际的革命战斗活动；以这种方式对取消派进行斗争；积极参加召开世界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最后是响应第四国际、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拉丁美洲局、第四国际临时领导机构的决议和昂扬斗志，因为这些合为一体的组织已经决定要消灭前进道路上的危机，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特别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恢复第四国际的领导，使它在全世界的活动更加坚强有力。有了这次会议，就奠定了克服发展方面的危机的基础。它为推进第四国际的世界规模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962年4月

## 四、中苏分歧的現阶段及其历史意义

——J. 波薩达斯 1963 年 6 月 9 日在阿根廷  
工人党(托派)全国扩大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中苏分歧这个阶段的特点在于它是苏联官僚主义分子和中国人双方都并不是自觉地进行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却提出了一些有意識的目标。对所追求的目标更有意識的是苏联官僚主义分子一方。他們知道他們必須維護保守利益。在这一方面，他們有經驗，也有办法。此外，保守利益在他們身上培养出一种本能、一种嗅觉和一种巨大的感觉和反应的能力。官僚主义把对它的利益的經常和不断增长的意識与經常指导着它的感觉和本能結合在一起，在这个結合的基础上行动与发展。当它的保守利益一旦受到冲击，它馬上就感觉到它所遭受的損害。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行动既不始終一貫也缺乏自觉，因为它缺乏一个一貫的自觉的綱領，也沒有一套对革命的綱領性的思想意識。

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間的討論表面上是共产党领导之間为了解决綱領和政策問題而进行的討論。其实，从这次討論和这次斗争中将产生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动力，推动世界革命的进程和向社会主义迈进。

在这次討論中，中国人代表着两派官僚主义分子中进步的一翼、进步的利益。虽然中国人的行动曖昧，但是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間的区别是非常巨大、非常明确的。苏联官僚主义分子是作为革命政权的篡夺者而出現的。他們沒有进行革命。他們篡夺了革命

的果实。他們在某一阶段（托洛茨基确定为 1926—27 年）篡夺了革命，吞取革命的果实，利用革命謀取私利而不顧革命的利益。用一般历史的說法，这可以說是一次“热月政变”。

中国官僚主义分子組織、領導并发展了革命。他們領導了革命。他們在中国建立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初步的主要基础。他們之所以为官僚主义分子，并不是因為他們維護保守利益，而是因為他們領導国家的方式是官僚主义的。他們对群众缺乏信心，不信任群众。他們相信的是机构，是党的行政作用。他們曾依靠群众夺取了政权。但是掌握政权的是一个小组。这个曾經受到而且依然受着农民方面的巨大压力的小集团最初組織了党，后来掌握了国家的領導。

中国官僚主义分子是在对革命提出革命性的政策的基础上取得政权，发展政权的。然而他們对革命却保持着官僚主义的观点。在官僚主义的观点和革命性的政策間是沒有矛盾的。官僚主义分子由于赶走了資本主义而取得政权。他們曾必須用武力推翻資本主义。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政策，然而他們的观点是官僚主义的。他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群众有可能参預、监督、計劃国家事务，并不是为了使他們有可能享受充分的革命民主。从开始的时候起，官僚主义分子就組成領導，制訂綱領，在中国組織工人政权。群众沒有参預过政策和經濟計劃的制訂。他們沒有决定过政治、經濟和国家經濟发展的計劃。他們現在通过公社参与一部分工作，但是制訂和决定計劃，监督計劃执行的并不是他們。在这个意义上來說，那里是用官僚行政的方法領導革命的官僚主义的領導。但是，即使那里存在一些保守的阶层，存在某些保守的和官僚主义的利益，那里還沒有一个維護保守利益的大規模的官僚主义集团的基础。

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这个区别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也不是由于种族不同，共产党建立过程的不同而产生的。这是每个国家革命的起源与发展产生的结果。从起源方面说，中国人为革命所推动，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不能像在苏联那样走上和帝国主义讲和平讲共处的道路，又不曾处在类似苏联官僚主义者在整个一个阶段中所处的那种历史环境——在那个阶段，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使得官僚主义者有可能在革命倒退的过程中生活下去——因此，中国人不得不采取左的立场，比较自觉、至少比较完整地遵循革命的阶级路线。

在朝鲜战争以后事态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首先是在它的政治方面，后来又在它的经济方面。事态的发展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意识的发展。人们要在对外方面执行接近于革命需要的政策，采取接近于革命需要的态度，就不能不在国内承受一定的后果。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后果、延长与继续，正如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方式的继续一样。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总是先有对内政策然后才有对外政策。时常是对外政策决定对内政策。自觉地执行的国际政策的需要可能在对内政策上产生意料不到的反应。这就得出下列结果：要就是使对内政策也成为自觉的政策；要就是执行反映对内政策的经验主义的对外政策。由于他们在朝鲜执行的政策，中国人在阶级斗争史上跃进了一大步。中国人直接参加了朝鲜战争；这也影响了中国本身。

### **殖民地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别篇文章，别的报告里详细阐述。我们在这里只指出一点，那就是1950这一年在中国是具有巨大重

要意义的一年。中国显示了比別人，例如越南，坚决得多的态度。中国向对外的革命总路綫前进，其目的不是要征服亚洲，而是要在亚洲扩张革命。

公社起源于1936年——这是毛澤东在延安所作的关于延安农业经济关系的那篇著名报告中所表明的。在1936年，公社就已潜在。1958年的公社不仅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它是革命組織、经济計划化以及中国克服落后状态等客观需要的一种表现。这是提早好几十年克服不发达状态的一种方式。当一个领导既不官僚主义也不保守，当它至少不是自觉地具有保守利益的时候，这样一些措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这个领导的思想意識。这些因素事实上也影响了中国。跟苏联不同，中国不可能进入世界陣营，不可能参加联合国，帝国主义也不可能和中国人共处，这些因素迫使中国采取革命的道路，以代替在与帝国主义共处、和好和竞赛中毫无出路的局面。

中国革命，跟苏联革命一样，在开始的时候是群众性的革命。可是同时，今天掌握政权的是实现了这个革命的人們。这就为革命的进程影响这个领导的可能性提供了基础。这个领导过去和現在都沒有反映出中国革命的全部力量。它并没有反映出它本身还能向何处演变。由于缺乏馬克思主义的自觉意識，它不能順利地反映出它自己还可能实现的前进道路。在这一个意义上來說，它今天还没有那些保守的利益，而这是苏联官僚主义統治的对抗性矛盾的主要基础。中国领导为自己的演变敞开着大門。国内政治生活的缺乏阻碍着这个演变，阻止它取得中国革命和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客观发展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推动力。

苏联官僚主义統治，由于经济客观发展的原因，沒有任何可能接受革命的影响，沒有任何可能向馬克思主义的立場演变。

世界殖民地革命的推动力在苏联官僚主义統治中得不到表現。它表現在苏联人民之中，部分地表現在軍隊之中。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領導中得到直接的表現。由于中国共产党領導形成的历史条件，随着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世界殖民地革命的影响表現在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例如公社——这是促进中国共产党領導的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跃进。这并不是說这个領導現在在思想意識方面运用着馬克思主义，只是說它大有可能达到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領導，由于我們前面所說的那些因素，接受着殖民地革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非常激烈、强烈和有力的。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庆祝和紀念殖民地革命，公开举行支持殖民地革命的政治示威。这些示威并不像中国人所說的那樣是群众性的。如果那样說，那就是撒謊。并没有上千百万人的动員。如果在中国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如果群众能够参加政治，那就会动員三百万、四百万、一千万甚至两千万人。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动員至少百分之十的人口，并不是件难事。中国人从来没有动員到五百万人以上。这是他們自己提供的数字。五百万人当然不少，但是对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來說，这可不是一个大数目。

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間的斗争，按照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冲突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冲突并不是新鮮的东西。共产国际早就試图支配中共，把中共置于僕役的地位。在共产国际中曾經发生过重大的事件、討論和論战。第一次大危机出现在1927年对蔣介石采取屈从政策的时候。这次对蔣介石的屈服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失敗。后来又有別的一些危机：先在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后来又出现在对“人民陣綫”采取屈从政策的問題上。

另外一次大危机发生在 1946 年当斯大林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再次向蒋介石屈服的时候。中国人的抵抗表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不是官僚主义的领导，没有官僚主义分子，否则不会决定这样一个政策。一次新的巨大的抵抗又在北朝鲜问题上表现了出来。那时开始了公开的、直接的国际冲突。在越南问题上，冲突没有显示出来，因为不曾有斗争。在朝鲜，两条不明确不自觉的路线互相对立：中国人的路线是不惜自己付出代价——由于可能引起美国帝国主义的干涉，这确实是可能的——来支持殖民地革命，苏联人的态度是为了保卫他们保守的、官僚主义的利益，而不送飞机给朝鲜人，阻止朝鲜取得彻底的胜利。

中国人没有得出思想意识的和政治的结论，这不是由于他们的领导或某一阶层有保守的利益，而是由于他们的思想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由于他们对群众缺乏信任。群众如果参预政治，原可以直接帮助他们的领导产生信心，帮助领导发展，从而帮助领导更自觉地依靠群众。领导原可以因此向前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学会一些东西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表明了它比苏联的领导更接近殖民地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然而中国人总是抗拒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的发展。他们所有的文件，从他们主要的理论家刘少奇和毛泽东写的文件数起，都是混乱不清，包含着机会主义的、严重的机会主义的立场。例如他们说：“应该教育资产阶级”。他们居然给自己提出教育资产阶级的任务！直到 1959 年，他们一直劝说已经掌握政权的国家去“教育资产阶级”，去争取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给他们参加政府的机会。他们把这个政策和在国内结成争取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结合在一起，把党的一切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下；不过，与苏联共产党不同，他们要求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



中国人采取了两个不相容的立場：把党的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下，同时又要求階級斗争。这并不是中国人的詭計，也不是詭辯，也不是圈套。这是理論上的混乱和缺乏經驗。此外，除了苏联以外，沒有任何別的历史經驗可以依靠。跟苏联不同，中国領導人并不是在培养精通馬克思主义的領導人的訓練班里培养出来的。中国沒有一个偉大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家，沒有一个偉大的馬克思主义領導人，也沒有一个偉大的理論家。在苏联，曾經有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的主要基础。中国沒有这些基础，中国必須依靠苏联。这曾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它影响中国領導的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中国人要求階級斗争这一事实，表明他們提防像苏联官僚主义分子那样对資產階級进行有意識的屈从。

在那个阶段，許多共产党建立了人民陣綫，“取消了”有利于工人的階級斗争，使其有利于資產階級。階級斗争是不能取消的。取消的是群众参加階級斗争的自觉性，那些共产党所做到的也就是这一点。在人民陣綫中，工人不进行罢工。他們不能把胜利果实从資產階級手上夺过来，惟恐“他們的同盟者发脾气”。中国人拋棄了这些条款，虽然方式上不明确。他們就这样表示了对这种政策的不信任。他們繼續接受階級斗争。后来，在掌握政权以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发展中国的利益跟苏联官僚主义統治公开冲突起来。这一个表面上是經濟的斗争——苏联官僚主义統治试图把中国经济利益置于它自己的利益之下——归根結底，是由中国領導的发展和成熟，是由它对馬克思主义思想理解的加深决定的，然而这并不是馬克思主义的理解。

毫無疑問，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繼續具有很大的份量，抗拒对苏联官僚主义利益的屈从。

在整个一个时期中，欧洲各工人国家屈从于苏联官僚主义的利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它在德国、捷克等国进行的掠夺。在中国，事情不能完全是那样子，因为存在着一个有真实的、直接的、自己的基础，取得人民支持的强大的共产党，这些都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不具备的，他们依靠苏联军队才取得政权。在中国，是共产党自己取得政权的，这是它能够保持自信与安全感，能够面对苏联官僚主义统治而保卫中国经济发展的民族利益的主要基础。这就使得革命的民族意识得以发展。然而这个发展是薄弱的，这就说明这个发展为什么是如此曲折、困难和缓慢，也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中为什么充满了混乱和矛盾的成分。

殖民地革命、工人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欧洲群众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的一个真正的发展），新的工人国家（朝鲜、越南和不久以前的老挝和缅甸）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亚洲的影响，古巴工人国家的建立，这些都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比对苏联官僚主义有利得多的世界历史基础。这使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一定的安全感、更大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殖民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工人国家在经济上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始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开始就理论问题写文章，虽然都还是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

“百花齐放”的口号并不是在一个随便的时刻提出的，它是在中国经济上升、加强的情况下，在殖民地革命发展历史性地显示出来的时机提出的。中国具备比较坚实稳固的历史基础，足以面对苏联官僚主义，因此敢于投入理论领域之中，虽然有局限性，但是肯定的。他们没有方向。他们以正确的方式前进到一定程度。因此，他们后来又在“百花”的立场上后退了。这个立场保护各种倾向（特别是在艺术中）存在的权利，这也是以间接的方式容

許討論，然而不是讓資產階級分子進行討論，可不是讓工人和托洛茨基主義者進行討論。“百花”這個立場是中國領導影響和爭取資產階級分子這個夢想的結果。中國人的觀點曾經是——現在也還留有痕迹——認為可以影響和爭取落後國家中的資產階級。他們認為資產階級上了當，很快就會認識到它不可能在資本主義中得到發展，同時認為，由於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說，畢竟並沒有腐朽，因此可以相信社會主義的好處。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機會主義的幻想，更糟的是，這是一個妥協。

但是殖民地革命的進展給了中國人巨大的信心和巨大的安全感，因此也使他們下定更大的決心來提高自己的政治認識，對理論問題進行更多的思考。然而他們的態度還是很有局限性的。

### 中共思想意識的進步

只是從1960年起，他們才決心對有關下列問題的国际和國內政策進行充分的分析。這些問題是：戰爭與革命、和平共處與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分析、共處以及戰爭能否避免、革命的利益、和平共處與避免戰爭的可能性以及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先進或落後）中奪取政權的必要性三者間的協調與配合、在落後國家中為了超越階段而達到先進國家的發展水平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

就在一年半或兩年以前，中國人還沒有能討論、闡述這些問題，還沒有能寫出文章來。最近，在三個月以前，具體說來是從今年3月起，他們公開走上了國際舞台來和蘇聯人討論這個歷史階段中的各項主要問題，其中有戰爭與革命問題、國家性質、奪取政權的必要性、黨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的必要性、共處與革命之間的對抗性矛盾、避免戰爭而不是阻止革命的可能性。在他們看來，在

支持和平共处和支持夺取政权的斗争之間并没有矛盾（我們知道其中有绝对的矛盾和对抗）。

在不到六个月以前，中国人才采取这些立场。他们得出这些结论这个事实，并不表示中国工人国家的经济有了发展，也不表示中国群众有了政治生活。在中国跟在苏联一样，群众没有可能去讨论和解决政治问题。他们并不参与中国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制订。他们并不参与经济计划的拟制。他们没有决定权，没有监督权，没有参政权。决定经济进程，甚至决定分配的都不是他们。一切都在国家机构手里。群众只是有限制地参加在官僚主义控制下的工会集会。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有这样一种态度呢？

如果说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结果、延长和继续，那么怎样来解释在国内不容许群众有政治生活，不容许有革命政党存在的中国人，在国际范围内却提出有必要在全世界夺取政权、提出要夺取政权就必须有共产党呢？是什么样的纽结把这个对外政策跟与之对立的对内政策联系起来呢？是哪一个纽结把它们联系起来呢？又是什么矛盾把它们分离开的呢？

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展开对陶里亚蒂和其他共产党的论战（这是同赫鲁晓夫进行直接论争的一种方式），提出可能防止战争而不可能阻止在任何国家中夺取政权呢？为什么他们宣称国家与国家之間有可能和平共处而阶级与阶级之間不可能和平共处呢？在中国人的提法当中存在着对立，存在着矛盾。如果国家之間、不同制度之間可以和平共处，那么阶级之間也就可以和平共处，因为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代表着工人阶级和新社会制度的世界利益。因此，如果说世界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共处直到历史通过经济竞赛作出是谁合理的裁决时为止，那么在国内也就应该如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

中国人提出了所有那些提法。可是中国人的这些提法并没有任何经济方面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原因。在不到几个月当中，中国人方面出现了一个突然的改变，一个跳跃。从去年12月起，說得更具体些，是从今年2、3月間起，中国人公开投身对苏共、对全世界各共产党的批評，而以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作为替罪的羔羊——倒是选得挺不错的。通过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他們批評苏联官僚主义的全部政策。

中国人对陶里亚蒂和多列士的批評如下：“我們同意和平共处；我們是和平共处的捍卫者。和平共处是我們最早提出来的。我們同意有可能防止战争爆发；我們是这个論点的捍卫者。不过……和平共处是一回事，防止战争是一回事，阶级間的共处又是一回事。当我们主張把帝国主义的手脚捆绑起来阻止它发动战争的时候，我們同时也对殖民地人民說要夺取政权。如果帝国主义以战争来与群众夺取政权的斗争相对抗的話，我們說工人国家的責任就是要支持殖民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那是帝国主义的死亡，而不是人类的死亡。”这是一个从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观点出发而得出的革命性的結論。矛盾不是从中国领导的保守利益，而是从他們的理論混淆中产生的。它是从中国共产党机构思想水平发展的不足，是从中国群众政治水平发展的不足产生的。

相反，苏联官僚主义试图进行的妥协則是由它的官僚主义的保守利益产生的。这表现在它的政策当中，特别是表现在它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当中。苏联官僚主义分子声称有可能防止战争。而为了防止战争，只要执行不导致战争的政策就行了。因此，在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暴力的方式夺取政权；应该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因此必須制訂一个一百年、二百年或者三百年的和平綱領——官僚主义以为它可以活这么久！进行日常的工作，证明社会主义在

經濟上合理、正在超过資本主义，这样，全世界群众就将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看到資本主义同他們背道而馳，他們就会一致奔向社会主义。

苏联官僚主义統治杜撰出这一套空中楼阁，目的在于证明它本身存在的合理。然而根本矛盾在这里：中国人說：“共处是可能的，不过必須夺取政权；如果战争来了，就让它来吧！”这样在中国的立場和苏联的立場之間就存在着对立。中国人是以对資本主义体系和阶级关系所进行的机会主义和調和主义的分析，以及改良主义的观点作为出发点的。不过他們得出了革命性的結論。應該清楚認識中国人的这个观点。这并不是他們在四年前、三年前、甚至两年前的立場。这是中国人去年 12 月以后的立場，或者說得更具体些（把今年 3 月作为一个分界綫），这是他們在发表反陶里亚蒂的第二篇文件《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以后的立場。

中国人对陶里亚蒂說：“你們說，在意大利有必要进行結構改革以发展經濟和意大利的世界貿易，使意大利的人民群众从中得到好处。然而这正是对意大利帝国主义有利的东西，因为意大利貿易和經濟的发展并不对工人有利，而是对帝国主义有利。人民群众从中得到的只是更严重的剝削，只是有利于意大利資本主义的战争准备；意大利帝国主义这么說，陶里亚蒂同志也这么說，因此，陶里亚蒂同志是代表意大利帝国主义說話。”这还是中国人对陶里亚蒂說的最客气、最友好的一句話。在其他部分，他們把他称之为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人：“这帮助帝国主义来反对我們，反对意大利人民群众”，而中国人支持在意大利的革命。

中国人方面的这一改变并不取决于国内政治生活，因为中国沒有政治生活。讓我們看看他們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各项文件，看看他們接待的訪問者，看看他們和外国元首、国王、亲王、公主們进

行的会談吧。他們和所有的人都进行討論。可是工厂里的工人却沒有任何討論政治的集会；中国共产党沒有任何討論大会，沒有任何政治活动是群众所能参加的。一切決議都来自机构。中国人的这个态度是从何而来的呢？相反，又是什么东西导致他們作出正确的推論，得出正确的結論的呢？这是世界殖民地革命，是中国革命进展的直接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压力。然而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認識的基础是什么呢？是第四国际給了他們直接的影响。是我們部分地影响了中国人，为他們提供了論据，提供了坚实的理論。

中国人說，列宁說过“爭取和平是我們的政策”这样的話，以此来证明战争可以避免。中国人之所以为斯大林欢呼，并不是因为他們相信他。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他們这是在向苏联的斯大林分子伸出手去，跟他們結成反赫魯曉夫的同盟。他們认为这是跟对資产階級分子說：“讓他們到我們政府里来吧，我們會教育他們的”如出一轍的一种外交手腕。正是这样一种对党群关系和对群众缺乏信心的机会主义态度，使他們依靠党机构的力量，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依靠世界殖民地革命。

中国人說，列宁說过“爭取和平是我們的根本政策”这样的話。列宁在什么地方說过这句话？列宁是个实事求是的、懂得辯证法的革命家。当除了和平以外別无出路的时候，列宁曾經說过：“和平是我們的政策”；可是他补充道：“我們現在不能进行战争，因为我們沒有进行战争的力量。工人国家精疲力竭，世界革命中止了。他們比我們力量强大；战争對我們不合宜；爭取和平吧。”所以列宁，作为好的革命家，說道：“帝国主义者先生們，我們要和平”，这正如工人們在罢工中看到不宜于繼續罢工，而不如保存力量的时候，对老板說：“咱們談判吧”一样。列宁既不是机会主义者，也不

是妥协主义者。他是一个懂得辩证法的革命家，他懂得当时应该继续革命，加强工人国家。所以列宁提出：“我们讲和平吧，可是我们同时要准备革命，因为我们的和平是肩上扛着枪的和平，同时由于我们此刻还不能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进攻，我们的和平也是进行革命和发展世界革命的号召。”

当中国人说列宁说过“我们的政策就是和平”这样的话，当他们说列宁说过“苏联的根本政策就是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处”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跟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一样，也在欺骗读者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列宁曾经说过这些话——托洛茨基也说过——，可是他在说这些话以前先说过：“和平对我们是合宜的”这样一句话。由于当时不可能扩展革命，由于当时除了被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以外没有别的解决办法，由于必须跟资本主义世界做买卖，实在必须共处。所以，他寻找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利用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的方式，以制订一个依靠某些资本家来反对别的资本家的革命外交政策。无论从商业、外交和政治各观点来看，这都是完全许可的，只要能加强和发展工人国家和世界革命。这就是列宁。

赫鲁晓夫说列宁说过“我们的政策就是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这样的话；中国人也说列宁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手上的列宁的文章跟我们手上的列宁的文章是一样的。他们所以挑出那几句话，是为了免得同他们在苏联的同盟者斯大林分子进行斗争。此外，这也是由于他们自己政治上的混乱和他们的机会主义，因为如果他们得出列宁的全部结论，那么他们关于战争可以避免和关于和平共处的提法就要改变。在他们那里，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他们的提法是模棱两可的，另一方面他们的结论又是正确的。在估价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和这个正确的结论时，应该看到，占优势的部分，决定中国人的路线的部分不是那个模棱两可的部分，而是那个



正确的部分：那就是必須在全世界夺取政权。他們对夺取政权的方式并没有明确的意識；他們并不是有意識地組織和促进夺取政权的斗争，他們也不倡导这种斗争，但是他們支持这种斗争。他們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只能是因为他們是世界殖民地革命过程和不断革命过程的这样一种傳声筒，他們对全局缺乏認識，只是对部分有所認識。中国人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进行像他們正在对苏联官僚主义和被莫斯科收买的各共产党展开的这样的公开斗争，那是因為他們在中国内部感觉到革命进展的巨大压力。因此，是在中国，表现出不断革命进展的一个主要方面。

### 同苏共的分歧只能向前发展下去

他們反对苏联官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深刻的，从历史上說是只能向前发展下去而无法后退的。他們就要去跟苏联人討論，可是并不是向他們伸出手去达成協議。他們信賴的不是談判能得出結論这样的希望，而是他們发表的各项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他們提出了跟苏联人不可調和的分歧。分歧具有根本的性质。跟我們一样，中国人得出的結論是：必須进行革命，必須建立政党来夺取政权，国家不能逐漸轉变而必須把它推翻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必須有共产党来組織阶级去夺取政权而不是去实行改革或是实行向资本主义(原文如此，当是“社会主义”之誤——譯者)逐步的轉变。从而他們得出結論：如果夺取政权意味着战争，那就让战争来吧；那将是资本主义的終結而不是世界的終結。他們又說：“人类是不会毀灭的。”他們完整地引用了我們文件当中的一句话：“现阶段决定历史的不是武器，而是群众。”古巴人对我們說：“啊！你們多么強調群众啊！”中国人跟我們一样，強調群众，把他們看成是决定历史过程的因素。中国人說：“正如馬克思、恩格斯

和列宁所說的那樣（托洛茨基和我們也這樣說），決定歷史進程的不是武器，而是群眾的革命意志；群眾的革命意志是締造歷史的最強大的武器。”群眾是不能毀滅的。原子戰爭將使人類遭到一次很大的蹂躪，但是它不能把人類消滅。它將消滅的是資本主義，因為戰爭一打起來，馬上就發生革命。這是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結論，我們的提法。當中國人談到意大利人的時候，他們用我們的方法，按照我們的方向來批評他們。波薩達斯關於意大利和法蘭西的兩篇文章對陶里亞蒂的政策作了一番描述。他闡明了陶里亞蒂機會主義的國家改革政策，因為在意大利並沒有一個足以包括群眾在內的經濟發展政策，因為意大利帝國主義在任何時刻都不會接受共產黨參預或者參加政府，因為意大利資產階級政策不是由意大利本國的經濟決定的，而是由參加世界帝國主義經濟、插手於最後分贓的准备工作做得怎樣決定的。陶里亞蒂之所以是機會主義，那是因為國家不會逐步轉化。必須把它推翻，來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必須以無產階級革命來建立政權。中國人對陶里亞蒂作了完全相同的批評；他們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話來補充他們的論證。雖然如此，他們還是說了相當多的優話。他們在引文中刪去幾行，從而歪曲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話。不過，總的說來，他們的批評是正確的，因為他們作了一番揭示特征的工作，作出了大體正確的結論。在意大利和在整個歐洲，跟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一樣，都必須奪取政權。

中國人依靠我們的文獻，依靠我們的論據，在同蘇聯人的論戰中支持革命的政策。當他們在這些文件的幫助下準備同蘇聯人進行討論的時候，並不像他們胡說的那樣是因為他們希望達成可以消除公開論爭的妥協或協議。推動中國人往前走的並不是毛澤東的意願，而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這個客觀需要要求中國人

的政策有所改变。而中国人之所以成为这样一种形势的傳声筒和代言人，那是因为殖民地革命和无产階級革命正在以巨大的步伐向前迈进。

中国人不怕原子战争。他們明确地这样說。他們說，原子战争是可怕的，但是它不会把人类消灭，它将消灭的只是資本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中国人和苏联官僚主义分子爭論的現阶段就是这样。在他們的演变过程中，中国人越来越接近第四国际的結論，越来越接近第四国际的政策。但这既不一貫也不自觉。他們是机会主义者，是妥协主义者。在他們的政策中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他們估計形势和估計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間的关系的方式，同他們的革命結論是无法調和的。两者之間是哪一个将取胜呢？一切都引导中国人得出必須清除資本主义，必須夺取政权这个結論。

在无产階級国际主义这个問題上，中国人也朝着我們的路綫前进。他們认为帝国主义毫无疑问是要准备战争的，但是“我們能够防止战争爆发。”可是当一个殖民地国家进行爭取政权的斗争时，“我們必須全力予以支持，而且以包括武器金錢在內的一切东西支持他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义务。”如果这种国际主义的支援性的干預引起帝国主义方面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将死亡。中国人得出的正是我們的結論。我們應該考虑到，中国人是亚洲一半土地的主人，全世界共产党有一半支持他們。他們对赫魯曉夫执行的就是这个政策，而他們并不想从苏联官僚主义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因为他們是世界不断革命这个高漲过程的間接的傳声筒。目前的形势就是如此。

如果說中国人繼續保持——在一个时期內他們是会这样做的——論证和結論間的这种混乱和矛盾，那么决定他們的政策而

且正在占据优势的是革命性結論这一方面。这也不是自觉的。他們缺乏一个綱領性的、意識形态的明确观点。不过，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无疑将发现他們为客观形势所迫，不得不协调他們的政策。要末就是由可能共处这个估計来决定总路綫，从而使他們的政策和行动从屬于共处；要末就是作出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政权这个結論，从而使共处政策从屬于夺取政权的必要。

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和发展，現在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今后适应世界革命的力量、进展和高漲而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現阶段革命斗争的本质。

第四国际将在这个斗争中得到发展，正如它現在在阿根廷的庇隆問題上得到发展，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危机中由于帮助中国人的革命傾向的发展而自己得到发展一样。第四国际将一直发展下去，直到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共产国际。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前途。現在，在被中国人采納的立場方面，第四国际正在恢复它的全部力量，恢复它的全部影响。

这不是一个短暫的过程，也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然而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中国人不能后退。他們并不是为了从中取利才采取譴責赫魯曉夫的政策。他們不得不采取这个由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客观地强制要求他們采取的立場，这就表明，在中国内部，現在出現一个政治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表現出来，或者說，只是通过这个綱領的提出間接地表現了出来。中国革命的現阶段就是这样。苏联官僚主义试图自卫。他們把菲德尔·卡斯特罗找到苏联去，把他留了一个多月，以便弄出这个有利于苏联官僚主义而不利于中国人的声明。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了自卫，至少是部分地进行了自卫。当他在苏联的时候，他没有发表任何支持赫魯曉夫，反对中国的声明。他和苏联人的

最后協議显然包括着他對蘇聯人所作的讓步，不過這些讓步和他早已在第二個哈瓦那宣言中；一般地說，也是和他在以前採取的立場中表現出來的觀點並不背道而馳。

蘇聯人輸了，因為他們作了最重要的讓步，那就是承認應該由每一個國家來決定它的政治發展路綫，這種提法損害了蘇聯人的基本政治路綫——共處。

顯然，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混亂，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使他也成為一個機會主義者。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態度，他在跟蘇聯人的協議上的簽字，和他在婦女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演說中採取的立場比起來，是后退了一大步。那篇演說中提出的立場是他到那時為止所提出的最高度的立場。不過菲德爾·卡斯特羅成了赫魯曉夫反對中國人的一張王牌，這一事實並不顯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價值和力量，也不顯示他的價值和能力，而是顯示古巴革命巨大的歷史影響。而古巴革命之所以有這樣的影響和力量，既不是因為古巴的經濟超出了蘇聯，也不是因為它的經濟力量構成一個堅強的堡壘，而是因為它的社會重要性對整個共產主義世界具有巨大的影響。赫魯曉夫把菲德爾·卡斯特羅找去，並不是為了讓卡斯特羅露臉，而是為了表示“古巴革命和我們在一起”，為了在蘇聯和全世界共產黨群眾面前顯示一下赫魯曉夫自己，表示他跟革命在一起，沒有背叛革命。

他就好像一個小偷一樣，一只手拿着一張證明他是好人的身份證，另一只手卻準備去偷東西。赫魯曉夫以為可以贏這一着。正如所有官僚主義者以為機構是個決定因素一樣，他以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旅行是個決定因素。事實上，赫魯曉夫只能從中取得部分的好處。可是，單是他必須依靠菲德爾·卡斯特羅這一事實就表明了赫魯曉夫的嚴重弱點；否則，他就不会依賴卡斯特羅。全

世界、苏联本国和各国共产党的广大群众看到了他的弱点。

赫魯曉夫为什么沒有利用捷克？他为什么沒有利用南斯拉夫，把铁托找到苏联去，說：“看哪，看哪，南斯拉夫人和我們在一起！”？他如果这样做，群众就会对赫魯曉夫說：“你这是开玩笑！”相反，他把作为革命的保证的古巴抬出来，把菲德尔·卡斯特罗找了去。

古巴是个在世界經濟上毫无重要地位的国家，而赫魯曉夫需要它，因为他正处在一个很危險的地位，即使表面上看不出来。

不能希望7月5日的中苏会談会得出什么肯定的結果。这不过是一个阶段，而不是别的什么。不管他們将达成怎样的妥协，总是不稳定的妥协。沒有任何历史基础使他們能达成稳定的妥协，因为殖民地革命的压力和繼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以及工人国家的发展不許可作出任何稳定的官僚行政的協議。革命超出一切協議之上。因此，應該把将于7月5日举行的会談和協議，看成是今后更激烈更严重的斗争的序幕阶段，这些斗争今后将在世界范圍內决定“政治革命”的进程。

## 五、中国革命的成熟, 政治 革命的新阶段

——J. 波薩达斯

在历史現阶段发生的如此具有活力的事件, 是为即将改变以往历史过程的基本决定而准备具体条件的标志和体现, 是这些事件的組成部分。这些表面上看来是粗野的討論, 在現阶段和在历史上曾經发生过的那样, 一般來說, 好像是由于保卫一伙国家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利益而产生的, 現在正在确定人类当前的进程, 并且为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开辟道路。

中苏爭論, 形式上是中苏之間的爭論, 实质上潜在地反映出一种压力, 一种力量。这种压力和力量虽然尚未明确体现出来, 但是它們却間接地表明打倒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残余的世界战略的必要性。

从中苏第一次爭論到目前这一次为止, 发生了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到 1962 年 11 月为止, 爭論还是以一种經驗主义的、含混不清的、绝对抽象的方式在談論斯大林和保护斯大林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人当时談到斯大林的性格和他的政策。他們并未明确說明現在和将来应该执行的政策。

从 11—12 月到現在, 中国人发表了一些文件, 他們在文件中提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 以及今天生动的历史經驗。为了继承这种經驗, 他們也提到第四国际的結論、分析和計劃。他們不再热衷于遵守斯大林在这个或那个問題上的立場。他們也不再热衷

于探討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是不是一个左傾冒險主义者，或斯大林在鎮压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方面是不是做对了。在目前的爭論中，中国人說到我們这个社会——当今世界——的最近的将来。这一切都暗含在实质性的討論之中。中国人还含含糊糊地、不連貫地、沒有条理地，然而在思想、理論、政治和綱領方面水平日益提高地談到历史現阶段为寻求合适有利的出路所必需的一切。他們談到应执行的政策，談到如何解釋和面对当前的历史，如何解釋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共处与战争、共处与革命等問題。

看起来，毛澤东和赫魯曉夫之間的爭論，好像是官僚主义和行政两类傾向之間的爭論。实际上，它却間接地反映和表明确定人类未来下一阶段斗争的最重要的內容。在現阶段的中苏爭論中，有关世界大战、局部战争或原子战争的爭論并不具有重大的意义。爭論既不是由中国人也不是由赫魯曉夫主动提出的。从历史上来看，爭論是由第四国际，由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的。中国人参加了爭論，并把爭論当作他們自己的事。然而，應該指出，中国人在去年11月保护过斯大林。他們抓住斯大林，他們抓住斯大林不放。此外，他們还把阿尔巴尼亚人当作受迫害和受誹謗的人加以保护。他們当时并未采取反对赫魯曉夫的政治立場。他們以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为依据，并給以抽象的解釋。今天，他們仍然以宣言和声明为依据，但是他們却給之以革命的解釋。宣言和声明和过去一样，沒有改变；改变了的是中国人。中国人本来在四五年以前就可以这样做的。从那时起到現在为止的这一阶段里，中国人之所以改变了立場，那是由于他們自己主动进行学习、写作并且成熟起来。从1957年到現在，中国人方面沒有任何政治著作，沒有任何政治工作，沒有任何对于当前局势的分析可以表明在政治上准备对他們得出的結論提出置疑。今天，中国人从1957年含混



不清、极端含混不清的立場出发——这种立場在爭論的某些阶段是毫无政治內容的，而且在思想意識方面是妥协性的——，得出了一些大体說来是革命的結論。

### 中国同志們的理論基础

中国人的态度并不是他們采取主动的結果。中国沒有公众的政治生活，沒有群众的討論会，沒有集会，沒有国际性的討論会，沒有中国的馬克思主义著作。殖民地革命对中国人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使他們面对现实，并且去克服这种障碍。他們的革命要求他們理解它，并且作出答复。中国的革命和其他的殖民地革命影响了中国的領導。但是，对路綫和方法进行討論和作出結論时所依靠的理論根据和理論基础并不是从中国人那里来的。这是中国人从第四国际的文件，特别是从波薩达斯同志的文章中，引伸出来的路綫、准則以及作出解釋和結論的方式。去年，我們在代表大会召开前所写的关于意大利共产党的文章中，分析了意大利共产党的綱領。我們也分析了反映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和苏联官僚主义所奉行的妥协的、改良主义的和投降主义的政策的基本点。我們当时指出，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經成熟。我們也得出了这样的結論：为了夺取政权，还缺乏其使命在于把階級組織起来以便夺取政权的具有充分准备的政党。但是，为了夺取政权，領導应当对国家机器以及国家机器不能改造，有着明确的概念。

### 人民陣綫的阶段已經彻底結束

資本主义的机器是不能改造的。在逐渐瓦解和消失的过程中，資本主义机器不会失去資本主义的形式，也不会不經過革命而

为社会主义形式所代替。我們曾經指出这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就这样指出过。历史用每天发生的生动实例明确地表明必須摧毁国家，并且在无产階級执政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我們曾經指出，如果不摧毁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即使实现最大程度的改革，也不能妨碍資本主义制度存在，和繼續存在，也不能阻碍資本主义制度反抗甚至取消已經进行的改革。

在某个特定阶段所必須进行的改革，应当继之以革命。革命不是改革的累积。一千項改革也不等于一次革命。但是，改革却是絕對必要的。群众的成果，在議會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无产階級的成果，它們当前的和历史的直接目标，就是消灭、削弱和粉碎資本主义制度，使工人階級充滿信心和信念。

人民中的被剝削階級——小資产階級和农民——都走向能够领导他們、能够采取必要的形式和措施来改造世界的无产階級。这使得无产階級对自己所进行的事业产生信心。經驗证明，改革是不够的，必須摧毁資本主义制度摧毁資本主义結構、資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和資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以及它賴以生存的其他种种基础：总统和总理，下議員、上議員、警察、士兵、法律以及迫使群众尊重資本主义法律的宪法。必須摧毁这一切，并且代之以反对私有财产的准则和法律，代之以实施和执行这些准则和法律的机构。

这一切我們在分析陶里亚蒂的政策的时候都談到了。我們当时指出，在意大利有可能夺取政权，陶里亚蒂的結構改革只是一种对資本主义的改革，而在資本主义不可能加以实现时、提出并且要求进行这种改革更是一种犯罪行为。

我們当时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出应当夺取政权的結論。我們指出，在意大利的斗争中，資产階級分成了好几派，其中有一派代表新兴的工业，他們的利益和意大利大資本集团有矛盾，并且反对

大資本集團。

因此，這一派資產階級也支持電氣國有化。這種國有化並不是革命的措施，而是資本主義的措施。工業資本家不願意付出電氣設備的全部費用，因此國家就不得不通過向勞動群眾徵稅的方式來支付這筆費用。陶里亞蒂的結構改革意味着對資本主義結構進行一種改革，以便資本主義得以繼續存在下去。多列士也完全是這樣。

我們曾經進行分析，並且指出，不再可能組織新的人民陣綫，這個階段已經結束了。實際上，資產階級的基本策略已經不再是設法同共產黨人達成協議，以便像1936年、1938年和戰前各個階段那樣來利用共產黨人從中漁利。資本主義的基本利益在於為算總賬而作好準備。因此，在意大利的自由民主資產階級和社會黨人同共產黨的全部爭論中，總是提出一個看起來很可笑的問題，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問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共產黨人和南尼口口聲聲說，應當放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天主教民主黨人却加以拒絕，他們說不能放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好，別的什麼組織也好，重要的是，這是資產階級算總賬的一個歐洲的軍事、政治、社會的反革命組織。

這也說明意大利資產階級過去和現在如何利用共產黨人的政策和赫魯曉夫伸出來的手。官僚主義為了向蘇聯軍隊和群眾說明，或企圖向他們說明可以在和平共處的環境中生活，需要和平地發展，需要在歐洲尋求支持以反對中國，這是對資產階級有利的。

資產階級利用一切，但是對於威脅他們的團結和影響他們在社會、政治和軍事方面準備算總賬的信念和信心的一切，即使能在財政、經濟上獲益，他們也不加以利用。資產階級之所以不利用蘇聯人為他們提供的如此有利於鬥爭的時機和形勢，那是因為他們

认为继续生存的基本条件不是经济发展或交换，而是军事上集中准备以便迎接决定性的阶段的到来。

#### 第四国际文件的作用

中国人在做什么？让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全部文件。这些问题在两年前就已经存在，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我们在两年前，随后又在六个月以前的4月会议上，都谈过这些问题，而中国人当时还未述及这些问题。到去年为止，他们还把这些問題攔在一边。为什么现在他们谈论这些问题呢？中国人并未主动采取像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方针。是我们的文件指导了他们，并使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具有信念。我们的世界组织，同共产党，同苏联的官僚机构，同中国人相比较，是要比他们小，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份量，但是它的理解能力，指导能力，决定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在他们之上。因此，在这些争论中，从来没有被引证过的我们的文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要观察一下中国人在争论中采取的路綫，就可以了解第四国际政治方针所起的影响。我们早在两年前向中国人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今天中国人向苏联官僚主义谈到的问题。

我们第四国际看来好像没有参与的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在他们之间进行的。实际上，我们是大力参預的。否则，我们就应该推論出：中国人进行过研究，并且得出他们有理的結論。中国人的确是争论过。但是，为什么不在两年前这样做呢？誰比他们先写文章呢？誰指出了方向呢？是我们。当中国人攻击托洛茨基和抓着斯大林不放的时候，他们表明他们还是机会主义者。但是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当論战是在理論基础上进行时，就思想、綱領和政治立場进行争论和不追随斯大林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高度的进步性。中国人遵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而不提及与馬

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具有同样立场的托洛茨基的名字，但他们却把斯大林撩在一边。

中国人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群众给他们以支持，使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获得的信念。他们是从部分被迫采取这种态度的过程出发的。他们处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的包围之中，苏联官僚主义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不反对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不受骚扰。中国官僚主义看到不可能得到苏联官僚主义的援助。没有援助和在一定程度上上的孤立，使中国官僚主义必不可免地要依靠群众。中国官僚主义终于得出依靠群众的这种结论，因为它同苏联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不一样的。中国官僚主义与苏联官僚主义的根源和利益不一样，他们的目的性也不一样。否则，中国官僚主义就会和苏联官僚主义一样，对群众漠然视之，而苏联官僚主义受到的群众压力要比中国大得多。

当苏联人进入柏林的时候，占领了工厂的工人用红旗来欢迎他们。成千上万的柏林工人多年来忍受了战争和希特勒带来的痛苦之后，遭到了今天向教皇致敬的赫鲁晓夫这个恶棍、这个卑鄙的官僚主义者的屠杀。希特勒好像扼杀了工人们的士气、意志和革命性，然而他们却有力量用红旗来欢迎苏联军队，占领工厂。这种行动只能是自我牺牲和有统一的革命信念的结果。苏联军队像他们在所有欧洲国家里所做所为那样，屠杀了这些工人，消灭了这些工人。

苏联官僚主义当时不得不打击资本主义，因为尽管有些矛盾，这却符合在一个工人国家里享有政权的官僚阶层的利益（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为了自卫，它必须在德国建立另一个工人国家，而不是建立一个阶级性质与它自己不能适应的资本主义国家。

## 中国官僚主义的性质

苏联官僚主义是与中国官僚主义有区别的。中国官僚主义没有保守的利益。它不是产生于热月党的出现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不是产生于领导吞食了革命果实、有利于领导革命的阶层而不利于革命群众的利益的过程。中国官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进行了革命。这个领导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缺乏见解，没有革命的观点，没有政治生命，国家经济落后，对蒋介石以及后来对苏联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巨大要求，中国共产党的软弱，这一切都是目前争论的根源，这种争论已经感觉到缺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方法上是官僚主义的，但是它不像苏联官僚主义那样有着保守的利益。当然，在中国存在着保守阶层，但是它们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否则中国官僚主义就不会有这样的进步。尽管如此，政治革命在中国是必须的。这一点是肯定的。然而这一革命不是非流血不可的。政治革命意味着为了工人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消灭官僚主义的领导。这在中国不必要通过武装起义的途径来实现，然而必须用这种起义来反对苏联官僚主义。中国官僚主义能够在同苏联人争论中采取这样的立场，因为它是从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革命前景出发的。

与此相反，中国官僚主义对于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产生的内部压力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

## 中国人的矛盾和局限性

我们看到的事件，我们参与的世界，是由两个根本因素决定

的，殖民地革命的发展和政治革命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殖民地革命的发展是基本力量，但是有利于殖民地革命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发展，目前应该迈出更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即提出和制订世界革命战略。这样，政治革命将会像今天的殖民地革命那样，成为一个轴心。政治革命已经部分地成为在现阶段已经具有决定意义、而在将来无疑要决定一切的轴心和基本中心。

为了进行比较——而这样比较并不是辩证的，只是为了形象化起见——我们说，像全体拉丁美洲国家加起来所能实现的那样重要的十次殖民地革命，还不能与中国或苏联的政治革命相提并论。在这两个国家的任何一国中（或是在另一个国家中，但是程度要低一些）的政治革命，将不仅意味着全世界革命的进展，而且也意味着爆发世界战争的进展。因此，表面上看来，在两个官僚阶层之间进行的争论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为了继续取得历史性的进展，不仅需要殖民地革命的进展，而且也需要政治革命的进展。过去两年内，中国人逐渐向前迈进，但是在最近六个月内，他们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下一步将具有历史意义，因为他们将组织力量以便在思想和纲领方面适应革命进展的压力。

### 中国人和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

目前中国人向苏联人提出了世界革命战略问题。他们以前什么时候提出过这个问题呢？从来没有提过。而第四国际在一年以前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提出世界革命战略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是在帝国主义所处的形势下产生的。帝国主义自己也不得不制订战略。它的战略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等。帝国主义正在通过这一战略准备反革命的世界大战。无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世界战略。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场合下，在文件中指出这

种必要性。今天，中国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即将策划这种战略。他们只是被迫用这种方式来回答苏联人。同样，他们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谈及斯大林，尽管他们早就不信任他了。

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发展等方面，斯大林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中国人的立场之间都存在着绝对的矛盾。

这种矛盾是全面的，因为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受阶级斗争规律支配的。现在，在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作为历史上敌对阶级之间对抗性的继续和发展的这种对抗性达到了最高点。

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和混乱，并不仅仅是理论上和思想意识上一窍不通和缺乏发展观的结果，事实上特别是由于缺乏和群众相联系的政治生活。

如果中国人有和群众相联系的政治生活，他们就会衡量第四国际的立场的正确性，并且会全盘接受这种立场。但是，目前他们只接受了一部分，只记住了某些方面和某些分析。如果他们愿意全盘接受，他们早就会和我们组成统一战线了。

中国人并不信任斯大林，但是他们对群众的革命发展也缺乏真正的信心。他们之所以谈起斯大林，那是为了得以依靠苏联国内反对赫鲁晓夫的阶层。中国人的机会主义使他们在在这方面采取了罪恶的立场。我们坦率地对中国同志说，依靠苏联的右派——斯大林主义分子——是犯罪的行为。我们并不是根据是否反对赫鲁晓夫，而是根据其纲领性的、政治性的内容本身来衡量一种斗争、纲领、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此外，阶级斗争的不容违反的原则之一，它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绝对不应该联合右派来反对中间派或



左派。絕對不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被迫利用右派，這是一回事，而聯合右派又是一回事，兩者迥然不同。舉一個明顯的例子來說，右派因為政府通過一項有關新聞的法令，限制甚至禁止他們從事新聞業務，而向政府提出抗議。我們並不因此而聯合右派去反對這項法令。我們既打擊這項法令，也打擊右派。右派永遠也不會有任何進步的表現，不像中間派有時在革命鬥爭中會以特定的形式表現出一些進步性。中國人以斯大林主義為依據是由於理論上極端保守和混亂所致，是由於機會主義所致。他們試圖聯合反對赫魯曉夫的各种派別、傾向和成分，以便進行反赫鬥爭。他們認為是可以這樣做的。這是一種錯誤。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全部歷史上，列寧和托洛茨基一向譴責任何聯合右派以反對中間派或左派的行為。這樣做不會有任何好處，絕對不會有任何好處，托洛茨基在反對右派的鬥爭中，和布哈林—季諾維也夫聯合起來，或者更確切地說，同意和他們聯合，但是他從來沒有聯合右派來反對中間派。

這就是鬥爭的基本原則。中國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還缺乏堅定剛毅的決心，但是他們在前進，儘管這種進步還缺乏理論上和政治上的信念，缺乏在這種信念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實踐。他們採用經驗主義的方式前進。最近六個月的事態表明，他們再也不可能後退了。如果他們中間有人企圖後退，後悔說“我們走得太遠了”，他也絕對不可能後退。中國人已經走上在很多問題上採取革命立場的道路。他們受到對他們施加壓力的保守階層的阻撓，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後退。中國的群眾，世界上的群眾和共產黨的黨員們，都已經意識到中國領導人的能力，意識到在什麼方面間接地體現出世界不斷革命的成熟。

## 群众决定一切

这表明提出世界革命的战略和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纲领的条件已经成熟。一部分中国人，甚至全体都可能后退，但是他们却不能阻挡自己促进和推动过的进程。

归根到底，各种倾向和集团，当他们不是单纯地代表某些领导集团所提出的过渡性的主张，而是群众思潮的反映时——中国工人国家有七亿人口，他们在阅读，在观察，在学习——，当他们是生根于群众运动之中的思潮，并且代表这种思潮的时候，他们并不表达自己的推理和信念，而是直接地反映历史进程的全部的巨大压力。中国人特别感受到力图前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压力，感受到殖民地世界革命的巨大压力。这种革命还缺乏统一的、协调的、适应规律的、能够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历史压力的领导。这种历史压力间接地表现在中国人身上。因此，他们能够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在既没有编写文件，也没有进行讨论，更没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的情况下，跃进了巨大的一步。在战争、共处、和平和革命等方面，他们从斯大林的观点过渡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中国人最近发表的文章，特别是题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文章，值得阅读和研究。这些文件是不能用别的什么东西代替的。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全部进展，看出他们所达到的水平，和他们对于现阶段的革命的理解；但是，也可以从他们企图解决不可能解决的对抗这一点上看到机会主义的残余。他们把这种对抗叫做矛盾，但是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不同阶级并不是矛盾的相互对立，而是对抗性地相互敌对。中国人谈论矛盾，却得出对抗的结论。他们在理论上的混乱，使他们力图寻求战争不可避免和革命这两种绝对敌对的概念之间的接近和联系。

这是两件根本对立的事。

但是当他們必須在他們自己的两种概念之間，即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共处的可能性同革命的必要性之間作出选择的时候，占上风的是革命的政策，而不是改良妥协的政策。他們的願望是执行革命的政策。他們在最近发表的文件中，在和苏联官僚主义进行的論战中，得出了极其重要的、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結論，他們不可能从这个結論后退。

他們基本的路綫是，历史現阶段是群众参与其事的阶段。这是我們一貫的主張。苏联人、古巴人、烏拉圭、阿根廷、巴西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回答我們說，……（此段原文排字有錯誤和遺漏——譯者）那里有托洛茨基主义者，那里就馬上有人称他們为狂热的群众煽动家，并且嘲弄这种观点，我們什么也沒說，我們在等待，同时重申群众决定一切。

中国人也嘲弄过我們。而現在，他們在做些什么呢？他們用什么来反对苏联人呢？他們用下面的論点反对苏联人：說武器决定一切就是說謊，群众决定一切。今天他們所說的，是我們二十八年以来、更具体地說是从上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就这样說的。十八年以前，第四国际就以群众决定一切这样的信心和信念为基础。如果在十八年以前，或者是十年以前，中国人也支持这种观点，那么今天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就不会是第四国际的代表大会，而会是在中国召开的一个新国际的代表大会了。

中国同志們，你們得出这个結論已經太晚了，而且你們还是用經驗主义和含混不清的方式得出这个結論的。中国同志們反对陶里亚蒂并且全力对他进行批評，实际上他們的斗争矛头是針對赫魯曉夫的。这种間接論战的方式表现了缺乏信念，沒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尽管如此，他們却有前进的願望。

陶里亚蒂断言：“武器可以毁灭世界”。中国人反問：“什么世界？”他們接着指出武器不能决定一切，武器可以杀害很大一部分人，但是剩下的人仍将建設共产主义。說武器决定一切就是說謊。决定一切的是群众，因为群众現在和将来都要掌握世界的命运。我們請同志們讀一讀我們的文件，并且和中国同志們的文件比較一下。除了由于标点符号和重音而在表面上有所不同以外，中国人所表达的实际上是我們的全部思想。

他們准确地运用了我們的語言。我們在我們的文件中明确地說明，“原子战争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末日，而意味着資本主义的末日和共产主义在世界範圍內的胜利。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都利用原子战争吓唬和麻痹群众。他們试图用来对付古巴，但是却遭到了失敗。”

群众既沒有被吓倒，也沒有麻痹起来。这不仅是因为他們一无所失，而且还因为他們将贏得很多东西。他們已經在世界上很多地区看到这一点。中国人采用了經驗主义的方式，晚了好几年才走上了我們的立場。如果中国人从我們的出发点出发，采取我們的立場并依据这种立場，我們目前就在莫斯科或者中国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我們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将不以帝国主义会选择什么时机发动原子战争，也不以中苏冲突为基础，而以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計劃化为基础。

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既不是一种灾难，也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中国人負有一部分責任。我們并不指責他們采取了他們今天所采取的立場，但是我們尽力向他們說明历史，以便他們向苏联人加以說明。

中国人談論共处和革命的經驗主义的方式，給他們带来錯誤和局限性。錯誤的出发点和錯誤的思想方式，使他們得出了战争、

共处和革命可以同时并存的錯誤的和不協調的結論。这是不可能的。战争和革命是正在酝酿的、将由群众参与的进程的结果，是危机和政治、社会、经济行动的产物。面对着这种进程的成熟，必须具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否则，我们就会受经验主义和进程本身的支配。中国人的情况正是如此。

中国人认为和平共处是可能实现的，同时他们又相信革命的必要性。他们一方面准备共处，另一方面又准备革命。

这是一种绝对的对立，它表现为一种混乱——表现为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落后，也就是说表现为组织群众方面的落后。不能不顾已经得到证实的经验，也不能不顾已经由历史证明有效的理论概念。敌对制度之间的共处是绝对不可能的。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共处。中国人一方面试图得出革命的结论，另一方面却又指出共处可以在国家之间，而不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阶级之间得到实现。这是很明显的混乱。

工人国家是工人阶级的继续。然而，工人阶级却是资本主义的敌对面。资本主义要依靠私有制，而工人阶级却要集体所有制。什么是工人国家呢？如果不是生产资料的集体组织；不是在从资本主义夺来的土地上确定阶级界限的无产阶级的继续和发展，那又是什么呢？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共处阶段已经结束，而当资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时，和资产阶级的共处丝毫也不是和平的。

在排斥资产阶级时，对抗性就自动增加，而且发展到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关系之中。显然，在资本主义继续统治的国家内，资本主义不得不拼命设法想把这些国家变成保护自身的堡垒，与此同时，必然产生对抗。世界资本主义都想摧毁和它们敌对的制度。怎么能够说共处是可能的呢？它们之所以一直并存到目前，这并不是因为共处是可能的，而是因为力量对比使资本主义不能摧毁工人

国家，同时也因为苏联官僚主义那一伙流氓阻碍工人国家运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去消灭资本主义残余。除此而外，没有别的原因。

## 革命輸出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敌对阶级能够和平共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共处体现为制度与制度之间的明显而全面的对立。列宁在1917年、1919年、1921年和1923年，说到同资本主义共处的必要性时说：“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共处”。但是列宁并不相信共处是适宜的，也不相信同资本主义共处有着实际的可能性；只不过是别无出路。苏联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人国家。这个国家在1917年、1919年和1921年曾经想扩大革命和输出革命。它不仅想尝试，而且还讨论直接和全面干涉波兰和德国。可是由于当时的形势而未行动。

1939年，这个工人国家曾经在军事上向波兰和芬兰输出革命。托洛茨基、中国人和赫鲁晓夫都没有加以谴责。这种革命输出和工人国家的这种扩充，当时是很正确的。不正确的是，当时苏联官僚主义推行的改良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在芬兰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未能在波兰复辟，那是因为占领和战争结合在一起。因此，为了适应这一阶段军事上的需要，必须建立一个中央政权。

为什么中国人今天不谈论这种经验呢？他们说，菲德尔·卡斯特罗也这样说，不应该输出革命。那么，他们谴责了在波兰和芬兰采取的行动吗？他们能不能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者托洛茨基的那篇文章谴责过革命输出呢？没有这样的文章。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革命本身的输出。革命输出可以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通过貿易来輸出。这是最简单、最緩和、痛苦最小的形式。輸出的是工人国家的影响和威信。一个北美工人得到古巴的糖和烟草时，就置身于一个非資本主义国家的产品之前，这个非資本主义国家能够比一个資本主义国家生产得更多更好。这时他就了解到这个国家正在生存，正在組織社会，正在发展。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国家赢得了威信，特别是当他看到資本主义打不倒它的时候。

第二种輸出的形式是政治的。这是一个基本問題。这是輸出革命最好的、最有效的形式，尽管表面上看来，軍事形式似乎是最有效的。从政治观点来看，革命輸出会使国内变成吸引全世界群众的中心。群众看到什么是他們能够全面参与的充分民主。工人国家的群众能够而且应该号召被剝削国家的群众起来夺取政权，并向他們提供全面的支援，那怕因此而放慢自己国家的发展速度。如果古巴群众过去或現在能够干預拉丁美洲，那么他們就应该号召拉丁美洲的群众起来夺取政权，并向他們提供自己所有的一切：武器、金錢、人員，以自己国内充分民主的生活为他們树立榜样，說明是由他們自己决定一切，是由他們自己制定計劃和实施監督，是由他們自己領導和解决一切对内和对外的政治問題。这一切比起派遣一万人到圣多米尼加去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种共产主义榜样将激发拉丁美洲和北美群众行动起来。

这种輸出革命的形式，对帝国主义說来，是最危险的。如果古巴这个工人的国家在十月危机期間，号召拉丁美洲群众起来捍卫它，并且反对撤出苏联火箭，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战争，但是今天就不再有什么資本主义了。而且我們知道，随着時間的推移，資本主义总是要进一步武装自己，如果資本主义丧失了社会和政治力量，那么它就会日益集中軍事和財政力量，从而在战争中可能造成更多的

損失。

第三种革命輸出的形式是軍事干涉。这种形式可以是間接的，即提供武器和金錢，派遣技術人員和志願人員。这种形式也可以是直接的，即工人國家的軍隊和革命的民兵干涉資本主義國家，但是这并不是为了代替这些國家的群眾，而是为了鼓动和激发他們去夺取政权，并且帮助他們消灭資本主義。

如果中國人和蘇聯人十年來一直在發展世界革命，那么資本主義在戰爭中造成的損失將是微不足道的。今天，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儲存了大量的原子武器。特萊舍船(Le threrher)就是一個例證。我們重復一次我們在特萊舍船遇難時說過的活。美國佬正在尋找一種不可摧毀的武器，一種可以達到三百至四百公尺深度的水下武器，这种武器既不能被發現，也不會失去作用，而能在一定時期突然襲擊和摧毀工人國家。這正是美國佬尋求的東西。

### 列寧反對共處

中國人究竟根據什麼，依靠什麼例子來說明國與國之間可以共處呢？他們沒有引證任何事例，也不貿然地孤立地援引所謂有關列寧的事例。但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中，難道有關於這種可能性的事例嗎？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把歷史事實和它們發生時的背景和形勢孤立開來，就不可能在理論上提出起碼的觀點。他們抓來證明可能共處的事例，就是蘇聯和古巴過去和現在同資本主義國家并存的事例。但是，古巴是依靠全世界工人國家的支持。在人們當時談到共處時，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人國家，而其他國家的革命已經遭到失敗。由於俄國革命的擴展沒有成功，蘇聯的首要任務就是生存下去。當時，蘇聯布爾什維克黨曾經討論是繼續我們的實驗，還是為了美好三倍的明天留下歷史性



的經驗，而冒着世界人民群眾眼看我們被消滅的危險在國際上採取行動！布爾什維克黨曾為此而展開討論。

在中蘇目前關於歷史問題的爭論中，絲毫也沒有提高這個例子，然而這個例子却是最清楚的，無可爭論的。

和平共處沒有任何可能性，因為資本主義不能忍受同它敵對的制度的發展。雖然它在某些時候要忍受，這是因為沒有別的方法。它可以暫時接受這種形勢，因為工人國家那方面還沒有力量，還沒有下定決心，也沒有採取主動來發起對資本主義的進攻。在這種情況下，共處是可能的。敵對國家間的和平共處，也可能是在法律和上層建築方面已經組織起來，並且實現了生產資料和交換的集體所有制的工人階級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和平共處。

中國人並非由於缺乏歷史概念而將這些觀點混淆起來，但是從來沒有討論過這些問題。他們現在第一次談到這些問題。對第四國際和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說來，他們已經討論和掌握了這些問題，因此這也就成為我們歷史樂觀主義的基礎。中國人以經驗主義的方式開始進行爭論。如果國家之間可以共處，那麼，在同一個國家里各個階級之間也可能共處。中國人的觀點含混不清，這是由於他們的經驗主義所致，由於他們對群眾，對世界革命，對未臻完善的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和理論上的發展缺乏信心所致。這就是他們觀點含混不清的根源。

由於同樣的原因，中國人依靠斯大林。他們抓住蘇聯國內的某些傾向，以便在反赫鬥爭中擁有一些據點，但是他們採取了行政的、機會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方式。他們採用同樣的方式來攻擊托洛茨基。但是他們究竟對托洛茨基進行什麼樣的攻擊呢？實際上，什麼也沒有。當他們說：“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犯了錯誤，他是一個左傾冒險分子”的時候，他們的確提到過托洛

茨基。但是，这种左傾冒險主义表現在什么地方呢？在这方面，他們只字不提。所謂左傾冒險主义，就是极端左傾，也就是当时人們称之为“极端革命”的政策，这种政策要求人民不顾条件和后果地进行斗争和扩大斗争。这条路綫的拥护者們当时說：“我們是布尔什維克，我們应当投入革命；我們是革命者，我們应当鬧革命。”关于当时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和通过的決議，我們請中国同志和全体共产党人閱讀一下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委员会 1917 年到 1923 年的报告，这些报告已于 1962 年由意大利的里納西塔共产主义书店出版。其中有關於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問題的討論。沒有人把托洛茨基当作土匪、极端左傾分子或叛徒看待。托洛茨基本人也提出退出爭論，因为他的使命已經完成、因为他需要退让。但是，退让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契杰林，托洛茨基正是为此而走开的。托洛茨基当时利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讲台来号召世界革命。德国人自己也声称：“你不是討論和平，而是号召革命”。托洛茨基反駁說：“这是一个涉及标准的問題：你称之为革命，而我称之为和平。”他当时是想爭取時間，而且在上面提到的布尔什維克党內的討論中，他也正是这样提出的。

必須贏得時間，時間，还是時間，以便让群众了解到人們企图通过給工人国家以和平来夺取它的土地，分裂它的人民。托洛茨基所做所为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中国人不仅不願捍卫保守的利益和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而且还极不負責地攻击托洛茨基。

这种态度是完全錯誤的。我們請中国同志参考“中央委员会決議”和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阶段的著作中談到的事例。托洛茨基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发表了“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一书。这是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写的。还有一些写給布尔什維克党中央的信。中国人不能說托洛茨基的

立場在實質上和形式上都是模稜兩可的。托洛茨基談過“既非和平，也非戰爭”。他當時說：我們不能擊退德國的進攻，我們也不能進行革命，那麼我們就應該堅持，以便爭取時間。列寧反駁說：“不，我們應該跟我們唯一的國家在一起。這是可靠的、具體的。歐洲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尚未為奪取政權作好準備。我們就應該捍衛現存的工人國家。”因此，轉向了和平政策。列寧當時說：“我們現在的政策，就是和平。”顯然，由於歐洲革命遭到失敗，當時必須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保衛工人國家。這就是和平。因此，列寧的聲明和布爾什維克黨採取的立場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經濟建設，並同資本主義展開經濟競賽。因此，在最後階段，才是戰爭和革命。今天，我們不能再搞革命。我們現在要退到經濟競賽的領域中去，以便把世界上的群眾吸引到我們這方面來，一直到我們有條件來發動革命。”蘇聯人和中國人都閹割了列寧這些話的內容，並且代之以死條文。當我們讀到他們硬說列寧說過“和平是我們的目標”時，不能不感到憤慨。但是，馬克思最偉大的學生——列寧在1913年的齊美瓦爾得和昆塔爾代表大會上，都主張必須“準備奪取政權，資本家的和平是假和平，這是一天的和平，他們借此來準備新的戰爭。只要階級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這是制定革命綱領的基本常識。蘇聯人，而且還有中國人，他們都同意和平共處的可能性，這是因為從蘇聯人方面說，他們是站在保守利益方面，而從中國人方面說，他們是站在官僚主義的立場上，雖然他們並沒有保守的利益。中國人的觀點是由於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所致，由於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生活所致。

## 爭論无法挽回

我們之所以如此坚持分析中国人的立場，并不是因為我們认为这种立場是最危險的，而是为了帮助中国同志了解。我們也要分析苏联人的立場，因为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間的全部爭論是以經驗主义方式进行的。無論是从自卫的苏联方面看，还是从进攻的中国方面看，既沒有准备，也沒有客观的目的。但是，尽管中国人沒有明确的目标，他們却不得不作出水平越来越高的結論，作出革命的結論。

例如，他們一方面同意可能避免战争，可能和平共处，但是在他們的結論中，却提出絕對不應該篡改各国夺取政权的斗争的綱領。在这两种立場之間存在着对抗。但是，在这两种立場中間，那一种立場占主导地位呢？对中国人來說，主导的是证明：資本主义的改良是不可能的；革命是必需的；應該着手准备；固然战争最終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各国夺取政权的斗争必然会驅使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这也是可能的。

中国人并不把原子战争看成是人类的灾难，而把它看成是大量破坏人类財富的根源。这是毫无疑問的。他們认为战争对資本主义說来将是一场浩劫。他們并不是帝国主义散布恐怖的傳声筒，可是他們沒有綱領。思想意識和政治方面的爭論和結論本来是應該用来进行斗争和制定綱領的。中国人有什么綱領呢？現在还没有。在他們最近一次跟苏联人的爭論中，他們试图在《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中制定一个綱領。他們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证明近几年来历史进程是一連串的战斗和革命。他們用一系列的事例和事实证明階級之間的共处是不可能的，并

且引证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来指出革命的必要性。

中国人不仅准备在世界范围内同苏联人争夺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的范围。他们还为世界范围内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发展的下一阶段、为推进世界革命而进行准备。从他们那方面来说，这并不是有意识的，也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被推向这个方面。他们不能先就这一切进行争论，然后又放弃这一切。他们不能把他们的立场当儿戏。纲领决不是四五个人争论的结果，而是世界殖民地不断革命的结果。中国人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而停顿不前。事实表明，这场争论是在殖民地革命不断进展，工人国家的发展和政治革命进展的历史形势下进行的。中国人对多列士和陶里亚蒂的批评，除了他们企图消除存在于战争的可能性，革命与和平共处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之外，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两种历史观之间必然有一种要胜利。中国人的观点是主张殖民地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而主张通过暴力摧毁资本主义。

目前这场争论不是像柏林代表大会那样以官僚主义方式进行的争论。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人对于可能同苏联达成协议这个问题，还抱有許多幻想。在那次代表大会以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当时作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思潮，无论是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投降主义分子，无论是苏联人，也无论是中国人，都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对那次代表大会作出真正的结论。我们把那次代表大会看成是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起点和开端。六个月已经过去，那次代表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已经得到证明。因此，历史上升的进程已经间接地、然而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由于缺乏布尔什维克政党和为群众而生存的政治组织，这种上升的进程不可能有直接的体现。

## 政治革命的進展

如果群众今天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那么就不会有中苏之間的爭論。群众会把苏联的領導和中国領導的一半成員赶下台，以便直接取得自己所願意取得的一切。我們并不把群众理想化。当我们談到群众的时候，我們并没有假設有一大群富有注意力的人，他們发表自己的意見，同时也提出理論观点。重要的是群众的意志与官僚主义相反，群众要求打倒資本主义。尽管会有原子战争，群众还是要推进革命。而官僚主义却不願推进革命。群众要实现一系列的国有化和集体化，那怕为此受冻挨餓也在所不惜。官僚主义却不同意这样做。在害怕战争的外衣下，官僚主义掩盖了它們維護本身的保守利益和反对群众的实质。今天，群众在一天之內就能懂得过去需要二十年才能懂得的东西。例如在古巴，群众自己行动起来，游行示威，集会反对撤走火箭。等我們知道已經有点晚了。消息是我們的一个支部向我們提供的，尽管遭到破坏和鎮压，这个支部仍然在工作。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苏联之行，有人在街上听說：“赫魯曉夫完蛋了，他不得不把菲德尔召去”。这就是古巴的評論；在这个問題上，不應該有錯誤的看法。

我們之所以十分重視中苏爭論，这是因为殖民地革命的全部进程必須和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的进程互相配合。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間的爭論标志着新的历史阶段。这已經不再是过去那样的爭論了。莫斯科会晤推迟了两个月，这說明双方都在准备，說明这次会晤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驟。

苏联官僚主义設法同中国人談判，并向他們建議背着世界其他工人国家达成一項協議。赫魯曉夫不是在一次演說中說过：“讓我們达成協議，不要管別人吧！”这句话嗎？中国人拒絕了，但是我

們不知道中国的拒絕意味着他們走到了那一步。

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有着自觉的馬克思主义立場的自觉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它的怀疑、犹豫和經驗主义会使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同意与苏联官僚主义休战或达成協議。

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用十二种文字发表了他們的文章，相当直接地攻击了苏联官僚主义，把陶里亚蒂和多列士称为孬种，向烏拉圭、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共产党宣战。他們在这些国家直接設立了发售文件的中心，这并不是因為他們不相信苏亚雷斯和阿里斯門迪会保证他們的文件的发售，而是因为已經宣战。中国人在烏拉圭周刊“前进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意味着对官僚主义和共产党作战。現在可以想像，如果他們在意大利設立一个发行中心，任何人都能买到他們的出版物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智利，他們已經設立了自己的“斯巴达克出版公司”办事处。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也有一个地下办事处。在意大利和法国，他們也有自己的发行員。采取这样的行动，說明中国人不准备和苏联人和解。他們准备进行彻底的斗争，即使他們自己并不自觉地想这样做。有了这样漂亮的出版物，他們并不想在基本問題上往前跳几米，而想大大跃进一步。他們已經用自己的方式根据他們的經驗主义和目前对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爭論达到了最高点。

最近发表的題为《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的文件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中国人力图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分析，反駁苏联的投降主义和妥协改良的立場。中国人沒有指名攻击“苏联官僚主义”，而是順便用“別的人”、“某些人”等詞来影射苏联官僚主义。但是，他們却指名攻击陶里亚蒂！看来陶里亚蒂要說：“为什么单单攻击我呢？”中国人也攻击了多列士。應該記得，中国人把多列士看成孬种、叛徒。如果中国人不想走得更远，他們就不会这样

对待这些人了。我們认为，說中国人打算走得更远，这并不是出于他們的本願。他們只是反映了威力要强大得多的进程。如果他們明确知道自己的願望，如果他們有着明确而坚定的目标，中国就会成为游行示威和集会的場所，成为群众进行热烈全面的政治討論的場所。目前在中国沒有进行討論。虽然他們的文章通过电台和出版得到了傳播，但是沒有任何的政治生活。否則，中共領導就会向苏联群众說，有一百万工人，几百万人在討論这些文件，你們也应该进行討論。但是中国人沒有这样做，他們指責苏联人不发表他們的文件，并且說苏联的文件已在中国发表。这种形式上的克制不仅反映出苏联人缺乏信心，而且也反映出中国人同样缺乏信心。但是，中国人的缺乏信心却由于他們在出版了的文件中在政治上表現出来的决心和理解力而暂时得到弥补。在这些方面，后退一步都是不可能的。

## 革命、夺取政权和先发制人的战争

中国人迫使苏联人部分地退到他們的妥协立場，但是無論是在目标方面，还是在实质上，苏联人都沒有改变立場。波諾馬廖夫曾經想答复中国人，但是发表的文件是一篇僵硬不化的文章，他閹割了我們大师的真正思想。例如，他引证列宁的著作时，只引用几个字，他写道：“正如列宁所說的：‘我們为和平而斗争’。”当然，列宁說过几百次：“我們为和平而斗争”，特别是在他乘坐有名的装甲列車回国的時候。当然，列宁也說过：“共处是必要的”，但是苏联人沒有說明这些引言是从那篇文章里摘出来的，引言与上下文关系如何，文章的結論又是如何。列宁是否认为什么时候都可能实现共处呢？列宁具体地談过某一时期的共处嗎？和平对列宁來說



意味着什么呢？中国人沒研究过这些問題，因此在这方面沒发表任何文章。对列宁来說，和平是每个人为了击毙資產階級，为了夺取政权而肩荷着的步枪。这就是列宁所理解的和平，这就是組織斗争夺取政权。

硬說可能出現“和平状态”，就是說謊。当階級关系还不許可就夺取政权作出决定时，會出現一种过渡状态。伴随着这种过渡状态的是战争、革命、罢工等等。决不是什么“和平状态”。苏联官僚主义不顾这一切，硬說列宁认为可能“为和平斗争”。巴布洛和杰尔曼之流的叛徒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場，他們說，“无产階級最重要的任务是防止原子战争和爭取帝国主义裁軍而斗争”。他們給无产階級規定了多么美妙的任务啊！他們从这样的立場出发，攻击中国人陷入了“极端主义”和“扩大狂”的錯誤。

中国人声明：“我們不主張單純的裁軍，我們主張落后人民拿起武器。”如果有可能在全世界实现裁軍，那么就不会有革命了，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大多数人的問題。既然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不可能裁軍，那么认为可能裁軍的看法就是一种幻想。当中国人談到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时，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正义战争不仅是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国家的战争，不仅是无产階級反对資產階級的战争，而且也是工人国家反对資本主义国家的战争。此外，中国人在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一問題上却后退了，他們不再談論这一点。我們认为，根据我們的观点，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永远是有效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并不意味着我們明天就向資本主义国家宣战。如果我們认为这将使人类免遭損失和牺牲，我們就这样主張。但是我們并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至少在今天来說，不是最好的方式。先发制人的战争意味着号召群众夺取政权，支持他們，向他們提供武器以及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例如，应当向古巴提供武器以

及鼓动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以便古巴人民得以通过自己的革命生活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作用，吸引群众的注意。工人国家应当发出号召。这一切我们是同意的。这就是先发制人的战争，因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是要发动战争，这也将是资本主义的消灭。

实际上，工人国家在为实现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计划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出号召而采取的行动中，就以一种最完善和最高级的形式准备着先发制人的战争，以便减少人类的痛苦。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群众，将会理解这种行动将如何减少80%的战争苦难。为了采取这种行动，工人国家需要有愿意这样做的革命领导。为什么中国人在去年秋天侵入印度北部以摆脱帝国主义的压力时，没有像苏联人在1917年对德国和波兰那样发出号召：“占领土地吧！我们支持你们”？这就是先发制人的战争，革命的战略。相反，中国人占领了土地，前进了40公里，然后又把这些土地交还给尼赫鲁。这是一种妥协的政策。

### 中国人在反对尼赫鲁斗争中的不彻底性

中国人的机会主义和革命结论并存。他们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行为，在他们最近反对印度官僚主义的军事斗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当时可以放手地号召印度群众起义和夺取土地。在同尼赫鲁的资本主义军队进行的军事斗争中，中国军队的义务，它在军事、社会和革命方面的需要，就是号召印度群众夺取土地和剥夺大地主的财产。这在军事方面对于瓦解尼赫鲁的军队，把印度的农民和平民以及印度军队中的士兵争取到中国军队方面来，可能是最有价值的支援和行动。中国人的官僚主义政策使得他们不向农民发出号召，以求避免同印度资产阶级迎面相撞，避免引起亚洲资产阶级的反对。

在中国人这种政策和他們目前得出的必須夺取政权的結論之間，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种矛盾从何而来呢？这是由于在思想意識上和政治上缺乏理解，由于思想意識上和政治上的經驗主义。彻底的革命的政策應該是把已經侵占的二、三十公里地区的土地交还给农民。然后，中国可以后撤或者根据农民的要求而留在当地。如果美国佬大声叫嚷說这是侵略，那也沒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可以回答說，我們并不是为我們自己而侵占的，印度农民得到了这些土地。

如果中国人把土地交给农民，那么这将傳遍全印度，傳遍全亚洲。这就可能有力地推进革命，可能引起資本主义的反作用，甚至包括战争。这场战争不是反对入侵，而是反对占有土地的农民。这就是先发制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資本主义的战争不会延續多久。人們早就看到成千成百的士兵从迎击中国军队的尼赫魯军队里逃亡。只剩下二千名印度士兵去对付紅軍，而且有许多人失踪。这样，中国人才能通过一般如果有人防守就无法通过的山口。只要一个人提着一挺机关枪就能够把守住通道。但是，有一万中国人通过了这个山口。印度參謀部无法說明他們是如何通过的。可是問題很简单。印度军队倒向中国，甚至給他們带路。几千名士兵能够在一個晚上通过这个山口，只能用得到印度士兵甚至軍官的合作来解釋。这也說明革命和工人國家的影响。

号召夺取土地就是革命輸出的政策。中国人不懂得这一点，还說他們不想輸出革命。他們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当他們倾向于把革命綱領当作整体看待的情况下；他們的經驗主义态度就逐渐变为革命的态度。由經驗主义态度向革命态度的发展表现在直接关系到他們的問題上，表现在直接关系到他們的理解和他們工人國家的利益的問題上。

領導并不想从經驗中邏輯地引伸出結論，或者局限于這些經驗。但是他們採取的路綫使他們不能后退，只能前進。

硬說中國人談到的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只有涉及殖民地戰爭時才有效，這是錯誤的。沒有比工人國家反對資本主義的戰爭更為正義的戰爭了。為什麼不就這一點進行爭論呢？而我們却在爭論中把這一點提出來了。

### 資本主義企圖消滅第一個工人國家

中國人還在別的地方談到過去兩次資本主義戰爭。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不能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只是資本主義戰爭。工人國家參加了戰爭，這是完全正確的，儘管在領導、組織和目的方面還有模稜兩可的說法。不過，這是另一回事。工人國家維護了這一階段最進步的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中國人避而不談這一切，也不是從經驗主義來談論這一切。表面上，他們想在爭論中涉及各个方面，但是，他們限制了爭論的範圍，排除了最基本的部分。

蘇維埃工人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依然存在，沒有被消滅。而當時存在資本主義有可能消滅這個國家的歷史條件。這樣的條件永遠不會重現，因為沒有這樣的歷史時期。

資本主義不可能在它日益受到限制的世界裡找到殘存的辦法。

在第一階段，資本主義企圖消滅工人國家，但是未能得逞。當時，世界上一半國家被動員來反對工人國家。繼軍事上失敗後，它們妄想從經濟上來扼殺這個國家，但是，它們同樣也未得逞。1921——1923年，被迫實施的新經濟政策滿足了由於經濟力量十分不足而提出的需要。人們在一定的方式下重新採用了由工人國家監督的資本主義成分。列寧以加強工人國家來抵制資本主義形

式的重新采用。在经济上部分地回到资本主义时，又如何来加强工人国家呢？这是从政治方面，特别是从社会方面来加强。让广大群众从社会方面更多地参预工人国家，扩大苏维埃的职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讨论。群众充分享有行动、思想、言论、提議和否決的自由。开展农民工作，从政治上影响他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经济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努力依靠广大群众，扩大革命影响。在这方面，中国人和苏联人都只字不提。苏联工人国家在三年经济匮乏时期处于复灭的边缘。由于苏联群众的英雄主义，才得以幸免。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因粮食缺乏而死去，但是，他们保卫了工人国家。

当时，世界上好些国家进行征募，向苏联输送小麦。大量衣靴运往苏联。苏联群众在这些年代忍受了一切，保卫了工人国家。日益众多的群众越来越自觉地参预国事以弥补经济力量的不足。因此，必须以社会和政治的力量弥补经济的虚弱，列宁和托洛茨基就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在中国人的分析中却缺少这种讨论。但是，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不根据历史事例就无法有效地讨论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 不可能达成任何使不断革命 瘫痪起来的协定

中苏争论是我们必将参与其事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序幕。这个阶段既不是由苏联人，也不是由中国人有意識地揭开的。中国人被迫投入这场斗争，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自觉性。把他们在两年前、一年前和半年前发表的文件和他们今天的文件比较一下，那是很有意思的。人们看到他们在最近半年内，有了突然的飞跃。今

天，他們把斯大林丟在一邊，從政治上和思想上進行分析，力圖根據歷史上的事例得出具有歷史意義的結論。

他們想朝正確的方向前進，但是他們的結論仍然是片面的，缺乏協調和聯繫。他們還缺乏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且只是以經驗主義的方式得出一系列的結論。

我們強調指出，在他們把戰爭與革命的可能性和共處聯繫起來的願望中存在着矛盾和對抗。但是，歸根到底，將要取得勝利的，是革命的立場，而不是妥協的立場。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人將矢志不移地前進。到目前為止，他們還只是以間接的方式進行鬥爭，因為中國國內正在對這些問題展開重要的討論。儘管對應該怎樣做沒有明確的概念，但是內部鬥爭正在發展。應該等待將要作出的決定，但是從我們方面來說，我們應該從現在起就參與其事。

中國人把所有有關現階段革命發展的基本問題都提出來討論。這一切都歸結於現階段必須制訂策略以組織鬥爭、消滅資本主義殘余。中國人的全部分析都歸結於這一點。他們不可能單靠他們自己得出真正的結論。我們必須干預其事。

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危機就是這一局勢的反映。

蘇聯人和中國人即將於7月5日舉行的會談並非是為了嚴厲批評、咒罵和控訴。歸根到底，這將直接體現不斷革命的進展和中國人對於不斷革命的不自覺的反映。蘇聯官僚主義將竭力阻止不斷革命。這並不等於說蘇聯官僚主義能夠達到目的，但是這却說明從這次討論起，不管其結果如何，如果中國人意志渙散，他們將被拋在一邊。同樣，卡斯特羅如果向赫魯曉夫屈服，就將去職。這並不是反革命的行為。在古巴目前處於經濟匱乏的情況下，菲德爾·卡斯特羅正在設法前進。

## 以革命的活动来保卫中国工人国家

炮击金門、馬祖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必須摆脱帝国主义从这两个島上对革命的中国所实行的压力和封鎖。炮击金門、馬祖是中国工人国家和苏联官僚主义之間的危机和爭端的原因之一。

苏联官僚主义譴責了中国工人国家这种合法的 和必要的行动。尽管这一行动是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因为沒有与号召群众参加相結合——，但是，它却符合捍卫中国工人国家的必要性。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与苏联官僚主义推行的国际政策的利益相抵触。当中国群众的經濟需要和他們在社会上提高觉悟的需要要求对帝国主义和世界资产阶级采取革命政策时，苏联官僚主义过去和現在都始終企图对帝国主义实行防御性的、妥协的政策，实行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共处的政策，以便维护他們的保守的利益。

在中国领导的反应和斗争中，反映出中国同古巴主張的不断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与苏联官僚主义的保守利益之間的矛盾。政治革命的条件成熟就是这样表現出来的。

中苏爭論不会在7月5日結束。这一天，将要开始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不再进行泛泛的討論，而要討論具体立場，討論这一阶段的根本問題：战争、革命、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准备世界革命战略的必要性，“紙老虎”的力量和弱点。

現在，中国人以新的方式分析、闡明和修正了他們过去的想法，因为他們現在宣称，紙老虎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不管他們的看法如何，也不管老虎是否紙糊的，归根到底，人民群众决定一切。为什么中国人現在需要讲这样的話呢？他們利用毛澤东1947年的报告，毛澤东在报告中讲到了紙老虎，因为最終說来，

群众要取得胜利。但是问题不在于得出一个基于历史分析的理論性的結論。这是一次簡單的談話，他們并不是根据这次談話来制訂綱領和政策的。否則，他們早就会根据这一結論宣布綱領了。帝国主义是紙老虎，因为它必然要被群众粉碎。但是他有原子武器自卫，因此必須准备应付这种破坏力，准备夺取政权。中国人現在所以这样讲，这是因为他們过去抱有幻想，因為他們在得出这些結論时抛掉了这些幻想，而我們的干預也是他們抛掉幻想的部分原因。

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間的会談不可能以达成協議告終，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方或那一方絕對拒絕达成協議，而是因为客观上不可能，絕對不可能。苏联官僚主义正在設法維護自己的保守利益，并对中国人作了相当重大的让步。但同中国革命和世界殖民地不断革命的发展的巨大需要比較起来，他們所能提供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达成任何協議的原因。因此完全排除了达成任何使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断革命瘫痪下来的協議的可能性，因为，不論他們怎样，中国人是中国和殖民地世界革命成熟的間接的代表。

能够說明这个結論的事例就是公社的发展。中国人已就生产数字上的虛报进行过自我批評。中国人承认在某些失敗的事例中犯了錯誤，农业生产上高估了百分之四十，工业上沒有达到預期的产量。但这一切将被改正和調整。中国人开始进行自我批評，改正数字，同意后退，任何人也不杀也不流放（至少未見公开发生）。这間接表明在工人国家中，群众参与其事程度正在提高。对領導沒有很大的不滿，但是也有議論。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群众对于即将进行的糾正怀有一定的信心，而且还因為他們对團結怀有信心，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公社扩大过程中表現出来的統一



的革命意志怀有信心。

### 中国人攻击南斯拉夫人

中国人对南斯拉夫人的攻击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攻击。他们在革命綱領方面无法攻击南斯拉夫人。他们认为南斯拉夫人是最靠近帝国主义的一些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南斯拉夫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靠近帝国主义的原因是：第一，保守领导集团的民族的和官僚主义的利益；第二，国家贫穷；第三，在整整一个时期，其他工人国家，特别是苏联所推行的孤立政策。当然，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南斯拉夫人在某些方面为帝国主义起着桥梁作用。这是一架政治桥梁，而不是一架社会桥梁。

南斯拉夫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南斯拉夫人并不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中国人弄错了，因为他们不能运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加以分析。如果他们正确地阐明南斯拉夫工人国家的特征，他们将被迫调整他们和群众的关系，而这是违反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他们的分析集混乱和经验主义之大成，而且也不排斥维护官僚主义的利益。今后几个月内，一、二年之内，假如没有原子战争（假如原子战争一旦爆发，有了原子战争）中国人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对南斯拉夫性质作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可以争论的，不是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而是与南斯拉夫群众的需要和关心相脱离的领导集团的政策。

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是一直存在的。由于中国领导的性质，中国的政治革命可以是非暴力的。它将体现为官僚和行政政权被革命领导推翻而垮台。这个革命领导将自己维护自己、依靠自己并且推动群众以革命的方式直接参与经济、财政、社会和国内外政治等一切问题的计划，讨论和决定。

考慮到中國人的進步，今後一兩年內，如果沒有原子戰爭（如果有的話，還會更快一些），中國人和我們，中國革命和第四國際將組成統一戰綫。我們在這方面沒有任何懷疑。中國人在政治和思想意識方面的進步歸結于總的評價。在這方面，立足點和出發點就是第四國際。今天是第四國際，明天是我們號召組織群眾的新國際，不論其名稱如何。

蘇聯人試圖同中國人進行內部談判。他們真正的意圖是使談判僅限于在內部進行，然而中國人卻公開了文件。他們用這麼多種文字出版文件，這不僅意味着他們要把真相公諸于世，而且表明他們準備把談判進行到底，而不會在7月15日結束。這是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我們將看到在這個階段里，政治革命的進程將飛躍地向前發展。

### 菲德爾·卡斯特羅蘇聯之行和中蘇會談

蘇聯官僚主義的這一切行動都是為了保證自己的地位而進行的掙扎和偽裝。人們看到過關於赫魯曉夫將被排斥和代替的消息，這也許是可能的，而且也許是在最近的將來，這些消息，雖然來自帝國主義，但有它一定的真實性。我們並不依據這些消息，而是依靠我們對政治形勢的分析，依靠蘇聯國內官僚主義內部鬥爭的發展，依靠世界殖民地長期革命的發展。赫魯曉夫的政策同殖民地長期革命所要求的實力關係發生衝突。中國人和古巴人都間接地表示了這一點。

蘇古文件儘管是一個妥協性的文件，仍然表明任何一個國家將奉行它認為必要和可以執行的政策，和平道路或革命道路。如果說赫魯曉夫沒有能爭取到同古巴人組成一條戰綫或達成一個反

华文件，那并不是他不願意这样做，而是他沒有能这样做。赫魯曉夫的文件是抽象的，充滿了泛泛之論。这些文件全部內容无非是只申述了共处是可能的，战争是不可能。

中国人目前只能求助于具体的历史事例。苏联官僚主义企图依靠列宁給自己的論点找理論根据。他們从片面的分析和个别原理得出一般性的結論。1923年，当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敗了的时候，列宁在談到年青的苏維埃国家的形势时曾經說过：“在这个阶段，当我们不可能进行革命时，对我们來說，同資本主义和平共处更好一些。”官僚主义从中得出一般的結論，即可以同帝国主义共处，从而賦予列宁的这一过渡性质的論点以准則、綱領和历史性原則的意义。列宁得出这个結論是无可爭議的，因为当时不可能进行革命。这种手法不仅是別有用心的，而且是利用列宁的思想，来有意識地起反革命的作用。只有苏联官僚主义企图利用列宁的威望来加强自己的妥協、投降和反革命的立場，这是很可怜的。最近，他們还迫使菲德尔·卡斯特罗到苏联訪問。苏联官僚主义企图在反对中国人的爭論中利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威信。工人国家、殖民地国家以及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群众对古巴这样一个小国如此热情，因为它反映了他們的感情和願望，他們的觉悟以及斗争和革命的決心。

迫使菲德尔·卡斯特罗訪苏是苏联官僚主义軟弱的表現，而不是强大的表現。苏联官僚主义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叫到莫斯科来并不是因为它需要給古巴革命以經濟上支持。卡斯特罗并不是去討論出售糖的問題，也不是討論簽訂貿易協定的問題。簽訂这种文件并不需要一个月的時間。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在赫魯曉夫命令之下到莫斯科去的。但是我們仍然要提這個問題，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否非进行这次訪問不可。我們认为不是非这样做不

可。为了答复一个邀请，菲德尔·卡斯特罗可以在一次人民集会上征求群众的意见以便决定古巴人民的行动路线。如果卡斯特罗拒绝邀请，赫鲁晓夫会用减少购糖的办法来回敬。这当然会造成经济上的打击。但是事情并不会停留于此。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群众，拉丁美洲的群众会起来干与。面对着这种报复措施，古巴人民本来可以找到不再依赖苏联购买他们的物品的办法。

我们懂得古巴存在的经济困难以及为了获得食糖市场有必要同工人国家保持经济关系。但是我们提醒一下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和古巴群众，苏联曾经在三年内毫无外援，受到来自包围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三重威胁。当时，人民群众吃旧皮鞋。目前，古巴革命所遇到的困难还不及苏联人民群众所遭遇过的困难的百分之五。应该重温苏联革命的历史。古巴人所忍受的困苦还不到苏联人民群众的百分之五。四年半的战争，三年的资本主义包围，而且这是发生在一个消费量只及世界消费量百分之一的贫穷的国家里。苏联群众并未因短粮缺食而死绝，资本主义也未取胜，而群众却获得了胜利。全部问题在于对群众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如果赫鲁晓夫否认这一点，那我们就同他公开争辩。菲德尔·卡斯特罗过去和现在都深知苏联官僚主义的立场和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为此，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了苏联，为此，他在赫鲁晓夫的文件上签了字，反对输出革命。尽管在文件中双方都有让步，而卡斯特罗作了更多的让步，因为归根结底，这个文件是同古巴革命背道而驰的。

### 反对和平共处的拉丁美洲革命

在半数拉美国家准备夺取政权的时候，文件却谈不要输出革

命。这对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是极为有利的。在这个阶段，应该签订的协议是号召群众夺取政权，而不是号召他们处于被动的地位。政治上最成熟的国家的义务乃是推动和鼓励群众去夺取政权。

巴西、秘鲁、智利、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部分地区，现在就准备夺取政权。乌培尔曼和斯韦齐已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值得我们推崇的作家看不到群众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他们看到了夺取政权的时机业已成熟的现实。他们说，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信任群众。但是他们的分析证明了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在这阶段，在七个国家可以夺取政权。工人国家发表的文件应当充分依据这一形势，号召群众夺取政权，向群众表明他们准备支持群众。相反，卡斯特罗在莫斯科签署的文件否定输出革命，同意革命只限于本国。文件的这一部分有利于反革命。

对文件不能进行分析和抽象的评价，而要根据文件发表的历史时刻来判断。今天的历史时刻是七个国家夺取政权的条件业已成熟的时刻，这一点不仅为我们和像乌培尔曼这样的人所证实，而且也为帝国主义本身，为阿根廷的翁加尼阿和巴西资产阶级领导所证实。在这个国家，勃利左拉在电视台所说的一番话对古拉特是个警告。这位勃利左拉在一次土地改革的群众集会上说：“我们不许可发生瓦加斯时所发生过的一切。我们不许可重演夸德罗斯下台时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要武装人民，让他们夺取土地。”与会者欢喜若狂。我们在无线电里听到这个讲话，以为是共产党或社会党的声明。其实不然，这是巴西工党左派组织的一次群众集会，会上勃利左拉讲了话。他还说：“有人指责我们要消灭个人所有制，这是错误的。我们所要的，是我们大家享有这种所有制。我们要

分土地。”这是一篇熾烈的，富有巴西人慣用的夸張色彩的演說，但是，是一篇正确的演說。还必須了解秘魯和委內瑞拉所发生的一切。我們首先要說，把責任交給作为群众的組織者的共产党人是錯誤的。采取行动的人是同共产党的領導决裂并反对这一領導的政策的人。

这就是拉美的形势。帝国主义坐在火药庫上。如果十月危机时——当时有着产生战争的危險，古巴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險——古巴革命号召世界人民群众打倒資本主义，那末数以百万計的人民群众将得到拯救。

烏拉圭《前进》周刊和記者烏·瓦賽曼在紐約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均清楚表明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巨大增长和北美反对战争、主張殖民地革命的輿論的巨大发展。《新进步》杂志上刊载了对各阶层輿論的調查結果。百分之六十二的被征詢人反对侵犯古巴，主張让古巴做它所願意做的一切。百分之三十八的人在古巴問題上表示中立，他們反对对苏作战。

瓦賽曼在其从布宜諾斯艾里斯发出的根据北美消息所写的文章中說道，那里有一个二万人的运动，大部分人是学者、科学家、教授，即知識分子和小資产階級；他們反对原子战争，反对肯尼迪策划入侵古巴和反对足以引起战争的一切。他們同意世界上每个国家按自己的意願管理国家。当有人問到他們这是不是有利于共产主义，他們回答說：这对我們有利，因为我們所要的，是不要死气，我們不願意肯尼迪进行战争。他們的态度不是反对工人国家的，尽管他們內心深处是不同意工人国家的，但是他們的态度是对帝国主义不信任的表現。

北美的群众和拉美的小資产階級有着一种深刻而緊張的政治生活。愚蠢的日耳曼人——我們說愚蠢并非貶低日耳曼人，而是

从政治上来说——在1962年3月写道，百分之九十的美洲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在同一个时期，我们写道，百分之八十的美洲人反对入侵古巴。我们是从确定无疑和具体的推论得出这些结论的。到过纽约的第四国际的同志向我们证实曾看到墙上写着“美国佬滚出古巴去”的标语。

如果当时古巴人号召夺取政权并作出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管理的榜样，那未来是会在北美和拉美产生大大加速革命的效果的。

### 苏古协定，对拉丁美洲革命的一次打击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访问表明了赫鲁晓夫无可奈何的立场。对此，我们毫不夸大其词。赫鲁晓夫在反对中国人的斗争中需要卡斯特罗。但是，如果认为卡斯特罗去苏联就会同意变节，那就大错特错了。卡斯特罗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试图保持一定的中立来维护自己。例如，尽管他同意和平共处的政策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并未赞扬苏联的立场。赫鲁晓夫也作了最大的让步，同意每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走自己的道路——和平的道路或革命的道路。整个说来，不能说卡斯特罗投降了，因为双方都作了让步。

就苏古文件没有号召夺取政权这一点说来，拉丁美洲受到一次最大的打击。如果当时发出这样的号召，美国佬可能会叫嚷抛弃十月妥协。但是，难道他们在准备再次入侵时，就不想抛弃这种妥协吗？他们肯定要明目张胆地和卑鄙无耻地抛弃妥协，以鼓励整个大陆的反革命活动。他们不准备，也不同意按协议办事。阶级斗争不是什么骑士盟约。只有依据力量对比，而不是依据协定的字句，协定才有价值。如果力量对比的发展有利于革命，从历史观点来看，是可以抛弃协定，以便向前迈进。在这方面，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签字是有害的。赫鲁晓夫乞灵于卡斯特罗，并非为了卡斯特罗的利益，而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拥有巨大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应该为革命的目的服务，首先从古巴开始，即像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那样，在全国举行公开讨论和群众示威游行。应该举行士兵、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大会。我们请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遵循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榜样，了解一下直到列宁死时为止工人国家所签署的、并为群众讨论过的最伟大的历史文件。

苏联人的决定得到全体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支持。否则，这些决定就经受不起四年来这样牺牲的考验。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赫鲁晓夫需要仅占世界经济0.01%的古巴，这说明政治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当瓶子满了的时候，一滴水不会使瓶里的水溢出，重要的是瓶子已经满了。

赫鲁晓夫需要卡斯特罗。在卡斯特罗逗留的一个月中，赫鲁晓夫想拉拢他，但是没有成功。菲德尔·卡斯特罗极力回避。在他发表的讲话中，从未提到中苏冲突。他不要任何妥协。在这些方面，归根结底，是因为有古巴群众。赫鲁晓夫本人不得不在文件中提醒美国佬，如果古巴受到侵犯，将导致战争；他还重申了自己对内的立场，并且被迫避免直接涉及撤出火箭一事。

文件没有提到撤出导弹的正确性，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会在赞同这种态度的文件上签字。如果签了字，他就不可能回古巴。这一切表明，在古巴，革命跃进的条件已经成熟。

赫鲁晓夫不得不依靠卡斯特罗，以便在反对中国人的斗争中武装自己。他正在准备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但是并不一定在7月5日采取这种行动。同时，这一切也表明，中苏会谈涉及那些方面。即使在会谈过程中，不会具体化，但却为今后的跃进准备条



件。我們确信，赫魯曉夫把卡斯特罗召到苏联去，以便获得一个反对中国人的据点。这个目的并未达到。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却为編写違反拉丁美洲革命利益的文件提供了基础，即使他并不是有意識地这样做。因为这样的文件沒有提到拉丁美洲革命的需要。

革命不是虛无縹緲的，而是具体的。拉丁美洲革命問題要求作出答复。卡斯特罗接受了这个文件，从而起了机会主义的作用。实质上，他帮助了規模更为巨大的行动，这就使他的立場更不正确。他間接地为苏联官僚主义的目的服务，为苏联官僚主义和肯尼迪达成的协定服务。目前，肯尼迪主要致力于阻止拉丁美洲殖民地革命的发展，而官僚主义手中最有效的武器是能够向拉丁美洲提供一切东西。这个大陆是官僚集团同帝国主义进行賭博的三牌。卡斯特罗已屈服于这一賭博。

必須批評和擯棄这种协定，因为它們在客观上是为反革命服务的。我們公开反对革命不能輸出的观点。

我們主張扩大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須要提供整箱的枪枝和派遣許多鼓动家。然而古巴人和苏联人都这样做了，他們提供了金錢、枪枝和飞机，但是，这些并不等于扩大革命；而动員群众准备政治斗争以便夺取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說，革命可以自动輸出。而帝国主义也是輸出反革命的；任何人也阻止不了。帝国主义千方百計地輸出反革命，虽然肯尼迪对赫魯曉夫說，他不容許侵犯古巴，但是沒有人会相信，甚至赫魯曉夫也不相信。赫魯曉夫的的确确不断提醒帝国主义，說苏联拥有一个完善的原子軍火庫。如果赫魯曉夫确信肯尼迪会遵守諾言，他又何必这样說呢？假使帝国主义要这样行事，赫魯曉夫就不会被迫发表和他政策背道而馳的声明。

菲德尔·卡斯特罗苏联之行的最后結論，一方面是拉丁美洲革命发展受了打击，另一方面，古巴群众不会长期同意菲德尔·卡斯特罗遵守他自己签署的文件。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发表的时候就是这样。在第二个哈瓦那宣言签署以后不久，卡斯特罗在妇女大会上的讲话又超过这个宣言。现在，卡斯特罗在莫斯科签署的文件，同妇女大会发表的演說比較，往后退了一步。

在妇女大会上，他說：“和平共处在世界某些地区也許是有效的，但是在拉丁美洲，应当夺取政权。在这里，应该夺取政权，向前迈进。”

“我們的經驗要求我們应当夺取政权。”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身上体现的矛盾也表明他在政治上缺乏信心，在群众中缺乏真正的支持。假使他在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組織动员群众，那么他在旅行过程中，就可以像一个自觉的领导人一样，依靠群众的組織动员来参預政治革命的发展。他就可以影响中国人，迫使他們走得更远。这就是說，卡斯特罗如果依靠群众并从經驗中得出馬克思主义的結論，那末，他目前所起的微小作用就可以大十倍，大一百倍。尽管斯大林主义者的警察式的威胁，托洛茨基主义者仍能在古巴活动、办报，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古巴工人国家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間的矛盾。

我們再重复一次，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莫斯科签署的文件对拉丁美洲的革命是一次真正的打击。尽管如此，拉丁美洲的群众，其中包括古巴群众，是不会同意这个文件的，他們会超越这个文件。

### 世界群众要求托洛茨基

召开各种會議和群众集会来討論这些文件，这在世界不断革命过程中，对古巴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革命条件和革命成熟的程度,对革命起十分巨大的影响。

这样的討論也对中国人和所有工人国家产生了影响。但是在古巴群众不能参与其事的情况下,这种如此丰富生动的革命进程所表現的力量将受到很大的阻碍。

因此,我們认为,在7月5日的會議上,政治革命成熟的整个过程不能得到体现,但是将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托洛茨基的名字和托洛茨基主义在下阶段不再仅仅是被引证来談論冒險主义和左傾主义,而且是用来制訂革命的路綫和政策。

我們反对苏联方面以它自己的名义提出要求的任何企图。托洛茨基同无产階級民主不断革命的发展和政治革命的发展不可分割,因此世界群众不顾中国人、赫魯曉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而要求托洛茨基。他們将很快以托洛茨基的方式思考問題。古巴的托洛茨基党的同志們告訴我們如果他們得到合法的地位,他們目前就可以出售六万到十万份日报。这并不夸大。这也并不等于說,托洛茨基党拥有十万党员,但是这意味着現在存在一种願意看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如何思想、言行的潮流。中国人无视托洛茨基主义,他們把托洛茨基說成“左傾冒險主义者”,因为他們采用官僚主义和行政的方式来进行斗争。如果他們不是这样来談論托洛茨基,……(以下一句排字有遺漏和錯誤无法譯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們應該取消他們的一部分官僚机构,让遵循苏联革命、1917年布尔什維克革命和当前的殖民地革命等历史范例的新的革命潮流和傾向得以体现出来。

世界各国共产党对这一爭論和这一斗争緘默不言。在拉丁美洲,烏拉圭的《人民报》、智利的《世紀报》,阿根廷的《我們的話》和巴西的《新方針》周刊只提到苏联官僚主义和中国人之間的某些冲突。它們只闡述了这一爭論的若干方面,并未涉及問題的本质,因

为成問題的，是在下一阶段消灭資本主义残余的策略、綱領和政策。所有这些爭論的实质涉及无产階級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发展的客观必要性和集中領導的必要性。殖民地无产階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利益應該相互協調，并且應該在倡議准备和領導革命进程的各国党取得了准备这一和諧发展的經驗之后，找到它們的代表和領導。目前的爭論仍然是以經驗主义的方式杂乱无章地进行的。

然而，世界不断革命发展的需要經常推动这种爭論，并使之繼續下去。

面对这一进程，帝国主义表现出惊慌胆怯。《紐約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最近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結論，談到两个根本的方面。因此，它們并不认为，在中苏爭論中，赫魯曉夫要把自己更加装扮成一个和平主义者，而是认为，为了站得住脚，他應該裝得更左。美国人在談到教皇約翰二十三世的通諭时說，肯尼迪将不会追隨这一講話，而是追隨帝国主义的利益。

我們并不准备以观察員的身分參預这一进程，而是准备通过我們的文件与活动干預共产党的危机。我們并不从表面上参加世界階級斗争。我們的参加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人从我們的文件中取經。我們重复一次，当我们研究他們五个月以前的文件和今天的文件时，看到这些文件里没有任何的中国群众內部的政治生活可以使人設想他們的結論是基于对世界經驗的分析的。在1960年的妇女大会上，中国人提出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妥协的、改良的文件，但是他們不得不在这个文件中部分地提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必要性。今后七、八个月內，如果没有原子战争，那么1960年的声明将会同斯大林像一样被扔入垃圾箱中。

1963年9月

## 六、法国革命共产党(第四 国际法国支部)

### 第一次代表会议呼吁书

致托派积极分子、共产党人积极分子、社会  
党人积极分子、工人、农民、学生和职员

同志们：

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革命共产党(托派)第一次代表会议欢呼4月在拉丁美洲局领导下举行的第四国际代表会议的成就，完全同意第四国际代表会议关于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全部决议，全力支持第四国际代表会议临时选出的其任期为到1963年第四国际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止的国际书记处和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四国际前届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密歇尔·巴布洛，列维奥·麦丹，皮埃尔·弗朗克，厄内斯特·杰尔曼和乔治等)，由于根本丧失了对当前时代革命可能性的信心，放弃了建立新的国际领导，建立第四国际各国布尔什维克支部和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党的前景。他们放弃了第四国际自从列昂·托洛茨基建立以来历届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纲领路线。他们谴责苏联恢复核试验，从而否认了工人国家进行军事准备以便自卫并在原子战争中消灭帝国主义的权利，而帝国主义却在准备原子战争，并以此作为从历史上拯救自己的最高手段。在当前时代原子战争不可避免的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完全站在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上，把战争

說成是“浩劫”，說成是人类的末日，說成是整个世界生产力和人力的破坏，从而接受了帝国主义为维护其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战争詭詐。站在这种立場上，就必然会采納和平共处的論調，而和平共处却是一种历史性的騙局。

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这一部分投降主义分子，从思想上、組織上滑到了改良主义和取消主义的立場上去，給我們的运动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危机。但是，世界其它地区的托洛茨基革命派的存在和发展，进行殖民地革命的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革命派的存在和发展，通过其全部决定和決議都是遵循着国际的馬克思主义革命路綫和綱領的第四国际特別代表會議的召开，已經使这种危机获得解决。

继承了托洛茨基主义为爭取在世界各国建立工人政权而斗争的全部傳統的国际布尔什維克派，繼續在过渡綱領原来規定的国际綱領和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建立无产階級革命世界領導的任务。

### 国际主义共产党的投降主义政策

在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企图通过放棄布尔什維克托洛茨基主义政治和組織原則的办法，使法国支部投降斯大林主义、赫魯曉夫主义和改良主义。这一派人已放棄了同工人階級联系在一起的布尔什維克的建設的組織原則。多年以来，他們在政治和組織方面，一直是停留在最严重的消极态度上，这使他們走向完全的瓦解。在組織方面，这个集团不能同无产階級和群众以及无产階級先鋒队打成一片，因为，他們在建設布尔什維克党的問題上投降了。在开展夺取工人政权的斗争中，他們不能使托洛茨基先鋒队发生作用，因为他們放棄了这一斗争。这个集团采用在一些政治上不成形的組織内部进行沒有目标的小活动，来代替以

階級綱領為基礎的革命鬥爭，从而使自己在法國爭取工人政權的鬥爭中只起輔助作用，而不是起革命先鋒隊的政黨作用。

同他們的經驗主義行動相適應，這個集團用一種在其所生活的環境中屈從於社會壓力的小資產階級所特有的經驗主義、經濟主義和混淆的分析方法，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分析方法。這個集團，一直是在充當着事變的尾巴，在解釋事變和採取行動上庸碌無能，只能充當既成事實的報界評論員。

這個集團和他們的機關報《國際》（前《勞動者的真理》），已經不再屬於第四國際，而是成了一種朝着法國共產黨領導集團及其和平共處政策和“革新民主主義”發展的機會主義出版物。這個集團所起的作用，是對共產黨官僚主義領導和擁護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工會組織和學生組織施加壓力的作用。這種適應法國共產黨的赫魯曉夫派改良主義路線的政策，使得這個集團（因為他們採取做共產黨顧問的中間主義立場）在官僚領導發生危機時，成為取代共產黨未來的領導的一部分人。這個集團不是別的，他們是讓他們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所影響和爭取過去的一種小資產階級傾向的表現。他們的分析反映了他們在第四國際的原則、綱領和組織上的投降。

### 革命的世界形勢

在我們的時代，從社會、經濟、政治條件——這些條件有史以來都沒有今天這樣具備——來看，建立世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領導機構的道路已經打開了。

全世界殖民地群眾都在以驚人的力量和進攻，投入打倒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者、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的鬥爭。這個殖民地革命的力量和能動性是如此巨大，每一個新生的獨立

国家都跨入了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的过程，证明了关于不断革命論的托洛茨基主义分析的正确性。古巴群众的斗争使一个工人国家得以在同美国海岸相隔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建立起来。工人国家在经济、科学、军事和社会方面的发展都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巨大鼓舞。

在这些国家里的政治革命的发展，对于加速帝国主义危机的到来，和促进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发展，有着带根本性的重大意义。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欧洲和美国，尽管经济情况繁荣得令人眼花缭乱，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还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斗争。在他们所举行的往往是规模很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他们的战斗性和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意志。

在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派在进行着公开的角斗。在比利时，1960年和1961年的罢工深深地震撼了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在意大利，菲亚特工厂的工人举行了十年以来的第一次罢工。在西班牙，在葡萄牙，无产阶级今年四月和五月掀起的罢工运动打开了这两个国家法西斯制度崩溃的序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第四国际，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和胜利，正在起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潮流的领导中心、组织中心和统一中心的作用。

### 法国无产阶级的巨大可能性

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政治胜利，在最为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帝国主义的同时，还打开了加速法国资本主义危机的阶段。尽管法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导奉行了阴险的政策，尽管他们费尽心机不让法国无产阶级的合理要求运动和政治



斗争同阿尔及利亚革命发生联系，但是绝大多数法国工人阶级、贫苦农民、知识分子和学生还是没有停止过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而且这些斗争又时常是自然而然地同阿尔及利亚革命彼此互相联系着。

尽管在有一段经济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施加了种种压力，工人阶级还是坚定地站稳了阶级立场。他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不许法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花费落到他们肩上的斗争，从来也没有放弃过争取新的增加工资的斗争，从而在客观上，削弱了资产阶级反对殖民地革命的斗争。1962年2月13日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戴高乐政府警察的大示威，对资产阶级政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压力。这次示威迫使法国政府在埃维昂谈判中对阿尔及利亚革命作了更多的它事先并不打算作出的让步。

法国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在站稳阶级立场的同时，对于当前存在的传统的工人组织领导失去了信任，他们开始认识到这些组织所起的改良主义作用。参加合理要求运动的人数十分众多，不必等待工会的事先布置，他们就自动爆发，像阿维尼昂铁路工人的运动就是一个例子。这些运动的绝大多数都超出了领导所规定的目标。但是，在显示这种斗争性的同时，参加工人中央所组织的集会和代表大会的工人却非常有限，勉强强有罢工人数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这反映了工人阶级对传统的组织领导信任的危机，证明了在法国发展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派有着十分巨大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现象：广大群众一方面参加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却又对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采取保留态度，可以举这样一件事来说明：工人阶级找不到表达意志、提出批评和采取行动的途径，因此用消极的办法来表示他们不再信任传统的组织。

在工人运动中有一种强烈的对抗。支持着这种对抗的是世界

革命力量的发展，是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这就是以在法国建立工人阶级为斗争纲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基础。在法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的存在的真正可能性由这样的事实表达出来：一切愿意以革命面貌出现并组织起来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对抗力量，必须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标准来确定自己的特点，因为，凡是要坚持到底的反对共产党的对抗力量都必须托洛茨基主义者。这证明托洛茨基主义在法国的潜力，证明人们渴望一条革命路线。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政策和革命纲领是互相符合的。《托洛茨基》一书在被人贪婪的阅读，有人在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都在研究历史的真理，这是另一种要求重新在法国建立群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潮流的反映，也是现时存在的可能性的标志。为数众多、日益强大的派系在试图对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领导进行反抗，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不实行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这是在一切工人阶级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内部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的基础。

### 缺少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党

好几个实际上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支派的所谓“托洛茨基”派和统一社会党派的存在反映了这两个党的持续的危机。但这些所谓“托洛茨基”派不能严重地影响两党这件事，表明了基层对纲领路线不明确队伍具有正当的猜疑。这些集团在根本政治路线上彼此之间毫无区别。他们放弃了对于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从而去推翻资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工作。他们所不相同的是在这一点或那一点策略上采取一种比共产党要“左”一些的立场。

自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派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

同政治路綫上十分濃厚的机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組織路綫上的宗派主义。所有这些派別都对法国本国的群众和群众的革命潜力失去了信心；他們說是工人階級“睡着了”，他們在等待工人階級“醒来”。这种对客观现实失去信心，对世界範圍內力量对比的发展失去信心，使得他們在政治上采取了这样的立場：他們甚至从客观上去为帝国主义效劳，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間朗貝尔集团就采取了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的政策。当时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想尽种种办法来寻求同帝国主义达成妥协，并且反对作为反帝起义和革命斗争的組織者的民族解放陣綫。它想尽一切办法帮助法国資產階級挖掘第三种力量并寻找阿尔及利亚革命代表以外的其它談判对象。朗貝尔集团，“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工人道路”等集团的机会主义政策和工团主义反动性表现了他們根本不了解当代的群众运动。

这些集团在法国之所以层出不穷，說明了第四国际前欧洲领导机构部分成員在建立真正的布尔什維克傾向中遭到的失敗。当时如果能够把这个真正的布尔什維克傾向建立起来，第一个后果必然是使这些集团不可能繼續存在下去。

这些集团当中沒有一个可以拿来当做在法国发展馬克思主义革命傾向的基础。

### **我們要建設革命共产党**

一方面由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給予法国資本主义带来的打击，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社会党所采取的明显的改良主义路綫，因而在法国为一个組織起来的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潮流提供了一切有利的条件。尽管这个潮流在开始的时候人数不多，但是由于他对殖民地革命的正确理解，由于它采取的打倒資產階級和反对資產

階級的革命行動，因而，這個潮流正在發展着。不曾有任何一個黨派在這種基礎上建設起來。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終止就是它們失敗的總結，然而，發展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條件却是存在着的。一切組織里的革命分子都正在從各個領導和各個派別在階級政策上的失職吸取教訓。這種自覺的運動就是在法國建立馬克思主義革命派的基础。通過把群眾運動（它根據經驗是站在具有革命內容的立場上的，並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傳統領導機構的機會主義政策），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工人運動中的有批判能力的革命分子結合起來，才能使現有的潛力發揮出來，以便在法國革命共產黨內建立和組織起革命的領導機構。

我們建立我們的黨並不是為同那些適應環境，借口群眾運動沒有依照他們事先擬好的計劃實現，因而歷史上已經投降的這一個或那一個派別進行競爭。

我們的黨（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繼承着在法國和全世界為托洛茨基主義而鬥爭、為“國際”而鬥爭、為建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黨而鬥爭的全部傳統和全部經驗。我們的黨要為實行對法國資產階級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的革命綱領，為建設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黨而繼續鬥爭。

最近以來，國有化企業職員的合理要求運動和被資本主義為了自己的發展徵收了全部土地但卻又不為他們作妥善安排的農民的鬥爭，表現了被剝削群眾的偉大戰鬥力和他們拒絕充當資本主義法國經濟發展的犧牲品和受騙者的意志。革命共產黨的任務是竭盡全力使群眾認識：在鬥爭中必須把他們的合理要求的鬥爭同阿爾及利亞的革命聯繫起來；這種鬥爭還同時牽涉到法國的政權問題。法國的群眾運動必須同阿爾及利亞革命聯繫起來，阿爾及利亞革命朝着建立工人國家的方向發展這件事將會從法國無產階

級推翻法國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得到支持。這種反對共同敵人——資產階級——的統一行動將使兩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闊步前進。

革命共產黨認識到這種必要性，認識到法國無產階級的鬥爭意志在短期內同奪取政權的政治目標聯系在一起的、反資本主義性質的行動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革命共產黨呼喚：有覺悟的革命先鋒隊在第四國際的隊伍里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以便在法國革命共產黨（托派）內建立革命的領導機構！

革命共產黨（托派）呼喚：在一切官僚主義化和改良主義化的組織內部，在共產黨、社會黨、法國總工會、工人力量總工會、法國天主教工人聯合會、全國教育聯合會等內部，在一項階級綱領和一條階級的、革命的政治路線的基礎上，建立馬克思主義革命派！

革命共產黨（托派）呼喚：各種所謂“托洛茨基”派里的全體布爾什維克積極分子和布爾什維克幹部投入到真正的群眾鬥爭中去，參加到革命共產黨（托派）中來，以便根據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治和組織規章建設黨！

革命共產黨（托派）呼喚：為了在原子戰爭爆發前或是在原子戰爭進行中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為了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為了建立工人政權，為了在反對資本主義力量而鬥爭的革命綱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為了人類共產主義的未來，一切力量行動起來！

第四國際法國支部革命共產黨（托派）

第一次代表會議

1962年7月

## 七、社会主义的世界前景

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在 1961 年年会上通过并在以后经过修正的  
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

### 1.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

1. 资本主义早已结束了它对于人类历史的进步贡献。在二十世纪开始时它已经不得不进入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自己中间瓜分了世界之后，彼此以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发生激烈的冲突。同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遇到了本国工人阶级和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它们的统治的不断的挑战。由于这些情况，资产阶级社会就无法确保它的前一世纪的开明的理论家为它规划出来的那些稳定的和平发展的条件。相反地，它甚至在比较和平的时期也不断表现出一种堕落和使用暴力的趋势。尽管有代表人类精神伟大成果的不断加着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但帝国主义却证明不能一直把这些进步用在建设的目的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给生产带来障碍，曲解和滥用人类知识方面的成就。在危机和战争的情况下，对于将来的怀疑和徬徨已代替了资产阶级全盛时期所特有的对于发展的坚定自信。

2. 当科学进步和资本主义赢利的需要结合起来时，科学进步就成了越来越多的积累资本和集中经济力量的手段，也是建立巨

大破坏潜力以保护和扩张这种资本和经济力量的手段。即使在最“民主”的国家里，资本主义历史上新时代的开始也是表现在：金融资本和垄断势力的日益强大，通过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的国家机器这个媒介使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同一化，以及军事订货对于工业越来越重要。虽然在特殊时期内或在特殊国家里，这种发展可能有助于暂时克服资本主义的某些固有问题，并因此而给工人运动内的机会主义倾向提供一个根据，但它的最終结果是：加深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并使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增加对人类的危害。

3. 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以后帝国主义在东欧及中国的失败严格地限制了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资本继续输出，并且和过去一样迫切，因为资本主义不断需要有新的出路以获得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受到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威胁，亟需要和领导这些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取得谅解以便继续输出资本，或者是在取得这样一种谅解看来不可能时，就改用武力来保持这些殖民地。资本主义今天使用的手段，不论是先进国家里的“福利国家”政策或者是“殖民地独立”政策，从表面上看来都比过去温和了。事实上，这些所谓“新资本主义”的政策同战前所采取的法西斯主义和强硬手段完全具有同样的目的，并且出于同样的需要。采取制造法西斯运动并在这种运动中的下层分子身上孤注一掷的做法是一件资产阶级宁愿避免的危险的事情。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资产阶级要通过议会、官僚机构、政党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来展开活动。同样，在殖民地，帝国主义者，拼命斗争以保持除用武力外就不能保持的地位，但是世界力量的对比使采取镇压手段对殖民地进行政治控制，成为资产阶级有见识的代理人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力求避免的一条路线。这种手段上的改变并不表明资本主义本身有什么变化。我们也不能认为现在的路线是永久

不变的，或者各国的资产阶级在必要时候不会再度依靠法西斯主义或在国际間使用武力以保持或恢复它們受到威胁的地位。

4. 帝国主义对于人类的不断威胁在二十世紀中叶更为惊人，因为現在的一次单独战争就有可能毁灭全人类。

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壟断资本家发动的法西斯群众运动的暴力和无理性的問題，不是一代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遭到毁灭的問題，也不是只使战争参加者精疲力尽而不使他們遭到毁灭的总体战問題。当前的形势是，资本主义的矛盾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互相彻底毁灭的世界冲突，这种冲突可能完全破坏人类生活或者把它推回到几千年以前的状况中去。这里只有一点和过去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同：現在的問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能卷入这样一种彻底毁灭的战争而不肯放棄对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剝削。

5. 使资本主义残存到二十世紀下半叶的那些条件不断地在社会各級和各个方面造成經濟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危机，而核毁灭的威胁只会加剧这些危机。

例如，在經濟方面，許多迹象表明，资本主义正在又一次地面对着必須为“剩余”资本寻找出路的問題。即使为核战争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吸收了巨大的资源，仍不能永远解决这一問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輸出的恢复和不断增加就是在寻求一条出路。但这一出路日趋狭窄，因之只能促成整个局势的爆发。资本主义不能有計劃地和合理地使用投資力量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市場的条件不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这些资源就不会發揮經濟生产能力。因此，生产这些资源的生产机构就要通过各种忽高忽低的情况，随着利潤率来調整它的生产能力。但是，资本主义現在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体系，它不能不遇到一些国家的竞争。这些国家虽然一般都比較貧穷，但有极为可贵的有利条件，能制定平衡发展的計劃，



从而能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資源。生产关系的不同說明了发展速度上的巨大差别，因之使资本主义在两个互不相容的体系的世界性对抗中处于越来越为不利的地位。誠然，苏、中集团国家的发展速度和一般經濟效率，由于官僚統治者的掠夺和手段拙劣；以及由于这些国家不能充分利用国际劳动分工，而受到了不利的影响，但是这些国家的較快的发展速度证明它們从国有化和計划經濟的基础得到了利益。

6. 甚至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尽管有高额的軍費开支，也不能突破几乎长期存在的經濟停滞状态。經濟衰退現象先后接踵而至，并且在每一次恢复之后，固定的失业和停止生产的程度都要增加。虽然某些欧洲国家和日本，由于一些有利因素的結合，能够达到較高的发展速度和避免严重的經濟衰退，但它們的繁荣也显然是朝不保夕的。它要依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場行情的不断上漲，而这种上漲的速度現在已不如从前。在这个市場上暂时会看到激烈的竞争。市場不能无限度地扩大。任何一部分发生的震动和危机都会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六十年代的前景不是穩步的繼續发展而是困难越来越大，不断发生經濟衰退和危机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間爭夺市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經濟中那些最沒有准备的部分一定会受到重大压力。1960年12月和1961年1月的比利时事件，就是可能遇到的那一类問題以及統治階級会用来对付这些問題的方法的預演。資本家階級和它的政府不能不随着国内形势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把它們的問題轉嫁到工人階級身上。在可能的情况下，这将会以不发生公开冲突的方式，以馴服工人階級組織的方式来完成。在其他情况下就不能不瓦解这些組織或破坏它們的战斗能力。資產階級巧妙地随着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它的手段。它可能慢慢瓦解这些組織，爭取它們的

领导人，或者用公开的斗争来消灭这些组织。旧派的工人领导本身对于这种策略提供了帮助。例如在法国，戴高乐政权不必破坏工人组织，不必进行公开斗争，就能减少大部分工人阶级实际工资的百分之十五。随着经济问题的日益尖锐，到处都将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击败工人。

7. 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了几十年和甚至统治了几百年的落后国家里，也有特殊的矛盾。帝国主义是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它在殖民地比在别处滋生着更多的贪污腐化。由于“反对殖民地化”而取得政权的民族资产阶级沉浸在利己主义和打小算盘的腐败环境里。它们不想和帝国主义进行真正的斗争，它们大多满足于在政治上独立的和经济上不能自养的国家里享受官职禄位。这些国家今天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的继续剥削提供了必要的体制。这些民族领袖至多也不过是想要多分一些用日益有计划的剥削从所属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掠夺来的赃物，或者想要把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利润用在“开发”计划上，以为民族资本更全面的发展打下基础而已。诚然，世界分为两个集团给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进行活动的余地，使比较有手腕的人可以从中取得一些利益，并从双方面得到援助。但是，重要的是，这些落后国家的新兴统治阶级并没有和帝国主义断绝联系，尽管它们对此提出相反的抗议。另一方面，它们在国内不能不面对着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壮大了队伍和提高了觉悟的工人阶级的日益强大的压力。这里已经看到使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的基础本身第一次受到威胁的新的斗争迹象，而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这一事实，这种局面就更具有爆炸性。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实行土地改革并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决裂或者保证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时，生活条件日益恶化。广大群众被投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旧有

的社会结构在解体；贫穷和绝望在增长。这种情况是同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活动不可分割的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它将加剧给帝国主义带来最后灭亡的阶级斗争。

8. 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战略就是建立在这种革命危机和这种危机在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与前殖民地的工人阶级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之上。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响应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说法，认为并且希望，世界根本危机的各个征象可以个别处理和分开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联系的，因为帝国主义本身已经在它们中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过，马克思主义者不认为，帝国主义由于本身隐藏着矛盾会最后使这个制度停止发展和灭亡。这种自动灭亡的想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想法。过去四十年的历史使人确信列宁和托洛茨基常常重复的教训，即没有资产阶级应付不了的局面。资产阶级依靠法西斯主义，在遭到两次大战期间的革命和经济不景气的挑战之后生存下来。它又依靠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这些领导保证工人阶级不会夺取政权——合谋，并利用这喘息时间来研究新的统治手段和加强经济力量，而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生存下来。只要本身作为一个阶级和拥有一个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党和领导的工人们没有及时准备好进行积极的干涉，即使是最险恶的局面也能为资产阶级所克服。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并不反映它具有内在的力量，或者证明它的存在是正当的；这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遭到一系列失败的结果，而这种失败的历史责任是要由国际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来承担的。

## 2. 领导的危机

1. 人类前途的唯一希望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胜利。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能够使世界工人阶级认识到它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这样一种认识不能自发地产生；它产生在斗争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在出现时，理论上已经成熟，经受了考验并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资本主义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一直到目前过分成熟的阶段，基本上是由于领导的危机阻碍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结果。传统领导的背叛为资产阶级取得暂时稳定和相对发展的时期准备了必要的基础。解决领导危机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责任。

2. 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派的政治领袖们继续支配着工人阶级运动。他们建立起强有力的官僚机构以训练和控制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的辞句和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变成为进行欺騙的掩护，借此遮盖他们放棄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这一目标的行为。他们成为工人阶级走向政治独立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而没有这种政治独立是不能击败资产阶级的。为了建立革命的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每一种机会主义倾向，特别是对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展开不断的和坚决的进攻。

3. 社会民主党是根据这样的假设行事的，即资本主义正在变成一种比较近人情的制度，对于福利和利润抱有同样的关心。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由于对资产阶级国家和组织的忠诚，而受到严格限制。他们在这些国家和组织里接受职务，特别是在危机和战争时期，甚至长时期担任政府职责。他们对于以推翻资产阶级国

家为目的的任何运动都抱敌视态度。

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是先进国家里的工人阶级中享有特权的少数。因为是这样的基础并且为小资产阶级分子所渗入，所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自 1945 年以来比过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证明它们在工人运动中担任着资本家代理人的角色。在西欧，它们在战争刚一结束的年代里挽救了资本主义。以后它们曾经开展从党的纲领中取消一切明确的社会主义要求的运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公开地作为一个积极改良类型的拥护资本主义的政党而出现。

社会民主党答应给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包括军事联盟和氢弹在内——以充分的支持，而它的国内政策则是这种态度的补充。

4. 社会民主党在先进国家里的势力（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它从来没有占过重要地位）的物质基础已经逐渐为近年来的世界发展所破坏。社会民主党由于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投降和公开地投靠反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帝国主义阵线而在工人阶级中间失去了威信。但是，更根本的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方面的不可避免的削弱。殖民帝国的旧的剥削方式，以及依靠这些殖民地作为市场和进行扩大投资的旧的方式，已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矛盾。虽然社会民主党在某些国家里，特别是在英国和德国，仍能得到工人阶级中多数的拥护，但是它们已经越来越成为官僚主义的空架子，它们的右翼领导遭到了中派和左派的挑战并由于内部危机而陷于分裂。在法国，“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大部分已经离开了社会党。在意大利，在南尼领导下的中派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在英国，左翼青年劳工运动的发展和巨大经济斗争的开始正在使机会主义者的统治越来越困难。

5. 斯大林主义在战后年代里的作用，在效果上和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是相同的。在一些国家里，共产党在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党，并且在其他国家，如英国和荷兰，曾经吸引革命战士离开社会民主党。认为和战时的资本主义盟友进行妥协最能保持苏维埃官僚机构的权力的斯大林主义观点形成了这些党的战后方针，尽管这些党有时也采取一种轻率的极端左倾的路线。自1944年以来，在一些国家里，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全力阻止工人阶级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资产阶级政权实际上陷于瓦解的机会。有武装的游击队作为后盾的工人阶级的高度自信，由于共产党领导正式反对任何与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对抗的行动而归于破灭。解除游击队的武装，共产党加入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以及号召尽最大努力进行生产，这一切使工人阶级的攻势受到挫折，为一系列的背叛开辟了道路，其结果是犬儒主义的蔓延和共产党本身的削弱。

6. 在中国和南斯拉夫，国际斯大林主义所建立起来的防止革命发展的堡垒，由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强大力量，由于不存在任何资产阶级的替身，以及旧政权的腐败和垮台，而被粉碎了。在这里，国际帝国主义阵线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缺口。在东欧，苏联官僚机构一般都表明自己准备同1944年到1945年的旧统治阶级和政党合作，甚至同曾经和纳粹占领者沆瀣一气的妥协分子合作。但是，由于这些统治阶级和政党名声太坏，十分明显地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因而使这种结合难于支持下去。结果就采取官僚主义方法或多或少地赶紧废除了一些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以作为建立一条反对帝国主义防线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帝国主义的反苏目的在1946到1947年期间已经更加明显了。

某些政治派别，特别是修正主义的巴布洛集团，或明或暗地辩

解說，这些形势和托洛茨基的关于世界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和作用的分析相矛盾。它們进一步推断說，在先进国家里建立一个独立的馬克思主义领导的工作必須无限地延期，以等待革命的中心轉移到先进国家里。

中国、印度支那和南斯拉夫的經驗并不与托洛茨基对于**作为苏联官僚机构的理論和綱領**的世界斯大林主义的分析相矛盾。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由于比較不受共产国际組織上的严格控制，所以能采取把民族解放斗爭和社会革命結合起来的比較独立的政策。但是，在为政权而斗爭的每一个步驟上，这些党的领导都同苏联官僚机构发生冲突，因为这个官僚机构为了“和平共处”的利益，希望限制或消灭这些运动，或者使之服从于这个官僚机构本身的目的。

另一方面，北京和貝尔格莱德的官僚机构，由于它們的經驗主义观点、斯大林主义的教育和“一国建設社会主义”的烏托邦改良主义的想法，完全不能确立一种帮助欧洲工人为取得政权而斗爭的綱領或者組織。这些官僚机构始終是以它們自己当前民族利益为目标的中間派，不能了解世界大勢的范圍和方向。最近的貝尔格莱德會議就是这些领导人破产的一个有力证明。

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沒有西欧或者美国工人阶级的援助是不能彻底成功的。所以在西方夺取政权是合理而协调地統一和发展經濟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7. 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苏联的改革和1956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結果，并没有改变苏联官僚机构对于世界革命的态度。事实上，雅尔达—波茨坦<sup>①</sup>政策和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处”政策基本

---

<sup>①</sup> 苏联与西方国家訂立的关于1945年以后在欧洲解决問題的战时协定，其中包括放棄西欧革命斗爭。

上是一脉相承的。目的仍是限制和引导每一个群众运动高潮以便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妥协。即使“支持”起义，那也只是为了在谈判中取得讨价还价的有利条件。

前一个时期，同资本主义妥协的政策产生自苏联内部的软弱和争取时间的必要。今天，倒是苏联本身所控制的巨大力量，使苏联官僚机构感到恐慌。俄国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潜力对于世界资本主义永远是一个威胁，因此迫使帝国主义采取以军事联盟和氢弹作为后盾的怀疑和反对态度。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追求的都是一种安定的生活——取得关于世界均势不会打乱而使自己陷入深渊的保证，借以巩固其在国内的地位；因而不可能有扩大革命的任何意图。

8. 为了应付国内人民和为了防止全世界共产党的批评，不能不为这种立场提出理论根据。这种根据的最新形式是对于“教条主义”的攻击；这一运动基本上是修正了列宁主义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结束只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在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而组织在革命政党里的无产阶级进行决定性的干涉。代替这种看法所提出来的概念是：这是一个在苏联“巩固”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计划经济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而随着这一问题的明朗化，就会出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事实。同时，否定独立的工人阶级的行动，或者使之服从于建立一个广泛联盟的工作。这个联盟包括“爱好和平”的资本家在内，并且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恢复一种帝国主义前期的和平资本主义；因此，真正的目的是成立1944年到1947年类型的一系列新的联合政府，以几个阶级为基础，能够同苏联谈判有效的和平与裁军的措施。必要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服从于这个目的。罢工运动遭到压



制，反对帝国主义軍事联盟的独立运动（如在日本）被譴責为冒險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被擱置在一边，旧的沙文主义的口号被提到最前头来。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共产党成立时为之斗争的一切完全被顛倒过来了。无怪乎共产国际的早期历史和宣言被神秘化了，并且有效地加以隱瞞，不让党员知道。

9. 社会民主党养肥了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也养肥了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不断給与社会民主党以支持是因为社会民主党能够采取反共路綫，而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史給这种反共路綫提供了必要的根据。另一方面，共产党不仅从十月革命的吸引力得到了好处，同时也从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明显的墮落上得到了好处。当然，問題不是像某些天真的人所相信的那样：工人阶级运动已經分裂，只要领导之間达成某种妥协和澄清誤解来实现一个“人民陣綫”，一切就都可以沒有問題。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都必须清除掉并取而代之。但是这两派对于威胁着要成为代替它們的吸引人的目标的任何运动都要进行頑强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它們甚至会結成邪恶的联盟。

10. 近年来，人們对于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越来越不滿。这种不滿是以消极的方式表現出来的，如冷嘲热諷、漠不关心和脫离組織等等。在一切国家里，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經濟战綫上的雇主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和青年不断发现一些“非官方”的斗争和組織方式，这些方式一再表明建立一个新的革命领导已經具有客观基础。在这些斗争經驗中和在与傳統领导的决定性的冲突中應該建立起这个领导。

11. 必須建立独立的馬克思主义政党以便更換领导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必須立即着手改組第四国际，把一切坚持正統的托洛茨基主义根本原則的馬克思主义党派重新团結在一起。在这种

改組中必須反对一切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特别是反对那些具有“客观主义”傾向的修正。这种修正不恰当地強調社会主义必然客观地实现，因而降低了有意識地建立一个革命領導的絕對重要性。

### 3. 現阶段的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

#### (1) 引言

1. 工人階級的假的領導人所起的作用和他們的思想符合于現阶段帝国主义的客观需要。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不仅依靠少数先进国家的工人貴族，而且也依靠与非資本主义世界有特殊关系的現代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控制之下的新的世界人民阶层。先进国家已經完成了巨大的工业和金融資本的集中，軍国主义化以及經濟和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化，經濟越来越依靠国家的干涉，結果就产生了一个包括大銀行和壟断企业、政治、軍事和保安机关，“社会服务”事业和操纵“公共輿論”机关的行政官員、管理人員和官僚的新的中間阶层。这个中間阶层忠实地为資本的国际需要服务。在落后国家里，他們在屬於民族主义小資产階級的統治階級（帝国主义已經把政权交給了这些統治階級）身上找到了他們的同类。联合国及其屬下机构的作用是对于这种制度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安全作全面的檢查。

2. 現代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就是要依靠在先进国家、落后国家和联合国組織里的这些中間集团。苏联官僚机构的作用是要在客观上帮助这些新兴的中間阶层及其政治代理人帝国主义带来暫时的穩定。苏联經濟的稳步发展对于帝国主义是一个直接

的威胁，但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试图用国家的官僚主义的操纵来调和十月革命及其成果与帝国主义敌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官僚机构控制和指导之下的苏联经济发展的经济后果，表现在与殖民地新兴中间阶层的合作上，正如苏联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危机的政治后果，是工人阶级在统治的官僚机构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上服从于官僚机构的需要一样。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机会主义者所要依靠的正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

3. 因此，在目前帝国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坚持机会主义就有了客观的阶级理由。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就不仅是在同一个运动中各派别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革命觉悟是实行变革的重要因素。依靠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认为可以迫使机会主义者及其背后的阶级力量起一种“进步作用”，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和骗人的。只有那些引导工人阶级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取得政权的道路的人才真正是进步的。不对一切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能建立起这样的领导。

4. 第四国际永远从帝国主义时代突出的特点的角度来探讨特定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全面需要决定着各社会集团和政治党派所起的作用。资本主义所发展起来的世界市场和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使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以这种国际主义的观点来看先进国家或落后国家里的一切发展。在这整个局面中，只有工人阶级能改变当前的形势，所以我们要以国际工人阶级的观点来考虑每一个问题。各国的运动和发展的特点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共同类型的变种而应该被理解为是局部现象，它的真正的重要意义要在帝国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世界战场上来决定。

5. 先进国家里的形势，尽管有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背

叛，仍然表明同 1918 年以后的年代有显著的不同。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曾经由于巨大的经济或政治上的失败而失去斗争能力。尽管有胆小鬼和失败主义者的表面现象以及天生的悲观主义，但是，先进国家里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情绪从来没有这样高涨过，他们并没有因为失败的痛苦记忆或者大批人失业的挫折而受到阻碍。而且这一时期在许多重要方面对于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是不利的。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发展和胜利时期曾经得势。斯大林主义在帝国主义混战失败的年月里养肥了自己。但是，在最近这一时期，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它们谁也没有得到便宜。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唤起、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不时表现出来的真正强大的战斗能力。

6. 每一个先进国家，按照它在帝国主义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正在导向阶级斗争的复活和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大好机会。在比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危机使它们必须进行调整，而这些调整是与旧的掠夺方式不调和的，并且给传统的工业和政治机构带来极大的紧张。在比利时、法国和英国，这种经济和政治危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很明显：在比利时是普遍的大罢工，在法国是军事独裁统治，在英国是因为资本家阶级准备对工会组织实行必要的进攻而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危机。资产阶级企图侵犯工人阶级 1945 年以来得到的利益，借以解决它的更为迫切的问题，并且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将看到下一次的在世界革命方面的质的飞跃。没有这种飞跃就不能打破斯大林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于群众力量的目前的统治和限制。只有在先进国家里突破这种统治和限制，才能在落后国家为工人提供政治和经济条件以使他们在一旦推翻了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之后保有无产阶级政权和

走向社会主义。同样,只有西方国家里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复活,才能给苏联工人阶级以必要的支持,使之对官僚机构进行革命斗争。

## (2) 欧洲资本主义为安全和稳定而斗争

1. 西欧各大国控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组织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它们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取得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的地位。英国是用伦敦的金镑维系着一个世界帝国的十分成熟的老大帝国主义,但是它的工业组织已经呈现出衰老和僵化现象。表现为政治形式的最有力的因素是随着法国在1870—1871年的战败而兴起的新德国,它的经济是与煤炭和钢铁大王——这个国家背后的真正力量——的需要联系着的。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最软弱的是法国,它和英国一样成熟,却远不如英国那样高度工业化。它受到人口停滞现象的压迫,而它的经济可以说是属于不劳而获的性质,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和沙皇俄国及以前的敌手——英国——结成联盟以谋求安全。英国、法国和俄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德意志帝国和它的中欧盟友与僕从——奥匈帝国——的扩张。

2. 在列强彼此之间经过四年血战之后,欧洲的形势改变了,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改变了。三个帝国瓦解。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获得胜利并随着战败干涉军而把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引离世界资本主义轨道。在德国,工人阶级革命得到了大好机会;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缺少革命领导,又失掉了这些机会。德国恢复了资本主义,但它的基础却遭到了削弱;第一次取得全部政权的资产阶级所面对的是一个战斗的工人阶级。法国遭到蹂躏和

人力(这是一个最不能提供这种人力的国家)的损失;它的统治阶级长期处于缺乏自信的危机中,因而造成了1940年投降的结果。在一切欧洲国家中,英国在许多方面是唯一从1914—1918年的战争中得到便宜的国家;它维护住帝国主义的屬地和地位,沒有遭到德国的掠夺,并且实际上它的帝国还有所扩大。但是,这个胜利的代价是高的。它所付出的是它的世界地位的急剧恶化。在互相混战的年代里,工业的停滞,金鎊为了对抗美元而不断进行斗争就是这种恶化的标志。

3. 整个欧洲是绝对地衰落了,与美国之同时上升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支配地位相比较,也是如此。日本作为争取大国地位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和一个激烈的经济竞争者的出现,表明欧洲不再是全世界的中心。尽管有斯大林主义的一切歪曲,苏联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不是唯一想得出来的世界制度并且警告资本主义要生存就必须进行斗争。

4. 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欧洲内部的国际竞争,与美国保持既亲近又疏远的关系,所有这些混在一起就产生了国际战争外交史的复杂典型。当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在德国导致统治阶级采取法西斯主义时,英法的统治阶级感到进退两难,究竟是把复活的德帝国主义当作主要危险呢,还是在革命的威胁面前和这个帝国主义结成同盟。从这个两难的处境中就产生了慕尼黑会议和维希政权,但是也带来了1939年9月3日的对德宣战和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新战争。

5. 1939年到1945年战争的直接结果是资本主义在整个西欧和在不发达的东方的衰落。三十年代的长期的经济衰退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弱点,因而破坏了人们对这个制度的信任,从而导致一些国家采取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又加深了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的敌对，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与战争到处结成不解缘，这种责任是要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来负的。在被占领国家里，大部分统治阶级和纳粹党人实行广泛的经济合作，使这些统治阶级进一步失去信誉。合作主义者的政权不仅在英美军事机器面前而且在抵抗运动中的武装人民面前归于瓦解，这就产生了一种局势，使政权暂时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回到了“军人集团”的最基本的形式。但是，由于共产党和它们的同盟者的有意选择，在“一个警察、一个军队、一个国家”<sup>①</sup>的口号之下，通过英美军政府和傀儡政府，这个政权由它们带来的或者从社会的废墟上收集来的政客转交给了资产阶级。因此，西欧资本主义的恢复是苏联官僚机构反革命政策的结果。

6. 尽管旧的统治阶级缺乏自信、怯懦和能力薄弱，但仍能因此保持或者恢复它的政权；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有过这样好的运气。

诚然，统治阶级接收过来的国家遭到了战争的蹂躏，和世界市场的联系已经中断多年，并且处于一种经济匮乏的状态中。欧洲的衰落似乎比第一次大战后更无可挽回。

但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经济生活就恢复了战前水平并且开始超过这个水平，这证明现代工业技术的恢复力量而不是证明资本主义关系有任何固有的生命力。资本主义确已普遍瘫痪。它必须靠着政治措施和靠着工人运动默认帮助它恢复那些不是必须绝对由国家直接接收部分的营利能力来给它以支持。

7. 这一工作如果没有首先是以贷款，其次是以在马歇尔计划下的帮助的形式，从美国涌来的巨大的援助是不能完成的。美国

---

<sup>①</sup> 这是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在1945年用来主张解散共产党游击队的口号。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和其他共产党领袖采用了同样的论点。

資本主義靠着兩次大戰的助力已經上升到世界權威的地位。在兩次戰爭期間，它的生產能力有飛躍的發展，強大到足以負擔一大部分資本主義世界。它必須這樣做有很多理由。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誠然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者，但是它也不能坐視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社會革命或者由於蘇聯的吞併而被排除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以外。那樣不僅要威脅美國的世界地位而且一定意味着西歐作為投資地區和市場的結束——就東歐來說，這種局面是在和蘇聯進行困難的談判（斯大林在這個談判中“放棄”了西方，包括希臘和應得的百分之五十的南斯拉夫在內）中勉為其難地接受下來的。所以西歐不論作為一個軍事樞紐或作為一個經濟上的同盟者對於資本主義美國都是不可缺少的。況且給與遭到戰爭破壞的歐洲經濟以援助對於美國的能力來說，並不是一種過度的負擔；實際上，它幫助避免了一般人預料遲早要出現的戰後經濟衰退。蘇聯的威脅使美國不能坐視西歐資本主義被削弱，必須不惜以任何代價予以援助，即使這個代價意味着冒某種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危險。

8. 因此，美國政策的目標是歐洲的經濟恢復，鼓勵和幫助各國間的合作。隨着冷戰的加劇，把德國的占領區合併起來成立一個新的聯邦國家，這就為在五十年代出現的德國經濟的驚人的復興準備下了政治條件。此外還極力恢復歐洲和世界市場的聯繫，因為要想給資本主義殘廢的身體注入新的生命，這是必要的。某些美國的政策制定人試圖把歐洲各政府自己不會選擇的政策強加給這些政府，但這些政府一旦站起來的時候就會有足夠的討價還價的本錢以取得某種程度的獨立自主。同時，歐洲的資產階級顯然和美國的統治階級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隨着冷戰的發展，通過柏林空運和朝鮮戰爭，由於對美國軍事援助的依賴和共同戰略的要求，



在欧洲产生了一些超国家的組織；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个新的神圣同盟，其目的是对付“共产主义侵略”和“内部顛复”，但是与十九世紀的神圣同盟不同的是，在它支配之下的有一个强大的軍事打击力量和一个横跨过欧洲直延伸到苏联集团边境的政治和經濟根据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逐步地为核战争的需要服务并且为軍人阶层提供了一个坚固的障地。这个軍人阶层在一切資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十几年的战争和战争准备而变得相当强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表明决心用强大的武力支持西欧資本主义，在这个組織里，各个国家所分担的責任在共同战略中不可分地联系着。

9. 随着欧洲軍事的加强产生了一个新的經濟上升。战后复兴的需要給予經濟的刺激、重新建立对外貿易关系的运动、新技术的发现和美元的流入，所有这些都由于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的巨大軍費开支而在积极地推进着。从这一点出发，在五十年代里，一个以民間投資和消費品市場巨大发展为中心的真正資本主义繁荣把生产和貿易帶向一个新的高峰。这个新的資本主义上升带来了，同时也一部分依靠着，比战前更为密切的政治与經濟的关系。在資本主义的根本社会关系不变的同时，国家作为支配階級的工具，完成了以前屬於私人企业范围的或者任凭市場随便执行的某些任务。某些重要工业，特别是那些缺乏技术和不能获利的工业的国有化和由国家控制一部分新的投資是这种新政策（自然不是全新的，但現在对于資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和这些措施一起也采取一些社会措施。这些社会措施，一部分代表着群众的压力，但如果資本主义要存在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总的情况”使很多人高談資本主义已經改变或者已經消灭，因此就給新的修正主义派准备了滋生的园地，这些派别根据很

少几年的經驗就认为資本主义矛盾已經不存在，并建立起新的“理論”来支持和說明已經确定了的政策。事实上，这些政策显然有助于資本主义的終于繼續存在下去，不管是不是在繁荣的条件之下。

10. 这里对于繁荣的現實性沒有任何怀疑。欧洲資本主义又能再一次大規模地从它所能支配的人数众多和具有高度技术的无产階級身上压榨和实现剩余价值。即使在德国，这里也确实没有什么奇迹。它无论如何不表明資本主义本来就比較牢固或比較稳定。事实上这个新看到的繁荣內部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

11. 首先，整个一系列促成这个繁荣实现的方針措施是以这样的事实为条件的，即資本主义在全世界面对着一个使安全的根本条件成为空談的生死攸关的挑战。美国統治階級願意給欧洲以非軍事的和軍事的援助和在欧洲大陆上駐扎軍隊是苏联威胁的直接結果。在早期发展上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和仍然繼續对欧洲經濟有影响的軍事开支来自这同一个原因。法国和英国政府願意承认德国——它們在大陆上的經濟方面的主要竞争者——首先是經濟上的，其次是作为一个政治和軍事对手的复兴也产生自这一种恐惧。一系列超国家組織虽然在建立时关于設想的“欧洲”意識形态发出了大批的口头和书面的說明，然而这种建立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斯特拉斯堡某处存在过并且仍然存在着一个欧洲委员会，欧洲議会的議員們聚在那里編造一些理想的动听的詞句，但是这些很快地就在冒着濃烟的工厂烟囱……和火箭基地的后边消失不見了。也許很少人知道有这样一個組織存在。

12. 欧洲政府被一个在和平时期所曾經看到过的和被梵蒂岡祝福过的历史上最龐大的軍事联盟束縛在一起。对于这些政府來說，空談一番統一欧洲的理念成为了一种政治上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产生自資本主义基础的强大而是产生自这个基础的軟弱。

十年来人为的合作并没有消灭了三百年来的历史。旧时代的窃取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利地位的做法只不过是采取了新的形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经济情况表明市场可能停止扩张或者开始收缩，资本家所关心的就是在斗争中追求本国的利益。军人和雇用军人的人非常愿意看到由其他国家武装和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队伍交给别人指挥。只有在他们设想苏联对他们有侵略的威胁因而暂时抱有共同目的的时候才能实行军事合作。

13. 欧洲三个大国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企图并且要在每一个适当时机，有时如戴高乐那样鲁莽地，有时如阿登纳和麦克米伦那样小心地，实现这些企图。

14. 法国 法国的情形特别有教育意义。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战争给法国阴暗的社会关系带回来一种溃烂因素，使这个国家成为二十世纪中叶的“欧洲的病夫”。诚然，这里有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的巨大增加，现代生产方式的普遍推行和戴高乐上台以后的收支平衡地位的加强。这些进展虽然表面上很动人，但只能进一步造成社会的紧张，给整个社会组织带来分裂的威胁并再度为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革命力量，在现场进行干涉准备条件。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小资产阶级对于政治和经济现代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调整感到的愤怒为戴高乐开辟了道路。阿尔及利亚社会革命的挑战为法帝国主义提出了无法解决的问题使整个国家机器于1958年5月濒于崩溃的地步，因此使戴高乐的上台得以实现。

15. 第五共和国是一个在危机中产生的政权。那位起着军事独裁作用(这是与他的性格相适合的也是法国的社会状况造成的)的总统不能对法国资本主义问题作根本的解决。经济上的成

功——生产上升、收支两抵后的盈余、高额的利润——是从压制或者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得来的。这里边包括着：第一，贬低币值，第二，强制实行一种第四共和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基础的警察制度。总统必须在不调合的社会力量之间起一种平衡作用和甚至有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某些部分，国家机器的加强和总统的起这种作用只有在工人阶级默认之下才能实现。因此，军事独裁的“成就”是1945年以来长期过程的产物。事实上，这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许多年来的背叛所造成的，在这些年代里，工人阶级曾经屡次证明他们有巨大的斗争能力和坚强的斗争意志。因为没有建立一个新领导的自发行动和马克思主义者没能够及时地提供另外一个领导，所以才导致了1958年5月的失败和以后工人阶级的漠不关心。法国工人阶级仍然被掌握在旧有组织的手里，即或暂时没有流于消极冷淡，但也不能从事于真正反对那个政权的斗争。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没有给那个政权以支持，在混乱和迷惘的情况之下，工人阶级仍然是那个政权所恐惧的一种潜在力量。就目前来说，戴高乐愿意让旧有的领导人替他压制这些工人。他并不想解散工会或者工人阶级的政党，因为工人在他们现在领导人控制之下不像他们原来那样地危险，同时也因为有时候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工人反对威胁他的政权的其他势力。突出的是，1960年2月和1961年4月，当这个政权受到阿尔及利亚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反抗的将军们的威胁时，工人阶级领导人在保卫共和国的口号之下竟纠合起来支持那个政权，正如他们在1958年5月支持前政权一样。

16. 戴高乐以这种方法操纵工人阶级显然是在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他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肯解散它的组织，但是他想要把工人阶级和他的体系更有效地联结在一起以取得工人阶级

将来循規蹈矩的某种保证。到现在为止，这并没有做到多少。唯一的办法是像现在这样玩弄花招，这必须有一种高明的手腕和甘愿冒险的精神而这大概是他的继任人所不具有的。但是，提到继任问题，人们会感到现在没有这样一个适当的继任者，能够具有戴高乐的一半能力，把不可调和的社会力量统摄在一起。对于这个政权或者对于戴高乐本人的每一个威胁都表明这个政权面临着无底的深渊。军事独裁所取得的稳定完全是暂时性的，不会比这个更多。至于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将来各种力量之间的更为公开和激烈的冲突。这是每一个明敏的观察家所看得到的；这是在正常的表面现象后边隐藏着渗透一切的恐惧，它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中间造成恼人的疑虑和不安。

17. 七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斗争在不断增加的冷淡、嘲讽和不时发生的反对中继续下来。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群众为土地、面包和管理自己国家事务而进行的不可压制的巨大斗争，使法帝国主义难以找到一种妥协方案，也使阿尔及利亚的民族领袖难以接受这个方案。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和种族主义者集团的殖民主义者的存在和军队的态度——如1961年4月的事件所表明的，他们准备取得政权——减少了谈判的余地。但是法国资本主义于在北非和在整個非洲保持权益的同时需要结束这个战争。资本主义的眼光敏锐的代表人物，包括戴高乐在内，知道：如果要想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掠夺，就必须对民族主义领袖做出某些正式让步。那就是说，欧洲人必须让出某些特权交给一定会取得政治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在此同时，如果不能从民族主义者得到关于欧洲人土地财产、资本投资、沙哈拉油田和军事基地的保障也不能做出这种让步。赋予这个“独立”和这些保障以确定的内容是一个在谈判中不易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原则问题。

題。但是任何一方都不能隨便決定它的讓步範圍。戴高樂必須與“極端殖民主義分子”和軍隊爭論；民族主義領袖們必須與戰場上的戰士和阿尔及利亚农民和工人的革命潛在力量辯論。雙方都需要一種妥協，但是由於來自他們自己那一方面的壓力，任何一方也不能在他們願意接受的條件下取得這種妥協。

18. 在法國這一方面，那些裂痕是公開的和可怕的。軍事獨裁政權的“強大國家”里有一些分子甚至對那個統治者是否支持也很成為問題。如1961年4月事件所表明的，高級官員和軍隊領袖，在緊急時刻，要知道誰將獲得勝利然後才肯委身聽命。每一個人都知道在國家機關和在軍隊里到處都是陰謀詭計。很長時期以來，法西斯恐怖集團就能夠安然無事地從事組織工作和取得他們的暴行所需要的爆炸物，其規模之大只有用軍警官員參加了密謀來解釋。同時，農民——由於經濟力量的日益集中而受打擊最甚的那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中間的大規模的騷動也加深了社會危機。

19. 所以這個政權並沒有順利發展的前途。所能看到的只是進一步的深刻的動蕩不安，繼任人選仍然是一個公開的和不能解決的問題。即使人們認為是自由主義的作家也覺得不會再回到議會制度上去。警察權的建立和軍人階級的驕橫使資產階級有可能通過某種形式的作為最後手段的法西斯主義來實行統治。這樣一種解決辦法自然須通過工人組織的服從或者完全瓦解的道路來實現。尖銳的衝突、工人階級抵抗的重新覺醒——自然給一個新的戰鬥的領導帶來了好機會，如果能建立起這樣一個領導的話——似乎是法國形勢中所固有的。但這並不意味着輕易就可以抱樂觀主義。革命先鋒隊的不够壯大和它所擔負的歷史使命的艱巨從來沒有這樣不相稱過。如果說樂觀主義有根據，那就是法國工人階級

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尽管由于一系列的失败而耗尽了力量，并遭到错误领导人的出卖和迷惑，但法国工人阶级仍然体现着丰富的革命传统。

20. 不管表面怎么样，法国的政权是朝不保夕的，此外戴高乐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不妥协态度也增加了这种局势的严重性。现在的法国政府一方面需要美国和其他任何人的支持，一方面却惟恐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这种态度的背景是：第一，法国有五十万人被牵制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以法国政府惟恐自己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受到影响。第二，法国资本主义自己不敢开刀的阿尔及利亚脓疮会引起外来的——也就是美国的或联合国的——注意，以确保阿尔及利亚不至落入苏联势力范围或者走古巴的道路；这是无论如何不能不防止的。所以这就不仅是戴高乐的骄傲和民族主义立场问题。但是，这样一条独立道路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遵循到底的话），确已引起某些法国资本家和他们政治代理人的恐惧。因此就在法国统治阶级队伍中造成一个新的分裂根源，如在英国所归纳出来的那样，有的主张自己拥有核打击力量，有的主张躲避在美国人的庇荫（如果这个词恰当的话）之下。

21. 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比它的各重要组成部分更强大。至少法国这一环节是成问题的。法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的外交目的是要在英德之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为它的同意美国计划索取最高的代价。近年来，特别是戴高乐上台以后，法国和德国的关系有所改进，和英国的关系则趋于恶化。英国由于它和美国较亲近的政治地位——从拥有较大的物质力量得来的——于是企图利用这一点来阻止欧洲国家采取威胁到它的利益的政策。因此，英国的政策是防止任何强国或强国集团在欧洲大陆取得优势以至损害到它的商业和政治影响或者削弱它与英联邦和英镑区的

关系。欧洲政府在美国支持之下企图通过关税联盟以实现密切的經濟关系，因此就引起了英国的反对，虽然这个联盟有它的吸引人的特点。甚至法国人或者至少法国資本家階級的某些部分也有一个时期对这个联盟不表欢迎，因为看来得到重大利益的一定是德国。这种勉强的态度终于被克服，并且因为欧洲共同市場从表面上看来将使法国工业得到重大的經濟利益，所以法国政府成了这个新組織的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它这样做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正如英国为了本国的經濟利益不参加共同市場并在以后把共同市場六国周圍的国家組成自由貿易区一样。

22. 西德 但是經濟利益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在欧洲进行的一系列复杂的外交活动都抱有这种意图。现在可以說主要是波恩对于倫敦和巴黎有吸引力，这证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战后欧洲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英国政府认为西德既是一个竞争者又是对于法国称霸欧洲的一个抵制力量，这种称霸从戴高乐对于核打击力量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态度看来是討厭的。不管怎样，尽管戴高乐有称霸一时的幻想，但德国的兴起和阿登納与其同伙的狡猾已使法国称霸欧洲成为不可能。

23. 在德国反动政府統治之下重新武装西德，把許多以前的納粹分子安置在非軍事的和軍事的重要地位对于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是一个特别的威胁。欧洲最强大的資本主义工业国家的重新軍国主义化有动搖的可能，共产党对于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做出正确的估計而西欧資本家（对于这些資本家德国是一个反对苏联的盟友）則掩飾这种可能性。共产党反对西德軍国主义的宣傳其目的是喚起宣傳对象的民族主义的反应，这与工人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直接相違反。这样的宣傳一方面正式解除了“德国人民”的責任，一方面对于工人階級未能阻止重新軍国主义化的原因也沒有



做出分析。我們必須以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所造成的悲慘的历史經驗为背景来看德国工人階級的軟弱。这种背叛为納粹主义开辟了道路。1933年以来工人运动的遭到毀灭、战争初期納粹主义在軍事方面的成功、在希特勒的“新秩序”之下对于欧洲的掠夺,所有这些都使人們于1944年以后难以克服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

24. 在战后选举中,共产党的选票逐渐减少,直到共产党——曾經一度在西德获得坚固的根据地——喚不起群众任何同情而被迫轉入地下。在五十年代里发展起来的激烈的反战运动失去了动力,而联邦軍的出現似乎也是为群众所接受的,即使沒有受到欢迎。原因究竟何在?苏联政策对以上两种情况都負有很大一部分責任。共产党从来沒有得到过战前那样的支持一部分是因为斯大林主义的教訓;俄国占領軍的行为、从苏德台区和东方逐出德国人、东德政权的性质、避难者的不断涌入——所有这些比斯大林說的話更有力量,和納粹分子的宣傳比起来,把人們对于工人階級几十年斗争的追念消灭得更为彻底。其后,在1956年,匈牙利的起义——仅仅在柏林同样事件的几年之后——帮着說服了頑固的德国人;他們的統治者談到从东方来的威胁和有必要重新武装是正确的。斯大林主义真正带来了恶果。

25. 但是,尽管有斯大林主义带来的恶果和社会民主党以采取一个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和階級斗争痕迹的新綱領作为最后結束的背叛史,德国的局面仍不是完全无望的。在战后的年代里,許多德国人有很多理由证明他們應該脱离政治去重新建立他們破碎了的生活,他們这样做不知不觉地帮助了德国資本主义的恢复。但是資本主义制度只能得到强大的德国工人階級暫时的拥护。在工厂、矿山、工地和办公室里每天都可以重新看到階級斗争。德国工

人階級將重新發現自己的力量和擺脫掉曾經出賣過它的領導。可是，這個任務是艱巨的，反對整個歐洲資本主義鬥爭的最初行動看來不見得來自於德國。因此，法國和英國的工人階級運動就特別負有責任，首先不要為克里姆林宮或他們自己的統治階級的宣傳所影響而抱有反德情緒，尤其重要的是盡可能在鬥爭中給德國工人以幫助和支持。例如，西德在五十年代里的反戰情緒的銷沉雖然應由蘇聯負責，但這個偉大運動的消滅，一部分也是由於未能在英國和法國得到支持。一個支持德國重整軍備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氫彈的工人運動不能給德國人民以任何教育。

26. 我們不能認為德國的資本主義已經以某種方法發現了永久繁榮的秘訣。不錯，1957年經濟衰退的打擊是輕微的。但是，德國的繁榮與投資和出口的大量增加不可分這一事實就意味着非常有可能受到經濟衰退的打擊。國內和國外市場的停止擴張——國內市場不能隨着工業生產的速度發展，所以出口很重要——就預告投資和繁榮將要結束。即使沒有深刻的衰退危機，一個時期的不穩定突然變動和變化，在德國特有的條件之下，也一定會加強工人運動的鬥爭意志和有助於新領導的出現。

27. 儘管有這種長遠的希望，但是如果現在和在最近的將來不充分估計到西德經濟力量的重要性和密切注意西德統治階級的方針政策，那仍是不現實的。在大托辣斯已經恢復了舊日經濟地位的同時，它們的政治代理人從最近幾十年的動蕩不安的歷史中得到了教訓，已經着手於為支持資本主義而想出一些新辦法。“正統”的經濟政策和壟斷資本主義基礎的結合，有計劃地對於工人階級或工人階級的享有特權部分採取讓步的社會政策、收買工會的大部分和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所有這些雖然不是新的，但艾哈德和阿登納都非常堅決地予以貫徹。對於工會的怀柔——給工會以共同

合作的幻想——和由工会巨头对于会员进行教育都是一些典型的例子。社会民主党承认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作上公开合作，给社会上带来了一种显然团结一致的力量。我们必须对这个力量做现实的估计，只要这种力量的基础，经济发展的本身，能维持下去，想要由一个新的领导突破这种力量是极端困难的。

28. 现代欧洲最残忍的工业大王和他们的政治代理人指导着经济的上升，所以随着这种上升带来了明显的危险。今天人们在西德公认，如果没有市场的继续扩大——实际上就是为获得剩余价值寻求道路——利润率势必降低而整个繁荣时期可能濒于危殆。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在论帝国主义时所分析的那些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再一次证明了本身的正确。近年来，西德正在共同市场上和在更远的地方积极寻求外部出路。西德在往来交易上是一个债权国家，马克是一种行情高的货币。在此同时，可能有的出路却由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或者政策以及由于苏联的“铁幕”而受到了限制。诚然，西德和东欧及苏联是通商的，但这是不够的。西德资本家，为了经济的理由，不是为了爱国的情，感到有必要恢复他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一般在东欧的主要是农业区的内地。现在在这个地区进行着的开发本身就意味着给西德托辣斯大量生产的装备和重型机器提供出路，同样也为消费品提供出路。向东方推进的内在压力已经反映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因此，西德政治家的民族主义和好战的姿态就不仅是在演戏或者是在迎合舆论；虽然那些控制着贪图金钱的报纸和宣传机器的人在千方百计地制造这种舆论。冒充解放者的美国人支持着这些人，对各广播电台和各种组织提供资金并从事组织工作使它们在这个战场上带头进行攻击。

29. 这些党派今天在德国没有遇到强大的有组织的抵抗。社会

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同盟互相竞争来助长这种政策。新国防军使人们对积极政策感到兴趣，同样也为这一政策制造了新的工具。柏林局势为德国内部的扩张趋势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使它有办法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取得支持，借此可以煽动对俄国人的仇恨和为新的扩张主义制造必要的气氛。1945年以后在群众中间看到的厌战情绪不断地处于宣传攻势之下，这是为了像1914年以前和1939年以前一样，把群众统合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机器中。

30. 无疑地，柏林危机曾经被尽量利用、夸大来达到选举前的目的，在德国准备土壤并向盟邦表明，和苏联打交道，它们唯一能够采取的就是西德的政策。没有任何方面对于制造这种危机感到厌恶，完全蔑视它们所操纵的群众的利益，更不必说还有引起连锁反应把人类带入核毁灭的危险。这种紧张气氛是施特劳斯和阿登纳所特别欢迎的，因为可以减少对于他们的政策的反抗，这些政策是他们作为德国大资本家代理人所希望采取和从西方国家得到支持的。

31. 大战以来，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显然变得更为亲密了。对于英国的统治阶级来说，在共同危险的面前，和他们的同伙作更密切地联合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仍然把对方看作为竞争者。外交上的握手，伪善的笑容和措辞谨慎的讲演对于任何人也掩盖不了欧洲各强国之间的真正关系。这些国家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此完全不同。工人不能让他们统治者在工资谈判中或者政治策动中制造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和。把资本主义消灭在它的策源地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经济以真正带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一个巨大的单一市场的利益（现在对于这些利益只是作了一些口头的诺言），工人在这些事情上具有真正的共同利益。英国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必须把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口

号写在它的旗帜上。

32. **英国** 英国很久以来就是最保守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心，这里的局面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工人运动中的传统关系正在以法国或德国没有试验过的方式被削弱着，旧领导正在遭到严重的挑战。已经出现的强有力的派系，如果有正确的领导，能够永远脱离阶级合作的路线。在单方面裁减核军备运动后边集合起来的群众力量与中间派和过去的斯大林主义的和平运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反对氢弹和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意味着和代表两党的外交方针因之也就和阶级合作的路线决裂。非常有重大意义的是，新的力量加入了这些斗争，不再为冷眼旁观主义、日常工作和为政治前途着想所限制。他们帮着促成的动力导向1960年的斯卡巴罗决议，为在工党中把反对盖茨克尔领导的斗争进行到底准备了有利的形势。基层党员的重要部分、大部分青年和甚至某些工会领袖积极活动在政策的后边，其中包括着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因而也就是和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彻底决裂。不过，斯卡巴罗年会以后，左倾的动力逐渐消失，同时盖茨克尔集团靠着高明的手腕，对于年会决议的大胆嘲弄和对于党机器的支配竟能重新建立起严密的控制并为正式推翻1961年的决议做好准备。

33. 这种有利局面被推翻的原因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不能专在工人态度冷淡上，在右派的阴谋诡计上或在客观形势的变化上寻求。主要的和压倒一切的原因是工党左派所提出来的代替盖茨克尔及其同党的那些人的破产。这些人不愿意从事真正的斗争，把议会事业看得比原则还重要，对于党的统一有着盲目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托词）。他们显然对于决议的必然结论、不屈不挠的斗争和不仅是对右派同僚而且也是对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非正式原则的挑战——如果他们要把会议上的胜利变成行动就必须进行这种

挑战——感到恐惧。因此“左派”民主党人所提出来的不是担任领导，而只能是与它的性质相符合的虔诚的希望、无益的公式、虚伪的斗争和最后按着他们多年的习惯所能实现的那种顾全面子的妥协。他们驯服地接受给他们的纪律制裁，从来不号召下层党员进行有力的斗争，非常满意地在左派身上找到赎罪的替身，并且寻找一些问题以便围绕这些问题恢复党的统一。无怪乎这些敏感的人物现在心安理得地承认为右派所击败。归根结蒂，他们只是要作反对党内部的一个反对派，领导这个反对派，接受他们的声明带来的后果，所有这些声明都远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因此，从表面看来必然是秩序的恢复。但是，如果说右派在议会中已经恢复了政策制定者的地位——它从来没有失掉在议会中说明政策的地位——情况也与以前不同了。1960年和1961年表明右派是能够被击败的。它的权力日益建立在党的躯壳上而不是建立在活跃的运动上。青年大体上仍是反对它的。战斗的工会主义者同样也反对它。党员人数急剧下降。“左派”的追随者感到精神沮丧，但不了解有利局面被推翻的原因，于是别寻出路以逃脱困境。因此工党的危机不是已经结束而是仅仅演奏了一个序曲，对于新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来说，一切大好机会都在前边。

34. 英国工党内部的斗争证明，工人阶级的国防政策与壟断大资本家控制军火工业的局面是不相容的。甚至下议院公共会计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新武器的军事订货不遵守任何真正的会计原则。资本家正在从导弹和它们的构件上获得巨大的不公开的利润。没收军火工业的纲领可以有绝对的号召力。但是这种没收一定会在机器、电子和化学工业方面深深伤害到英国工业最获利的部分，因此必然导向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出击而意味着革命。

35. 使各大工会支持这样的要求意味着现在要展开一个和左

派傳統的照例要求完全不同的运动。二十年的充分就业已經建立起工人階級的組織和他們的自信心，使雇主想要降低工資和生活条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这种坚定的力量和某些人把繁荣看作是永久的那种滿足傾向相比更为重要得多。

36. 上次选举以前和剛剛过去那一时期曾經产生一种沒有根据的乐观主义。此后，連保守党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英国經濟的根本地位已經发生进一步的相对恶化現象。尽管有十年来的前所未有的繁荣，但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指出来的那些弱点並沒有像一般所承认的那样得到克服。迟緩的投資，因之帶來的迟緩的工业生产和生产率，意味着要不断落后于发展比較迅速的資本主义国家和减少世界貿易額。英国資本主义的双重性——既是一个完全倚靠世界市場的先进工业国家又是一个国际金融資本家和主要债权人——为政策制定者制造了不能解决的矛盾。为了保证英鎊的国际金融地位必須不断地采取延迟工业投資的措施，因此妨碍了竞争能力。要想制定一些政策既能使工业得到稳步而平衡的发展同时又能維持和加强汇兌儲备和英鎊的世界地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最老的資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决，資本家階級的最有利的时机看来已成为过去。

37. 即使沒有經濟衰退，英国資本主义所經驗到的緊張情况也是可观的。为了减少緊張情况对商业的影响，英国政府和雇主必然要打击工人階級。最近的紧急措施，特别是要求冻结工資，再一次证明他們希望牺牲工人来解决他們的問題。到現在为止这还只不过是一种初步尝试。随着局势的恶化，特别是如果由于經濟衰退和国际貿易的发展迟緩而复杂化，他們将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这就要开始一个新的階級斗争高潮。

38. 工会官僚，如工党的議會領袖，试图把斗争限制在談判桌

上,并公开地与雇主合作来反对工厂管理人和基层組織。但是,矿山、工地和港口以及其他地方的斗士将在外交和国防方面从左派得到支持,虽然在这一过程开始的时候,这两派从表面上看来是分开的和互相反对的。例如,宣布将要在克莱德河口建立北极星核潜艇基地在工人看来一定会是失业现象严重地区的一个取得工作和較高工資的来源。但是,日益扩大的反对核备战运动在当地和在全国有同样的影响。很有可能的是,工人方面反对这种政治上战略动議的行动既标志着为反对氢彈而斗争的新阶段也标志着为工作和工資而斗争的新阶段。

39. 英国工厂主想要从中部地方靠得住的和高度組織起来的工厂逃到工資較低和为工作而竞争得比較尖銳的地方去的企图也遭到了反对。这种动議表明他們鉴于維持車輛运输費越来越困难,所以要寻找方法以降低成本。所以,这些动議都是直接从英国资本主义积弊已深的问题中产生的。

40. 英国的革命領導的任务是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使反对氢彈、殖民地暴行、资本主义的經濟进攻和文化墮落的各种运动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发生关系。革命的領導要积极参加下层工人的运动并把这些运动和国际斗争与殖民地斗争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在英国开展一个群众革命运动和建立起馬克思主义的党。特別由工党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担任着的和通过他們的理論和宣傳工作来完成的准备工作是建立一个革命的党的基础。

41. 这样革命的党,在取得群众运动的信任之后,将提出工人階級保持政治独立的主張。具有这种希望,革命的党将批判由于理論上的混乱、悲观主义和对于无产階級缺乏信任而别寻出路的各种小資产階級和中间派系。当权的階級重視氢彈和与美国联合认为是保护它的社会存在的唯一手段,英国社会主义劳动同盟认



为，为击败这个阶级而斗争是极端重要的。这一斗争将导向于夺取政权。循着这个方向，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将号召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工人进行共同斗争来反对备战。同时，它将和一切对殖民地与属地的统治断绝关系并积极支持它们击败反动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工人阶级运动将撤回对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军事独裁领袖的支持，因为他们阻碍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 (3) 美国的资本主义

1. 自上一次经济衰退以来，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中的成就远不是惊人的。1960年，美国经济进入了停滞阶段，特别是在钢铁工业和耐用品工业方面。失业现象扩大是这一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特点，一直达到大战以来任何时期未曾有过的高峰。鉴于苏联发展速度之快，美国对于自己每年的经济发展未能超过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就更感到严重。为美国资本主义辩护的人从高额工资和一般较高的生活水平上得到一些安慰，并认为发展速度不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没有继续的发展，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将减少，资本主义制度将失去它的主要源泉，而不得不靠着国家不断注射兴奋剂的帮助来维持下去。这种帮助所采取的形式大部分是通过军备计划来开辟一条实现剩余价值的道路。在美国，即使工厂的平常改装，每年也会增加生产率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因此就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要，而同时劳动力却在增多。所以任何经济情况的变动都会带来严重的形势，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承认，五百万到六百万的失业大军是不可避免的。

2. 大战以来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为了资本主义，必须保全欧洲。美国的经济

方針与战略方針和为世界准备条件以使美国資本主义繼續存在下去的目的密切結合在一起。孤立主义不再切合实际，这种关系也不仅是一个經濟問題——支持它的是紧密配合在一起的美国基地网、准备立即采取行动的飞机和导彈，以及航行在全世界大洋上的舰队。只要把世界革命阻止住和压回去，这将是一个美国的世紀。

3. 美国与欧洲被削弱了的統治階級的联合在資本主义的老家保全了資本主义，但这并不是沒有問題的。一則是，欧洲經濟复兴——虽然是美国統治階級非常希望的——使欧洲統治階級相对地增加了它們在政治談判方面的力量。欧洲資本主义的較大程度的經濟独立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后果。一則是，美国的私人資本比以前更多地被吸引到欧洲以利用比在美国发展得更为迅速的市場和那里有的賤价劳动力。因此在1960年，一方面国内的投資虽然减少，一方面，海外的制造工业投資，特別在欧洲，却增多了。此外，虽然某些美国国外的制造业工厂在美国市場上竞争得很激烈，但是在1960年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出口仍有所增加。的确，这些地区的不断的經濟繁荣帮助挽救了国内市場在原料方面和在資本設備方面的衰落。美国經濟和世界資本主义市場的关系采取了許多新形式，它的可能有的后果与我們过去所常見的不同。重要的是，美国資本輸出日益增加的趋势将造成与老資本主义国家資本輸出不同的后果和矛盾。这大部分是对帝国主义国家和老資本主义国家本身的輸出。

4. 这种情况的鮮明反映是美元的削弱，这是过去两年来国际支付差額不断出現巨大赤字的结果。美元的脆弱一部分反映其他货币的更有力量，特別是馬克，同样也反映美国战略所承担的世界义务中包括有巨額的軍費开支和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欧洲中心的較高的利率也引起了資金的轉移，当美元的贬值看来可

能——如 1960 年 7 月到 9 月所发生的情况——进一步给美元带来困难时，这些投机的活动就更变得疯狂。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曾经缩减一些海外开支并曾试图把对外援助的责任转嫁给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同时不能不刺激美国的输出——这就意味着和已经面对着销路减少的欧洲和日本的出口商做更大的竞争。在此同时，美国的商业日益依存于造成这些销路的经济情况。因此，如果西欧将来的继续发展有助于减轻美国的衰退，欧洲的开始衰退也能以过去未曾经验过的方式反过来影响美国经济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永远固定在一个特殊的模型里是错误的。

5. 但是，如果强调美国资本主义近来的困难，认为它作为一个世界力量，眼看就要衰落，那还有很大距离。研究美元的困难必须以美国的巨大生产力和它的战略地位——这个战略地位由于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在先进国家里的日益增多的资本投资而得到了加强——为背景。这些困难不像老牌帝国主义的问题那样严重地威胁着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存在；这些老牌帝国主义的经济发展近年来比美国更为表面化。但是，美国经济不能迅速发展或者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最强大的资本主义也在危机中。每一次经济衰退都留下一个更高的无法减少的失业记录，每一次繁荣都缩小了新的投资范围。资本家仍然以发展的比例榨取和实现剩余价值，但发展的速度正在降低，而在日程上的即使不是深刻的衰退也是停滞。即使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威信也趋向于降低，因为它不能面对苏联的挑战和合理地使用这一世纪可能有的技术。

6. 同时，美国资本主义面对着的是它所必然造成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美国工人阶级已经建立起高工资标准和强有力的组织，由这些组织进行谈判以在资本主义本身规定的范围内维

持和提高这些标准。但是，工人阶级不能超越无产阶级身份为它规定的界限。它有更多可用的消费资料，但仍然是工资劳动者。它有技术，但由于技术的进步，由于整个工业的衰落，或者在经济衰退时期，这些技术都会很快地贬值。同时，大公司把工业力量大量地集中在自己手里也正在为社会主义准备着客观条件。

7. 美国局面的突出因素是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的软弱和马克思主义的党的不够壮大。但是，为了在全世界上击败资本主义，就不能不对它在西半球的主要堡垒作正面的进攻。因此美国的工人运动就担负着巨大的责任，而没有绝对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政治路线是不能完成这些责任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作在一个具有许多特点的环境中，这些特点能够使个人和整个运动软弱和气馁。美国统治阶级的强大，在工贼竞争中取得胜利的人们的较高的生活标准、工会官僚的堕落、工人中间缺乏独立斗争的政治传统、遵循种族思想和种族歧视路线的各阶层和各集团之间的分裂、资本主义宣传机器的渗透一切的影响、旧派领导的背叛、易于流为实利主义和调和理论——所有这些危险都在包围着那些真正希望在美国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人。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战士必须不断检查自己的政治工作以防止这些危险。处于政治上相对孤立和不断与当前趋势做斗争的地位，很可能不知不觉地脱离正轨。寻求捷径、寻求不能不和异党妥协的联合、寻求没有牢固理论基础的内结、寻求被认为是符合于美国特点的实利主义的调和——这些自1917年以来曾经不断地使美国的社会主义越出轨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必须经常注意这些危险，因为这些危险可能影响他们自己的政策和思想。

8. 尽管如此，近年来也有一些进步，并且在社会上几个重要阶层的内部已经有了一些想要突破美国封冻的迹象。青年中间对于

美国生活方式的批評越来越多，他們开始听取各派反映他們精神荒蕪的意見。从小資产階級浪漫派中涌現出一派批判主义作家，他們把很多不滿引向个人主义的消极的道路。对于美国社会各方面批判的研究获得了相当的成效，这些研究指出美国社会怎样使人精神錯乱和失去人性，但并没有指出，或者想要指出任何出路。社会悲观主义和逃避主义盛行一时，使急进的青年陷于迷惘，但同时也在引导一些最优秀的青年寻求前进的道路和积极的政治解决途徑。各大学在很快地接受着社会主义思想。核战争的威胁激起了一个和英国同样的反对氢彈运动，虽然到目前为止还不是那么有力量。

9. 但是，在美国社会的被压迫的集团中間，特别是在黑人中間有着最重要的发展。新的力量和新的领导人已經出現在学生、青年和工业无产阶级中間，他們正在突破与“有才能的人物”——这些人物在大部分地区控制着如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的巨大組織——不可分的那种例外主义和妥协政策。他們采取直接行动和群众运动来反对种族隔离和維護人类尊严，以此为美国一般的工人階級树立了光輝的榜样。这一运动因为没有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有組織的工人群众的支持，所以只能取得微小的和部分的成功，但是，这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开端，而且可以取得巨大的成果。我們曾經指出，在黑人群众中扎下根基有绝对的重要性。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最受剝削的部分来自于黑人群众。这些部分受着各种政治和經濟的歧視，所以是新的势力和革命力量的非常宝贵的源泉。对于其他在北美土地上形成一部分半无产阶级的少数民族集团，特别是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也可以这样说，在这部分人中間坚持工作是绝对重要的。

10. 美国工人階級在各种罢工斗争——有一些是小范围的，另

外一些是像 1960 年鋼铁工人那样的全国性大罢工——中表现了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卓越的牺牲与团结精神。美国工人阶级的潜力是无限的。所以当务之急是使美国工人阶级有一种政治认识以把这个潜力用在反对支持着美国统治阶级的工资制度的斗争上，这个统治阶级本身就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战略支柱。这里没有实行例外主义和关门主义政策的余地。美国资本遍布于世界各地这件事本身——其目的一部分显然是要降低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就使我们不能不采取一种国际观点。

11. 1960 年的选举运动两党以几乎分得相等数目的人民选票而更换了政府。无疑地，很多美国工人投民主党的票是希望美国改变对外政策和与反劳工法有关的对内政策。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采取第三种选择和在那激烈的运动中对于那些公开地或暗暗地支持民主党的各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进行攻击而作出了重要贡献。

肯尼迪政府上台以来的政策和行动证明美国资本主义代理人没有多少自行选择的权力。这些代理人的行动方针基本上决定于垄断资本家的需要，而两个不相容的世界体系彼此矛盾的国际背景也没有给总统留下多少自作主张的余地。新总统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在国内——那里普遍存在着经济呆滞——和国际上日益处于困境的时期上台的。人们不久就看到，他不但无意于削减军费开支而且决心在革命的威胁面前维护美国的利益。在老撾采取干涉政策和利用中央情报局操纵下的傀儡对古巴进行无结果的侵略，使人们不能对于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再抱有任何幻想。

在处理经济衰退问题上，肯尼迪表明他既没有采取主动的愿望也没有这种能力；对于失业者多给了一些施舍，但在政策上没有重大的改变。已经开始的逐渐恢复——仍然留下很多的失业

者——和对于美元压力的減輕暫時把經濟問題推向背后。此外，国际局势的恶化——直到本年年中和十年来一样地沒有好轉——所造成的大量軍事撥款給經濟情况带来了活跃。但是，真正的和日益加甚的生产停滯問題始終威胁着美国經濟。虽然在紧急时刻，肯尼迪无疑地会更快地增加联邦預算并比他的前任更大方地用政府的力量来支援經濟，但这里也有严格的限制。况且共和党人也不能把从經濟窘境中产生的趋势扭回到三十年代去。事实上，軍事計劃以外的联邦預算是比較小的；大部分民政方面的开支掌握在邦和地方政府手里，不一定受更換总统或者流行在肯尼迪顧問中間的肯尼迪思想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国际上的美元問題都会給建立在低利率和赤字預算基础上的再膨脹政策以限制。进一步从美元逃避能够造成黄金贬值或可能造成黄金的停止流通，从而不可避免地使美国的金融地位和国际威信受到打击。美国政策这种两难的处境給揭露資本主义危机带来了大好机会，借此可以把个别的斗争联系起来，使日益扩大的失业大軍与他們的已就业的弟兄采取共同行动。

12. 根据美国的情况，我們沒有理由把为和平而斗争和阶级斗争分开来提出。美国資本家阶级会出现一部分“爱好和平”的人，这样的希望是一点也没有的。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虽然就美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而言，現在极端沒有力量，但在急进运动中仍能看到它的存在。这表现在承认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处”的想法上，表现在沿着小资产阶级和欧洲“新左派”的路綫对于裁减軍备协定和联合国抱有幻想上。这些派别企图繞过阶级斗争，把信任寄托在高级首脑会谈和領袖們的协商上，希望不經過真正的斗争美帝国主义就会不管怎样縮回它的魔爪。迎合这些幻想的空談和綢緞式的声明必須受到譴責，同样地，如果沒有指出苏联官僚机构在現阶

段所起的真正反动作用也应该受到谴责。自然，因为退化了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培育反共产主义和美国国务院对工会运动和知识分子灌输反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一切时候高举保卫苏联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和苏联官僚机构，和它的口号与诡辩，或者和它的美国替身妥协。也不能因此就让中国人机会主义地接受列宁主义导使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中国领导现在在远东也是革命发展的一个历史障碍。

13. 美帝国主义干涉全世界已经在许多国家里引起人民反抗这一事实，对于在美国确立国际革命力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美国国务院一直在寻找并支持驯服的外国政治领导人以和他们商量如建立包围苏联的军事基地、导弹基地和飞机场等一类的问题。一般说来，特别在不发达地区，这种做法就不能不依靠旧封建统治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最反动的势力。但是，这些政权基本上是靠不住的，常常是腐败无能的，靠着贪污、警察统治和压迫政敌来维持自己。所以，无怪乎在“自由世界”属地，从朝鲜到古巴，相继爆发革命运动。过去一两年里，美国在土耳其、朝鲜和古巴的傀儡政权已经被推翻。在日本，甚至在台湾也发生反对美国政策的示威游行。拉丁美洲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浪潮汹涌澎湃。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现在的形势有进行世界革命的可能性。

14. 失去人心的政权之所以动摇主要是学生、青年和工人阶级的某些急进部分的领导进行斗争的结果。但是这些领导并没有接着建立起革命政府，而只是从小资产阶级、军事和行政官僚机构中选出一班新的负责人。结果表现在群众高潮中的革命运动没有带来实际成果就平息了下去。全部弱点是在这些国家里缺少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因此就表明当务之急是在牢固的基础上建立这样的领导以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但是，这种斗争必须注



意避免沙文主义的反美情緒，必須明确指出主要的敌人是民族資產階級和美帝国主义。在此同时，美国工人階級对于这些运动和对于防止这些运动采取反国际主义的方針所能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加强反对他們自己的統治階級的斗争并提出保卫世界革命的口号。

#### (4) 比利时罢工和它的教訓

1. 1960年12月和1961年1月，比利时无产阶级进行了激烈的反对政府的总罢工。在这次斗争中，显然证明了：在那一时期，客观上需要一个坚决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和以建立工人階級政权为明确目标的馬克思主义领导。

2. 比利时是老牌工业国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比利时經濟是发展的并且获得了相对的繁荣。在这里出現了一次小規模的，在未来时期其他国家的工人階級也可能遇到的化裝排演場面。从这次排演中取得的教訓不但极其重要而且最具有普遍性。如果及时吸取这些教訓，其他工人階級就可以避免遭到慘痛的失敗，而比利时工人的牺牲也将不是沒有代价的。

3. 罢工的爆发起因于伊斯更斯的天主教社会党和自由党的联合政府向議會提出節約法案，这个法案的用意是想把比利时資本主义的負担轉嫁給比利时工人階級——包括政府雇佣人員和白領工人在內。比利时資本主义已經衰老并且有些动轉不灵，在新的工业投資和提高生产方面保持着欧洲大陆上的最低記錄。如果比利时資本主义想在共同市場內部和在世界市場上和它的对手竞争，就不能不縮减开支和提高生产率。剛果事件虽然沒有带来巨大的直接損失，但使暗中蔓延着的危机严重化，使資本家階級和它

的政府决心采取激烈的措施来保障利潤和表明它对于国内局势的控制。这个法案在加剧阶级斗争上是一个刺激，使这个斗争发展到最高潮。

4. 在工人阶级中，特别是在华龙族区的重工业中心，强大的群众压力发展到最后一试的地步，而这是社会党和总工会的领导人所不能阻挡的。采取罢工行动的压力不顾举行象征性罢工和延期到1月3日议会重新开会的温和的号召，于12月中旬在许多工业中心和各行业里已经成为不可遏止之势。这不是由上层筹划和发动的总罢工。这是自发的，在下层强迫领导人接受的意义上的总罢工，并且是随着各层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而发展着的。

5. 改良主义的领导者，就物质力量来说是一个强大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组织的主人。他们突然被放在了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地位。社会党的领导人从来没有领导过比照例的示威游行或者通过议会走廊的运动更大的运动。他们现在相形见绌了。为强大的地区组织所支持着的工会领袖站在运动的先头，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雷纳德<sup>①</sup>。

6. 不论是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工会的官僚主义者，或是斯大林主义者都把自己局限在资产阶级的组织范围以内，不能担任这个不可缺少的领导。他们没有提出斗争的口号，只是号召通过所提出来的法案。他们不具备表现工人战斗意志的方针或纲领。从这些领袖们的行动判断，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随波逐流，适应当时的情况，迎合基层群众的心情并且这样拖下去直到找出一条解决的办法。

7. 在华龙族区<sup>②</sup>的工会阵营里，罢工是坚定的，并且存在着建

① 五金工人工会的领袖，一个具有工团主义倾向的左翼中间派。

② 这是重工业区，比利时南部说法语的区域，有些人在矿井里做苦工和陷于失业。

立工人委员会的可能性。这里的工会领导人对于来自下层的压力是最让步的，但是他们把运动放在自己的严密控制下。这里当时曾采取一种战斗的姿态，但对于找到一种战术和要求取得政权没有必要的准备。群众在领导的箝制之下，除了举行一些显然为反映当时的一般想法和心情而计划出来的示威和讲演外，没有做别的事情。这一运动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很有力量，事实上是紧守在原地转圈子，远处有宪兵、军队和政府机关监视着，显然准备随时给他们以打击。

8. 这些领袖们由于他们是改良主义者，当时采取了迟疑、撤退或者完全等待的态度。华龙族的领袖们为了寻求一条解决途径以在他们的追随者面前保全颜面和证明他们自己主张的正确，转向联合主义求救。语言和宗教的不同提供了一个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讲得通的现成理由。事实上，天主教会对于讲弗来米语的北部的控制和社会党工会不能使工资较低和阶级觉悟较差的弗来米族工人和天主教工会断绝关系，一部分是因为过去的缺乏领导。在南部采取同样的依靠工人自发性的政治态度使他们有理由在天主教的北部也等待同样的自发性，因此这种理论就起了使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意识投降的模范作用。弗来米族工人被认为是落后的，是反动的群众，注定是反动教会的驯服工具。同时，这些领袖们估计到他们在南部的优势，于是回到了更换这个国家政治机构的道路上去，认为他们会得到多数票，并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试验。

9. 在此同时，华龙族领袖们的态度是不做任何事情来打破教权主义的控制，不做任何事情和天主教工人建立起联系。这些工人很多在早期曾经表示愿意罢工，甚至因此不惜和他们自己的工会决裂。当然，这种态度会加强教会的控制和有助于对弗来米族

工人进行錯誤的教育。

10. 这种态度暴露了中間派工会領袖如雷納德等所一貫采取的适应当时情况的經驗主义的做法。尽管雷納德对于議会的局限性表示不耐煩，但是他不能提出比社会党議員所提出的更为进步的綱領。

11. 領導者方面的无畏精神並沒有如人們有理由預料的那樣，和工人階級的团結与热情是相配合的。工人階級的力量消耗在听讲演——通常只是在星期日才有的那种讲演——游行和等待着发生誰也不知道准是什么的事情上。他們不應該等待着看政府如何处理，而應該占領工厂和建立起工厂和罢工委員會，應該組織起自卫队和打下扩大斗争的基础。工人的战斗部分缺少这样一个領導，由自己去寻找前进的道路，于是采取无目的的暴动，打破窗子和破坏等等手段。战斗意志消沉下去了，那些最沒有坚持力量的部分，如布魯塞尔的工人，走开了并且回到工厂去工作。

12. 那些領袖們于是退縮了。事实上，他們並沒有担負起領導的責任，而他們的不願意为窘境寻求一条出路就为政府效了劳。伊斯更斯和他的同伙使用狡猾的手段，保持着巨大的斗争本錢。他們掌握有广播电台和大部分报纸（虽然有“总”罢工但仍然出版），有宪兵和警察并从德国調回来一部分派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分遣队。他們显然有很多的鎮压力量，或者如一般人都知道的，在背后保有这些力量。他們注意使用这些力量的方式不激起工人階級的憤怒，而且無疑是了解到罢工領袖可能有的反抗行动的。因此，对于工人階級組織的中心沒有进攻，罢工領袖沒有被逮捕，他們的活動似乎也沒有受到限制。政府的方針是让运动自消自灭。

13.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罢工時間的長短是由各地区或

各阶层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程度决定的。因此，在北部，除了两三个地方以外，罢工高潮很快就衰落了下來。在布鲁塞尔罢工曾上升到高峰并且是群众性的，但由于沒有前途而未能坚持下来。南部几乎完全卷入罢工并且工人们一直坚持了四个星期，虽然全国其他地方的罢工于最后两个星期內正在瓦解。

14. 如果有一个和社会党与工会机构相反的領導，在比利时显然有非常美好的机会。除非在这件事情上坚持着做很多年细致的工作，就不会存在或出現这样的領導或者完成这件事情。

15. 比利时共产党的立場沒有提供，并且也不能提供这样的領導。它的政策完全服从于“通过議會走向社会主义”的要求。它的口号沒有超出社会民主党規定的范围，并且完全在左翼口号的范围以內。它一方面尊重議會形式，一方面病态地希望加入由社会党和工会建立的共同行动委员会。它号召各党联合解散議會和重新选举，除了其他目的之外，还有一个是为了保持“我們”議會制度的威信，这是一种墮落的方案。它实行施加压力和一般追隨在改良主义者后边的政策。在政治性总罢工的形势之下采取这样政策清楚地表明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衰落和斯大林主义的机会主义的特性。

16. 社会党左派，特别是在它的青年运动中，和于某种程度上在工会里，有一个时期，显然产生了一种左傾的趋向，但是沒能够赶掉旧有的領導。这一部分人尽管提出看来比較激烈的口号，但也同样地不能突破难关。它的根本弱点在于沒有建立起和显然沒想建立起另外一个領導。这样的領導虽然人数不多，但有战斗工人的支持是能够取得公认的权威地位的。这种革命的骨干力量在罢工中能够起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缺少这样的骨干，是因为左派对于中間派的批評純粹是形式上的批評。罢工前后，所謂左派

的行动方式,其本身就完全属于中间派的性质。实际上,它也是主张施加压力,它企图把自己的想法和政策通过下层群众或直接地灌输给如雷纳德那样的工会领导人。左派和雷纳德显然建立起一种以便利为基础而不是以真正关于战略或方针的同意为基础的关系。事实上,雷纳德向他的“朋友”表明,他准备只是推行(并且不是很有力地)左派纲领的一部分——与社会党最低纲领相一致的“机构改革”纲领。

17. 虽然左派可能得到了一些支持并且由于经历了罢工而有所发展,但分析起来,它显然对于罢工的失败负有一部分责任。

18. 以《左翼》<sup>①</sup>为中心的左派的经验,从本决议所提出来其他各观点看来是特别有教育意义的。围绕着《左翼》那个集团的方针和活动是一群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和战术的具体表现。事实上,这一派自1953年以来,就一贯赞同并实行压服和甚至清除在传统组织(巴布洛主义)里边的中间派中的革命骨干。这显然带来了一系列的妥协,在这些妥协中,为了取得一种所谓“有影响的”地位,就失掉了原则上的和纲领上的明确性。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幸的但在政治上无可避免的命运就是成为中间派的俘虏,看去越来越像中间派,直到只剩下形式上的区别——语汇的不同和比较分析地对待问题的方式。此外还意味着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罢工的形势下不能担任领导,这是因为他们过去方针的错误和在罢工期间采取一个最低的纲领。特别是,他们失掉了和工人阶级一起经历斗争从而使工人阶级取得高度觉悟的机会。通过一系列既符合于罢工者当前需要又提出政权问题的具体的过渡时期的要求,这是能够做到的。不这样做而支持改良主义的“最低纲领”,不

---

① 《左翼》是社会党左派的机关报。

論有什么保留,都是对于革命責任的背叛。这种經驗,一方面证明了反对改良主义的过渡时期要求的基本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第四国际有必要反对那些导致 1953 年分裂的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各种修正;这些修正最后表明基本上是中間派的修正,在政治上完全不适合于这一时期。

19. 比利时事件給我們的最一般的教訓是,首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革命的骨干。我們不能因为考虑当前策略上的成功和为了取得中間派和其他派系的贊同而逃避这一工作。如果不提出重要的理論問題来加以討論,或者只是努力取得联合而把原則性的問題放在一边,我們就不能开始这一工作。支持中間派的“人物”或者建立包括原則性的让步在內的关系也不能开始这一工作。比利时运动从这些事情上取得教訓还不算太晚,特別因为那里現在有受到巴布洛主义相当影响的强有力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存在。

20. 这些教訓对于国际比只是对于比利时无产階級更为重要,对于这些教訓作全面討論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必須从事理論准备的一部分。

## 4. 殖民地革命

### (1) 一般原則

1. 每一个落后国家的解放斗争必須被看作是帝国主义总危机的一部分。各階級和各党派的作用必須以帝国主义在总危机中的需要为背景来予以估計。工人階級革命者的战略和战术必須产生自这种全面的估計。

在每一个过程中都有临时的和在特殊情况下的局部的例外，帝国主义世界的某些部分甚至有在一定限度内的上升时期，虽然总的趋势是衰落。任何国家里的第四国际支部的政策如果以“特殊”现象为根据，那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作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殖民地革命的一般基本特征一直是只有工人阶级能领导群众跳出帝国主义的泥坑。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就必须采取一种战略，从而建立起具有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纲领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

2. 殖民地群众的反抗迫使帝国主义政府把政权交给了参加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殖民地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大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在非洲的殖民主义者的意见，反对国际金融资本的这种战略（在它的直接目的上）。在南非和中非，这些分子的保守主义使建立为非洲人民所能接受的当地资产阶级政权的希望不能实现。结果就发生了大陆上的内战，在这个内战中，平常的领导很快就会力穷智竭。不论是已经给了当地政府以宪法上的权利，或者是反抗帝国主义军队的军事冲突在进行中，或者是联合国组织及其代理人正在“保证稳定”，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特别致力于使无产阶级和它的党担负起领导任务。

3. 尽管国际垄断资本家关于经济开发谈的很多，但是他们在不发达国家里既没有实现工业平衡发展的愿望也没有实现这种发展的可能。殖民地革命的发展并没有阻止得了他们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临时商谈以不断地增加投资。先进国家的政府也直接或通过国际组织提供经济援助以作为和新政府的政治谈判的一部分。但是，不平衡的发展一直在继续和加深，因为在出产宝贵原料——特别是石油和一般的矿物——的地区，投资在迅速地进行着，而“第三世界”人口稠密的广大地区则因为忽视和经济停滞——由于



世界物价变动而更为严重——而受到严重的伤害。一方面在大部分世界上，长期存在的贫穷和剥削问题得不到解决，一方面资本主义利益却在世界上已经发展了的地区进一步促成更快的发展。收入和发展程度的悬殊，显然日益加甚。

民族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受着帝国主义掠夺和破坏的伤害，他们不能和旧社会腐败堕落的封建势力和拥护资本主义分子——地主、放利为生者、部落酋长等等——断绝关系，并且默默地接受或者甚至支持作为经济上决定因素的垄断资本家的继续存在。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立场使我们难以想像它会为了群众的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4. 帝国主义者在这种形势下，认为在殖民地和新独立的国家中必须有一个所谓“投资前阶段”。这是希望在社会比较安定的情况下，做一些基本工作以便后来实现工业化。肯尼迪主张解放一切非洲商业，放弃旧日的殖民地优先的政策，以便资本最后可以自由活动和建立起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广大消费者市场（这里另外一个目的是使拉丁美洲的主要产品比较容易地进入欧洲市场以缓和美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西半球的特殊地位。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立仍然妨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理想的解决）。负责管理这个投资前阶段的工具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担任“独立”政府和国际机构，如国际金融基金团、国际劳工局等等职位。

5. 新政府的政治作用不能根据任何形式主义的标准或者根据它们所表明的政治主张来判断。事实上，帝国主义者承认基本工业和服务事业的国有化是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意识形态有意识地予以支持，因为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工具。这里再一

次证明，社会民主党在先进国家里的作用是支持帝国主义。正如社会民主党在集权的西方国家的官僚机构中寻找新的根据地以支持帝国主义一样，它在落后国家里也使自己正好符合于这样一个官僚机构的需要。这个官僚机构一般是一个政府官僚机构，因为现代金融资本完全承认，在发展的现阶段，由国家控制经济是必要的。

6. 正如社会民主党左右两派都欢迎这个殖民地统治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袖，认为他们是一个进步力量一样，斯大林主义者对于这些领袖也表示欢迎。斯大林主义者忠实于“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欢迎在目前形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因此，他们根据某种假设的独立民族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阶段来对各阶级和各党派估价，而不是根据它们对于帝国主义和作为一个国际整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認識。和往常一样，这些理论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歪曲，而是工人运动中的一定阶级派别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先进国家里的工人贵族和官僚机构经验主义地使自己适应于帝国主义的机构改革，并且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同时，苏联官僚机构——它的小资产阶级利益阻碍着苏联工人实现可以完成十月革命的世界革命——通过苏联共产党改订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纲领以符合于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的情况，符合于“和平竞争”的现阶段。

7. 这些机会主义派系的客观影响是导致殖民地工人和农民在帝国主义者手里的失败。在中等阶级领袖与垄断资本家和银行妥协的同时，共产党由于接受实现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的时机尚未成熟的学说而在政治上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事实上，这在印度尼西亚、埃及、印度、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就导致了新兴统治阶级的强大，并在许多情形下导致很多先进工人丧失生命。斯大林主义

者和社会民主党在先进国家里的背叛对于阻碍正是殖民地工人所需要的那种支持在这些国家里的发展也有它们的影响。法国共产党对阿尔及利亚的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8. 帝国主义者注意在先进国家里集中投资、科学和技术的加速发展、新的合成原料的生产对于落后国家产品市场的破坏,所有这些都增加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并一定会使落后国家和先进国家里的斗争步骤加速。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日子没有多久了,他们不能长期在军事独裁制度的危机下维持下去,这种制度是在几年“独立”之后的一般趋势。在这些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抓住机会建立具有工农委员会纲领的无产阶级的党以作为第四国际的各支部。一切“发现”小资产阶级领导人本身能完成社会主义阶段革命的学说不仅是错误的和浮浅的,是以暂时的和局部的现象为根据的,而且在效果上是造成一种危险的修正主义倾向。

9. 对于这些民族主义政权做一种正确的阶级分析对于了解它们在世界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强大苏联的存在使这些统治者中的某些人在他们自己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他们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在国际外交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中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过是他们在国内的阶级作用的一种发展。所以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印度的尼赫鲁都在助长一种幻想,认为通过有影响的政治家的善意可以保证世界和平,认为这些政治家会使战争贩子们恢复理智。在1961年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一切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世界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都因为“和平倡议”的“主要任务”而被搁置在一边。社会民主党——即使是“左派”——和斯大林主义者自然欢迎任何阻止群众本身通过推翻帝国主义来解决战争问题的行动方针。这些“中立

主义者”，只要他們的命运还没有受到决定性的威胁，他們将在大国集团之間起一种平衡作用。但是，他們基本上是世界资产阶级的一个部分，并且将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

10. 很显然，在落后国家里支持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方针、国际舞台上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先进国家里的“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苏联集团的“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这些都是一个单一整体的一部分，一种反革命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完全固定下来，所以必须以最坚决的态度来加以反对。这里任何等待着斯大林主义的方针在某些“客观力量”压力之下自动改变的倾向也都是修正主义的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独立和取得政权道路上的障碍，只有建立起具有革命纲领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11. 最后，我們再度强调把殖民地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一部分的重要性。殖民地革命没有在先进国家里的革命胜利是不能完成的。把殖民地革命看作是在它自己推动下的自动的发展是对于我們討論过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修正的支持。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导，没有把革命扩展到先进国家里去的希望，而谈不断革命的理論已经得到了“证明”，这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经济問題将更为严重而政治制度也将越来越专横。革命斗争給落后国家带来的工人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前途只能靠着工人阶级革命在先进国家里胜利的帮助来保证。这不是一个通过殖民地革命建立起越来越“进步”的政权以最后改变外交上均势的問題。那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只能为民族主义统治者本身、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和一切中間派的輿論所接受。第四国际对于不断革命的纲领有坚定的信仰。落后国家的工人必须取得政权，并和他們欧洲和美洲的弟兄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然后共同取

得胜利。在此之前，不会有脱离帝国主义的独立，也不会有和平。

## (2) 古巴革命的例子

1. 自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以来，接着卡斯特罗政府就在这个岛屿上实行了美国财产的国有化。古巴革命运动有许多特点值得我们详细研究和作出评价。

2. 古巴革命有三个特点和以前一切拉丁美洲大陆上的革命不同：(1) 广范围的土地改革；(2) 大规模的国有化措施；(3) 武装民兵的建立。

### (1) 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到现在为止是我们西半球所看到的一种范围最广泛的措施。不论玻利维亚或危地马拉都没有像卡斯特罗这样做过。这个改革把土地分配给十万多没有土地的劳动者(农业工人)，给像占有约二十万亩以上大片土地的联合果品公司那样的美国大壟断资本和作为巴蒂斯塔政权主要支柱的离开当地的地主以重大的打击。

尽管如此，这个改革在内容和动机上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革，并没有超出农村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范围。即使卡斯特罗也承认，“这不是一个十分彻底的改革”，因为没有影响到一千亩以下的土地和牧场。

虽然土改法规定，属于农业合作社的土地不能被分割，但在古巴遭到严重的农业衰退打击时，就不能保证全部合作社都不会流于破产或者甚至把土地出售给其他合作社或农民私人。

这样一种影响绝对地租同时保留级差地租的土地改革不仅可

以包容在資本主义体制之內，而且可以成为資本主义經濟发展的一个刺激因素。

沒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沒有取消农村債務和不肯对农民提供低利信貸的便利——所有这些都在于制造新的农村社会分化的条件。农村資產階級和农村无产階級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土地分割——造成农业不发达的原因——和出让将继续存在并且在缺少有計劃的工业化的情形下将在农村为更深刻的階級冲突开辟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合作社的前途至少可以說是靠不住的。

## (2) 国有化

美国公司的收归国有，像土地改革一样，其目的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壟断資本。但是它們不是根据事前想好的合理的經濟发展計劃来完成的，也不是一个把一切資產階級财产收归国有計劃的一个組成部分，而只是对于美国政府减少古巴糖限額的一个回答。

像納賽尔沒收苏伊士运河一样，这种沒收在半殖民地世界构成了“国家主义”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托洛茨基关于墨西哥的铁路和油田国有化所說的：“这是一种在落后国家采取的国家資本主义措施，这样做为的是一方面在外国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在本国的无产階級面前维护自己”。

沒有任何关于工人监督的立法、除了少数例外，不許工人在沒收的企业中有管理权和由国家对国有化公司进行官僚主义的經營，更不必說这个政权还用公开的和隱蔽的策略，通过代替原来穆哈尔<sup>①</sup>官僚的新工人官僚来訓导和統一工会——所有这些都肯定

---

① 拥护巴蒂斯塔的工会领导。

地表明了这个政权及其社会政策的资本主义性质。

因此，我們不應該把这些沒收和工人国家的沒收混同起来。革命政府的改革是为了更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更平衡地进行資本投資和在現有的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財產关系体制之内适当地扩大国内市场。

### (3) 民兵队

三十万人民民兵的建立是古巴革命的一项最重大的成就和这个政权的最丰靠的保障。由于这个民兵队的警觉性，一切反革命企图都遭到了镇压。

但是这个民兵队的将来却决不是有保障的。随着阶级冲突的扩大和矛盾的加深，在民兵队中将发生拥护资本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力量的分化。政府将企图解散民兵队或解除其武装——像玻利維亞那样——或者更可能的是把它編入军队和警察机关，像埃及改編敢死队<sup>①</sup>那样。

起义軍控制彈药庫保证了资产阶级国家对于民兵队的控制。所以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为民兵队的組織上独立和隶属于工会与农业合作社而斗争。

沒有生气勃勃的革命领导沿着阶级路綫来影响、組織和领导民兵队，那就太可能消灭了。

3. 卡斯特罗政权在組織上是軍事独裁，在构成上是小资产阶级。一切重要政策都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周围的一个小集团决定，而只是在这个政权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例如哈瓦那宣言——才和群众商量。民族资产阶级的极端軟弱和与此相反地工

---

<sup>①</sup> 在英國人占領苏伊士运河地区基地的最后阶段組織起来打击英國人的队伍。

人階級的比較有力量和能够團結，使任何想要在人民权力机关的基础上來巩固一个受欢迎的真正代表資本主义制度的政权的企图完全成为幻想。

因为缺少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的領導，所以这个政权能够在敌对的階級力量之間站穩脚步，既利用右派又利用左派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

但是，在一切打击到整个民族資產階級权力和財產的有决定性的和根本的問題上，这个政权是站在資本主义一边的。由于企图建立一个“革命的单一的党”，由于攻击“7月26日运动”的左派和由于拒絕在秘密和普遍投票的基础上召集立宪會議，卡斯特罗政权越来越表明了它在貫徹民主革命上的階級局限性。对于革命工人党<sup>①</sup>进行攻击是这种傾向的另一个证明。

因此摆在古巴革命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前进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反資本主义的工人国家，或者是后退回軍事—警察的独裁制度，一个带来飢餓和貧穷的政权。

不管怎么样，卡斯特的領導只能是一个追求彻头彻尾烏托邦——和实利主义的——目的的过渡現象，它试图在整个世界資本主义經濟和文化基础正在发生动搖的时期建立一个民族資本主义国家。

4. 保卫古巴革命是极端重要的——但同时也要求得它的发展，一方面在深度上通过建立一个以工农委员会为基础的政权，一方面在地区上要在拉丁美洲其他部分，特別是有同样問題和显然受着美国大壟断資本統治的中美国家，提出同样的問題。无疑地，古巴革命已經在整个西半球有很大的影响。它在策略方面給了我

---

<sup>①</sup> 革命工人党是属于第四国际書記处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党，主張古巴是一个“工人国家”。



們很多教訓并且正在证明美国是可以反抗的。但是，从这上边就說卡斯特罗的古巴已經是一个工人国家或者甚至說作为一个政权能以現在的形式存在下去，那就离題太远了。

5. 古巴革命对于美国的急进分子特別容易有号召力。因为他們第一次能够这样切近地观察一个获得絕對成就的反帝运动。古巴工人和农民的信心与热情，领导者們的坦白直率，不仅和其他每一个拉丁美洲政权成为对照而且和美国本身的腐朽的、冷酷的和为金錢支配的風气成为对照。这說明了为什么他們有时过于热情地接受古巴革命的現在形式。但是，我們仍有必要詳細核对事实 and 可能性。

6. 古巴革命的孤立和因此而造成的卡斯特罗对于苏联的必然依靠，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人民社会党的强大。这个党在“7月26日运动”的最初成就中并未起任何作用，并且事实上有一个时期和巴蒂斯塔政权是妥协的。但是，它現在却能因此而在政府中取得地位和发生影响。它毫不迟疑地用它的权力来打击其他党派的独立报刊，惟恐它們走上不仅妨碍卡斯特罗而且妨碍苏联政府的道路。1936到1939年期間在西班牙用过的毁灭了西班牙革命机会的那种斯大林主义者的手段現在又一次地发生了作用。苏联官僚机构非常喜欢与受到共产党“压力”的卡斯特罗——正如尼格林在西班牙一样——打交道，而不喜欢和在組織上真正代表并紧紧依靠工人階級的領導打交道。

7. 卡斯特罗領導缺少穩固的理論基础并不是一个优点。它导致了并且将导致在困难問題面前的临时应付主义和折衷主义。缺少理論基础意味着沒有教育广大群众充分了解国内形势和这种形势与国际間的复杂关系。对于一个領袖的信任并不能代替这种了解，相反地，这种信任把过去已經取得的成就放在了一个刺客的子

彈的支配之下。它也能导向欺騙与退却。在革命虽然有群众基础，而群众却并未控制或领导这个革命的时候，这种情形并不是什么意外。卡斯特罗的领导来自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反对美帝国主义只是由于当前的必要，并没有没收资本的明确纲领。将来究竟是哪一种经济是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开展一个建立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的运动，由这个领导根据工农委员会接收经济的纲领进行斗争，同时在整个美洲大陆上展开一个保卫和扩大古巴革命的运动。保卫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者在整个美洲的首要任务，而它的前途则在于美洲社会主义合众国口号的实现。

## 5.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苏联

1. 自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遇到了一个敌对的取消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和市场关系无政府状态的生产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经济方面的成就与革命在新国家里边的成功，特别是在中国的成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一大部分世界人口和生产资源现在已经不在资本主义掠夺或扩张的范围以内。这种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初步成就之间的必然冲突不会轻易地消失在“和平共处”的气氛中。根据苏联官僚的解释，“和平共处”不过是他们和帝国主义妥协政策的一种理论上的掩饰，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与革命的工人阶级发生决定性冲突的一种理论上的掩饰。资本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冲突只能在国际阶级斗争的舞台上得到解决。提出“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作为另外的解决办法是错误的并且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尤其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觉悟、国际组织和

国际行动的問題。赫魯曉夫不此之图，却重視越来越多的現存国家或政权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結果，在資本主义和前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运动就被导向“压力”政治的途徑而不是去推翻資本主义国家。这就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反对壟断資本的联合”“广泛的和平同盟”这些理論的根本意义。

2. 苏联、中国和东欧的經濟上漲是国有化和計劃經濟的結果。和資本主义国家相比，它們的更为迅速的和平衡的发展证明計劃經濟优于私人企业的經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們應該承认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关于在苏联建設社会主义或者甚至共产主义的論点。这样的論点是危險的和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承认这种論点就意味着承认斯大林主义的一切极端措施，承认它的政治上的鎮压和社会的与經濟的歪曲是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具有的特点。虽然这种鎮压已經不是那么殘酷和明显，但这里仍存在有一切以“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为掩飾的——从背叛革命产生的矛盾。收入的不平等和官僚們的社会特权、在制定和实现国家計劃上沒有来自下边的有效监督——所有这些都造成不协调从而拖累着經濟，阻碍經濟以計劃的方式来充分发展生产力。这样就不仅在官僚中間而且在工人和农民中間鼓励了个人主义傾向。只要工人階級被官僚控制着的国家和党机器严厉地排除在政权之外，这种矛盾就无法解决。社会主义的基础建立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生产資料国有化的形式上，但是这种国有化的财产和集体农庄一样，并不构成社会主义。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須由工人階級通过各級苏維埃充分参加国家职权的行使和經濟的民主管理。社会主义还意味着一定会趋向于收入平等和国家鎮压职权的衰落。今天的趋势与此相反，是加强官僚国家和繼續存在着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即使沒有官僚在苏联窃取工人階級的权力，在击败帝国主义

和达到很高的物质生产水平以前，也談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是**工人阶级国家**，也就是說，它們是以十月革命所直接或間接建立起来的财产形式为基础的，这种财产形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掌握政权，并没有控制生产，也没有决定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

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只发生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结果造成官僚阶层在政治上掠夺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个官僚机构站在工人阶级之上和工人阶级之外，并且是寄生于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形式的。这并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可避免的特点而是产生自俄国革命孤立的特殊情况，并且在历史上将为苏联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所代替。这个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决定于革命的工人阶级力量在全世界上的战略。

3. 因此，我们认为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都是畸形的或者是已经堕落了的工作人国家。它們現在的形式只能是暫时的，把这些暫时被歪曲了的形式說成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或者不可避免的阶段是錯誤的。我們主張保卫这些国家正如保卫工人阶级的每一个成果一样；这些国家回到被帝国主义掠夺的地位上去，将是对于社会主义前途的一个重大打击，而它們的繼續存在将是对于帝国主义安定的一个长期的挑战和威胁。但是，我們保卫苏联、东欧和中国并不意味着我們放棄了批評的权利。革命者有责任对于官僚机构的反革命作用进行无情的批判，这个官僚机构事实上是在反对保卫革命。不論是在苏联集团內或者是在全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官僚机构都在通过共产党的影响阻碍着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我們号召用政治革命推翻官僚机构，并不是在支持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在工人运动中进行的“解放”宣傳。我們主張政治革命，是保全而不是推翻国有化的财产关系，是保证这种关系不再回到

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第四國際號召用政治革命推翻工人國家里的官僚機構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戰略的一部分。

特別危險的是那個把蘇聯描寫成為“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小資產階級派系。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用表面比較的方法，認為蘇聯官僚通過對於國家機器的控制，已經成為一個新的資本家階級並且已經消滅了十月革命的一切成果。以此為根據，就逃避了在帝國主義攻擊面前保衛蘇聯的一切責任並且否認了建立一個列寧主義的黨的必要性。這種派系表面上擁護馬克思主義，事實上是為資產階級的“極權主義”和工人階級不可能取得政權的理論提供了一種左的掩護；在政治鬥爭的緊急時期，如朝鮮戰爭，它們對帝國主義者提供了支持。這些派系是直接代理機關，通過它們，革命運動中的某些分子，在發生尖銳階級鬥爭和極端需要無產階級紀律與原則性綱領的時刻，投降於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從抽象的政治標準的觀點，如“民主”和“自由”等來討論蘇聯的性質而不是以生產關係為根據，就是這一派的階級性的明顯的證明。在理論上和在实践中，它們都是右派社會民主黨的直接傳聲筒。

4. 斯大林的極端措施曾經用“在一個國家里建成社會主義”的學說來證明其正確。這種措施以最鮮明的形式表現出官僚機構的反動作用。在斯大林死後的那一時期，官僚機構本身為了自己的利益對保安機關的權力進行了限制。這樣，官僚機構的權力不是告一結束而是被放在了一個不同的基礎上。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閉幕式上的演講是在使官僚機構內部關係合理化和試圖給人一種和斯大林時代的野蠻鎮壓完全決裂的印象，藉此來回答蘇聯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力量和斯大林死後所發生的一切疑問。赫魯曉夫成功地渡過了蘇聯共產黨領導內部和東歐國家里的各種危機，最後成為了人所公認的斯大林的繼承者。

虽然赫魯曉夫政权表面上不像斯大林政权那样严峻和野蛮，但辯論和民主的范围仍然受着严格的限制。国家和党实行集体领导的諾言——对于受过教育的觉悟越来越高的工人阶级群众的反抗是一种必有的回答——并没有实现。个人崇拜即使和斯大林时代相比已经消沉下来，但仍然存在。官僚主义的統治集中表现在个人統治上，由一个最高的决定者任命他所提名的人担任各高级职务并由他对一切国内国外事务做出重要决定。这种个人統治适合于官僚主义类型的拟定计划，这种拟定不是根据民主的決議和查定而是根据中央发布的命令。赫魯曉夫以一种常常等于政治煽动的經驗主义的方式把一系列政策的改变和思想意識的修正結合在一起，所以他能够在官僚机构和人民的关系中間保持着某种稳定。他对于农民作出了让步并相当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他答应将来还要提高以防止他們的不滿。赫魯曉夫把他个人的精力用在这些实际問題上并巧妙地在官僚机构的內部鏟除了他的反对者，因此使他的首領地位得到了确认。这样得来的稳定必然只能是暫时的，因为包容和集中在单一人物身上的个人权力是与經濟的不断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日益壮大相矛盾的。因此，赫魯曉夫的个人統治是在为将来酝酿着更深刻的矛盾。自赫魯曉夫在紧急情况下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做“秘密报告”以来，整个方針是把基本矛盾掩藏起来而不是解决基本矛盾。

在匈牙利和波兰，1956年的起义沒能够推翻官僚統治。这里旧日的警察統治也有一些修正。但是在匈牙利，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領导人物仍然被监禁着，1956年建立起来的工人委员会受到殘酷的压制。在波兰，哥穆尔卡的領导使官僚机构順利渡过1956年从波茲南和华沙事件产生的难关。但是，从那一年的第八次中央全体會議以后，关于工人委员会的立法和对于不同意見的鎮压手

段就一直被用来压制青年和工人阶级的进步力量。1958年对斯大林主义者或纳托林集团让步之后，随着镇压机器的许多成员的恢复职务，工人委员会被限制成为仅仅是工厂中的諮詢委员会。这种官僚权力的恢复和对于工人阶级活动的压制鼓励了如罗马天主教会那些分子的政治宣传。

5. 赫鲁晓夫现在认为资本主义包围已经结束并且苏联正在建设共产主义。两种说法都没有说明了客观形势。必须从事大量军备生产对于经济的不断压榨和与军事需要相结合的科学研究、由于先进工业国家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围而继续加强重工业和放松消费物品的生产——所有这些都反映苏联仍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尽管说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但苏联经济在许多方面都远不具有进步经济的面貌。消费品生产、住宅、公路和汽车运输的相对落后，在为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经济中，必然都是不相称的，并且不能从国际分工中获得利益。但是，他们却骗人说，已经开始进入共产主义。

官僚机构既不能认清也不能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因为造成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寄生的存在和机会主义路线。赫鲁晓夫必然会遇到使苏联经济三十年来感到苦恼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享有特权的管理人员阶层对于计划制度的强调，这些管理人员和生产者脱离，所依靠的是从不受监督的中央发布命令的制度。中央及其周围的管理人员阶层不必把经济计划提交民主讨论并且不受来自下边的任何监督（这种监督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赫鲁晓夫本人的一再诉苦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奖励制度和个人对于生产定额负责制度，助长了国家及其企业的有计划的不忠实和欺骗。贪污、无效率、掠夺公家财物、行贿、“提出”不兑现的诺言——所有这些并不是经济计划本身或“人类天性”的不可避免的

結果而是产生于統治阶层处理事务的官僚主义方式。我們当然不应该根据这些例子对苏联做片面的估計，但是同时这些发展却一定会是苏联經濟的障碍，而繼續把它們归之于“資本主义残余”也是可笑的。尽管口头上做些“工人参加管理”和实行非物质奖励等官样文章的表示，但事实上繼續支配工人階級生活的物质奖励制度每天都在养成資本主义残余特点所代表的那种落后的个人主义作风。官僚机构成員及其家族显然享有消費特权的現象助长了这种个人主义作风。

6. 赫魯曉夫特別关心的是苏联农业上一再发生的危机和与之有关的问题。事实上生产落后現象主要是在农业方面。尽管有“处女地”计划和各种农业改革，但农民显然沒有受到官方代言人劝說的多大影响。农业部分看来特別給官僚机构的墮落和弊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工业方面，主要是生产各部門之間的諧調比例問題而不是一个繼續发展的問題。但在农业方面，在新的生产工具上不断增加資本投資并不能以同样的程度保证产量的不断增加。这种增加只能靠着在同样的規模上开垦新的土地来实现。其他必要的条件是：牧畜业的改良、收获量的提高，农民中間的技术知識的傳播和他們在完成經濟计划上的积极合作。显然，这些方面的成就是很不平衡的，既需要对农民作出許多让步也需要赫魯曉夫本人的不断关心。同时，收买和分配农产品的制度曾經受到官僚机构本身的严厉批評，认为它是經濟制度中薄弱的一环，像原来一样地容許有很多舞弊和投机机会的存在。官僚机构的性质一直威胁着工人国家与农民之間的关系，农业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决。将来的财产形式和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同样的不确定。把拖拉机站出售給大集体农庄那样的措施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的关系受到人們严重的怀疑。



7. 苏联官僚机构企图和帝国主义者达成和平和裁减军备的协议，不仅因为要保证本身特权的继续存在而且也因为军备计划对于苏联经济是一个重大负担。但是认为有必要反对任何革命发展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存在使这种裁减军备成为一种危险的幻想。和平共处的理论是企图粉饰这个根本矛盾。

和平共处的理论是苏联官僚现有思想意识的总结。它建立在关于现代世界阶级力量性质的一些主要假设上。苏联政治家的声明和经济学家的著作表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有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想法，他们认为这种危机是那些包括失业日益扩大和生活水平降低在内的不可避免的矛盾的逐步发展。事实上，这种描绘严重地低估了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恢复力量，这种力量当然需要社会民主党和欧洲工人阶级的斯大林主义领导的直接合作。因此，苏联经济就从统治阶层在国际间的政治背叛所造成的曲解上受到了损害。这个同样的官僚机构现在又主张加强这个同样抱有幻想的和背叛的政策。在殖民地革命方面，同样地，说殖民制度的历史已经告一结束固然很好，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帝国主义者能够和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以保持帝国主义者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权益。这种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仍是因为没有在殖民地国家建立起作为代替的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而这种失败的责任可以完全归之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因为它在反帝运动中对民族资产阶级领袖不加批判地予以支持。

在此同时，如1960年八十一一个共产党的声明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必然衰落——在此衰落期间，社会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将逐渐“证明”其本身优于资本主义——的那种机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想法导致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的潜在力量的过高的估计。

工人階級採取獨立革命行動的實際可能性由於這種機械地把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與蘇聯官僚機構的利益等同起來而遭到了否認。這種想法是與和殖民地甚至和先進國家里的資產階級的“愛好和平”的部分結成聯盟相結合着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對蘇聯友好的聯合政府，或者像在東歐那樣，建立為共產黨所支配的政權。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最近已經對於赫魯曉夫和平共處政策的一切理論上的根本假設發生了懷疑。中國人認為和平共處暗含着願意承認現狀，因而也就是放棄反對蔣介石和收復台灣的鬥爭，同時也暗含着願意放棄對殖民地革命的支持以換取裁減軍備的協議。中國的領導也是起家於官僚階層，和俄國的領導同樣地抓住權力和特權就不放手。但是，中國的領導與革命力量的淵源較近，在國內遇到了些困難問題，對於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強行規定一些不利於其本身的政策抱有反感，因此它很快地找到了列寧主義的理論武器用來反對“修正主義者”。任何人都會看到，集中這種火力對“鐵托主義者”進行攻擊另有它的真正目標。中國人在這場爭論中，有許多觀點是正確的，他們對於世界力量劃分的估計比較現實而他們的思想也“比較純正”，但不能因為這一事實就承認他們的整個立場。他們採取這種立場同樣是以經驗主義而不是以原則為根據，並且其中還包括有某些冒險主義的危險的觀點，如認為在一次氫彈戰爭中社會主義一定會勝利等等。

中國的立場產生自蘇聯集團的一個特別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具有極高威信的強有力的成員，因此它在共產黨內部引起了理論上的爭論，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這個爭論的全部結果。八十一個共產黨和以後蘇聯的聲明表明，在口頭上採用了一些中國人所提出來的反對意見，但在策略和方針上並沒有重大改變。這就使人們看到，蘇聯領導人利用中國人在國內遇到的困難，所主要關

心的是在統一的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保持他們的支配地位。他們事实上达到了这个目的。結果八十一个共产党的声明和其他声明都采取了甚至比这类声明所一貫采取的更为折衷的态度。这些声明中包括有所有各派別的某些意見并使之有可能事先就几乎把赫魯曉夫所决定的任何方針都包容在內——因此使各国共产党除了遵循这个方針外沒有其他选择。

9. 斯大林主义内部危机的根本原因在1960到1961年期间，和1956年一样沒有得到处理。这些根本原因的解决，由于使用蒙混、压制和制造一些掩飾分歧的折衷声明的手段而被再一次地擱置起来。在現在正在开始的巨大的阶级斗争中，这个危机必然要加深。共产党内部的和国际間的“磐石般的团结”仅仅是表面現象。随着赫魯曉夫的机会主义路綫的危險的被揭露和下层党员的开始寻求一个更接近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世界革命的新阶段将造成共产党进一步的分裂。最初这些派別必然是散在的和不协调的。苏联官僚机构的被推翻和资本主义国家里旧领导人的政策的改变不会是一个自动的过程。馬克思主义运动所担負的巨大責任是建立新的群众的革命的党并从共产党中爭取革命战士和在他們影响之下的那些工人阶级部分以促进这个过程。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里，共产党是官僚机构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工具。或者在共产党組織内部或者在外部可能再度发生1956年的回到列宁道路上去的运动。不管是在党内或在党外，都不是一个改造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問題而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党以作为具有政治革命战略的第四国际的一部分的問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回到左派反对派和布尔什維克党的傳統和政策上去，而尤其重要的是以这种精神教育青年。在促进这一工作上必須不丢掉任何机会，虽然开始是細小的和微不足道的。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

利事件表明，在工人国家里缺少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会带来悲惨的后果。这些事件指出，如果将来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就迫切需要建立这样的党。只有把革命的真正力量组织成为深深扎根在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并以此和官僚机构相对抗，才能给官僚机构带来历史上的灭亡命运。在苏联、东欧和中国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和在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无条件地保卫这些国家以及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国际就是我们对于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政策的根本精神。

10. 在斯大林采用“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学说的三十六年以后，现在的世界形势明确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将来是一个世界革命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各大国的核武器装备给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学说以最尖锐的回答。只有一方面是苏联、中国和东欧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的新的关系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即使在工人国家范围之内，也还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起一种有计划的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随着先进国家里进行革命，社会主义必能在它的真正客观基础——高度生产率的物质基础和资本主义本身所发展起来的国际分工——上得到发展。

## 6. 第四国际

1. 在全世界上建立革命领导的主要任务牵涉着第四国际的改组问题，所以也就牵涉着对于巴布洛集团的研究。从这个集团的文件和活动上看，巴布洛主义的突出特点，总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印象主义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试图从数量上来估计所谓“客观因素”，

并以此降低在革命领导指挥下的群众所起的作用。这种在“客观”力量面前低头的主张使人们常常谈到“无可挽回的”和“不可抵抗的”过程。在苏联的情形下，它使人们得出关于群众“压力”的极端的结论，认为这种压力会迫使官僚机构自动地趋于“开明”和恢复苏维埃民主。巴布洛主义者就是使用“政治革命”这一名词也与建立革命领导没有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巴布洛主义导向于对斯大林主义势力的过高估计，并使人们相信在某种情况下，群众压力将同样地起作用以使共产党掌握政权。事实已经使人们很难相信这种预测，但是它仍然意味着对于无产阶级信任的保留和对于建立一个新的革命领导的轻视。在早期，这个同一的印象主义曾制造世界大战是真正不可避免的和即将到来的学说。这个同一的理论体系今天表现在下列的公式上边：

“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在历史上的迟迟到来是领导的背叛和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发展之间彼此辩证地互相影响的结果，通过这一事实，殖民地革命就和工人国家日益增长的力量一起在客观上成为了世界革命的动力。”

2. 我们的分析与评论家所特有的这种抽象混乱的词句没有任何共同之点。这种评论家脱离事实并把这些事实随便归之于某些人所起的主要和次要作用。在目前的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研究社会矛盾和工人阶级本身所起的作用，其目的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建立领导。例如，宗主国家里边的稳定，如已经表明的，与一系列强烈反抗资本主义和使帝国主义根本矛盾复杂化的世界力量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决定于这种力量。五十年代的经济上升，其本身并不证明资本主义原来是健康的或者在牢固的基础上恢复了它的旺盛的精力。此外，这种上升一直是工人阶级组织巩固的基础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削弱。

3. 革命运动所遇到的最大危險就是产生于或者向帝国主义力量投降或者向工人运动中的官僚机构力量投降或者同时向二者投降的取消主义。巴布洛主义, 现在甚至比 1953 年更明显地在国际馬克思主义运动中代表着这种取消主义的傾向。根据巴布洛主义, 先进的工人阶级不再是历史上的先鋒队, 帝国主义时代的全部馬克思学說和战略的中心, 而是以抽象的方式来加以研究和估計的“世界历史因素”的玩具。巴布洛分子国际會議的決議草案对于这一点是不諱言的。根据他們的看法, 世界革命現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工人国家的日益增长的实力和殖民地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在先进国家里的斗争, 因为現代資本主义性质的改变, 而被完全貶低到次要地位。这里否认了革命运动的一切历史任务, 一切都要服从于周圍环境的力量。苏联官僚机构的作用問題和殖民地革命的阶级力量問題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是自然的, 因为解决这些問題的关键是工人阶级在先进国家里所起的作用和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上的危机。

现在迫切需要对于这些問題确定一个正确的革命方針, 因为在日本和英国已經开始的巨大斗争在有組織的工人阶级面前直接提出了阶级领导的问题。在每一种情形下, 这些問題都是帝国主义最近的危机在这些特定国家里的特殊表现所强迫造成的。圍繞这些問題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加剧, 而且要扩展向其他帝国主义国家, 包括美国在內。任何从工人阶级政治独立和建立革命的党的战略上的撤退, 都意味着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那方面要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錯誤。

4. 第四国际各支部必須特別認識到自己的历史使命, 認識到只有通过不断地为正确方針而斗争和与其他派系展开竞争才能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 而不是去寻求一个共同基础。每一个

国家里的支部都要从国际的綱領出发，从第四国际的过渡时期綱領所总结出来的策略和基本概念出发。如支部认识到，这里并没有个别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美国，在殖民地和以前的殖民地以及在苏联范围以内的所有斗争都是互相依存的。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工业处境都受整个世界趋势的影响。

5. 在任何国家里建立革命的党都必须从坚持国际綱領和战略出发。但是，我们参加斗争的战术和方式必须产生自从那个国家里的阶级关系开始的具体讨论并考虑到一切有关的问题。因此，从一个由整个世界趋势中概括出来的普遍有效的战术出发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例如，我们不能以这种办法在一切有社会民主党的广大群众或者共产党存在的国家里都规定使用“打进去”战术。每一种情形，都必须根据那个特定国家的历史因素、阶级斗争的步骤、群众的需要和运动本身的情况来加以考虑；“打进去”战术也许非常正确，但是它必须建立在这种对于形势的全面考查上。

6. 革命者必须把他们的活动和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因为工人阶级本身是决定形势的因素。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能坐下来像公正的观察家那样从旁观察；他们本身是促成事件发展的参加者。此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工人阶级中的一切其他倾向都是以帝国主义胜利和工人阶级失败为根据的非无产阶级路线的胜利所造成的结果。

7. 我们在每一个国家里的运动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于阶级斗争的研究制定一个提出过渡时期要求的綱領，这一綱領将为一切与政治党派和工会的官僚机构展开斗争的那些支部提供一个斗争中心。我们必须用一个根据阶级斗争路线的统一綱領，以工人阶级自己的经验向他们证明：如果不摆脱官僚主义的领导，他们

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就不能获得胜利。在参加提高工人觉悟的一切运动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保持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最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思想意识的统一。这种参加的整个目的是为工人阶级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这个领导将得到一个群众的党的承认并领导这个党走向发展。

8. 托洛茨基主义者虽然人数不多，但要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和与工人阶级共同取得主要经验。这种参加并不是根据要和“主流”在一起的观点。促成这种参加的目的是帮助工人阶级认识到需要一个革命的领导。不管这种参加是否牵涉到加入一个有广大群众的党的问题，它都永远是一种独立地参加斗争。事实上，为了加强在各传统的党里边的的工作，这是一项首要任务。

9. 马克思主义者加入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是为了把这些党改造成革命的党的这种想法必须予以根除。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些党的战术与压力集团或者鞭撻政府派的政策没有任何共同之点。这就使它们与巴布洛主义者的学说——“工人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的政权”可以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步”或者它的“准备阶段”——处于反对的地位。在这些党控制着工人阶级群众的地方，如在法国、意大利或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随时正确地提出“夺取政权”作为中心的口号。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这种加入的想法当作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阶段提出来。这个号召不是为了支持改良主义者或斯大林主义领导人，而是作为突破它们对于群众运动控制的一个步骤。这些政权和它们的妥协政策与背叛是教育工人阶级和引导他们建立革命政权的一个必要的步骤。

10. 工党官僚——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掌握政权和靠着工人阶级养肥了自己的那些工党官僚——不能由于自然发展或者由于中间派那种广泛的宣传布置而被从革命运动中清洗出去。英国工党



在1960到1961年两次年会期間的經驗再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們渴望保持他們的权力和特权，所以他們的狹隘利益和群众利益发生了冲突。即使他們被迫領導斗争，或者为了維護特权而被迫維護工人阶级取得的成果，他們也是采取他們自己的行动方式。这些方式是不惜一切代价以避免动員工人群众的阶级力量。

11. 1953年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分裂表明，在关于世界战略和建立革命的党的重大問題上，存在着两个不可調和的流派。巴布洛主义代表离开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翼中間派。虽然在有些問題上它的路綫表面看来和正統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路綫相似，但实际上它的方針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自分裂以来，政治上的根本分歧越来越多。我們同作为一个政治派系的巴布洛主义沒有任何妥协的可能。相反地，只有对于巴布洛主义究竟代表什么进行彻底的討論，然后才能使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特别是現在在各国参加这一运动的青年干部受到教育。

12. 1953年的尖銳而突然的分裂在有些国家里造成很大的混乱。甚至現在还可以看到这种混乱存在的一些迹象。这一問題必須尽速地予以解决。但是，完全用組織上的手段来重新統一这一运动的任何企图只能造成进一步的分裂。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并不反对統一，但是它反对那种不是以經過国际間充分討論之后而取得的政治上的根本同意为基础的假統一。只有通过这种討論才能重新改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成为一个单一的世界的党。所以我們不相信如1958年所看到的那种“平等委员会”的提議能够再被用来作为我們解决这个問題的主要方針。

13. 托洛茨基于1938年建立的作为一个世界組織的第四国际已經不再存在。它已經为巴布洛的修正主义所破坏。惟一继承第

四国际理論傳統的是那些屬於国际委員會的各支部。因此必須立即着手改組第四国际,其方式是准备进行一次彻底的討論,由屬於国际委員會和国际書記处的各支部在討論中提出決議案和意見书并尽可能广泛地把这些文件散发給整个国际运动。这次討論必須于1962年1月以前开始,并且必須建立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組委員會負責組織这次討論。这个小組委員會应包括来自两派的同等数目的人員,其任务是广泛散发各种資料并使各支部的基层黨員都有机会对这些資料进行研究。一年之后必須召开国际运动的筹备會議以确定从討論結果产生的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然后就可以为国际运动提出新的党章。

14. 对于“打进去”的战术問題和各支部在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組織內部进行工作的經驗做彻底的研究将是这次討論的一个特点。这种討論对于整个运动一定有极大的教育价值。

15. 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把本決議提交国际討論。我們主張在有无限美好机会的时候改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这些机会可以通过重新建立一个权威性的世界領導来实现。我們要求所有支部对此予以密切的注意。

附录：

## 战争与第四国际

(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国际书记处 1934 年  
6 月通过的提纲草案)

### 引 言

〔本提纲出版时，正当战争的危險以山雨欲来的形势籠罩在欧洲的上空。裁军会议已經变成了締結新的軍事同盟的战场。墨索里尼和魏刚将军正在呼吁增加军备。昨天經受新的世界屠杀的考驗的是奥地利，今天則是薩尔和滿洲。在整个世界，用作人們談話題材最多的莫过于空中动員、加强航空与軍舰、化学战争、工业动員，等等。

和 1914 年一样，第二国际的爱国主义领导者又在作为帝国主义的忠实僕人而准备为未来的战争提供炮灰。

无能为力的第三国际的领导者，正在把群众引入歧途，他們用像假面跳舞会那样喧鬧的代表大会来代替反对战争的动員。

反对战争的斗争必須在不顾两个国际和反对两个国际的情况下进行。这个斗争必須給予一个新的基础和一面新的旗帜——第四国际的旗帜。不管第四国际的干部在人数上多么少，他們的政策的正确性和明确性将会使他們起决定性的作用。牢记着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

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的問題，是今天的中心

問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内部分化过程的焦点。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组织的性质将在这个斗争中暴露出来；可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干部，将在这场斗争中变得坚强起来。

只有对本提纲以严肃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加以研究的同志，才会在反战的政治工作方面得到充分的武装。但是，尽管对本提纲的学习、讨论和批评是有用的，可是还不够。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斗争！在日常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必须以本提纲的精神，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列宁的精神，进行战斗。

本提纲经过某些增补和修改后，已于1934年2月在我们的期刊《问题与讨论》的法文版上以草案的形式公布了。

我们本着这种精神将本提纲公诸无产阶级大众。

1934年7月10日，日内瓦

国际书记处

商业、工业、农业和财政方面灾难性的危机，国际经济联系的中断，社会生产力的衰退，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的极度尖锐化，——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日暮途穷，并且充分地证实了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的论断。

1914—1918年的战争，正式地宣告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到今天为止，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有：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世界各国人民可怕的灾难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可怕的危险，都是由于1917年的革命没有在欧洲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得到胜利的发展的结果。

在个别国家内，资本主义历史性的死胡同，表现在慢性的失业现象，表现在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表现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表现在议会国家的解体和腐朽，表现在以所谓“社会的”和

“民族的”蠱惑宣傳來恣意毒害人民，即實際上取消了社會改良并把舊的統治政黨拋在一邊而代之以赤裸裸的軍事警察機構（資本主義衰頹時期的波拿巴主義），表現在法西斯主義的滋長，表現在每個無產階級組織的當權和垮台。

在世界舞台上，同樣的過程正在沖走國際關係穩定性的最後殘余，使各國之間的每個沖突都瀕于劍拔弩張的境地，暴露了和平主義的各種企圖的無用，使軍備在一種新的、更高的技術基礎上增長，從而導致一場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法西斯主義就是這種戰爭的一貫的設計者和組織者。

另一方面，現代資本主義反動腐朽透頂和掠奪本性的暴露，民主主義、改良主義和和平主義的破滅，無產階級對尋求一條避開當前災難的迫切的需要，等等，把國際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來了。

只有通過起義的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推翻，才能使人類免于一場新的對各國人民的毀滅性的屠殺。

### 一場新戰爭的準備

1. 與現代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造成上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同樣事件，現在已經達到了遠比 1914 年 6、7 月間嚴重的緊張局面。對於一場新的戰爭的後果的恐懼，是束縛帝國主義意志的唯一的因素。但是，這種遏制力量的效用是有限的。內部矛盾的壓力，把一個個的國家先後推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而法西斯主義本身，除了準備國際性的爆發外，還是不能保持政權的。各國政府都害怕戰爭。但是哪一國政府都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不經過一次無產階級的革命，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

2. 歐洲，一個歷史上離開我們最近而規模最大的戰爭的戰場，

無論是战胜国和战敗国方面，都在繼續走向衰頹。根据正式的綱領以充当“和平的組織者”为己任的国际联盟，事实上是力图使凡尔賽体系永久化，使美国的領導地位中立化，并且建立起一个反对紅色东方的堡垒，但它經不起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冲击。只有最冷酷的社会爱国者(汉德逊、王德威尔得、茹奥等等)才仍然力求把裁减軍备与和平主义政策的前途同国联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国联在帝国主义联合的棋盘上变成为一个次要的棋子了。今天在日内瓦幕后进行的外交的主要工作，是寻求軍事上的同盟，也就是說，是热狂地准备一場新的屠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軍备的不断擴張，法西斯的德国在这方面已經作了一次最新而巨大的推动。

3. 国联的崩潰，是同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領導地位的開始崩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法国的人口数量和經濟实力，正如人們所預料的，異常薄弱，不适于作为凡尔賽体系的基地。具有优良的軍事装备并显然帶有“防御”性的法帝国主义，只就它是根据合法的協議而不得不开保卫它的搶劫和掠奪成果來說，实质上仍然是新的大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德国的資本主义受到严重不堪的矛盾和战敗的后果的压力，已經被迫掙脫了民主的和平主义政策的束縛，而現在却成为凡尔賽体系的主要威胁了。欧洲大陆的国家联合，基本上仍旧遵循着战胜国与战敗国的路綫。意大利处于一个背叛性的中間人的地位，在决定性的关头，它会把自己的友誼出賣給强大的一方，就像它在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現的那樣。英国希望利用欧洲的各种敌对关系，利用欧洲和美洲之間的矛盾以及远东的即将来临的冲突，以图保持自己的“独立”——这是它过去“光荣的孤立”的遺影。但是，优势的英国，在策划謀略方面是越来越难得逞了。英国的資產階級看到英帝的分崩离析、看到印度的革命运动和他們在中国的地位

的搖搖欲墜而惊慌失措，他們要用麥克唐納和漢德遜的令人作嘔的偽善精神來彌補他們貪婪而怯懦的觀望與權宜政策，而這個政策反而成為今天的普遍不穩定和明天的大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4. 在戰爭和戰後時期，美國的國內外地位都發生了空前巨大的變化。美國對歐洲從而對全世界在經濟上的巨大優勢，使美國資產階級在戰後的最初時期能夠作為一個不偏不倚的“和事老”、“海上自由”和“門戶開放”的保衛者而出現。但是，工業和商業的危機，以可怕的力量顯示出原來在國內市場找到充分支持的舊的經濟平衡狀態，已經受到騷擾了。這條道路已經走到盡頭了。

當然，美國在經濟上的優勢並不是已經消失，相反地，由於歐洲的進一步的分崩離析，它甚至已經以潛伏的形式增長起來了。但是，這種優勢所表現的舊形式（工業技術、貿易差額、穩定的美元、歐洲的債款）已經失掉了現實的意義；先進的技術不再使用了，貿易差額是逆差多，美元正在跌價，債務尚未清還。美國的優勢必須找到新的表現形式，尋找出一條只有戰爭才能打開的道路。

對中國的門戶開放的口號，在少數的幾個日本師團面前，就顯得無能為力。華盛頓在執行遠東政策時，力求在最合適的時刻，挑起蘇聯與日本之間的軍事衝突，削弱日本和蘇聯的力量，視戰爭的結局而規定自己進一步的戰略計劃。在依照習慣繼續討論解放菲律賓的同時，美帝國主義者實際上是在準備為自己在中國建立基地，以便下一階段與英國發生衝突時，提出“解放”印度的問題。美國的資本主義正在面臨着曾經把1914年的德國推向戰爭道路上的同樣的問題。世界不是瓜分了嗎？它還必須重新瓜分。對於德國來說，那是一個“組織歐洲”的問題。美國必須“組織”世界。歷史正在使人類面對着美帝國主義火山的爆發。

5. 依靠落后、貧困和野蠻的漿汁生活的後起的日本資本主義，

正在被国内不堪忍受的潰瘍和膿疮所驅使，走上了不断的海盜性掠奪的道路。由于缺乏自己的工业基础，由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安定，日本的資本主义是最富于侵略性和肆无忌惮的。但是，未来的历史会表明，在这种貪婪的侵略后面，真正的力量是寥寥无几的。日本可能首先发出战争的訊号；半封建性质的日本虽然被曾經襲击过沙皇俄国的各种矛盾弄得分裂了，可是正是从这个半封建的日本，而不是从別的国家，可能发出革命的号召。

6. 当然，如果确切地預言，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時間会打第一枪，那未免是太冒險了。在苏美协定以及国内困难的影响下，日本可能暂时退让。但是，恰恰相反，同样的情况也可能迫使日本軍閥利用时机加快进行攻击。法国政府会不会决心来一次“預防性”的战争，在意大利的援助下这种战争会一会轉变成一种普遍性的战争呢？或者相反，在观望和策划的同时，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会不会走上与希特勒达成協議的道路从而为他开辟向东方进攻的道路呢？

巴尔干半島会不会再一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呢？或者这一次将由多瑙河国家采取主动？因素有許多，各种冲突力量又互相交織在一起，这就排斥了具体的預測的可能性。但是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绝对地清楚的，这就是：战后时期已經簡直变成了两个大战之間的休整时期，而这个时期就要在我們面前消失。計劃化的劳資协会式的資本主义或国家資本主义，同极权的、拿破侖主义的国家或法西斯主义国家，密切地配合行动，只就它的官方任务是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进行一种和諧的国民經济來說，它仍然是一种空想，是一种謊言。但是，既然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的一切經济力量以准备一場新的大战的問題，那末，它也是一种危險的現實。这个工作目前正在全力开展。一場新的大战已經在到处敲門。這場大



战比起以前的战争将更残酷，更富于破坏性。正是这个事实使对待日益迫近的战斗的态度成为无产阶级政策的中心问题。

### 苏联和帝国主义战争

7. 同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发生的那种对立情况比起来，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敌对性矛盾，是无比深刻的。但是，工人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矛盾，它的尖锐化程度是依工人国家的演变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为转移的。苏联的官僚主义的惊人发展和劳动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已经大大地降低了苏联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共产国际的严重失败和苏维埃政府的民族和平主义对外政策，也只会减少世界资产阶级的不安。最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重新加剧，迫使欧美各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同苏联接近起来，这不是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种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出发，而是着眼于苏维埃国家在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互不侵犯协定和华盛顿政府的承认苏联，等等，是这种国际形势的显明标志。希特勒为了使德国重振军备合法化，以“东方的危险”为名作了苦心孤诣的奋斗，其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反应，特别是法国及其附属国方面的反应，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危险，尽管还有可怕的危机，但已丧失了它的尖锐性。因此，苏联在外交上的成就，至少在颇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国际革命的极端衰弱。

8. 但是，如果认为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是完全从议程上取消掉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纵横捭阖的关系即使有所缓和，社会制度的矛盾仍然会全部保持着。资本主义的继续衰退会驱使资产阶级政府作出断然的决定。每一次大战，不管它最初的动机如何，终归要提出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问题，以便向资本主义硬化的血

管中輸送新的血液。

蘇維埃國家明顯而日益加深的官僚主義蛻化以及它的對外政策的民族保守主義性質，並沒有改變蘇聯作為第一個工人國家的社會性質。各種各樣民主的、理想主義的、極左的、無政府主義的理論，都無視蘇聯的所有制關係的性質在趨向性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否認或避而不談蘇聯和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階級矛盾，它們不可避免地，特別是在發生戰爭時，得出反革命的政治結論。

不管形勢如何，不管衝突的直接原因是什麼，**保衛蘇聯**免於資本主義敵人的攻擊，是每個忠誠勞動者組織的基本的和應盡的義務。

### “保衛國家”

9. 在資本主義同中世紀地方割據現象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變成了資本主義的階級活動場所。但是，民族國家剛剛形成，就成為經濟和文化發展方面的障礙。生產力和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同生產力與生產手段私人占有的這個主要矛盾一起，把資本主義的危機變成了世界性的社會制度的危機。

10. 如果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能夠一下子廢除的話，那末，甚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在一定的時期內也是能夠繼續上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的（這當然要作許多犧牲）。正如蘇聯的經驗表明，生產手段的私人所有制要是廢除了，那末甚至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生產力也可能獲得較高的發展。但是，只有廢除了私有制和國與國之間的障壁，才能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社會**創造條件。

11. 保衛民族國家，首先是在割據成許多小國的歐洲——民族國家的發祥地——是一個十足的**反動**的任務。設有邊界、通行

证、货币制度、关卡以及保护关卡的军队的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可怕障碍了。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保卫民族国家，而是完全地、最后地废除民族国家。

12. 如果现在的民族国家果然能够代表一种进步的因素，那末，不管它的政治形式如何，当然也不必去问是谁首先“发动”战争，它是一定要加以保卫的。把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的问题同某一特定政府的“罪行”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十分可笑的。对于一所适于居住的房子，难道人们只是因为主人不小心或意图不良而引起的火灾就拒绝抢救吗？但是这里所谈的恰好是一所不适于生活而只适于死亡的房子。民族国家的结构必须彻底夷平，才能使各国人民生活下去。

13. 进行保卫国家的说教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效劳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有在和平时期已经向民族国家宣告了不可调和的战争的政党，才能在战争时期不受民族国家的束缚，才能做到不以战争的地图为重，而以阶级斗争的地图为重。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客观上的反动作用，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经得起各种各样社会爱国主义的侵袭。这就是说，只有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才能与“保卫国家”的思想和政策真正地划清界限。

### 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战争

14. 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民族(nation)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历史把民族的命运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工人阶级才拒绝把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工作委托给帝国主义，事实上，帝国主义“拯救”民族的结果，只能使民族为了一小撮剥削者的利益而在将来遭受到新的危险。

15. 資本主义虽然曾經利用民族，取得了自身的发展，但是它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沒有完全地解决有关民族的問題。凡尔賽的歐洲的边界，是脫离現存的民族集合体而划定的。重新划定資本主义歐洲的边界，使国家的边界与民族的边界一致的主張，是一种純粹的空想。沒有任何一个政府会通过和平的方式让出自己的一寸土地的。一場新的战争，也只会按照战争的地图，而不是与民族的边界相适应，来重新划定歐洲的边界的。完全的民族自决和歐洲各国人民和平协作的任务，只有在扫清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歐洲的經濟統一的基础上，才能求得解决。“歐洲联邦”的口号，不仅是拯救巴尔干和多瑙河各族人民的口号，而且也是拯救德法两国人民的口号。

16. 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問題，占着特殊的、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甚至到今天都还是在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战斗的。它們的斗争毫無疑問是进步的，它們使落后人民摆脱了亞細亞主义、地方主义和外国的束縛，从而对帝国主义国家施以有力的打击。但是必須預先清楚地理解到，亚洲和非洲后起的革命，是不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复兴开辟新的时代的。殖民地的解放在将来只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巨大的插曲，正如在同样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俄国的后起的民主轉变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序曲一样。

17. 在南美洲，兴起較晚但已开始衰退的資本主义正在維持半封建的、或半奴隶的生活条件，在那里，世界性的对抗矛盾引起了买办集团間的剧烈火并，引起了各国内部連續不断的大轉变，也引起各国之間曠日持久的武装冲突。美洲的資產階級能够在其历史上的兴盛时期联合而成为美洲大陆北半部的一个联邦，因而它現在可以利用他們由此而得到的全部权力，来瓦解、削弱和奴役他們

的南半部。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組成一个强大的联邦，才能使自己摆脱落后和被奴役的状况。但是，能够响应号召解决这一任务的，决不是后起的南美资产阶级，一个完全被外国帝国主义用金錢收买的代理人，而是年輕的南美无产阶级，被压迫群众的理想的领导者。因此，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暴行和阴谋、反对当地买办集团的血腥勾当的斗争中的口号是：**南美和中美苏維埃联邦。**

無論在什么地方，民族問題都是同社会問題同时发生的。

### 保 卫 民 主

18. 保卫国家的虛伪性，到处都是以**保卫民主**的补充的虛伪性来加以掩飾的。如果說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今天不把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看做是一样的东西，而且随时准备击退法西斯主义对民主主义的进攻，难道在战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就不必支持民主政府来反对法西斯政府嗎？

真是奇談怪論！我們是通过无产阶级的組織和方法来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我們决不把这种保卫委托給资产阶级国家（“Staat, greit zu！”归国家負責！）。如果說在和平时期，我們同最“民主”的政府就处于不可調和的对立状态，那末，到了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和罪行都采取了最殘酷而血腥的形式的战争时期，难道我們对它还应担負絲毫的責任嗎？

19. 大国之間的一場現代的战争，决不意味着是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間的冲突，而是两个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同时，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的性质，在两个陣营中都既会有法西斯主义的（半法西斯主义的，拿破侖主义的，等等）国家，也会有“民主主义的”国家。法帝国主义的共和国形式在过去并没有防止

它在和平时期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波兰、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亚的軍事資產階級專政之上，正如它在必要时会恢复奧匈君主国家以作为反对奥地利与德国統一的障壁一样。最后，在法国本身，今天已經相当削弱的議會民主政府，如果在战争开始前还不予以推翻的話，毫無疑問会成为战争的首批牺牲者之一。

20. 一些文明国家的資產階級，已經表明而且还要繼續表明，在发生国内危險时，它怎样不費多大周折就能把議会的統治形式变成极权的、專制的、拿破侖主义的或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在战争期間，国内和国外的危險，会以十倍的力量威胁它的基本階級利益，这时，它就要使这种变化来得更加迅速，更加果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党为了一个脆弱的民主外壳而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是对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策的放棄和沙文主义的道德敗坏，也就是說，毀灭了能够把人类从災难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因素。

21. 战争时期“保卫民主的斗争”，首先是意味着爭取保存工人的出版和工人的組織以反对放肆的軍事檢查和軍事当局作斗争。革命的先鋒队，要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寻求同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建立統一战綫——反对本国的“民主”政府，但决不是寻求同本国政府的团结，以反对敌对的国家。

22. 帝国主义战争，远比資本主义統治的国家形式的問題更为重要。它在每一个民族資產階級面前提出了民族資本主义的命运的問題，在各国的資產階級面前則提出了一般資本主义命运的問題。无产階級也只能提出这样的問題：資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某一个帝国主义陣营的胜利还是无产階級革命的胜利？

### 保卫弱小国家和中立国家

23. 保卫国家的概念，特别是当它同保卫民主的观念是一致的

时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国家和中立国家（瑞士、比利时的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人，这些国家不能执行独立的征服政策，因而赋予国界的保卫以无可辩驳的绝对的教条主义的性质。但是，仅仅以比利时为例来说，我们就看到，形式上的中立是多么自然地会被帝国主义公约的体系所代替，“保卫国家”的战争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合并主义的和平。战争的性质，不是决定于战争本身所采取的发端的步骤（“中立的破坏”、“敌人的入侵”，等），而是战争的主要动力，战争的整个发展以及战争最后导致的结果。

24. 不难理解，瑞士的资产阶级是不会毅然决然地首先发动战争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比任何其他资产阶级都具有更为充分的理由来谈**防御地位**。但是，一旦瑞士由于事件发展的进程而拖入战争的时候，它就会为了追求同样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目的而参加世界强国的斗争。中立地位要是破坏了，瑞士的资产阶级就会同进攻的双方中较强大的一方联合起来，而不管哪一方对于破坏中立应负有较大的责任，也不管在哪一个阵营里有更多的“民主”。例如在上次大战期间，比利时本是沙皇制度的盟国，但它决不离开同盟国的阵营，而在战争的过程中，他们又感觉到破坏希腊的中立是有利可图的了。

只有来自瑞士偏僻乡村的一位冥顽不化的资产阶级（如罗伯特·格里姆）才会煞有介事地认为，他参加的世界战争是为保卫瑞士的独立而进行的。正如上次大战扫除了比利时的中立一样，新的战争也不会给瑞士留下任何独立的痕迹。即使没有独立，瑞士在战后是会继续保留国家的地位，还是会被德、法、意三国瓜分，这个问题要依一系列欧洲的和世界的因素为转移的，其中瑞士的“保卫国家”一项只占着微不足道的地位。

由此可見，就中立的、民主的瑞士來說，尽管它是一个沒有殖民地的国家，而且在我們看来这里的保卫国家的概念似乎是最純粹沒有的了，可是帝国主义的規律还是沒有例外。对于资产阶级的要求：“参加保卫国家的政策”，瑞士的无产阶级必須回以保卫阶级的政策，才能在下一步向着革命前进。

## 第二国际和战争

25. 保卫国家的戒律是从这样一个教条推論出来的：全国各阶级的团结高于阶级斗争。事实上，有产者从来不是在一切条件和任何条件下都这样地承认保卫祖国的，而是利用这种說法对保护自己在祖国的特权地位进行掩飾。被推翻的統治阶级总是要变成“被打敗者”，也就是說，他們准备通过外国的武装援助来恢复他們的特权地位。

。意識不到自己的利益和慣于忍受牺牲的被压迫阶级，是从表面价值来接受“保卫国家”的口号的，也就是說，把它看做是高于阶级之上的絕对的义务。第二国际各党的基本历史罪行，就在于他們培养了和加强了被压迫者的奴才习惯和傳統，挫折了他們的革命义憤，用爱国主义的思想蒙蔽了他們的阶级觉悟。

如果說欧洲的无产阶级在大战的末期不曾把资产阶级推翻；如果說人类今天飽受危机痛苦的折磨；如果說一場新的战争有可能把城市和乡村变为廢墟，那末，第二国际应对这些罪行和灾难負主要責任。

26. 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曾使人民群众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无能为力。如果說在战争时期为了民族的利益需要放棄阶级斗争，那末，在一次重大的經濟危机的时代，也就需要丟开“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危机对“民族”的为害性并不少于战争。远在1915



年4月，罗莎·卢森堡就用下列的一段話詳盡地探討了這個問題：“要末，階級鬥爭在戰時也是無產階級存在的不可缺少的規律……要末，在平時，階級鬥爭也是違反民族利益和祖國安全的一種罪行。”“民族利益”和“祖國安全”的思想，已經通過法西斯主義而轉變成無產階級的鎖鏈和鐐銬了。

27. 德國的社會民主曾經支持過希特勒的對外政策，一直到希特勒把它攆走的時刻為止。法西斯主義最後取代民主主義的事實表明，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會民主確保它的利益和特權，社會民主就能保持它的愛國主義性質。前霍亨索倫王朝的愛國主義者，一旦僑居國外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準備歡迎法國資產階級反對希特勒的防禦戰了。第二國際毫不為難地大赦了威爾斯(Wels)之流的人物，可是到了第二天，只要德國資產階級的小指頭一動，召喚他們回來，他們就會重新轉變為熱忱的愛國主義者。

28. 法國的、比利時的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對德國事件的反應是，在“保衛國家”的問題上同本國的資產階級結成公開的聯盟。法國當局正在同摩洛哥進行“小型的”、“意義不重大”但非常殘酷的戰爭，與此同時，法國的社會民主黨和改良主義的工會則在自己的代表大會上討論一般戰爭的慘無人道，在心目中主要指的是德國方面的復仇戰爭。在僅僅發生新利潤問題的地方對掠奪殖民地的殘暴行為視而不見地予以支持的政黨，在一場涉及到資產階級共和國自身命運的大戰中，一定會閉着眼睛來支持任何民族政府的。

29. 今天，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同無產階級歷史利益的不相容性，同帝國主義戰爭的前夕比較起來，是空前地深刻化和尖銳化了。反對群眾的愛國主義偏見的鬥爭，首先就是反對第二國際作為一個組織、一個政黨、一個綱領和一面旗幟的不可調和的鬥爭。

## 中派主义与战争

30. 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完全地瓦解了第二国际这个革命政党,从而产生了创立第三国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共和国“革命”,某些国家选举制的民主化,受惊的欧洲资产阶级战后最初几年在社会立法方面所做的让步——所有这一切,和列宁主义的追随者的灾难性的政策一起,曾给予第二国际这个不再是革命的政党而是一个和平改良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工人党以大量的喘息时机。可是,曾几何时——最后与上一次世界性危机的来到一起——走向改良道路的一切可能性终于完结了。资产阶级转而采取反攻。社会民主党背叛性地放弃了一个个的成就。近年来,改良主义的一切变种——议会式的、工联式的、地方自治的、劳资协作的“社会主义”,都已遭到了无法挽救的破产和灾难。正因为这样,在新战争的准备面前,第二国际感到沮丧灰心了。社会民主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褪色的过程。始终一贯的改良主义着上了新的色彩,它变得沉默起来或是分裂开了。它的地位正由**各色各样的中派主义**所取代,有的表现为旧的政党内部的无数派别,有的表现为独立的组织。

31. 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伪装的改良主义者和右翼中派主义者**(里昂·勃鲁姆,亨利·德·曼,罗勃·格里姆,马丁·特兰梅尔,奥托·鲍尔等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支吾含糊的外交词句,企图一面抚慰资产阶级,一面愚弄工人阶级。他们提出了经济“计划”或一系列的社会要求,许诺在保卫祖国免于外部“法西斯主义”方面力求做到使民族资产阶级也会支持他们的纲领。这样地提出问题的目的,就在于掩盖国家的阶级性质的问题,避而不谈获得政权的问题,并且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的幌子下,提出保卫资本主义祖国。

32. **左翼中派主义者**本身有許多不同的色彩(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 荷兰的独立社会党, 英国的独立工党, 法国的齐罗姆斯基和馬柯·皮維特集团, 等等), 他們在口头上算是做到了要放棄保卫祖国。但是, 光有口头上的放棄, 他們还不能得出必要的具体結論。他們的国际主义, 有一大半, 如果不是十分之九的話, 是帶有柏拉图式的純精神的性质。他們不敢摆脱右翼中派主义者; 他們在进行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的名义下, 进行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斗争, 拒絕为革命的国际而战斗, 繼續呆在以国王的侍从王德威尔得为首的**第二国际**里。中派主义者在一定的时刻也能表达群众向左轉变的趋势, 但归根結底他們是阻撓无产階級內部革命的重新集結, 从而也阻撓反对战争的斗争。

33. 中派主义在实质上意味着半心半意和犹豫不决。但是战争的問題最不利于犹豫不决的政策。对群众說来, 中派主义永远只能是一个短暫的过渡阶段。日益加剧的战争的危險, 将要促使中派主义各派別內部的分化日益尖銳, 尽管它們今天还在工人运动中起主导作用。无产階級的先鋒队越迅速而充分地使自己的头脑摆脱中派主义的束縛, 就会越有效地武装起来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就是明明白白地、毫不調和地提出有关战争的一切問題。

### **苏联的外交和国际革命**

34. 在取得政权后, 无产階級本身就要轉而采取“保卫祖国”的立場。但是从这时起, 这个公式获得了嶄新的历史內容。孤立的工人階級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滿足自己需要的实体, 而仅仅是一个**为世界革命磨好的钻头**。无产階級在保卫苏联时, 不是保卫国界綫, 而是保卫暂时被国界圍起来的社会主义专政。只有深刻地理解

这样的事实：无产阶级的革命不能在国家的范围内达于完成；没有无产阶级在主要国家里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一切成就都注定要归于失败；除了通过国际革命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不到拯救；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建成——只有这个深入到血液和精髓的坚定的信念，才能为战争时期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创立可靠的基础。

35. 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出发的苏维埃对外政策，即实际上把国际革命的问题置之不理的政策，是以**普遍裁军和互不侵略**这两个主张为基础的。为了寻求外交上的保证，苏维埃政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不得不采取纯粹形式主义的說法，这是从有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出发的。但是这些由于国际革命的软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苏维埃政府本身以往的错误所强加给自己的迁就敌人的方法，是决不能上升为一种普遍适用的体系的。苏联外交的行动和言论，长久以来超越了不可避免的、可以容许切实可行的妥协的界限，而这种行动和言论居然已被规定为第三国际的国际政策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并且已经变成为最恶劣的和平主义幻想和社会爱国主义的错误根源。

36. **裁军**并不是反对战争的一种手段，因为，正如德国本身的经验表明，插曲性质的裁军只不过是走上新的重整军备道路的一个阶段罢了。重新发动而又十分迅速的重整军备的可能性，是现代工业技术所固有。“普遍”裁军即使可以实现，也只能意味着比较强大的工业国的军事优势的加强。“百分之五十的裁军”决不是完全裁军的道路，而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重整军备的道路。把裁军说成是“防止战争的唯一现实的手段”，就是为了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结成共同阵线而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

37. 苏维埃政府在同帝国主义者们的任何协定中有权就**侵略**一

詞的涵義以最大的精確性加以闡述，對於這種權利，我們決不能爭論。但是如果企圖把這個有條件的合法主義的公式轉而用作國際關係的一種最高調節者，那就是要用保守主義的準則來代替革命的準則，而把無產階級的國際政策歸結為保衛現有的兼併和用武力建立起來的邊界了。

38. 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我們認為革命戰爭既是一種起義行動也是無產階級政策的一種手段。我們對待戰爭的態度，不是取決於對“侵略”的合法主義的公式，而是取決於哪一個階級進行戰爭和為了什麼目的而進行戰爭的問題。在國與國的衝突中，也和階級鬥爭中一樣，“防禦”與“侵略”僅僅是實際權宜措施的問題，而不是法律準則或倫理準則的問題。單單一個侵略準則只能為勃魯姆、王德威爾得等人的社會愛國主義政策創立支持的根據，這些人是由於有了凡爾賽條約才能在保衛和平的幌子下保衛帝國主義的掠奪物的。

39. 斯大林的著名的公式“我們不要別人的一寸土地但也不放棄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在極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侵略性質中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的綱領。一國社會主義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對民族國家的反動作用的模糊，導致對民族國家的調和，對民族國家的理想化，減弱革命的國際主義的重要意義。

40. 第三國際的領導人，以工人階級的国家必須利用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為理由，來為蘇聯外交政策辯護。這種論斷本身固然無可厚非，但需要加以具體化。

每個階級的對外政策，都是它的國內政策的繼續和發展。如果說當權的無產階級必須辨別和利用國外敵人陣營中的矛盾，那末，仍在為取得政權而戰鬥的無產階級，就必須知道如何辨別和利用國內敵人陣營中的矛盾。第三國際原來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利用

改良主义的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間的矛盾，从而直接地导致了无产阶级最大的失敗，使它面临着一場新的战争的危險。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之間的矛盾，也必須从国际革命着眼才能加以利用。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鋒队不以苏維埃外交政策为轉移的情况下，只有在有充分自由来揭露这种違反国际革命利益从而也違反苏联利益的民族主义的保守方法的情况下，保卫苏联才是可以理解的。

### 苏联及帝国主义的各种联合

41. 苏維埃政府現在正在改变它的关于国际联盟的方针。同过去一样，第三国际还是依样画葫芦地重复苏維埃外交的詞句和姿态。各种各样的“极左分子”利用这种情况再一次在资产阶级国家中間排斥苏联。以自己特殊的民族考虑为轉移的社会民主党人，把苏联同国联的“和解”不是看做莫斯科政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证据，便是相反地，把它看做是国联以及一般地說是整个和平主义思想意識的更新。在这个問題上，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同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任何一种評价都沒有共同之处的。

我們对待国联的原則上的态度，和我們对待每一个无论是在国联之内或之外的每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是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苏維埃国家在帝国主义敌对集团之間的策略，也是以对待国联的策略为前提的。只要日本和德国呆在国联内，国联就有可能变成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强盗达成牺牲苏联的协定的場所。日本和德国——苏联最直接而主要的敌人——退出国联之后，国联一部分变成法帝国主义的同盟和附庸的集团，一部分变成法、英、意三国間火并的舞台了。同国联这样或那样的联合，都可能强加在苏維埃国家的身上，由实质上都是同苏維埃国家敌对的帝国主

义阵营所操纵。

42. 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对当前的形势作出充分的现实主义的估计,同时,还必须把下列的考虑放在首要的地位:

1) 在十月革命十六、七年后,苏联仍然需要寻求同国联的和解,需要用抽象的和平主义公式来掩饰这种和解,这正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衰弱,从而是苏联国际地位的极端衰弱。

2) 苏维埃外交抽象的和平主义的措辞和它对国联的恭维话,同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对它们不负任何责任,恰恰相反,它要揭露它们的肤浅和虚伪,以便在清楚地理解现实的力量和真正的对抗矛盾的基础上,更好地动员无产阶级。

43. 在当前的形势下,苏联同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或是在发生战争时同某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结盟反对另外一个集团,这决不能认为是不会有的。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暂时的结盟十有八九是难以避免的,而且还不会因此而不再是对苏联和对世界革命的最大的危险。

即使苏联被迫同某些帝国主义者结成军事同盟来反对另外一些帝国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也不会拒绝保卫苏联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甚至更需要保证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赖于苏维埃外交,从而也不依赖于第三国际的官僚机构。

44.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仍旧是工人阶级国家的坚决而忠忱的保卫者,但决不会成为苏联的帝国主义联盟的成员。一个同苏联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地、完全地保持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愾。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政策和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但在实际行动的性质上,可能由于具体的战

爭形勢而产生許多差異。譬如說，在苏联和日本之間发生战争时，假若美国的无产阶级阻撓美国的軍火运送到苏联，那就是可笑的和犯罪的了。但是，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就义不容辞地可以采取罢工和怠工以及諸如此类的行动。

45. 无产阶级对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的不可調和的反对活动，必須一方面根据国际阶级政策，另一方面根据該国的帝国主义目的，来揭发这个“盟国”的背叛的性质，揭发它在苏联进行资本主义顛复的投机活动。因此，在“結盟的”和在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应当以对资产阶级实行革命的推翻和夺取政权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同苏联的**真正的联盟**，才能把第一个工人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46. 在苏联国内，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战争，毫无疑问会激发起轰轰烈烈的战斗热情。一切矛盾和敌对看来都会被克服，或者无论如何会退到不显著的地位。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年轻一代的工人和农民，将会在战场上显示出巨大的能动力量。集中化的工业，尽管有缺陷和缺点，可是将在满足战争的需要方面，发挥巨大的优越性。苏联政府毫无疑问已经建立了大量的粮食储备，足以应付战争初期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参谋部当然会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发现红军是强大的对手**，同这个对手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要对军队进行异常严格的训练。

47. 但是，正是战争的曠日持久的性质，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苏联过渡时期的经济与官僚主义计划的矛盾。在许多情况下，巨大的新企业竟然变成了同样巨大的死资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响下，农民经济的个人主义倾向将得到极大的发展，集体农庄内的离心力量将随着战争逐月增长。不受监督的官僚主义的統治将要变成一种战争的专政。缺少一个生气勃勃的党作为政



治上的監督者和調節者，就會導致矛盾的極端積累和加劇。在如火如荼的戰爭氣氛中，人們將能看到的，是朝着農業和手工業方面個人主義原則、朝着吸引外國的和“盟國的”資本的大轉變，是對外貿易壟斷制中的破壞，是政府對聯合企業的監督的削弱，是聯合企業相互間競爭的尖銳化，是它們同工人之間的沖突，等等。在政治方面，這些過程意味着拿破侖主義已臻于完整的地步，在所有制關係方面將發生相應的變化或一系列變化。換句話說，假使曠日持久的戰爭繼以世界無產階級的消極被動，則蘇聯的內部社會矛盾不僅可能而且一定要導致一場資產階級拿破侖主義的反革命。

48. 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結論是明顯的：

1) 在曠日持久的戰爭下，只有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拯救蘇聯這個工人階級國家。

2) 只有世界無產階級先鋒隊擺脫蘇聯的官僚主義而達到完全的獨立，在“友好的”、“結盟的”以及敵對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才是可以思議的。

3) 無條件地支持蘇聯以反對帝國主義的軍隊的活動，必須同進行對戰爭和蘇維埃政府外交政策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密切地配合起來，必須同在蘇聯國內建立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革命黨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來。

### 第三國際和戰爭

49. 第三國際既已在戰爭問題上放棄了原則性的路線，就在失敗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之間猶豫不決。在德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轉變成了一種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市場競爭。同“社會解放”的口號一道提出的“民族解放”口號，粗暴地歪曲了革命的前途，它同失敗主義沒有任何區分。在薩爾問題上，共產黨一開始就屈從于民

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是由于內部的四分五裂才摆脱了这种思想。

第三国际德国支部在战争时期将要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呢，“希特勒的失败是较轻的祸害”吗？但是，如果说民族解放的口号在“法西斯分子”弥勒和勃鲁宁的统治下是正确的，那末，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它怎能就不适用了呢？是不是民族主义的口号只适用于平时而不适用于战时呢？的确，列宁主义的追随者曾经竭力使他们自己和工人阶级陷于彻底的莫名其妙的境地。

50. 第三国际虚弱无力的革命主义是它的错误政策的直接结果。在德国的灾难之后，那些所谓共产党，在所有它们经受过考验的国家里，已暴露出它们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法国支部根本不能动员哪怕是少少几万工人来反对对非洲的殖民主义掠夺，在所谓“民族危险”的时刻，它无疑地将会遭到更多的破产。

51. 没有城乡广泛的劳动群众的革命动员，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不可想像的。同时，这个斗争还要求直接影响陆海军以及运输业。但是，不通过对工人和青年农民的影响，是不可能影响兵士的。运输业方面的影响，是以工会中的一个坚强的据点为先决条件的。在这里，由于工会国际（Profintern）的帮忙，第三国际在工会运动中已经失去了一切阵地，使自己断绝了接近劳动青年的一切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反对战争的侈谈，就好像是痴人说梦一样。幻想是万万行不通了；要是帝国主义对苏联发动进攻，第三国际就要化为乌有了。

### “革命的”和平主义和战争

52. “左翼”和平主义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外，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外，也可能用某种奇特的方法使和平得到保证，从这种前提出发，它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流行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

竭力进行“厌恶战争”的說教，支持自觉的反对者，宣傳反对战争的抵制和总罢工（或者毋宁說是总罢工的神話）。更“革命的”和平主义者有时甚至不厌其烦地談論反战起义的問題。但是对于起义和革命党的阶级斗争和政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什么，他們无论是全体或是个别的人，都是一窍不通的。对他們說来，起义只是针对着統治阶级的一种字面上的威胁，而不是一个长期坚持奋斗的事情。

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利用群众对和平的天生的热爱，使这种热爱和平的情緒脫离开固有的途徑，終于轉变为帝国主义不自觉的拥护者。要是发生战争，絕大多数的和平主义“同盟者”将加入资产阶级的陣营，并且利用第三国际作为一种異常不吉利的东西賦与他們的权威，以爱国主义的思想来迷惑无产阶级先锋队。

53. 反对战争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以及第三国际組織的反法西斯的**巴黎代表大会**都是以自鳴得意的示威、炫耀的游行以及波将金村社等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典型实例。通过后台的操纵人为地拼凑起来的牛鬼蛇神，在吵吵嚷嚷对一般的战争抗議一番之后，将会向四面八方潰散，对特殊的战争連一个小指头也不会举起来表示反对。

54. 用共产主义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集团（其中每一个真誠的惊慌失措者配合着数十个野心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統一战綫，即工人阶级組織的战斗協議，那就会导致完完全全的策略問題中的折衷主义。巴比塞·美因茲堡代表大会（Barbusse-Muenzenberg congresses）认为它們的特殊功績是，它們結合了反战“斗争”的各种类型：人道主义的抗議，个人拒絕服兵役，“輿論”的教育，总罢工甚至起义。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在实际上只能互相冲突的一些方法，說成是一个和諧的整体的組成

成分。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宣传“综合策略”(自由主义者、个人恐怖和群众斗争的联盟)的俄国“社会革命者”，比起阿姆斯特丹集团的鼓舞者来是一批实实在在的人物。但是工人们必须记住，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民粹派的折衷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 小资产阶级和战争

55. 战争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居民的灾难并不比对于无产阶级为少，他们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同无产阶级靠攏得最近。一般地说，只有这样才能用起义的方法来制止战争。但是，用抽象的理论、现成的公式和单纯的命令使自己接近革命道路的农民，甚至比工人少而又少的。1923—1924年间在“面向农民”的口号下造成共产国际中的一次大失败的列宁主义的追随者，显示出不仅完全不能把农民吸引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来，而且连农业工人也完全不能吸引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来。农民国际连一次出殯讲演也未举行就不声不响地埋葬了。曾经大肆宣扬的各国农民的所谓“成就”，原来都是曇花一现的，甚至简直是空想的。正是第三国际在农民政策方面的破产具有特别生动的性质，虽然它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与无产阶级决裂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只有在实践中相信工人阶级有能力领导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农民才会走上这一斗争的道路。因此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商店和工厂。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变成一支真正的力量，农民和小市民才能同它紧密地团结起来。

56. 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无产阶级能够吸引到自己一边的只能是这个阶级的最低阶层，即最贫苦的农民、半无产阶级、低级公务员、小商贩以及被剥夺了一切生活条件而不能进行独立奋斗的被压迫的和流浪的居民。在他们之

上的是一个广泛的极力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倾向于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并且在政治上发展成为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甚或法西斯主义类型的野心家。当他们是在野党时，这些先生采用最放肆的蛊惑宣传，作为以后在大资产阶级眼中提高自己身价的最可靠的手段。

第三国际的罪恶，在于它以自己同小资产阶级虚伪的和平主义领导人的戏剧性联盟来代替向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即向它的广大下层群众施行革命影响的斗争。第三国际不但没有损害小资产阶级的威信，反而用十月革命的威望来加强他们的威信，使小资产阶级的被压迫的下层成为背信弃义的上层的政治牺牲品。

57. **农民的革命道路要通过工人阶级。**要取得农村的信任，必须使先进的工人重新取得对无产阶级革命旗帜的信任。这一点，只有通过一般正确的政策特别是正确的反战政策，才能够办得到。

### **“失败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

58. 假如发生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冲突的问题时，这些国家中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都会毅然决然地拒绝为了资产阶级在军事上的胜利而牺牲自己的历史的利益，因为这种利益归根结底是与民族和人类的利益一致的。列宁的公式“失败是较轻的祸害”，并不是意味着本国的失败要比敌国的失败的祸害轻，而是意味着由于革命运动增长而发生的军事上的失败，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好处，远远胜过由“国内和平”而予以确保的军事胜利。卡尔·李卜克内西给战时的无产阶级政策提供了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在自己的国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会矫正由于失败而引起的祸害，而且也会建立起防止未来的战争和失败的最后保证。对待战争的这种辩证的态度，是进行革命训练从而

也是进行反战斗争的最重要的因素。

59.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时全部工作所必须服从的总战略任务。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结果以及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屠杀的结果（巴黎公社、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若干交战国中的起义运动），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现代战争会带来每个国家内部的各阶级之间的战争，而革命党的任务就是在后一种战争中进行无产阶级胜利的准备工作的。

60. 1914—1918年的经验还证明，**和平的口号**同“失败主义”的战略公式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特别是在曠日持久的战争情况下，它能发展磅礴的革命力量。和平的口号只有当民主党人和其他政治家利用它来进行誑騙的时候，当牧师們进行最迅速的停止屠杀的禱告的时候，当“人类的博爱者”，包括社会爱国主义者在內，泪汪汪地敦促政府在“正义的基础”上迅速媾和的时候，它才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亦即欺騙、麻痹和涣散人心的性质。但是，如果和平的口号能使工人阶级从营房和战壕里走出来，并且同作战双方兵士携手友爱、团结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口号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同和平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了。采取日益广泛而大胆的形式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最可靠的手段。

### **战争、法西斯主义和武装无产阶级**

61. 战争要求“国内和平”。在当前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只能用**法西斯主义**来赢得国内和平。因此，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政治因素。反对战争的斗争要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为先决条件。要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能胜利地击退法西斯主义，那末

反战斗爭的各种各样的綱領（“失敗主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等）就要变成空洞的东西。

要求資產階級的国家解除法西斯匪帮武装，正如斯大林分子做的那样，是走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和奥地利馬克思主义的道路。正是威尔斯(Wels)和奥托·鲍尔“要求”这个国家解除納粹的武装，确保国内的和平。的确，当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民主”政府是能够解除个别法西斯集团的武装的，但这仅仅是为了更加凶殘地解除工人們的武装和防止他們进行武装。昨天才“被解除武装”的法西斯分子，到了第二天，資產階級国家就会讓他們加倍地武装起来，并以加倍的力量把武器对准手无寸铁的无产階級。向国家，也就是向資本家要求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意味着散布最恶劣的民主幻想，意味着麻痹无产階級的警惕性，意味着腐蝕无产階級的意志。

62. 从武装法西斯匪帮的事实出发，正确的革命政策，在于建立自卫的工人武装队伍，在于不知疲倦地号召工人武装起来。这就是目前整个政治形势的重心。社会民主党人，哪怕是最左的人物，即那些喜欢重复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一般詞句的人們，不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談武装工人的問題，便是公开地宣告这种任务是“妄想的”，“冒險的”，“浪漫主义的”，等等。他們不但不(!)武装工人，反而在兵士中間推行他們事实上不实行而且也不能实行的种种宣傳。机会主义者之所以需要談談軍队工作，完全是为了要湮沒武装工人的問題。

63. 爭取軍队的斗爭无可爭辯地是夺取政权的斗爭的最大的一部分。在兵士中間进行坚持不懈和自我牺牲的工作，是每个真正的无产階級政党的革命义务。在党的总政策正确的条件下，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执行这个工作是能有成功的把握的。党的土地

綱領以及有关过渡时期各种要求的一般制度，既触及小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又为他們开辟了得救的前途，在拥有大量农业人口的国家里，这对于軍隊工作的成功，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64. 可是如果以为单单靠宣傳就能把整个軍隊爭取到无产階級方面来，从而一般地可以使革命成为不必要的，那就是幼稚的想法了。軍隊是異己的軍隊，軍隊的異己分子是被紀律的铁箍束縛起来的。宣傳工作能够在軍隊中創立革命的細胞并能在最进步的兵士当中培养同情的态度。宣傳和鼓动只能做到这一点。倚靠軍隊以其主动性来保卫工人組織免于法西斯主义，甚至保证把政权轉移到无产階級手中，这是用甜蜜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严酷的教訓。在革命的时代，只有无产階級本身在行动中向軍隊表示甘願和能够为取得政权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軍隊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才能轉到无产階級这一边来。这种斗争必須以武装无产階級为先决条件。

65. 資產階級的任务是防止无产階級爭取軍隊。法西斯主义用武装支队来解决这个任务时，并不是沒有成功的。无产階級当前迫切的紧急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保卫无产階級的組織不受法西斯匪帮（在他們背后的一定距离有着資本主义国家）的进攻。誰要是肯定工人沒有武装自己的可能性，誰就是拿这个論断来宣布工人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是沒有防御能力的。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必談社会主义了，不必談无产階級革命和反战斗争了。如果是这样，共产主义綱領就应当收起来，馬克思主义就应当取消了。

66. 可能放棄武装工人的任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无能为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将向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投降的人。正如历史所证明的，武装任务本身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假使工人們真正地懂得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問題，那末他們就会获得武器。向工人



們讲解政治形势，不隱瞞，不縮小，驅散一切安定人心的謊言，这是革命党的首要职责。的确，如果不是用拿两把刀子对付每一把法西斯分子的刀子，拿两支手枪对付每一支手枪的办法，人們怎能保卫自己抵抗死敌呢？别的答案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

67. 应当从哪儿获得武器呢？首先是从法西斯分子那里。对资产阶级警察来说，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是一个可耻的口号。对革命的工人来说，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口号。但是法西斯的兵工厂并非唯一的来源。无产阶级有着千百万条自卫的途径。我们不应忘记，正是工人们而且也只有他们，才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制造各种各样武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务必清清楚楚地懂得，我们不能规避自卫的任务。一个革命党必须毅然决然地采取主动，把战斗的工人支队武装起来。为此，在武装工人的问题上首先必须清除各种各样的怀疑主义、犹豫不决和平主义的議論。

68. 工人民兵或自卫队的口号，只就它是一个武装民兵的问题来讲，具有革命的意义，否则，民兵就要变成一场戏剧性的表演，变成一次炫耀，从而成为一种自我陶醉。最初的工人支队不一定要有榴弹炮，也不必要有坦克和飞机。然而在二月六日那天，在巴黎，在一个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一些用手枪和縛在木棍上的剃刀武装起来的队伍，几乎攻占了巴本皇宫的宫殿，造成政府的垮台。明天，类似的一些队伍，就能够抢夺无产阶级（原文如此）的报馆或工会的总指挥部。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人多势众。群众手里有了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也会创造出奇迹的。在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最原始的武器可以为更优良的武器开辟道路。

69. 統一战綫的口号，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以宣传和实际运用反法西斯斗争的明确办法来补充的话，就要蜕化成为中派主

义的詞句。在創立地方的保卫委员会方面，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統一战綫。保卫委员会所以需要，是为了建立和团結工人民兵队。这些支队一开始就必须搜罗武器。自卫队只是武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一个阶段。一般地說来，革命是沒有別的道路的。

### 反对战争的革命政策

70. 成功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訓練党的干部**，使他們正确地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条件，正确地理解伴随着帝国主义战争而发生的一切政治上的变动。在这个万分火急的問題上，还只是搬弄一般的詞句和抽象的口号的党，是真正可悲的！血腥的事件将会压到它的头上来，把它压碎的。

需要成立一些专门小组，研究研究 1914—1918 年战争的政治經驗（帝国主义者对战争的思想意識方面的准备；軍事总指挥部如何通过爱国主义的报刊来迷惑輿論；反对提綱的防御进攻的作用；无产阶级陣营內的各个集团；馬克思主义分子的孤立，等等）。

71. 对于一个革命党說来，**宣战的时机**是特別重要的。资产阶级的和社会爱国主义的报刊，同无綫电广播及电影配合一起，向劳动群众大量灌輸沙文主义的毒素。甚至最富于革命性和久經鍛炼的党，也不能是全体党员都抵抗得住这种毒素的。目前关于各个布尔什維克党的彻头彻尾捏造的历史，对于先进工人进行有现实意义的考驗的准备毫无作用，而是拿一种杜撰的理想形式哄騙先进工人陷入消极的无能为力的状态。

对于沙皇俄国，本来无论怎样想入非非也不能把它看做是一个民主国家或者是文明国家，也不是属于实行自卫的一方，但是杜馬中的布尔什維克党团和孟什維克党团一起却不顾这个事实，在一开始就发表了一个充滿粉紅色的和平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社会爱

国主义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不久之后采取了更富于革命性的立场，但在审讯该党团时，除穆拉诺夫外，所有被控诉的代表和他们的理论指导加米涅夫，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列宁的失败主义理论。在开始时，党的地下工作几乎断送了。革命的小册子是逐步地开始印行的，它们把工人们团结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然而没有提出失败主义的口号。

战争的头两年，大大地伤害了群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并且使党向左转。但是，把俄国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的二月革命，引起了“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新的强大浪潮。布尔什维克党的绝大多数的领导者，甚至在那时也没有经得起这个浪潮。1917年3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向党的中央机关发出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指示。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组织的和解，在多数城市里，发生了直接的合并。为了开展党的国际主义战线，需要最坚决的革命者，主要是彼得格勒各先进地区的革命者的抗议；需要列宁回到俄国，同社会爱国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最优秀、最富于革命性和经久锻炼的党的情况，就是如此。

72. 对于先进的工人说来，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经验，具有无可估量的教育意义；这种研究向他们指出他们不得不经受资产阶级舆论的巨大压力，同时教导他们，尽管在战争开始时完全孤立也决不要失望，不要把武器收藏起来，不要灰心丧气。

需要同样仔细地加以研究的，是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内部的政治阵容，不管这些国家是已经参战还是保持中立。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经验，具有特别的意义，那里发生的事件尽管在进程方面与俄国不同，但归根结底，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必须学会逆水游泳。

73. 必须密切注意目前正在酝酿的当炮灰的爱国主义的准备

**活动:** 以推卸責任为目的的外交上的搪塞支吾; 公开和隱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为給自己准备一条由和平主义到軍国主义的桥梁而提出的叛变性的公式; “共产党”领导人空空洞洞的口号, 这些人在战争的第一天就惊慌失措, 正好像德国的“領袖們”在議會纵火的当天夜里所表現的那样。

74. 必須仔細收集政府官員和反对派发表的論文和講話中最能說明特征的材料, 拿它們来同上次战争的經驗进行比较; 預測愚弄人民的进一步工作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向; 然后以一系列的事实来证实这些預言; 教导无产阶级在事变中善于独立决定自己的方針, 而不至于措手不及。

75. 反对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的大力鼓动工作, 不应从抽象的公式出发, 而应从打动群众心弦的具体事实出发。不仅需要苦心孤詣地揭露公开的軍事預算, 而且需要揭露軍国主义的一切伪装形式, 抗議战争的布署、軍事的設備和定貨, 等等。

工人們經過优良的訓練, 必須在无产阶级所有一切的組織中以及劳工报刊上提出关于战争的危害性和关于反战斗争的問題, 要求领导人清楚而确切地回答這個問題: 怎么办?

76. 为了贏得青年的信心, 不仅需要向道德腐敗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国际的令人沉悶的官僚主义宣布战斗到底, 而且需要真正地創立一个以年青一代的批評精神和革命主动性为基础的国际組織。

必須喚起劳动青年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軍事化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此同时, 为了革命的利益, 必須把劳动青年动員起来, 实行軍事化(組織反法西斯主义的保卫委员会、紅色战斗支队、工人民兵、爭取武装无产阶级的斗争)。

77. 为了在工会和在其他工人阶级群众組織中占領革命陣地,

必須同官僚主义的极端作风毫不留情地断绝关系，在有工人的地方争取他们，领导他们从局部性的任务前进到全局性的任务，从防御转入进攻，从爱国主义的偏见进到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既然大多数国家的工会官僚机构的上层实质上是资本家警察的非正式的组成部分，那末，一个革命者就必须知道如何同它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要把合法的活动同非法的活动结合起来，要把战斗的勇气同谨慎的谋略结合起来。

只有采用这些互相结合的办法，我们才能顺利地要把工人阶级，首先是青年，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下来，才能打开通向资本主义兵营的道路，才能唤起一切被压迫者。

78. 只有女工和农村妇女也参加反对战争的斗争，这个斗争才能成为真正广泛的群众性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的蜕化以及第三国际的官僚主义的变质，向无产阶级中受压迫最深、权利被剥夺得最多的阶层，也就是说，首先是劳动妇女，发出了最沉重的打击。要唤醒她们，要赢得她们的信心，要向她们指出真正的道路，意味着要把社会中受蹂躏最厉害的一部分人们的革命热情调动起来，以便反对帝国主义。

妇女中间进行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尤其要力求保证做到以革命的女工来代替被动员起来的男工，因为在战争的情况下，党和工会的一大部分工作都不可避免地要转交女工去接办。

79. 万一无产阶级感到自己无力用革命（这是防止战争的唯一的手段）的手段来防止战争，那末，工人就要同全体人民一起，被迫参军和参战。拒绝服兵役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消极抵抗、开小差和怠工等，都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根本矛盾的。但是正像工厂中的先进工人感到自己是资本的奴隶而随时准备解放一样，资本家军队中的先进工人也应感到自己是帝国主义

的奴隶。今天他是被迫出卖自己的精力甚或生命，但决不肯拋棄自己的革命意識。他要繼續作一个战士，要学会如何使用武器，甚至在战壕里都要解說战争的階級意义，要把有不滿情緒的人團結到自己的周圍，要把他們組織起来，要傳達党的主張和口号，要密切地注意群众情緒的变化、爱国主义浪潮的低沉、义憤的增长，并要在危急关头劝导兵士来援助工人。

#### 第四国际和战争

80. 反对战争的斗争，是以斗争的革命工具——党为先决条件的。现在既沒有一国規模的党，也沒有国际規模的党。必須以过去的全部經驗（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經驗在內）为基础，建立一个革命党。拒絕为建立新的国际而进行公开的和直接的斗争，意味着对两个現存的国际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支持；在这两个国际中，一个将要积极地支持战争，而另一个則只能瓦解和削弱无产阶级先鋒队。

81. 当然，繼續留在所謂共产党的队伍中的忠实的革命工人，为数还不算少。他們繼續支持第三国际，在許多場合下，只能解釋为他們的革命热誠被引錯了方向。能把他們吸引到新国际的旗帜下来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让步，不是迁就他們的偏見，而是对斯大林主义（即官僚的中派主义）的有害的国际作用进行系統的揭露。因此，必須特別明确而果断地提出战争的問題。

82. 同时，必須密切地注意改良主义陣营中的內部斗争，把向革命方面发展的左翼社会主义派別及时地吸引到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来。衡量一个組織的各种傾向的最好的尺度，是它在實踐中、在行动中对待保卫祖国、对待殖民地的态度，特別是在本国资产阶级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奴隶的情况下的态度。只有在“保卫祖国”的最

緊急的問題上同官方的輿論完全而真正的決裂，才意味着從資產階級觀點向無產階級觀點的轉變，或者至少是轉變的開始。在同這一類型的左派組織接觸的時候，應當對他們的政策中的一切猶豫不決的表現進行友好的批評，並在有關戰爭的一切理論與實際問題上共同研討。

83. 在工人階級運動中，有不少政治家，至少在口頭上承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失敗，但他們同時認為**開始建立一個新國際“這還不是時候”**。這種觀點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而是幻想破滅的斯大林主義者或悲觀失望的改良主義者的觀點。革命鬥爭是不容間斷的。在今天，革命鬥爭的條件可能是不利的，但是，不善于逆水游泳的革命者，不算是一個革命者。認為建立新國際是“不合時宜的”這種說法，就同宣布階級鬥爭，特別是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不合時宜的一樣。在現時代，無產階級的政策不得不把國際任務提到自己的面前來。國際任務不得不要求國際幹部緊密地團結起來。除非向帝國主義投降，否則這項工作是連一天也不能拖延的。

84. 當然，誰也无法預言戰爭爆發的確切時間，也无法預言在戰爭的什麼階段會建立新的政黨和第四國際。我們必須竭力使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準備工作走在新戰爭的準備工作的前頭。然而很可能帝國主義也在这个時期趕上了革命。但是連這條預示着有重大犧牲和災難的道路，也決不能使我們擺脫**立即建立新國際**的義務。我們的準備工作越向前開展，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革命幹部越是堅定不移，他們在參戰國中的工作進行得越是系統化，他們的工作越是扎扎實實地建立在正確的战略戰術原則和組織原則的基礎上，那末，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就會進行得越快。

85. 帝国主义战争一开始打第一炮，就会粉碎第二国际腐朽的脊背，就会瓦解第二国际的各国支部。战争将会彻底暴露第三国际的空虚和无力。但是到了那时，帝国主义战争也不会饶恕优柔寡断的中派主义集团的，尽管这些中派主义集团规避有关共产国际的问题，一味追求民族基础，不使任何问题得到一定结论，同时缺乏长远的计划，暂时地依靠工人阶级的骚扰和混乱过日子。

即使在新战争开始时，真正的革命者还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我们也丝毫不怀疑，在这个时候，群众转向革命道路，会比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来得更快，更果断，更坚决。一次新的起义浪潮将能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获得胜利，而且必然要获得胜利。

在我们的时代，只有以国际原则为基础并加入无产阶级世界党的队伍中的组织，才能在本国的土壤中扎根，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今天，反对战争的斗争就意味着争取建立第四国际的斗争！

